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 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15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十五卷

联共(布)、共产国际 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9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ISBN 978-7-80199-607-7

I. 联… II. 中… III. ①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料—中国—1931—1937 ②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料—中国—1931—1937 IV. K260.6 D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1145 号

书 名: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

译 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责任编辑: 姚建萍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 1000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40mm×203mm 1/32

字 数: 349 千字

印 张: 14

印 数: 1—1100 册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99-607-7

定 价: 298.00 元 (共五卷)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刘宋斌

学术指导

李 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 M. 格里戈里耶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 B. 舍维廖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
研究员)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V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ОВЕ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1931—1937
В ДВУХ ЧАСТЯХ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ЕЙТНЕР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РАБОТЫ),
К. М. АНДЕРСОН, В. И. ГЛУНИН, А. М. ГРИГОРЬЕВ,
И. КРЮГЕР, Р. ФЕЛЬБЕР, К. В. ШЕВЕЛЁВ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丛 书 前 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

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2005年11月
于京郊自得园

译者前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三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即原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大型系列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四卷(两册)的中译本,根据莫斯科2003年俄文版译出。本卷文件集共收录自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期间有关档案文件411份,绝大部分为首次发表。有些文件阐述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在上海保卫战期间(1932年1月至2月)、在冯玉祥察哈尔抗日人民军发动过程中(1935年5月至8月),以及在有名的“福建事变”期间(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对中国事态发展所持的立场,有些文件披露了莫斯科对中国红军于1934年秋放弃中央苏区的计划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共和中国红军领导人(首先是毛泽东)所持的态度,有些文件揭示了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七大前后制定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和莫斯科对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发生变动的反应。这一卷首次全面公布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机构(政治书记处、七大前存在的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

会、七大上成立的并由季米特洛夫领导的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这个时期对华政策的问题的决议和指示。还公布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讨论对华政策问题的会议的记录。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一卷首次发表了1932年至1934年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共中央、中共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以及远东局与1933年至1934年间驻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局之间往来的电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共中央1936年至1937年间往来的电报。该卷还收录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政治、军事代表给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书信、远东局成员给红色工会国际和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书信等,并且发表了共产国际档案中所保存的反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31年至1937年间工作情况的所有文件。

这些文件都很珍贵,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学术研究参考价值。为了及时译介给我国史学界,我们于2002年向原书编者购买了中文版翻译出版权,并于2003年上半年组织力量进行翻译。中译本分三册,列为我们编译的大型文献档案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13、14、15卷。

本书俄文版由前言、文件正文、图书目录、人名索引四部分组成,中译本全文译出前两部分和第四部分(放在第15卷末),第三部分从略。为反映文件原貌,本卷译本仍保持了原文件体例,未作任何删节。在俄文版中注释是文尾注和脚注,为便于读者阅读,中译本一律改为脚

注。有些注释对中国读者来说实无必要，翻译时作了删节。译者新加的注释在注后标有“译者”字样。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很大难题，是准确还原中国人的本名，文件中有些中国人使用的是化名或方言拼音姓名，由于年代较久，又缺乏可参考的中文资料，有些人的名字难以查实，只好音译或估译，这种情况在行文中或脚注中作了说明。

文件中有些俄国人的名和父名缩写字母，因不知全称，无法译出相应汉字，为统一起见，在中译本正文中一律删去不译，只译姓，但在注释中则注明其名和父名的缩写字母。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关心和帮助。著名汉学家、原书俄方编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A. M. 格里戈里耶夫教授和 K. B. 舍维廖夫博士热情地帮助解决语言理解等方面的某些疑难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张注洪教授、刘桂生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读译稿，帮助订正译文中的不准确之处。在此我们特向他们表示谢意。

本书翻译工作由马贵凡同志组织。

参加翻译的有(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贵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审)；

王昌滨(中共中央党校译审)；

宋洪训(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李永昌(辽宁大学教授)；

李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董友忱(中共中央党校译审)。

全书译稿最后由宋洪训、马贵凡同志校定。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二部分：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

(1935年7月—1937年6月)

333. 王明给米夫的信(1935年7月19日) 33
334. 李立三就阿拉木图的工作给米夫的报告
(1935年8月3日)..... 34
335.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向起草关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的决议的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摘录)(1935年8月18日) 42
33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第3号记录(摘录)
(1935年9月24日) 44
33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机关结构的决议(摘录)
(1935年10月2日) 45
338. 潘汉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非常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10月15日)..... 47
33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非常会议第8(A)号记录(摘录)(1935年10月15日)..... 56
340. 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35年10月29日)..... 59
341.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吴玉章的信
(1935年11月16日)..... 63
342. 中国工农红军的呼吁书(1935年11月) 66
343.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戈帕涅尔的便函(1935年12月20日)..... 69

344. 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提出的
1936年第一季度中国工作计划
(1935年12月23日)…………… 71
345. 赖特就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中共培养干部问
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书面报告
(1935年12月25日)…………… 78
346. 库西宁书记处给叶若夫的信
(1936年1月5日)…………… 83
347. 王明与邓文仪谈话记录(1936年1月17日)…………… 89
348. 季米特洛夫给伏罗希洛夫的信
(1936年1月21日)…………… 103
349. 王明与邓文仪谈话速记记录
(1936年1月22日)…………… 104
350. 王明同邓文仪谈话速记记录
(1936年1月23日)…………… 108
351. 王明给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的信(摘录)
(1936年1月23日)…………… 111
352. 陈丕时给米夫的信(1936年1月23日)…………… 112
353. 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36年1月29日)…………… 115
354.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关于干部问题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书面报告
(1936年2月2日)…………… 116
355. 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36年2月9日)…………… 129
35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为中共培养干部的
决定(1936年2月11日)…………… 131
357.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关于为中共培养干
部的紧迫任务给联共(布)中央的书面报告
(1936年2月19日)…………… 134

-
358. 米夫关于中共干部问题的书面报告
(1936年3月4日) 139
359. 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信
(1936年3月5日) 150
36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的形势和中
共的任务的指示文件草案
(1936年3月5日) 156
361. 盛世才给王明的信(1936年3月15日)..... 168
362.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
(摘要)(1936年3月23日)..... 178
363. 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向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的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书记处关于中国的形势和中共的任务的指示
文件草案的补充建议(1936年3月27日)..... 185
364. 王明和康生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书面报告
(1936年4月16日)..... 189
36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第43(A)号记录
(摘录)(1936年5月19日)..... 196
366.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
果整理的第45(A)号记录
(1936年5月20日)..... 197
367.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为同中共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问题进行谈判提出的建议
(1936年5月20日)..... 198
368. 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36年5月25日)..... 204
36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共代表同陈铭
枢谈判的指示(1936年6月19日)..... 205

37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
15周年的决定(1936年6月23日) 207
371.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
果整理的第53(B)号记录
(1936年6月23日)..... 209
372. 陈铭枢给中共中央委员们的信
(1936年7月1日) 210
373. 潘汉年给王明的信(1936年7月1日) 220
374. 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6年7月初) 223
375.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
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
(1936年7月23日)..... 230
37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第60(A)号记录
(摘录)(1936年7月23日)..... 235
377.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
(不早于1936年7月25日) 236
378.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
果整理的第61(A)号记录(摘录)
(1936年7月26日)..... 238
379. 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
(1936年7月27日)..... 240
38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
电报(1936年8月15日)..... 241
38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给
中共中央的贺电草稿(1936年8月23日)..... 245
382. 赖安关于艾萨克斯的书面报告
(1936年9月7日) 248

-
383. 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
(1936年9月8日) 251
38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格伯特关于上海
工作的报告(1936年9月29日) 253
385. 季米特洛夫给王明的电报
(不晚于1936年11月20日) 262
386. 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
(1936年12月14日) 263
38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6年12月16日) 265
38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信
(1936年12月23日) 267
389.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
果整理的第106(B)号记录(摘录)
(1937年1月17日) 268
39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7年1月19日) 270
39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第107(B)号记录
(摘录)(1937年1月20日) 273
39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7年1月20日) 274
393. 宋庆龄给王明的信(1937年1月26日) 275
39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
电报(1937年1月28日) 278
395.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
果整理的第109(A)号记录(摘录)
(1937年1月29日) 281
39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 (1937年2月5日) 282
39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
电报(1937年3月2日) 283
39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7年3月5日) 284
39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
电报(1937年3月5日) 285
400. 王明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1937年3月13日) 286
40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7年3月22日) 288
40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
电报(1937年3月28日) 290
403. 乌里茨基给季米特洛夫的信
(1937年4月3日) 291
404. 瓦尔加关于中国主要发展趋势的报告的基本论点
(1937年4月20日) 294
405. 上海党的工作者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
表团的信(1937年5月14日) 303
406. 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7年6月17日) 308
407. 中共中央关于周恩来同蒋介石第二次谈判情况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报告
(1937年6月17日) 310
408. 王稼祥关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中共的任务给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提纲
(1937年7月10日) 313

附录

409. 毛泽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

(1939年8月26日).....	325
410. 布劳恩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的关于福建 事变的调查材料(1939年9月21日).....	337
411. 布劳恩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 (1939年9月22日).....	343
人名索引.....	355
勘误表.....	427

第二部分

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
(1935年7月—1937年6月)

收入本卷第二部分的文件阐述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

这期间的国际局势问题和中国内外政治形势问题,在现有的文献中都作了相当详细的分析。与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领导立场的演变有关的主要问题也都有非常全面的阐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发表的文献和研究著作,为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做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第二册中发表的文件为阐明这一课题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使我们有可能对迄今还在争论的许多问题作出回答。

研究人员(包括本文件集编者)把共产国际这些年对华政策的演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到1936年七八月,这个时期,建立苏维埃人民政府的口号和苏维埃在社会经济政策问题上及其他方面政策问题上的相应指导方针,被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所取代,中共的政策也随之作出了进一步的修订——放弃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由同南京政府的某种尖锐对抗转为逼迫蒋介石接受同中共联合抗日的政策。

众所周知,共产国际和中共新政治方针的起点,是1935年六七月起草的所谓1935年的《八一宣言》。正如本卷总前言和第一部分引言所指出的,该《宣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1934年至1935年上半年的分析研究为基础起草的,是在转向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工作过程中所制定的新策略的情况下最后形成的。在对《宣言》起草人和内容产生影响的一般性决议中,应当指出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所赞同的法国人民阵线政策。由此得出了“抗日人民统一战线”和“人民”术语,在中共后来的许多文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直到1936年年中“人民”术语才被“民族”术语取代。

在代表大会召开前所确定的共产国际政策中的其他重大变化,除了主要变化,即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提议修订对社会民主党作用的评价和共产党对它的态度^①外,直接与中共有关系的是恢复对民族改良主义党和国家革命党在东方国家解放运动中的作用的正面评价,承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大部分阶层也包括在这种运动中,与此相联系,建议当地共产党采取同这些势力达成临时协议的策略^②。东方书记处领导人兼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库西宁,在1935年6月14日主持召开共产国际七大筹委会第一次会议时,号召各党代表对本党策略作出重大修改^③。

利用了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会议记录的中国作者说,王明起草的《八一宣言》草案在7月14日的代表团会议上进行了第一次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草案修改委员会,该委员会于7月15日完成了文件修订工作^④,1935年7月19日,将草案呈送给米夫(第338号文件)^⑤。

1935年8月2日,季米特洛夫在七大上作报告时说:“我们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与一切准备真正为拯救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进行斗争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

-
- ① 《共产国际七大与反法西斯反斗争(文件集)》,莫斯科1975年,第28—30页。
 - ② B·库丘莫夫:《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统一战线而斗争》,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5年第20—21期,第109页。
 - ③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卷宗1,第2—3页。
 - ④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第131页。在起草《八一宣言》时期,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组成人员是王明、康生、李复生、饶漱石、吴玉章等。
 - ⑤ 王明后来写道,他曾口头向斯大林报告过文件的内容,斯大林赞同文件的基本论点,但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只考虑实力(见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第131页)。据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工作人员A.Γ.克雷莫夫(郭绍棠)口头回忆,斯大林还对王明说,只有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包括南京军队时,才能给日本侵略者以反击。

中国代理人的反帝统一战线”^①。8月7日,王明在大会上发言时宣布,《宣言》呼吁成立国防政府,并说明了《宣言》建议对中共政策作出的一些修改(对待富农和小土地所有者,要修订税收、财政、贸易等政策),以“使中共政策具有明显的全民和民族性质”。王明还建议改变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态度,理由是孙中山的主要目标是争取国家独立,因此,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而不是蒋介石是孙中山最优秀革命传统和思想的继承者”^②。

大家知道,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途径问题不同于在其他东方国家。如果说在其他国家成立苏维埃的口号是作为宣传口号提出的,那么对于中国,大会决议中则建议“把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战斗力同开展人民反帝运动结合起来,并且这种运动要在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而首先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仆从的国民革命战争口号下进行”。苏维埃应当成为联合全体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倡导者和核心。^③

在著作中至今还没有充分论证对中国统一战线策略的这种处理方法。在本卷编者所了解的代表大会筹委会的材料中,在季米特洛夫全宗的材料中,在他的日记中,在东方书记处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文件中也都没有对此作出说明。看来,提出这种处理方法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存在苏区和红军这个事实,以及由于七大期间莫斯科缺少有关苏区和红军的可靠情报,也是为了宣传的目的,大大夸大了它们的实际力量和潜力。这一点在季米

① 季米特洛夫:《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1935年8月2日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见《共产国际七大与反法西斯反战斗争》,第171页。

② 王明:《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第26—49页。

③ 《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1935年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就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5年第23—24期,第144—145页。

特洛夫的报告中,更在王明的报告中和其他中国代表的发言中都有反映。提出这种处理方法的另一个可能的理由也许是有这样的考虑:在与中共领导缺乏有效联系的情况下急剧改变口号会使中共中央以及与之失去联系的中国的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迷失方向,因为自1927年以来这些党组织一直在实行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国家苏维埃化的方针,并且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警察的迫害,它们蒙受了巨大牺牲。

最后,急剧改变口号会意味着“单方面解除武装”和单方面对今天的敌人作出让步,新策略制定者认为,今天的敌人明天就可能成为就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途径问题,以及一致抗日问题进行谈判的伙伴。

这里也有以前由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共六大决议和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所阐明的“正确路线”的惯性,谁也没有撤销这些决议,多年来任何偏离这些决议的行为都被斥之为“陈独秀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背叛”,而主要的是这样一个情况:苏维埃化方针是由斯大林本人提出和论证的。正因为如此,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中以及他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许多其他文章中都试图证明(与实际背道而驰),似乎中共的新方针符合斯大林早在1927年作出的“指示”^①。

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不久,即9月7日,1935年的《八一宣言》草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进行了审议;9月10日,最后稿经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通过,1935年9月24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得到批准[第333、336号文件]。众所周知,

^① 王明:《为反帝统一战线而斗争与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5年第33—34期,第7—25页。A. C. 季托夫说,王明在70年代初同他的一次会晤中说过,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及其后修改和撤销苏维埃口号的最大困难之一是有这样一个情况: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中国苏维埃化方针都是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与呼吁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同时,在《宣言》中还提出了该政府的十点行动纲领,其中包括收复失地,救灾治水,安定民生,没收日本人在华的一切财产并将其充作抗日战费,没收汉奸的财产和粮食并把它们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发展本国工商业,加薪加饷并改善工农军学各界生活,实行民主政治,释放一切政治犯。《宣言》中说,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表示愿意成为“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准备“首先加入联军”。把代表大会开始前送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文件草稿^①同最后稿作一比较,证明它们几乎完全一致。1935年10月1日,文件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俄文稿《宣言》首次在《共产国际》杂志12月号^②上公布。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论述中国1935年至1937年统一战线形成史的大量著作中,关于联共(布)(斯大林)、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在共产国际七大到1936年七八月这一时期的作用和立场问题,至今仍然是争论不休的问题^③。不同出版物的作者在解释莫斯科(斯大林,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立场的相同点与区别时存在着分歧。由于本引言篇幅所限,不详细分析上述出版物,我们只指出,争论参加者往往试图通过以下两种办法来弥补“第一手”文件证据的缺乏(有时是不知道已经公布的文件):要么构建由以前的(已经过时的)观点引出的投机公式(可以把J.加弗关于毛泽东的“特殊路线”、他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重大分歧”以及毛“违背”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59,目录16,卷宗14,第25—35页。

② 《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5年第33—34期,第106—111页。

③ 见《对第二次统一战线的新看法(观点交流)》,载《中国季刊》,伦敦1992年第129期,第149—183页。

他们的意愿掌握中共政权的观点归入此类),要么试图根据对某个活动家例如王明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所作的分析得出有关他的立场的结论,而这些文章发表时通常是未公开发表的言论作过很大修改的版本,并未反映这些言论中所含有的许多论点(其中也有策略上的考虑)。还应当指出,多数西方作者表现出惊人的天真,认为(看来是按自由学术出版物风格),王明在联共(布)或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上,也包括在《救国报》或《救国时报》上发表的文章反映了他本人的观点。本卷发表的文献资料,使我们有可能对引起争论的主要问题作出有根有据的回答。

根据档案材料和回忆录可以确认,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以及苏联特工部门早在共产国际七大结束前就已采取措施,让中共中央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中共组织了解新的策略。在代表大会结束前就派遣参加过《八一宣言》讨论的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成员张浩(李复生)扮成商人前往中共中央,他于1935年11月中旬到达中共中央驻地。为了免遭不测,他熟记了“四条指示”,即关于提出统一战线政策、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关于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和关于改变对富农的政策指示,以及关于莫斯科(斯大林本人)同意红军向西北或向北推进,以便通过新疆或蒙古同苏联建立联系并得到它的援助^①的信息。中共中央还被告知,统一战线策略要求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南京蒋介石政府的斗争,把苏维埃运动和国民革命斗争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等等。根据这些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1月以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②,而在12月发表了关于改变对

①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1997年版,第314,354页;李义彬主编:《从内战到抗战》,上海1995年版,第287—289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80—582页。

富农的政策决议^①、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②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③。最后这个文件反映了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对1935年8月事态的看法,确定了中共中央直至1936年8月的基本方针。1936年2月中共中央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四条指示”传达给了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和朱德^④。

据一些中国作者说,大约在1936年初中共中央收到了注明日期为1935年10月的文件,标题是《[中共]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⑤,其中未提及《八一宣言》,但讲述了一些指示,反映了它的基本内容^⑥。1936年3月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看来是主要决议)(第374号文件)。收到这些正式文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专门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得出结论:中共中央在12月通过的政治决议完全符合共产国际路线的精神^⑦。1936年5月中共领导收到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所作的报告(第362号文件)也应使他们确信这一点。

中共中央根据这些指示和十二月决议,在1935年底至1936年上半年同已加入国民党军队的东北军的军官及其司令官张学良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83—588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89—597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98—623页。

④ 《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北京1997年版,第62、64—65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61—571页。

⑥ 关于该文件出自何人之手,在中国学者当中发生了争论,结果是多数人倾向于认为,它是由中共临时上海中央局起草的,该局或是从报刊上,或是通过华北的一个党组织得到了关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中共的政策有改变的消息。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见《从内战到抗战》,第282—287页。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在1935年11月22日给日本外务省的报告中说,《八一宣言》已在上海广为传播(见《党史研究资料》,北京1994年第7期,第25页)。

⑦ 《从内战到抗战》,第287—288页。

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竭力争取张在抗日倒蒋的立场上同红军合作。尽管张学良直到1936年底还拒绝把推翻蒋介石的要求列入合作纲领,但众所周知,他已同意与中共领导达成实现停战的秘密口头协议,赞同中共中央在西安设常驻代表,实际上是允许共产党组织在他的军队及其所控制的地区进行半公开的活动。尽管在红军进军山西省的问题上同中共领导有分歧(张认为红军应向宁夏进发),但张还是同情中共领导的立场。张学良对中共目标的同情到1936年年中已达到中共中央认为可以接纳他人党的程度(第380号文件)。在这里张学良希望得到苏联支持的念头起了不小的作用,关于苏联支持的问题,从1936年3月起在他同中共代表的会晤中就讨论过。几乎同时,中共领导同以爱国著称的国民党第17路军军长杨虎城建立了联系。到1936年6月同他也达成了互不侵犯协定,建立了常设联络点,互派了代表^①。

在同张学良和杨虎城保持接触的基础上,到1936年夏天,中共领导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即成立与南京相抗衡的西北政府和包括红军部队和张学良、杨虎城军队的(抗日)联军计划已完全成熟。这些方针具体体现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呼吁上。毛泽东在1936年7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大联合”计划说成是党的最具现实意义的任务^②。同时中共领导还试图在反日讨蒋口号基础上同为南京和蒋介石所不满意的两广军政首领建立联系。从1935年起就呆在香港的中共华南地下工作委员会领导人宣侠父,在1936年上半年同李济深、蔡廷锴、陈济棠、蒋光鼐等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些人是6月初两广联军发动反蒋行动的倡导者,该军在向湖南进军时,宣

^① 关于中共代表同张学良和杨虎城接触的详细情况,见《从内战到抗战》,第506—536、551页。

^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北京1993年版第1卷,第562页。

侠父就在广西省中心城市南宁市^①。中共中央支持这次行动,认为这次行动以及南京与西南的整个对抗为成立西北政府创造了有利条件^②,成立该政府的方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6年8月12日通过的《关于近期战略方针的建议》中得到了确认^③。中共领导在恢复无线电通讯后给莫斯科发去的头几份电报中,有一份发的就是这份计划,请共产国际执委会审议(第374号文件)。

另一个行动纲领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对《八一宣言》中的方针逐步修订之后于1936年7月前在莫斯科确定的。

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团于1935年8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会议在将共产国际七大总的方针和《八一宣言》草案中的论点加以具体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如何在中国运用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会议的主要材料即王明的内容丰富的报告和结束语,首次尝试论证和阐明了新的基本策略方针的内容,即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思想,以及根据《宣言》中提出的该政府的行动纲领(“十点”)拟对中共政策作出的修改。

王明的报告反映了制定新方针的出发点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共代表团的立场所固有的矛盾,这种矛盾来源于把苏维埃革命和反帝革命结合起来的方针。

新纲领的矛盾性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王明对苏维埃政府纲领和提出的国防政府纲领的相同点与差异的解释上。王明说,这两个纲领基本相似,其主要共同点是为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口号,同时他又指出,主要的差异是在第四点,《宣言》在这一点中说的是只没

① 宣侠父:《西北远征记》,第6—7页。

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1卷,第568页。

③ 《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1卷,第568—569页;《从内战到抗战》,第303页。

收汉奸的土地和财产,而苏维埃政府,报告人论证说,是应该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的^①。王明关于苏维埃和红军似乎已经在一省或数省取得革命胜利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和矫揉造作的。王明把红军至今未能占领一个城市的事实说成是它的“优势”,其理由是它在农村没有遭受到帝国主义的打击^②。

报告中说明了苏维埃对富农、小私有者、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政策及税收政策、苏维埃劳动法和对知识分子与专家的态度将作出重大修改的理由。建议放弃对私有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在中国条件下的不切实际的过分的经济要求,取消对生产实行工人监督的这个在中国条件下无法实行的口号,第一次呼吁修改苏维埃宪法,扩大小资产阶级代表以及所有参加同侵略者的武装斗争的人们的政治权利^③。宣布,在宣传中和在组织群众反帝活动时,应该首先提出拯救中国的口号,而不是“保卫苏联”的口号^④。

在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中建议重视在“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以及工人和劳动者的所有其他群众性组织中的工作,同时要特别注意建立反帝协会和同盟^⑤。

在反帝宣传和活动中,建议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摒弃对西方国家外交、商贸和宗教人士采取“游击的做法”(扣留人质、进行攻击等)。

策略上的这些变化对中共来说是如此明显,以致在会议上有人就提出必须对这些变化作出有充分根据的和耐心的解释工作。在康生的报告中直截了当地谈到,“如果你们用干巴巴的语言通报这个方针,人们不会相信你们,也许会谴责你们搞机会主义,甚至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33,第 14—17 页。

②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33,第 10 页。

③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33,第 19—32 页。

④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33,第 82—83 页。

⑤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33,第 49—50 页。

有可能把你们抓起来，因为你们是如此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正式批准《宣言》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和中共代表团就采取一些措施在中国国内外传播该文件，宣传其基本论点^②。为此在1935年11月起草并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宣言》（第341号文件）、《告工农红军书》（第342号文件）和《东北抗日联军首领电报》，该电报注明的日期是1935年10月11日^③。这个文件及《第二次宣言》的收件人中首次包括了蒋介石。《第二次宣言》中建议立即召开所有抗日团体的“全民代表会议”以便制定组织民族防御的措施。在给《救国报》的指示（第341号文件）中特别强调了把这个宣言发给蒋介石的必要性。

这些表面上的举动反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策中的进一步动向——试图试探和至少弄清蒋介石是否同意停止同红军的斗争，而在将来能否把他和南京的将领与政治家列入统一战线之中。在共产国际的公开刊物中，这种可能性的首次提出是在1935年12月王明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中，这篇文章是他在8月25日至27日会议上的报告作过重大修改和补充的版本^④。这个步骤反映了莫斯科对红军状况的了解有一定的进展并获得了关于蒋介石的立场和国民党的内部情况有变化的新信息。

1935年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听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关于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转

①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卷宗834，第82—83页。

② 1935年9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向美国共产党中国部提书面请求，印制3到5万份载有《宣言》的传单，以便在国民党党政军人员中、在其他党派和社会团体以及华侨中散发。见黄启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6页。

③ 《救国文选》，[巴黎][1936年]，第249—253页。

④ 王明：《为反帝统一战线而斗争与中共当前的任务》，第7—25、16页。

移到四川的报告(第339号文件)。尽管陈云在1935年6月,即中共中央和红军发生分裂前就离开了四川,并不知道张国焘西路军的命运和历尽艰辛到达陕北的一方面军部队的艰难处境,但他关于红军艰苦卓绝的战斗和在转战四川途中精疲力竭的征程的通报还是使人对红军的状况有了十分清楚的了解。应当指出,从陈云的报告中莫斯科首次了解到中共领导和红军在遵义发生的变化以及毛泽东走上领导岗位的情况。这一消息并未引起对他的工作的高度评价。有意思的是,在刊载陈云报告摘要的那期《共产国际》杂志上还登载了毛泽东的履历,把他说成是中共的杰出活动家,是中国人民的领袖^①。

10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得知蒋介石对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特别是对王明讲话的反应。王明在1935年10月29日写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说,蒋介石声明,中共现在“确实在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并想改变自己的战线,也就是同我们缔结抗日统一战线”。王明接着写道,“事情今后如何发展,目前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在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事业,在实行正确政策和进行顽强斗争的情况下,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局面”(第340号文件)。

王明在上述文章中提出的关于一旦蒋介石停止同红军作战并把武器对准侵略者,红军就准备同他和他的军队一起战斗的问题,也是与对红军的力量和潜力、对中共的政治影响的较为切合实际的评价有关系的。在那篇文章中还谈到,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是由红军和苏维埃的一些“弱点”决定的:承认“单靠一支红军还不足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广大居民阶层还没有从其他势力、其他

^① 施平[陈云]:《英勇的长征》,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5年第33—34期,第26—41页;哈马丹:《毛泽东——中国劳动人民的领袖》,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5年第33—34期,第83—88页。

党派和集团的影响下解脱出来，他们今天还不是苏维埃的拥护者”^①。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就 1935 年 12 月在中国爆发的广泛的一二九爱国运动^②所起草的文件，特别是《中国共青团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③（该宣言上注明的日期是 1935 年 12 月 20 日），也未含有号召推翻蒋介石的内容。

在这方面采取的进一步步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南京与莫斯科在 1935 年 10 月至 12 月间积极进行的谈判决定的，这次谈判是就中国方面提出的一旦中日战争爆发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并签订相应的中苏协定^④的可能性问题展开的。在苏联全权代表鲍戈莫洛夫同南京政府代表于 1935 年 11 月至 12 月间进行的会晤中，后者首先开始提出关于调解国共关系的愿望和条件问题。1935 年 12 月 19 日，蒋介石在同鲍戈莫洛夫的谈话中又一次提到，他希望能把 1923 年 1 月 26 日的孙越宣言^⑤作为中苏关系的基础。众所周知，在这个宣言中谈到，“目前共产主义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不能运用于中国”，因为那里不具备必要的条件^⑥。在这次谈话中蒋介石说，他并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但由于它主张推翻中央政府，他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⑦。1935 年 12 月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指示鲍戈莫洛夫向蒋介石通报苏联领导人的看法：如果南京军队不同红军建立统一战线，武装抗日是不可能的，再者苏

① 王明：《为反帝统一战线而斗争与中共当前的任务》，第 13—14 页。

② 详见《一二·九运动（1935）》，北京 1987 年版。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第 803—805 页。

④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莫斯科 1973 年版第 18 卷，第 537—539、587—588、590、599—603、662—663 页。

⑤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莫斯科 1973 年版第 18 卷，第 599 页。

⑥ 《苏中关系文件集（1917—1957）》，莫斯科 1959 年版，第 64 页。

⑦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 18 卷，第 599—600 页。

联政府不会充当调解南京与中共关系的中间人角色^①。

苏联政府的这种立场促使蒋介石同中共代表直接接触。根据蒋介石的亲自指示,他的代理人——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在1936年1月下半月同王明进行了交谈,谈话记录在本卷内发表(第347、349、350号文件)。蒋介石的代表十分坦率地讲述了他打算利用日苏纠纷来阻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他确认,至少从1935年秋天起蒋介石的立场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至南京将在1936年9月向日本开战,因此他愿意调整同中共领导和中国红军的关系,也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邓文仪再次转达了蒋介石的委托:在莫斯科制定并签署南京同中共的协议条款,然后“将准备好的协议送往苏区”(第349号文件),并力求弄清楚中共的具体态度。王明对此回答说,南京应当在国内直接同中共中央就协议的具体条款进行谈判(第347、349号文件)。同时,王明和蒋介石的代表都对谈判的初步条件和协议的某些重要条款谈了自己的看法。蒋介石的代表提出以下建议:撤销苏维埃政府,中共领导承认南京政府的至高地位;将红军改成南京军队的分支并由最高总司令蒋介石予以承认(在这种情况下答应给红军发放武器装备);使中共活动合法化,而后,要么恢复以前的合作方式(即中共加入国民党),要么中共独立活动,但要在承认南京政府的基础上(第347、349号文件)。实际上,蒋介石于1936年1月22日在南京同鲍戈莫洛夫的谈话中也谈到了同中共和解的这些条件^②。王明答复邓文仪说,他认为这些要求是不切实际和不能接受的,并且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实现互信和停止进攻红军(第347号文件),对此邓文仪回答说,谈判没有开始之前,进攻不会停下来。根据双方后来对这些初步接触的评价判断,哪一方对谈判结果都不满意。但是,这次会晤

^①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18卷,第602页。

^②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莫斯科1974年第19卷,第35—36页。

和之后蒋介石及其周围的人同苏联外交代表的接触开启并促进了南京与中共领导之间的直接谈判,谈判于1936年3月在保安开始进行。^①不过在1936年6月以前,莫斯科并不了解中共领导对这次谈判进程和结果的评价。

1936年2月至4月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上既有能否把蒋介石列入统一战线的论题又有对他的“卖国”行径等的尖锐批判和指责^②。这与南京政府在1935年底1936年初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的方针、南京政府对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在1936年3月12日签署互助备忘录的抗议照会,以及调动南京军队去帮助阎锡山阻止红军东进山西的行动有关系,红军东进山西的情况莫斯科只是从报刊上了解到的^③。但是,从4月开始,在共产国际刊物发表的文章中,对蒋介石的攻击又消失了,“惩罚”他的口号被关于有必要“揭露”“卖国贼”和“匪帮”活动后果的声明所取代^④。

制定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新的步骤是由(作为季米特洛夫的政治助手、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负责中国工作的)米夫、王明和中国代表团的几名成员所起草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局势和中共任务的指示文件草案》,该草案上注明的日期是1936年3月5日(第360号文件)。

在这个草案中第一次不提以前关于把争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斗争同扩大苏维埃的任务等结合起来的论点,而是讲中共的中

① 关于国共谈判的详细情况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桂林1992年版,第6—26页。

② 详情见李良志:《论王明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第2部分)》,载《中共研究通讯》,科罗拉多斯普林斯1990年第6—7期,第25—26页。

③ 见《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1936年3月10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救国宣言》,载《救国时报》,巴黎1936年4月20日。〔俄译稿,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卷宗860,第1—11页〕。

④ 王明:《为抗日人民阵线而斗争》,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6年第8期,第28、32—33页。

心任务是组织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全民斗争,争取人民群众独立及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应当是出发点并是中国反帝人民阵线的主要内容。

在指出某些行动的分散是国内解放运动的主要弱点时,草案起草者提出了集中领导这一运动的任务。建议中共开始同所有政党和群众团体就组织联合行动和集中领导抗日斗争的问题进行谈判。同时还提出了采取措施把中国军阀军队吸引到这一斗争来的任务,并要在这些军队内部的工作中避免“部队过早脱离和暴动”。草案起草者建议修改中国苏维埃宪法,以便与劳动者一样给予“所有其他以某种方式参加……救国武装斗争的人们”以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允许民族革命政党的代表和不仅资产阶级专家而且还有“其他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苏维埃机构。

规定将中国红军改编成“人民救国军”,保持对其领导的控制,扩大其社会成分。草案中还谈到必须明确说明党的土地政策,补充修订对富农的政策,不再没收参加武装斗争的军人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建议重新审议限制自由贸易和工业增长的指令,不要解散而要利用商会,重新考虑给予私人工商业发展以更大自由的税收政策。草案中谈到,必须支持和扩大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和其他城市小资产阶级阶层中的运动,“造成”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根本转变”,争取把所有文化团体联合成“救国大同盟”。在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中提出了“把符合工人群众传统和认识水平的一切组织中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任务。在党的工作中提出了尽最大可能使党的活动合法化的方针,以使除了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外其他与之相联系的组织(左翼工会、共青团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都成为合法或半合法的组织。总之,从这个行动纲领到取消苏维埃口号的思想只有一步之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机关讨论该草案之后,“鉴于这个文件特别重要”,于1936年4月14日将这个文件呈送给斯大林,征求他的意见(第360号文

件)。草案起草者关于分阶段实施统一战线政策、关于新的策略[其中包括对国民党的策略]和中共同南京政府关系发展前景的想法,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1936 年 3 月 23 日会议上发言时作了说明(第 362 号文件)。

发言中揭示了上述草案中拟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局势与中共任务的指示和本着草案条款精神对党的工作中的弱点和群众性反帝运动状况中的弱点作了评估。王明在谈到这个文件时说,“我们拟作出重大修改,要使我们的方针出现从未有过的转折”。发言中谈到,这些问题很快就会提到共产国际领导面前。与草案相比较,新的内容是提出了吸收国民党的军队以及国民党有影响的军政领导人参加统一战线的任务,提出了同所有国民党军队联合的口号。因此,如何对待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问题被认为是“基本策略问题”。

王明认为,在蒋介石反对统一战线,而国民党内出现“一些派别”,或多或少公开支持中共政策的情况下,确定解决这一任务的方法时应该考虑到“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可能发生分裂,有望把它们争取到我们方面来”这一点。王明认为国民党分裂对中共有利,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排除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包括同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建立统一战线,因为离开中心地区进入边远地区的红军,现在并不直接威胁南京,而日本人的新攻势却威胁着蒋介石在华中的主要基地。

王明和康生 1936 年 4 月 16 日的(看来是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书面报告《近期建立中国反帝统一战线的资料和计划》(第 364 号文件),反映了对上面指出的季米特洛夫于 1936 年 4 月 14 日呈送给斯大林的草案方针的具体实施计划。在书面报告中,根据从香港和从驻莫斯科的上海著名记者、中共党员胡愈之那里,以及从 4 月份来到苏联的陈铭枢那里得到的零星消息,通报了蒋介石的一些军队中,特别是张学良的军队中发生骚动并想与

中共联合的情况,谈到陈铭枢想恢复 19 路军的建议和他准备承认中共纲领和中共领导的意向,谈到鉴于杨虎城希望参与同中共的统一战线同他建立联系的可能性,以及两广首领策划反蒋行动的情况。

在此基础上,王明和康生提出了以下计划:(1)集中党的力量争取张学良的 12 到 15 万军队,建立由张学良、阎锡山、杨虎城和傅作义的军队与总数约 30 万人的红军组成“中国西北省份的抗日联盟”。(2)开展建立“红军同桂军、粤军和川军共同反蒋统一战线”的行动。(3)“成立共同的政治组织,即具有集体和个人成员资格的所有抗日政党和团体的联盟”。

为了同杨虎城建立联系从莫斯科派出了王炳南(他于 1936 年 4 月到达西安),而为了同西南集团的首领们取得联系,派出了潘汉年,他于 5 月抵达香港,并在那里与筹备反蒋行动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①。潘汉年在 1936 年 7 月 1 日写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信中通报了他同两广集团的首领之一陈济棠的谈判情况,并建议为着中共的利益“利用”该集团同蒋介石的矛盾(第 373 号文件)。

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在 4 月至 6 月间特别重视同陈铭枢的谈判,他是它们与之建立了直接联系的中国唯一大军政活动家。有关这次谈判的文件首次在本卷中发表(第 367、369、372 号文件)。1936 年 7 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向中共中央书记处通报了这次谈判的进程和结果(第 377 号文件)。

1936 年 6 月底,在恢复了同中共中央的无线电联络之后,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通报了红军各兵团的情况,并征询莫斯科对它所采取的依靠红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的意见。为养活这支总数为 20 万官土的军队,据中共预算,

^① 《从内战到抗战》,第 401—402、560 页。

每月需要苏联提供 300 万美元的援助(第 374 号文件)。

鉴于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季米特洛夫把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的译文送交了斯大林,并请他首先就下列问题给予指示:“(1)中共和红军在西北的政治军事计划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建立抗日人民统一战线的总方针问题;(2)给予中国红军的物质援助问题”(第 374 号文件)。这样一来就向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提出了两个计划。一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和中共代表团制定的计划,总的说来是指望国民党分裂,不仅利用地区集团及其首领们的爱国主义情绪而且还利用它们的反蒋和分裂主义情绪。另一个是中共中央的计划,可能引起中国国家政治的分裂,需要投入巨额经费,还会使苏联陷入中央政府与西北政府的对抗之中,在日本侵略面前丧失苏中接近的前景。

斯大林的答复没有文献记载。但是 1936 年 7 月 23 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这些计划时所持的立场使人有理由认为,斯大林曾向季米特洛夫暗示,在他看来“两者都不好”。季米特洛夫也倾向于这种看法,他在书记处的讲话中指出,中共代表团的立场与中共中央的计划有同样的缺点。可以认为,1936 年 6 月 22 日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处给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报告《1935 年至 1936 年的中国》对形势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对季米特洛夫的立场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报告中谈到,蒋介石同日本发生冲突的必然性会把建立统一战的问题提上日程,这一点蒋介石自己也明白,但他不准备根据统一战线协议对整个体制实行民主化。报告中得出结论说,蒋介石只有受到形势所迫才会同意这样做^①。我们要指出,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一次讲话中说明了对蒋介石采取新策略的目的,他所作的说明与上述论点几乎一模一样。

^①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 19 卷,第 741 页。

季米特洛夫于1936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讲话肯定了中共政策中的新的根本性进展,这个讲话是研究者所熟悉的。我们只是指出,近年来的出版物表明,新口号的提出(即用成立“中华民族共和国”的口号取代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后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1936年8月15日给中共的指示中又改为“建立统一民主共和国”的口号)(第380号文件)是季米特洛夫本人对问题进行仔细分析的结果^①。季米特洛夫在讲话中发出的号召也使人确信这一点,他说:“请想一想,在中国能否进行历史性的跳越,向苏维埃化过渡,我们能继续前进吗?当然不能。需要考虑条件和局势,特别是现在中国人民所处的局势”(第375号文件)。季米特洛夫在修改速记记录时所强调的这段话,实际上意味着承认在1927年采取的中国苏维埃化方针是错误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决定把王明起草的相应决议草案作为基础,建议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王明、康生和陈云)会同米夫和曼达良对在会议上听取的建议作最后审定,然后提交季米特洛夫批准(第376号文件)。7月27日,季米特洛夫写信给斯大林,请求他对草案提出意见。斯大林在信上作了简短批示——“同意”(第379号文件)。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决议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6年8月15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形式确定下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认为,不能同时与日本和蒋介石进行斗争,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所有军队都是日本的盟友,“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为了有效抗日,还需要有“蒋介石军队或其绝大部分参加”。因此,必须采取红军与蒋介石军队停战并与后者达成协议的方针。在政治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① 这种情况王明在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1936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已经指出。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第309—310页。

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其他组织之间在保持它们“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的情况下，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建议中共和红军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开始就停止内战进行谈判，并在以下四项最低条件基础上达成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的具体协议：(1)停止内战，联合一切抗日武装力量；(2)建立统一的指挥部，制订对日斗争的统一计划，同时保持负责自己战区的红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3)向红军提供相应的基地和必要的武器装备；(4)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停止迫害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建议即使在红军“被迫防御”蒋介石军队进攻的情况下也要继续进行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谈判。同时建议保持同张学良的联系，以便在他的军队中进行工作，虽然已经指出，张学良本人是不可靠的盟友，还建议用“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的防御口号取代“立即对日宣战”的口号(第380号文件)。8月15日电报的基本论点，共产国际执委会在适逢中共建党15周年之际发给中共中央的贺电中大致作了重复(第381号文件)。

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中央于1936年8月25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的信，并于1936年9月1日作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①。这些决定为国共两党代表之间的新一轮谈判开辟了道路。在新一轮谈判中，中心问题是关于红军的人数和地位问题。在中共代表潘汉年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之间于1936年秋在南京和上海开始的谈判过程中再一次弄清了国民党方面想吞并中共和红军的企图。因此，季米特洛夫于1936年11月20日从基斯洛沃茨克发给王明的电报再次提到8月15日电报中含有的同国民党达成协议的条件，同时特别强调“必须保持领导的团结一致、我们的组织体系和我们的指挥人员，不允许蒋介石和国民党干预红军的内部事务”(第385号文件)。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7—91页。

共产国际对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进一步重大修正是在著名的西安事变(即1936年12月12日到达西安的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官逮捕)之后提出的^①。本卷发表了编者所掌握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领导的全部电报,其中有一些为研究人员以前所不了解的电报,揭示了莫斯科在和平解决这一事件过程中及后来在修正中共立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1936年12月14日,季米特洛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作出推测,“很难设想,没有同他们(中国共产党人)协商甚至没有他们的参与,张学良会采取这种冒险行动”,因此应该劝告中共中央采取措施和平解决冲突(第386号文件)。12月16日,斯大林接见了季米特洛夫,在场的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在会见中,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2月16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得到赞许,电报中认为张学良的行动有害于抗日统一战线并且鼓励日本侵略。建议中共在以下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冲突”: (1)通过吸收若干抗日运动代表参加的办法改组南京政府; (2)确保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3)“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同它合作”抗日; (4)与同情中国跟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国家合作。电报中还建议不要作为条件要求蒋介石提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第387号文件)。共产国际的指示被中共中央接受了。在周恩来同蒋介石近两年的谈判过程中,大体上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2月16日电报提出的条件的基础上达成了秘密和平协议。这是一个口头协议。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在洛阳停留期间,蒋介石于12月26日发表一个声明,谴责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为。毛泽东在1936年12月28日针对这个声明作出了严厉的驳斥。驳斥中不顾在西安达成的协议,公布了同蒋介石达成的不应

^① 详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1995年版。

公开的秘密协议^①。毛泽东的声明通过史沫特莱的西安电台播出了。共产国际劝告中共中央公开同史沫特莱划清界限(第390、400号文件),实际上暗含着对中共立场的批评。正如宋庆龄1937年1月26日给王明的信中所说,蒋介石得知毛泽东泄漏西安秘密协议后,曾声称要抛弃已经达成的协议(第393号文件)。然而,蒋介石还是暂时中止了对红军的军事行动,撤销了南京政府讨伐西安人的司令部,虽然他没有取消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后来又用忠于他的将领取代了陕西和甘肃两省的省长。

西安事变后实现的和解是十分脆弱的,在国民党领导层反共亲日势力的压力下,以及由于中共中央采取“左”倾行动,随时都可能重新爆发内战。在这种情况下,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作出决定,用迎合国民党的新步骤来巩固西安的协议。1937年1月19日,在斯大林处召开的有莫洛托夫、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和叶若夫参加的会议上,季米特洛夫提出的两份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得到了大家的赞同^②,1月20日又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批准(第391号文件)。1937年1月19日电报中指出,共产国际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但是它不仅可能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搞阴谋而遭到破坏,而且也可能由于“你们党的错误步骤”被断送。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电报中指出,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切实停止内战”,并“同南京采取联合行动反对日本侵略者,尽管在初期没有签署正式协议”。其中包括建议党不要在西安人地区进行“共产党的公开发动,不应对待蒋介石在西安作出的承诺发表议论”(第390号文件)。1月20日电报中建议中共中央“十分认真地考虑和讨论”共产国际关于“从苏维

① 见《毛泽东选集》1991年中文第2版第1卷,第246页。

② 见Г.季米特洛夫:《日记(1933年3月9日—1949年2月6日)》,第122页。

埃体制向人民革命民主管理体制”过渡的建议。实际上这就意味着：(1)将苏维埃政府变为人民革命政府；(2)把红军变为人民革命军；(3)只在中心城市保留苏维埃，并且不是作为政权机构，而是作为群众组织；(4)放弃普遍没收土地的做法(第392号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7年1月28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加强同中国托派的斗争(众所周知，他们拒绝同国民党签署任何协议)的电报，有助于间接地达到同国民党合作的目的，尽管表面上这份电报与莫斯科在1936年8月和1937年1月对“托洛茨基总部”案件所进行的审讯有关(第394号文件)。共产国际领导对中共的“错误步骤”的担心，得到了王稼祥为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国局势和中共任务所列提纲内容的证实。王稼祥于1937年2月离开中国，他的报告提纲表明党内及其领导层中存在着“左”的倾向，这反映在对国内形势和对国共两党之间达成协议的前景的评估上(第408号文件)。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在延安开展的批判张国焘的运动也是错误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1937年3月2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它认为“现在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作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展开讨论是不合适的。在需要联合党和红军的所有力量来对付敌人的时候，应该千方百计避免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第401号文件)。尽管有这一警告，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在1937年3月31日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月20日电报中所阐述的关于改变方针的意见，在共产国际书记处1937年2月5日的电报中加以具体化了，其中含有关于中共中央应对国民党三中全会采取的立场的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只发表一般性声明，表示中共和红军决心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采取各种旨在停止内战和联合一切力量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64—168页。

抗击侵略者的措施,同时还表示中共和红军准备同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达成协议,以便根据民主原则并在承认南京政府是全中国政府的基础上改组苏区政权。同时还建议中共中央目前不要发表关于“根本改变我们中共在苏区的政策”的具体声明,因为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仔细讨论,需要“对我们政策的这种急剧转变”做认真准备(第396号文件)。这些建议在中共中央1937年2月10日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得到了反映^①。

中共中央的电报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1937年2月15日至25日)的参加者留下了一定的印象。尽管在2月21日的全会上通过的《关于根除红色危险的决议》仍坚持使用反共言词,但它还是含有同中共达成协议的回应条件,这就为恢复两党谈判开辟了道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7年3月5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就这次全会的决议给中共在即将开始的谈判中应采取的方针提出了具体的建议(第398号文件)。同一天还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去了另一份电报,为防止发生“围剿”红军的危险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正确处理同张学良和杨虎城军队的关系,以便共同进行防御,并在同国民党合作的基础上联合一切力量投入抗日斗争”(第399号文件)。

中共与国民党之间恢复的第一轮谈判是1937年1月初到3月中在西安进行的。谈判中的主要问题是关于红军的人数、其根据地的规模以及根据地政权的地位问题。由于双方立场相左,西安谈判中断,中共建议直接同蒋介石继续进行谈判。不过谈判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共要求每月为红军提供50万元的军饷,最后它得到了一次性款项50万元,以及一定数量的粮食和运输工具。谈判于1937年3月底在杭州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恢复,后来于6月初在庐山继续进行。关于杭州谈判的内容,乌里茨基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57—158页。

1937年4月3日给季米特洛夫的书面通报(第403号文件)以及1937年4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的过程和我党的立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都作了介绍。在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与乌里茨基的通报不同,没有提到拨给红军50万元一事^①。庐山六月谈判的内容在第407号文件中已反映出来。

本文件集收入一些以前鲜为人知的关于这些年间在共产国际学校培训中共干部的文件(第343、344、354号文件)。遗憾的是,在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中没有找到关于在苏联学校的中共党员和中国共青团团员人数的综合材料。1937年12月25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赖特就中共干部问题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书面报告,引用了关于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和学习的干部人数的材料。根据这个报告,从1926年至1928年共培训了1119人,其中在专门的军事训练班培训的有687人。1935年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分校学习的达70人,到1936年春又来了200人。就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所占的比重而言,中国分校居“第一位”。赖特坚持要求加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分校的物质基础,并确定1936年从满洲招生150人,从华北招收30人,从苏联远东招收20人(第345号文件)。根据这些报告,1936年2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决定“采取扩大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的方针”,使其学生人数到1936年秋达到200到250人,同时到1936年夏在国际列宁学校成立有两个系(苏维埃中国系和非苏维埃中国系)的中国部,总共50人(第356号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干部问题之所以特别关注,是因为党遭受了惨重损失,特别是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1936年3月5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的建议中说,“国统区党的处境异常艰难”,那里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175—184页。

“只剩下了个别基层组织和单个共产党员”，他们与领导中心没有联系，而满洲党的系统已“微不足道”。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代表团建议：“鉴于[中共]中央远离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并与它们中断了联系，又处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因此必须在下列地区建立中央全权代表机构(或特派员)：(1)在满洲；(2)在华北；(3)在华中；(4)在华南；(5)国外局。这些机构应该是绝对保密的”(第359号文件)。

1936年年中和1937年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还通过了几个关于改组专为外国干部，其中包括中国干部设立的干部培训系统的文件。1936年5月20日通过了关于成立一个小组“以便安排中共系统的干部工作”的决议(第366号文件)。1936年6月23日决定把外国部“作为单独的高级学校”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中分离出来，并且基于保密上的考虑，“表面上”把这一措施作为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分离出一个研究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科研学会提出。共产国际为东方各国培养干部的学校“以后应以这一名称和在这种对外掩护下”加以合法化(第371号文件)。1937年1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批准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为培养高水平的教员在研究所研究生部一年级成立由21名中国部教员和翻译组成的学员班，学期三年(第389号文件)。为了扩大干部培训人数，打算利用逃亡到新疆的中国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战士中的干部。季米特洛夫1937年6月17日给斯大林的信说，进入新疆的一批“流浪汉”(393人)请求派它们去苏联学习。季米特洛夫建议：(1)调这些“流浪汉”去苏联学校；(2)在解决好学校问题之前，暂时将他们安顿在克里米亚营地；(3)接收100到150人到“我们的中国分校”，而其余的以后安置到其他学校(第406号文件)。

遗憾的是，本文件集只收入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馆藏的少量反映1936年至1937年间向中共及其红军提供财政援助情况的文件，当时中共和红军在转战西北之后，武器装备、药

品等极度短缺。这些材料充实了已经纳入学术研究的有关这些问题的材料^①。早在193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军事部门就制订了通过新疆向当时在四川省的红军提供军事援助的计划。根据盛世才1936年3月15日给王明的信判断,通过新疆转交武器的准备工作在1936年初就开始了(第361号文件)。莫斯科与中共领导之间恢复无线电联络之后,首批电报中的最后一份就提出了经费和各种武器援助的问题(第374号文件)。文件集中发表的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1936年9月8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叙述了从中国红军指挥部发来的两个作战计划,目的是要从苏联获得武器。第一个(主要的)计划预定在1936年12月前经宁夏打通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电报中说,中共中央和红军指挥部“请求同意提供武器装备、资金和人力援助,同时指出,财政,粮食和武器装备问题已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第二个(从中共中央的角度来看是令人怀疑的)计划预定再次组织进军新疆。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认为可以同意第一个计划,“并断然指出中国红军继续向新疆推进是不能允许的”。电报中还指出预定到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界的武器弹药的具体数量,谈到把武器转运到宁夏的问题(第383号文件)。这些计划的实施取决于中国红军部队能否进入相应的地区。但是,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蒙古方案没有得到联共(布)领导的赞同。在共产国际执委会1936年11月3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认为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蒙古方案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红军不可能突破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还担心,这样做可能引起日本与苏联之间的冲突。建议中共转向通过

^① P. A. 米罗维茨卡娅:《关系破裂与恢复时期的苏联和中国(1928—1936)》,第107页;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载黄修荣主编:《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北京1995年版,第312页。

新疆取得援助上,在哈密将集中上千吨的军用物资^①。如上所述,中共中央认为这条路线是很难通过的。的确,红军部队进军新疆的行动也遭到了失败。从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路军为进入新疆在甘肃进行了浴血奋战,但几乎全部被回民将领马步芳的骑兵歼灭。成功进入新疆的只有几百人的小股队伍(第406号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曾不止一次地向中共中央询问红军西路军进军新疆的作战进程(第397、401、402号文件)。

由于在1936年9月至10月间未能得到武器援助,中共中央再一次请求共产国际提供财政援助。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36年11月9日发给王明、康生和陈云的电报中,请求共产国际紧急汇款(5万到10万美元)。共产国际在1936年11月12日答复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通报了向中共提供55万美元财政援助的决定。第一笔总额15万美元的援助,计划于11月底通过宋庆龄转交在上海的潘汉年^②。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1937年3月2日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许诺把对中共的财政援助增至160万美元。除了中共中央在此前收到的两笔15万和5万美元的援助外,答应援助的数额接近200万美元^③。

※ ※ ※

共产国际七大的统一战线方针以及其他(外部和内部)因素对中共、国民党和中间社会政治集团的立场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上所述,在争取实现这些方针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策略路线

① 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第321页。

② 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第324—325页。

③ 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第326页。

作了急剧的转变。由于内战停止,对抗双方——中共和国民党坐到了谈判桌旁。虽然在1936年至1937年6月举行的几轮谈判没有达成具体协议,但这些谈判还是有助于双方立场的澄清和某种接近。抗日统一战线协议是在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一个半月后才达成的,当时日军在华北和华中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毫无疑问,苏联与中国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向中国提供苏联武器的协议有助于达成上述协议。1937年8月22日,蒋介石政府下令将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9月22日,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上公布了早在7月15日转交给蒋介石的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建议,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声明,确立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10月,蒋介石同意组建由中共领导的另一支部队新四军(以华中和华南的游击队为基础),将华中战场划给这支军队。这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变成了政治现实,而它是否稳固,在抗日战争年代还要经历许多考验。

333

王明给米夫的信

1935年7月19日

于莫斯科

尊敬的米夫同志：

这个呼吁书^①是我和出席[共产国际]七大^②的中共代表团一起起草的。中文稿相当简短，写得不错，但由于我的俄文知识浅薄，译稿刚好比中文稿多出一半。因此，请首先注意文件的基本思想和含义。此外，恳请你腾出一点时间，以便[我]在两天内能得到你的指示和修改意见，好尽快结束文件的审定工作并把它发下去。此致

敬礼

(王明)

全宗 495，目录 16，卷宗 14，第 24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和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初稿，俄译稿（见全宗 495，目录 16，卷宗 14，第 25—35 页）。文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 1935 年 7 月 14 日会议上通过。文件最后稿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成员于 1935 年 9 月 10 日经飞行表决批准（见第 336 号文件）。

②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 1935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1 日在莫斯科举行。

334

李立三就阿拉木图的工作给米夫的报告

1935年8月3日于莫斯科

绝密

工作报告^①

1. 基本目的是同中国苏区建立联系。

途径是建立无线电联系和交通线。

2. 为建立无线电联系已派陈宣传(音)^②和罗英^③经陕西苏区前往四川苏区。前一名同志非常熟悉陕西和甘肃的情况。他们两人一起沿已选定的路线经新疆和甘肃前往陕西苏区,他们应在那里同红26军或红25军取得联系。应在这些部队的帮助下建立小股游击队,坚定地潜入四川。

陈宣传和罗[英]两同志携带了在莫斯科给他们的密码。

我也给了他们同26军联络的单独密码。

我和这两位同志制定了26军同主要地区联系的计划,该计划还需要就地根据相应的具体情况进一步明确。两人已于1935年4月从阿拉木图出发。当月他们就到达了乌鲁木齐,在那里他们为下面几个阶段做了准备。5月12日他们离开乌鲁木齐继续前行。

① 文件上有批注:收入机密中国文件。п. 米夫。

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③ 刘长胜。

制定了三条旅途方案：(1)沿公共汽车线路到兰州(甘肃)和平凉，从那里步行或骑马前往陕北。(2)乘车到达公共汽车线路终点站包头，从那里步行或坐马车向南抵达神木。(3)乘车到达包头，从那里沿绥远铁路^①抵达黄河边，接着直接进入陕北苏区。

我想，如途中未遇到特殊困难的话，这些同志已经到达头几个目的地。他们的最近一份报告是5月10日从乌鲁木齐发出的。

3. 建立信使联系的第一阶段是从阿拉木图到哈密，即到新疆的东部边境。在这方面做了以下事情：(1)从阿拉木图到新疆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经塔城到乌鲁木齐，这是一条商道，汽车(货车和客车)不断，从苏联回国的多数中国人都走这条路线，而且即使是居住在远东的中国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切断了经满洲里的道路也走这条路线。我们已决定在这条路线上设固定的信使联络线。第二条路线是经伊宁到乌鲁木齐，在这条路线上有驮运队往来(没有汽车行驶)。沿这条路线通行的居民不是汉族人。所以我们决定把非汉族同志派往那里。

(2)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新疆内部已经做了什么事情呢？第一，决定在中心枢纽乌鲁木齐建立主要中转联络站，所有过往的中国同志都应在这里脱下西式服装，穿上中式服装。(从中国来我们这里的则相反。)

现在已有个小白铁制品作坊。马拉特同志负责这个作坊。

王武(音)^②同志负责通过新疆的整个线路，特别是乌鲁木齐的联络站。为保密起见，王武同志没有同马拉特同志住在一起，他应为自己找另一个隐蔽所之类的地方。将来王武同志只同马拉特联系，他将通过马拉特间接地同其他工作人员和经乌鲁木齐的过往人员联系。

① 原文如此。指北平——绥远铁路。

② 何人不详。

第二,在塔城建立第二个中转联络站。这里开设了皮靴作坊。沃林同志负责该作坊。

第三,派出闻廷(音)和雅科夫列夫同志,他俩应为自己找一份在乌鲁木齐——塔城线路上当司机的工作,而王祥(音)^①同志也应在乌鲁木齐——哈密线路上找这样一份工作。但是到1935年5月中旬他们之中都还没有找到工作。

上面提及的同志(除王祥同志外)都有同我联络的密码。我收到了所有同志的报告,雅科夫列夫同志除外,他是在晚些时候派去的,报告是经新疆邮局寄来的信件。信从乌鲁木齐寄到阿拉木图的时间是40天。将来有自己的联络线路时,就只需要10天时间。

(3)由此可见,阿拉木图——新疆线路还没有完全建成。为建成这条线路至少还需要5名同志:一人负责哈密中转站;另一人负责乌鲁木齐至哈密一线(已有一名同志,但还不够);第三人任从塔城至巴赫塔(9公里)边境的联络员;第四人在阿拉木图中国侨民区工作,以办理证件和中国签证等;第五人在巴赫塔为过往人员寻找住处。

4. 遇到了哪些需要解决的困难?

(1)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位同志^②在6月通知我说,王武同志在乌鲁木齐与在其他(友邻)系统^③工作的几名中国同志进行了联系,还同托派分子进行了联系,这些人对他的到来议论纷纷。另一(友邻)系统的一位负责同志为避免别人对王武在乌鲁木齐的逗留说闲话,让他(王武)到他那里当家里的仆人。鉴于这种情况,莫斯科的邻居要求,以后派遣新的人员须经他们的认可。

我认为,王武同志并不认识任何一个托派分子,因为他们是在

① 何人不详。

② 何人不详。

③ 即工农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系统。

1929年以前从苏联派去的。王武是在中国和国际列宁学校的工作中受过考验的同志，因此他不可能有意同托派分子取得联系。但是，王武在乌鲁木齐可能遇到了在其他系统工作的中国同志，他们可能在托派分子中间散布了有关王武同志的谣言。据我所知，在去阿拉木图的火车上，王武同志就遇到了带着其他任务去新疆的熟人。因为乌鲁木齐是一座小城市，所以完全可能他们又见面了。

王武同志违背我的指示，同意为友邻机构的一位同志做仆人工作，这当然是不能容许的。

由此产生许多问题：(1)我们的工作人员不可能不遇见或[不]碰上其他机构的工作人员。因此，需要找出一种工作模式，以便分清不同机构的系统，使他们不至于相互交错，相互干扰。

我认为，从我们方面应该禁止工作人员同其他机构的人员联系，还应该注意挑选不太有名和不为其他机构人员所熟悉的人。但这还不能保证完全脱离接触。因为我不可能知道，谁认识谁，哪里(乌鲁木齐、哈密等等)有在其他系统工作的同志，所以我也不能在派遣我们的人员的时候确信，他们不会偶尔碰上可能的熟人。因此，我也不能在这里提出如何避免不同系统相互交错的具体建议。但是这个问题很重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拖延。不解决这个问题，随时都可能遇到出乎意料的麻烦。我请求从上面就这个问题采取紧急措施。

(2)在新疆的工作中遇到了各种困难，没有我们其他机构的协助，要解决这些难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办理在新疆内部行动的签证或从新疆到甘肃的签证。

若是在中国其他地区，我们还可以自己想办法克服这些困难。而在新疆，我们这种迂回的办法还可能造成误会，使我们的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为了解决这类难题，我建议采用两种办法中的一种：第一种是在其他系统的公开工作中要有我们一位信得过的同志。

比如说,有一位新疆当局的官员,他同时要同我们负责经过新疆进行联络的地下工作同志有联系。这样,必要时就可以由这位官员同志提供帮助。第二种办法是我们的负责同志获准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位领导同志取得联系。

(3)派往新疆工作的所有同志,从对党忠诚的角度来说无疑都是经过考验的。但是他们缺少秘密工作的经验。我认为,在秘密工作方面这些同志应就地经受附加的考验。这一点我指的是,必须检验他们在取得合法化地位、建立“掩护所”、选择地址等方面所采取的最初步骤是否正确。

我建议,允许我在全新疆转一圈,目的就是进行这种检验和指导。如果你们认为我亲自走一趟不行,那就应委派另一位同志。

(4)既然王武同志的身份已暴露,所以我建议把他从那里召回或者把他派到另一个地方。

5. 关于非汉族同志。如果说汉族同志(包括出了问题的王武总共8人,他们都已到达他们在线路上的固定工作地点)在工作中表现较好,那么非汉族同志就显得差一些。

我想分别介绍一下每个非汉族同志的情况:

(1)艾达洛夫——根据委派,他应先去哈密,然后再到甘肃。从2月中他离开以来,我没有从他那里收到一份报告说明他在哪里。

(2)奥斯曼诺夫——他一到阿拉木图就立即宣布,他不往前走了。只好让他返回。

(3)布拉兹——根据委派,他应当去兰州。到伊宁后,他再没有报告自己的情况。我从另一些人那里得知,6月底他还呆在乌鲁木齐。

(4)苏法洪——根据委派,他应去乌鲁木齐并为自己找一份工作作掩护。同时他应在从甘肃到苏联的邮递联系中,成为非汉族同志的中转地点。

这位同志表现得比其他同志好一些。

(5)尤苏波夫——根据委派,他应去哈密。由于他不久前才去,还没有得到他的信息。

(6)巴希——他应去兰州(甘肃)。他是最后一个走的,也还没有得到他的信息。

(7)卡西莫夫——刚到阿拉木图,他就表示,他想回家。我根据您的^①指示让他回家了。

(8)丹津——他应去青海。在伊宁他就违背指示出现在苏联领事馆,要求帮助办理出境签证。此后他违反规定的路线,去了乌鲁木齐,又出现在那里的领事馆。因此我已将他召回。在丹津的问题上我犯了错误,我把过于复杂和不适合他的工作委托给了他。

可见,在8名非汉族同志中有3名是不能用的。在其余5人中我们只得到了两人的信息。

为了通过西北省份发展同苏区的牢固联系,必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更确切地说是非汉族干部。这样做不只是对小范围的联络问题,而且从更广义上说对在非汉族居民中开展工作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的苏区都紧靠这些居民居住的地区或与之接壤。

6. 今后的工作计划。

第一,建立从哈密到陕西和四川苏区的信使联系。为此至少还需要有四个中转站。第一站设在兰州,从这里开辟两条路线:一条经甘肃南部;另一条经陕西南部。第二站设在平凉(在甘肃——陕西交界处附近),从这里也开辟两条路线:一条经甘肃东部,那里很容易与陕北一些单独的苏区联系;另一条经陕西南部与四川苏区联系。

第三站设在包头,那里离陕北苏区很近,同时又可以与北京^②联系,因为乘火车只需一昼夜时间。从这里也便于近距离与蒙古

^① 指 П. А. 米夫的指示。

^② 原文如此。应为:北平。

人民共和国方面联系,如果那里将有我们的联络路线的话。

第四站设在仓口(音)(陕西南部),这里离四川苏区很近。

为了完成整个计划,最需要的是汉族同志干部。需要有6位站点负责人(兰州和包头各两人,其余两个站点各一人)。

加上司机12人。(从哈密到包头——6人;从兰州到天水——2人,从兰州到西安府——2人,从西安府到韩城——2人。)

所有这些同志都应是北方人,最好都来自陕西或甘肃。

第二,为了效仿中国境内(新疆除外)的联络路线,我与陈宣传和罗英两同志扩展了计划,他们到达苏区后应同当地负责同志一起就不涉及第一条路线的逆向联络路线制定出具体的措施。同时已同陈宣传和罗英两同志商定,他们将在苏区采取措施争取到必要的干部,派到我们这里来培训和学习。我们可以从他们中间选派新的工作人员来为我们的联络路线服务。

第三,除了经过新疆——甘肃的主要路线之外,还可拟出两条联络路线。第一条路线经喀什沿南疆道路到萨伊天然界限^①(在新疆——青海边界)然后经青海沿南路和柴达木河谷到松潘(在青海^②),这里离四川联合红军总部所在地理番不远。这条路线的优点是,沿线没有严重的政治障碍,因为居民都是蒙族和藏族牧民,那里也没有中国地方当局。

困难大多是自然地理性质的:山岭峻峭,只有当地的马才能穿越山隘。还需要翻译。

从喀什到萨伊天然界限还可以乘汽车,行程8天。从萨伊天然界限到松潘,据英国旅行家的资料,需要骑马25天。我认为,25天不多,因为走完1600公里的路程要用35到40天才行。总之,从喀什到苏区的联系需要不少于两个月的时间。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应在四川——译者。

第二条路线是从乌兰巴托经苏联天然界限然后向包头进发到陕西。这条路线的优点是距离较短(从苏兹天然界限到陕西只有450公里),但是困难是政治性质的,这就是说,蒙古的王公在这里设有稳固的政权,并同日本的奸细有密切联系。

我认为,喀什和乌兰巴托的这两条附加路线应给予高度重视。

※ ※ ※

综合全部问题和建议,我要着重指出:

- (1)要理顺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便不出现交错。
- (2)拟订措施减轻我们在乌鲁木齐的工作。
- (3)立即为阿拉木图——哈密地段提供5名汉族同志。
- (4)由一名同志去接替王武的位置。
- (5)派一位领导同志去检查新疆地区的工作。我想亲自去。
- (6)为中转站准备6名同志,为延续哈密的路线准备12名司机。
- (7)为非汉族同志开办专门训练班,以便在中国西北地区工作。

完^①

在弗雷德同志^②的参与下手写了12页。

李明^③

全宗514,目录1,卷宗1034,第1—12页。

亲笔签字。

① 原文如此。

② M. 施特恩。

③ 李立三。

335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 向起草关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 七大上的报告的决议的委员会 提出的建议^①

(摘录)

1935年8月18日于莫斯科

中国代表团致季米特洛夫同志报告 [决议起草]委员会

6. 在关于中国的[决议草案]的第13页上,建议作如下表述:
“在中国,中共坚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奴役者及其中国仆从的原则性方针,同时应善于根据每个反帝斗争时期的具体情况,在武装人民同最可恶的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在中国当前情况下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进行民族革命斗争的口号下,建立最广泛的民众统一战线。因此,中共应善于将扩大苏维埃运动、加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结合起来,并提出苏维埃

^① 见第33页注^②。

作为全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中的唯一中心”^①。

全宗 494, 目录 1, 卷宗 422, 第 12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决议最后稿中是：“在中国，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战斗力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结合起来。这一运动应在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而首先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走卒的民族革命斗争口号下进行。苏维埃应成为全中国人民在解放斗争中的联合中心”。见《共产国际七大与反法西斯反战斗争》（文件集），莫斯科 1975 年版，第 378 页。

33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处会议第3号记录 (摘录)

1935年9月24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2.(2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告中华民族书草案(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5年9月7日决议,记录:2)^①。

决定:2.——批准建议稿^②。(1935年9月10日飞行表决:季米特洛夫、库西宁、皮克、艾尔科里^③、王明、弗洛林、马尔蒂)。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艾尔科里

全宗495,目录18,卷宗1017,第3—4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
- ①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5年9月7日会议上决定在几天内通过飞行表决批准文件草案(见全宗495,目录18,卷宗1016,第14、16、18页)。
- ② 指《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见全宗495,目录18,卷宗1017,第29—38页)。文件上有批注:最后稿。文件于1935年10月1日首次在巴黎《救国报》上发表,并散发了单独传单。亦见《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5年第33—34期,第106—111页;《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5年第11—12期,第86—91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18—525页。文件注明日期是1935年8月1日,在文献中以《八一宣言》著称。将《宣言》初稿(见全宗495,目录16,卷宗14,第25—35页)同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稿相比较,表明基本表述和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 ③ П. 陶里亚蒂。

33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机关结构的决议^①

(摘录)

1935年10月2日于莫斯科

秘密

2.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的职责分工

为了研究单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的职责作如下分工:

(1)季米特洛夫同志——总书记职责见第一部分(决定:1)^②。此外,季米特洛夫同志还负责处理中国问题。

3.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机关的组成人员

(1)季米特洛夫同志书记处:4名政治助理

(戈利采夫、谢尔盖耶夫同志,2名空缺)

1名中国问题政治助理(米夫同志)

2名中国问题顾问(瓦西里耶夫和克雷莫夫同志^③)

1名秘书(瓦尔特同志)

① 文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35年10月13日会议上获得批准(见全宗495,目录2,卷宗220,第51、54页)。记录原件用德文发表(见《德国工人运动史国际学术通讯》,柏林1995年第1期,第25—53页)。

② 这部分没有发表。

③ 分别为:杨松和郭绍棠。

1 名事务秘书

1 名秘书康生同志,掌握俄语

1 名女速记员

1 名女打字员

季米特洛夫同志直接与中共代表(康生同志)联系。

总共 12 名工作人员和 1 名党的代表。

全宗 17, 目录 120, 卷宗 204, 第 55、59、61 页。

打字稿, 副本, 无签字。

338

潘汉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书记处非常会议上的发言^①

1935年10月15日于莫斯科

秘密

伯林^②同志：同志们，我想给你们讲一讲我们在第五次和第六次“围剿”^③之间时期是如何同一些军事集团进行谈判和签订协议的。

19路军在上海保卫战^④后被调往福建。这是蒋介石进一步展开对红军的“围剿”行动的最困难的时候。1933年，蒋介石下令，让19路军经福建赴江西来进攻我们。还在进攻江西之前，19路军指挥部和蔡廷锴将军就改变了主意，因为他认为，进攻红军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他派代表^⑤来同我们的同志谈判通过什么办法能同我们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同时，为防蒋介石一手，他调一个师到常州，造成进攻红军的假象。红军指挥部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不知道19路军指挥部已派代表去上海同共产党谈判。江西红军调第3军团给了福建19路军以沉重打击。此后19路军就更突出地感受到摆在它面前的进攻红军任务的难度。

① 在会议上发言的除潘汉年外还有陈云、陈潭秋和 Д. 3. 曼努伊尔斯基(见第339号文件)。文件上有批注：已校订，但不是为了发表。

② 潘汉年。

③ 指国民党军队在1933年至1935年对中国苏区的“围剿”。

④ 指国民党19路军和居民在上海和吴淞对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抵抗。

⑤ 指朱蕴山、梅龚彬等。

19路军代表在上海的谈判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蔡廷锴便派自己的代表^①到前线同彭德怀同志的第3军团指挥部谈判。19路军代表建议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在防御日本人的上海保卫战时,他们就知道我们的方针,知道我军是致力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我们对他们说:“我们的方针你们是知道的,请问你们的具体条件是什么,你们希望得到什么?”

1933年10月,蔡廷锴将军再次派正式代表^②到苏区与福建交界地区^③同红军谈判。当时我们对同19路军建立统一战线的意义和可能性还估计不足。我们以为,19路军只是想利用这种谈判来减轻自己军事上的困境。但当10月份他们的代表到来并向我们暗示,他们打算同我们进行认真的谈判^④时,苏维埃政府责成我作为苏维埃政府的全权代表到汀州同19路军的两位代表^⑤谈判。这两位代表表达了同我们进行认真谈判的十分真诚的愿望,甚至表示愿意前往苏维埃中国的首都[瑞金城]会见我们中央执委会代表^⑥毛泽东同志,但我们中央的某些成员不想让这两位代表进入苏区,因为担心他们是特务。但当我给毛泽东同志发去电报^⑦后,他不同意这种观点并建议:让他们来。这样,毛泽东同志便把他们请到苏区。

他们到达后,毛泽东同志为他们举行了正式宴会。宴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讲话,阐明了以前公布过的统一战线的基本方

① 陈公培。

② 徐名鸿。

③ 原文如此。指福建省西部。

④ 见第170号文件。

⑤ 陈公培和徐名鸿。

⑥ 原文如此。应为:主席。

⑦ 文件没有找到。

针^①。两位代表听到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后深受感动，以至不知说什么好。让他们发言时他们说，“我们以为，毛[泽东]是半土匪半游击队的头领，我们决没有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位睿智的政治家”。

我们同这两位代表详细谈了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斗争中实行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谈判时这两位代表没有提出任何原则性的异议。于是决定，我们要签订某种正式协议。的确，我们把过于片面的要求列入了这个协议，开始机械性地拟订了协议。在协议中我们提出了释放全部囚犯，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的要求。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我军与 19 路军之间的中立地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争议。

回顾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我应该说，我们表现得似乎我们在战斗中战胜了他们，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但当 19 路军一位代表给蔡廷锴将军发去电报叙述了我们的协议草案^②后，他得到的答复出乎我们的预料。蔡廷锴作出指示：“接受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条件，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不管怎么样都要签订协议。”

于是我们同这两位代表签订了初步协议^③。蔡廷锴将军要求苏维埃政府派全权代表同他的代表一起去福建。我作为苏维埃政府的全权代表同蔡廷锴的代表一起去了福建。

但是，施平同志^④谈到的那位军事领导人责成我执行一项重大的军事任务，即获取重要的军事器材。他给了我一份这些军事器材的清单。当我到达福建时，蔡廷锴将军派自己的小汽车来接我们。我们被请上小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将军的私宅。应该说，在

① 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3 年 1 月 10 日和 4 月 15 日发表的宣言（见第 100 号文件）。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第 183 号文件。

④ 陈云。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报告时谈到了 O. 布劳恩（李德）。

第3次“围剿”^①时，蔡廷锴将军同我们进行过极为激烈的战斗。现在，当我被请到他的住所时，我想：“见鬼，我在跟谁打交道啊？是跟已经三次对我们实行‘围剿’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当我离开苏区时，同志们提醒我：“留神，小心点，可别让他把你给宰了。”我的一个朋友在同我告别时说：“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

不过我想，在业已形成的政治局势下，我们完全有可能真的同这些将军们签订军事协议。因此，我作为一名外交官满怀信心地去会见将军。我按照全部礼仪同将军进行了会晤。我向他递交了由毛泽东同志亲自签署的官方证书，其中正式确认委任我为苏维埃政府^②的全权代表。他很满意。他说：“我没有料到，你们也有这些东西，我对此事没有准备。”

我在同蔡廷锴交谈时，还是认为，在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他没有诚意。他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您看，如果我们在福建成立政府，并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苏联会不会承认我们的新政府？”他又补充说，“要知道，孙中山在广东成立政府时，苏联就支持他，这给了他极大的帮助。我想继续孙中山的事业，在国内同共产党人合作，在国际范围内保持同苏联友好。”当然，我不能对他作出什么具体回答。我对他说，作为原则，苏联始终会帮助被压迫民族进行解放斗争。我不能对他作出什么肯定的回答，但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成立强大的政府，那么苏联一定会支持它的。我补充说，我有一些朋友，可以同苏联人士取得联系。

[他]接着对我说，“最难办的是，如果我们成立一个新的政府，没有一个政府会正式承认我们。”我提请他注意，美帝国主义会对他们表现出比较友好的态度。据我们所知，美国驻华大使馆代表约翰逊曾专门乘飞机到常州，会见19路军的代表。这个情况他瞒

① 指国民党军队1931年7、8月间对中国苏区的“围剿”。

② 1931年11月20日成立。

着我。显然，他怕我们指责他与帝国主义者有联系。当我向他说出自己对美国政府的推测，说明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并不排除利用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某种友好关系和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矛盾的可能性时，他抓住我的手，使劲握着我的手说：“天哪，我没有想到，苏维埃代表如此精通外交事务。”他当即问我：“那就是说，如果美帝国主义的代表约翰逊打算支持我们，你们不会反对我们？”我再一次向他解释说，原则上我们可以同意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条件下利用美帝国主义。他高兴极了，说：“你们有广阔的眼界。”

因为军事领导人责成我弄到军事器材，我便闪过一个念头，想利用业已形成的局面向他提出这些问题。不言而喻，如果我把清单交给他，那会闹出笑话的。我向他指出：“您知道，假如我们真的共同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那就请您注意，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不足。您其实了解我们红军的英雄主义精神，知道我们有多么英勇的战士，但我们缺少现代军事技术装备。如果你们真想同我们共同战斗，你们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一些现代技术装备，如高射炮、改良型山炮、炸弹发射炮等。”他回答说，“是的，这个不难。如果我们要占领某些港口要地，我们就可以以 19 路军的名义正式订购军事器材。”这时他毫不掩饰地向我们提出问题：“您知道，眼下还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大国承认我们，我很难支持你们。”

然而，我们军事指挥部的同志们没完没了地询问我获取军事器材的结果。我权衡了局势并考虑到，如果我坚持向将军提出这个问题，就会给他造成不好的印象。我决定前往福州，看看那里的情况到底怎样，那时再给指挥部作具体回答。

这个时候，蒋光鼐和陈铭枢这两位著名活动家从香港乘飞机来到福州。蔡廷锴向我表示：“我们确信，你们真诚地希望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我个人，比如说，只想站出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我打算正式退出国民党，推翻蒋介石政权，成立新的政府。”他说得很坦诚。于是我们开始详细而具体地讨论了军事合作问题。

他说：“现在我们还不能这样做。我们想尽快成立新的政府，并以这个政府的名义同你们签订协议，不过要请您同我一起去福州。”我同他去了福州。他们确信，如果蒋介石决定反对 19 路军，那么首先就会打击红军。

他们明白，如果同我们签订协议，就应当用适当的军事器材给予补偿。他们并不特别想这样做。但他们知道，不这样做谈判就不会达到目的，因此，他们口头上答应了，而实际上并不愿意这样去做。

在福州，蔡廷锴向自己的指挥部示意，有苏维埃政府的全权代表在这里。但同时他却不让师长们直接同我交谈。他召开了军事委员会会议，并邀请我出席这次会议。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想让自己的指挥官们明白，他们有红军的支持，他们有盟军。

过了一段时间，在福建成立了人民政府^①。我们又一次试图签订协议，但感到事情进展不顺。于是我们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我们提出在我们地区与他们地区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的问题。我们缺少很多生活必需品：食盐、药品等等。但我们苏区有些产品卖不出去，如纸张、大量的钨。他们赞成开展贸易。这样就达成了协议。苏区的情绪大大高涨起来。大家都认为同 19 路军建立贸易联系是正确的。19 路军地区的居民也很满意，因为他们可以向苏区出售自己的商品。

这时，蒋介石开始从北面进攻。我们中断了关于以后军事采购的谈判，开始讨论共同反对蒋介石的可能性。他们的外交部长叶夫根尼·陈^②还试图玩弄手腕来对付我们。他指出：“我们不需要书面协议，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实际执行。”但是我们的谈判还没有结束，蒋介石就占领了离福州 120 里(60 公里)的延平^③城。

① 成立于 1933 年 11 月 20 日。

② 陈友仁。

③ 现称南平——译者。

在 19 路军指挥部内还对能否真正相信红军进行了一场很大的争论。一些人说,如果红军真的同我们在一起,那它为什么给蒋介石军队提供突破防线的[机会]来反对我们。而另一些人则说,过错在叶夫根尼·陈身上,他跟红军玩弄外交手腕,就像同帝国主义大国玩弄外交手腕一样。

在延平被占领后,19 路军陷入了非常艰难的境地。它开始极力请求红军给予支援。蔡廷锴通过电台请求我们的司令员在眼下还可以挽救危局,阻止蒋介石的进攻的时候尽快派出部队。但是我们的红军不是派部队去援助 19 路军,而是向西,即向远离福建的方向推进。蔡廷锴又向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发电报^①。我们开始论证,如果我们现在不派部队去援助 19 路军,它就会很快被消灭,那就会中断我们建立的贸易联系,我们苏区是靠这种联系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联系的中断会给苏区居民造成很大的打击。我党领导和苏维埃政府决定放弃远离计划,去援助 19 路军。但蒋介石军队占领延平后已经渡过离省会^② 80 公里的闽江。当时不仅 19 路军指挥部,就连 19 路军的战士都开始请求和期待着红军的援助。

战士中间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情绪:他们认为,他们的军队是第一条战线,而红军是第二条战线。19 路军指挥部不止一次地鼓励士兵说,红军一定会来支援他们的。我说说这样一个情况:一名战士走到我面前说:“听说我们红军在某地取得了胜利?”我问他,“你为什么说我们的红军?”他反驳说:“怎么,难道你不知道 19 路军和红军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

不久,蒋介石就包围了福建。蔡廷锴和叶夫根尼·陈看到,同蒋介石作战单靠 19 路军的力量不行。他们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红军不去援助他们,他们将不得不撤退。但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指福建省省会福州市。

我们没有好的运输工具,我们估计,如果我们徒步前往,那需要7天时间,才能给他们以援助。他们已经丧失任何希望,并已开始撤退。他们有一半力量已被蒋介石军队消灭。政府的全部人员仓皇逃亡香港。处境非常困难。我们鼓励蔡廷锴说,红军将始终同他在一起。最后蔡廷锴只剩下了一个团。又有红军代表^①到他那里去,再次向他提出了武器弹药问题。蔡廷锴只是摆摆手。

这时红军已经发起进攻。我们占领了离福州60公里的沙县。蔡廷锴将军对此非常高兴,并为红军举行了宴会。我当时已去香港。叶夫根尼·陈到处找我。见面时他对我说:“我们将永远是好朋友,尽管我们遭到了失败。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见面的。”蔡廷锴至今仍表示希望继续同我们友好,虽然他已经没有军队了。

当王明的小册子^②发表时,蔡廷锴说,里面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他指出,在这本小册子里,共产党人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正确地批评了19路军。当我动身来这里时,他大体上是这样一种心情,他希望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斗争。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当我们的红军向中国西部推进时,广州的军阀们认为,如果蒋介石能消灭红军,那就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威胁。在他们看来,红军至今是南京军队和广州军队之间的屏障。我们曾派代表^③去进行谈判。第一次我们未能达成什么协议。第二次我们终究争取到广州同意进行谈判。我没有去广州,而是去了边防站^④。他们的代表对我们说:“如果你们遭到失败,那我们的处境会更糟。”

① 张云逸。

② 见王明:《新条件与新策略》,莫斯科1935年版。

③ 何人不详。

④ 指潘汉年和何长工于1934年10月上旬在江西省寻乌县罗塘镇同广州政府代表杨幼敏、黄质文和黄任寰的谈判。详见黄继祥:《关于中央红军同陈济棠进行军事停战谈判的若干问题》,载《党史通讯》北京1986年第11期,第35—39页。

在这个时期我们错误地提出了建立反帝人民阵线问题。我们打算通过同 19 路军谈判获得军事器材,并从这个角度进行谈判。但在我还没有取得谈判的具体成果时,我就接到了立刻返回的命令。我得知,红军要西进,我很快就返回了。当我们第二次同广州政府首脑陈济棠的代表进行谈判时,我们说,我们想继续进行反蒋斗争,并想经过他的防区。但陈济棠没有明白我们的意图。在我们经过的那些地区,我们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但当我们快要走过时,他从后面向我们开火了。他说:“如果你们只想经过我的防区,为何你们事先不让我知道。”

若是我们以前有建立反帝人民阵线的方针,并本着王明同志近期提出的建议^①的精神行事,若是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能粉碎蒋介石军队的进攻,因为实际上第六次“围剿”^②是在蒋介石消灭了 19 路军之后才开始的。如果我们真正同 19 路军实现了行动统一,蒋介石就不会那么容易进攻我们。19 路军以及其他集团的将领都希望同我们签订协议。但我们当时是以另一种方式提出统一战线问题的。我们不是统一战线的倡导者,而是人家派代表来找我们的。如果我们正确地实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民阵线政策,那么今天中国的军事地图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们会取得更多的成就。

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012,第 67—78 页。

经过核对的速记记录,副本。

① 见王明:《中国共产党的新任务》,载《布尔塞维克》杂志,莫斯科 1935 年第 20 期,第 53—67 页。

② 即指第五次“围剿”。

33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非常会议^①
第8(A)号记录

(摘录)

1935年10月15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7(64)。——中国红军和苏维埃的状况。

① 出席会议的除共产国际负责工作人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成员外还有 C. II. 乌里茨基和 A. X. 阿尔图佐夫。

报告人：施平^①、徐杰^②和伯林^③（见速记记录^④）。

- ① 陈云。
② 陈潭秋。
③ 潘汉年。见第 338 号文件。

- ④ 会议记录进行两次校订。第一次主要是对中国代表的发言进行文字加工，完全删去了 J. 3. 曼努伊尔斯基在徐杰报告后所作的以下发言：“我认为，最后是让不准备发言的同志大致也像发言的同志那样把自己所做的工作写出来。我们将在我们的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这个材料，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打算就苏维埃中国的革命问题出一期《共产国际》专号。此外，我们将在外国报刊上发表。我要说，这是极其珍贵和十分重要的材料，多年来我们还不曾有外国党的这类材料。因为在这里就座的一方面是英勇长征的参加者，另一方面是近年来中国革命斗争的参加者，因此我认为，这将是极珍贵的材料。如果我们再把满洲运动直接参加者的某些材料补充进去，那我们就将获得目前正在开展的运动的全貌。”

我认为，迄今为止我们在对中国的态度上有过许多的热情和下意识的爱，但我要让你们相信，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与我们迄今所看到过的完全不同。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

我认为，这个材料应该发表，加以广泛宣传，当然要删掉出于保密考虑不能公布的部分，例如，对那位“帮助过”你们的、可以说是天才的代表的批评。

我还认为，我们现在要按这样的程序继续下去：我们今天只听取中国同志的报告和发言，而在你们回来后[休息后]，我们或许还要向你们提出一些问题。在你们作出答复之后，我们想听一听当今的军事形势和前景，然后我们讨论整个中国问题，并作出一些决定。同意吗，同志们？（中国同志答：同意）”。（见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012，第 151—152 页。）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经过校订的速记记录于 1935 年 10 月 22 日呈送给 H. B. 斯大林、K. E. 伏罗希洛夫、B. M. 莫洛托夫和 JI. M. 卡冈诺维奇（见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012，第 1 页）。

在起草供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报告时，施平的讲话作了较大修改。

其中，大大压缩了关于所犯军事错误的部分，完全删掉了关于经济政策（对商人和富农的态度）上的缺点、关于罗迈（李维汉）在干部政策上的错误、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部分。谈及遵义会议时，施平说，“我们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不仅是政治局委员，而且还有全部军事领导，军团长和政委。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向四川[省]进发的决定。此外，我们还在会上纠正了在防御蒋介石第六次“围剿”的最后阶段和我们西征的最初阶段军事领导的错误。”

你们知道，军事领导在这一时期犯了许多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已经得到彻底纠正。组成了坚强的领导取代了原有的领导。加强了军队内党的领导。我们解除了“纸上谈兵的战略家”的职务，并把毛泽东推上了领导岗位。（见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012，第 12 页。）

在讲话的最后一部分删去了争取中国苏维埃革命取得胜利的提法，增加了必须首先取得对日本帝国主义胜利的提法（见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013，第 104 页）。

在第二次校订过的速记记录上有批注：我们已审阅，重印后可以交《共产国际》编辑部。王明、弗雷德[M. 施特恩]（见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013，第 65 页）。1935 年 11 月 15 日，J. 3. 曼努伊尔斯基把经过审定的供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报告送给了 A. A. 安德烈耶夫（见全宗 17，目录 120，卷宗 204，第 80 页）。三个报告中只有一个以论文形式发表。见施平：《英勇的西征》，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 1936 年第 1—2 期，第 45—68 页；亦见《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 1935 年第 33—34 期，第 26—41 页。

决定:1. ——只限于在会上听取报告。

共产国际代总书记 艾尔科里^①

全宗 495, 目录 18, 卷宗 1022, 第 1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陶里亚蒂。

340

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

1935年10月29日于莫斯科

绝密

亲爱的季米特洛夫同志：

谨向您通报中国方面的几件比较重要和比较紧急的事情：

(1)关于那个能否解决要取决于有关机构^①的问题，尽管现在客观上的可能性比以前大得多，我们已经都准备好了，并且曼努伊尔斯基打了电话，亲自到那里去了，但由于当时主人^②不在，从您动身时起到现在还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现在主人来了，我们将尽量直接同他谈一谈，但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谈。如果能从您那方面给予某种协助，问题就会得到更好和更快的解决。

(2)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外举行党的代表会议一事，这个会议应在本月举行，但由于来自美国的主要代表在取得护照和签证方面遇到了困难，至今还不能举行。我们正设法使它尽快在最近一个月^③内举行。

(3)关于中国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19路军集团同其他集团一起又组建了一个新党，虽然我们对这个党还不详细了解，但据塔斯社报道我们知道以下情况：

又一个具有更为激进的行动纲领的集团正在形成。人们认为

① 显然是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② И. В. 斯大林。

③ 会议没有举行。

原 19 路军司令蔡廷锴、原“独立的”福建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原河北省省长于学忠、广西省省长李济深和其他与南京对立的将领都是该集团的创始人，甚至南京政府的成员（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将军）似乎也是创始人。

在称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①的新党创始人预备会议上制定了以下纲领：认为该党存在的主要目标是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建立民主政府，该党将为实现以下纲领而奋斗：

1. 推翻南京政府。
2. 集中全国力量完成国民革命。
3. 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收复被占领土。
4. 武装民众。
5. 征召爱国士兵进行抗日战争。
6. 抵制日货并对其实行高额关税。
7. 反对独裁和白色恐怖。
8. 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自由。
9. 反对卖身投靠的国民党官吏、豪绅和长老。
10. 消灭封建主义。
11. 消灭“蓝衣社”^②。
12. 拒绝向南京国民党政府缴纳一切捐税。
13. 取消一切附加捐税和非法勒索。
14. 反对旧礼教（孔教、佛教和道教）。
15. 普及教育。

正如该党的拥护者所言，他们打算一开始建立独立的西北中国，其中包括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如果顺利还包括绥远，并同中华苏维埃结成同盟，开始进行抗日战争。

① 1935 年秋在香港成立，1937 年 10 月宣布自行解散。

② 蓝衣社成立于 1932 年 3 月，于 1938 年 4 月解散。

该集团希望成为群众性的“民族救亡”党。武装抗日、与中华苏维埃媾和、同苏联结盟的口号最近不仅在中国工人中间，而且在某些国民党人阶层中间都成了十分流行的口号。因此，该党创始人试图利用这些口号是毫不奇怪的。

还不清楚，在成立大会上纲领草案经过讨论后纲领本身会成为什么样子，据说，大会本应于9月底在香港举行。但现在，在创始人中间围绕草案已进行着不小的争论。最激进的一派建议加进关于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其分配给农民的直接要求，但多数主要领导人认为这过于革命了。

对于消灭封建主义的一条，在该党创始人的嘴里只意味着消灭封建行政体制，但决不触及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封建乡村的基础。

该党的著名领袖之一陈铭枢将军，在值满洲被占领四周年之际发表的告人民书中，不仅公开批判了自己过去对人民和国家犯下的错误和罪行（过去他自己也以军阀和官僚的习气行事），也不仅公开而具体地历数了蒋介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背叛民族的事实，而且清楚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民近年来的全部灾难和不幸，首先是由于国民党在1927年背叛中国革命事业，同中共闹分裂，并在“清党”的借口下屠杀了全国成千上万的先进的、忠诚的和进步的青年^①。

其他党派发表的这种公开声明在中国已经好久不见了。这位将军现在打算到这里来同我们（中共和共产国际）谈谈。我们与他有联系的人^②不止一次地劝他，眼下不要到这里来，而应当在国内工作，但他坚决要来，大概很快就会到这里。我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让他来这里合适吗？如果他还是来了，那么对

① 见《学生救国运动》，[巴黎]1936年第1卷，第84—90页。

② 何人不详。

他应当怎么办呢?

(4)由于日本对中国发动新的进攻以确立它对中国的完全保护国地位,也由于要求撤换蒋介石等,以及由于红军与蒋介石之间斗争形势的变化,蒋介石与其他集团之间斗争的加剧,特别是包括军队在内的全民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的增长,中国的局势有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已经有消息说,连蒋介石也宣称他知道我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①,并确信共产党只是现在才真正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并想改变自己的战线,也就是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斗争。以后事情会怎么发展,目前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实行正确政策和进行顽强斗争的条件下,在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局面。

康生、米夫和克雷莫夫^②同志与又从苏区和国民党地区来的同志一起于10月17日前往哈尔科夫参观去了。康生和施平^③(中央书记之一)将于11月3日返回莫斯科,其余的人于11月5日返回。

您的身体状况如何?望您多安心休息和治疗,少考虑一般的事情。

紧握您的手。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王明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1037, 第 55—58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王明:《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见《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5年第25期,第26—49页。

② 郭绍棠。

③ 陈云。

341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 给吴玉章的信^①

1935年11月16日^②于莫斯科

请立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以下内容的简短声明^③：

“致全国人民、各党派和各军队！

同胞们和兄弟们！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组建‘华北国’^④和进攻整个中国。北方的军阀在把我们华北五省的广阔领土和9500万人民出卖给日本人。而南京政府，尽管内部对日本今后的攻势有严重分歧，但是实际上仍在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我们整个国家处在危急之中！我们全体人民的命运已千钧一发！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奴役我们伟大的四亿五千万人民的威

① 发信人和收信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日期是根据1935年11月19日A. Г. 克雷莫夫(郭绍棠)送给Г. 季米特洛夫的文件俄译稿(见全宗495, 目录74, 卷宗280, 第1页)确定的。1935年11月17日, 王明和K. 哥特瓦尔德向在巴黎的吴玉章发去了关于必须广泛散发中共中央声明(见全宗495, 目录184, 卷宗45(始于1935年), 第147页)的电报。根据未查明的原因, 声明俄译稿注明日期为1935年11月25日(见《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莫斯科1937年, 第110页)。

③ 经稍许删节的中共中央声明于1935年12月9日首次在《救国时报》上发表, 该报1935年至1938年在巴黎出版, 1938年至1939年在纽约出版。发表时特别删去了文件最后一句。

④ 原文如此。指由热河、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北等省组成的“华北傀儡国”。

胁，中共中央再次号召全国同胞、一切忠诚的爱国者和所有军队不管党派属性和政治信仰的差别，立刻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同斗争！”

早在今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起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①中，就已具体建议我们所有不愿意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奴隶的忠诚的爱国者和军队同苏维埃政府和满洲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人民的国防政府，并同红军和满洲抗日游击队一起组织全中国的抗日联军！

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现在是联合我们伟大的全国人民拯救自己祖国的时候了！

只有我们全国人民赶紧团结起来才能挽救我们的祖国！

中共中央再次真诚地声明：共产党准备同所有忠诚的爱国者一起为拯救我们的祖国而奋斗，同时它还表达了英勇红军的千百万战士的热切愿望和战斗准备，红军准备同我们所有的国民军一起进行武装保卫，反对不共戴天的外部敌人。

同胞们，兄弟们！

立即停止我们人民和我们军队中的任何内部争斗！立即停止对自己的中华苏维埃和红军的军事行动。让全国人民和所有军队为共同的神圣事业——抗日救国立即联合起来！

中共中央建议：在一切政党和集团之间、所有军队之间和各社会团体与群众组织之间立即开始就联合反对共同敌人的条件和途径问题进行谈判。中共中央建议立即召开将有我国所有愿意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斗争的各政党和集团、各军队、各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民主选出的代表参加的全民救国大会，以便讨论动员和联合全体人民和所有军队进行民族保卫战的具体措施。

^① 见第336号文件。

打倒全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全中国人民和所有中国军队为抗日救国统一行动万岁！
请广泛散发这一声明，把它寄给从普通士兵到蒋介石的所有
军队。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80，第 2—4 页。

打字稿，副本。

342

中国工农红军的呼吁书

1935年11月^①于莫斯科

中国红军的呼吁书^②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杨靖宇、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第六军军长谢文东,东北义勇军总司令吴义成、副司令孔宪荣,他们属下的团营连,以及所有满怀抗日热情的义勇军和游击队官兵,在香港的陈铭枢和李济深先生,19路军军长蔡廷锴、指挥官蒋光鼐和保卫上海的全体官兵,南京蒋介石总司令,广东陈济棠总指挥,广西李宗仁总指挥、白崇禧指挥官,太原阎锡山总指挥,泰山冯玉祥总指挥,天津方振武和孙殿英将军,西安张学良副总司令、于学忠指挥官和杨虎城主任,长沙市市长何键,宜昌市市长程潜,川军司令刘湘将军、刘文辉将军,军长邓锡侯将军、军长田颂尧将军、军长杨森将军,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和军长马鸿逵,青海省军队总指挥马步芳,新疆省督军盛世才将军,黄埔军校、中央军校、保定军校的学员,各海、陆、空军校的全体学员,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的全体指

① 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文件首次发表在《救国时报》上(巴黎,1935年第1期,12月9日)。

② 文件草案由潘汉年起草,由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审定(见黄启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载《中共党史研究》,北京1988年第6期,第7页)。

挥员全体战士，以及商人和地主自卫队的所有长官和队员，全体兄弟们，谨此通告如下：

在各个时期和在全世界没有再比国家丧失独立更大的灾难，没有再比变成被征服国无依无靠的奴隶更大的痛苦。今天中国东北的4000万同胞正处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他们的财产被征用，土地被没收，武器被剥夺，粮食被洗劫，学校被强制灌输奴隶思想，[中国]文化被彻底扼杀。青年被强迫去服兵役，妇女被强奸，炽热的爱国者被残忍的消灭，甚至和平居民也受到敌视。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引起全国同胞的痛苦和悲伤，不论他们的阶级和党派属性如何。作为被征服国举目无亲的奴隶要比无家可归的野狗处境更糟。中国东北的所有同胞现在实际上就处于这种境地。情况就是这样，类似的命运很快就会降临到我们全国同胞的头上。日本侵略者不仅侵入我国北部省份，在那里建立了实际上是第二个“满洲国”，而且也已抵达长江流域，深入到福建和广东两省。日本飞行中队不久前对汕头的侵袭和军队在汉口的集结不仅是武力的炫耀，而且是为继续进攻我们整个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如果我国还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还任凭敌人胡作非为，那么我们就将面临国家灭亡、家园沦丧的前景。卫国护民是军人的天职，如果我们只考虑个人，让我国人民处于这样悲惨的境地，那么我们自己不仅不能逃避灾难，而且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不久前，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了告全体同胞书^①，号召全国同胞面对外来危险要真正理解“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应当团结一致。告全体同胞书还建议，要号召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所有党派和集团共同成立统一的国防政府，要把一切希望卫国护民的军队和武装力量团结在一起，建立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以便动员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军力）满足神圣的全国抗日战争的需要。我们认为，在这

^① 见第44页注^②。

一号召中含有拯救国家,保证其生存的真正唯一的途径。我们声明,决心保证完全支持任何国防政府,不管它以何种方式成立,我们决心率先加入抗日联军,不管它以何种方式组建。我们希望同一切真正抗日的武装力量建立密切协作关系,不管它们过去是否反对过我们。只要这样的军队抗日就足够了,我们立即承认它是与共同的敌人进行斗争的友军,我们将兄弟般地并肩地共同进行抗日战争。我们再次呼吁全国同胞表现出爱国天良,停止任何内讧,团结一致共同维护自己国家的尊严。如果全国四万万同胞团结一致英勇的斗争,那么日本侵略者虽然强大,但也难以取胜,而我们中华民族仍有希望振作起来并获得新生。现在,在这危急时刻,时不我待,已经没有时间再多加思索了,我们建议立即举行各方代表的联合谈判,并在最短时期内召开全国怀有抗日热情的军人的代表大会,确定建立抗日联军的具体措施。我们都是我国的军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如果我们不希望让我们的祖国和家园处在外人的铁蹄之下,那么我们就应当立即奋起,挺直腰杆,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一致。急切地期待着调遣,望电复。

中国红军总司令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第一军团司令林彪、第二军团司令贺龙、第三军团司令彭德怀、第四军团司令徐向前、第五军团司令董振堂、第六军团司令肖克、第八军团司令周昆、第九军团司令罗炳辉、第十军团司令刘英以及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战士。

《学生救国运动》,巴黎 1936 年第 1 卷,第 57—59 页。

343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代表团给戈帕涅尔的便函

1935年12月20日于莫斯科

秘密

戈帕涅尔同志^①：

为使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培养中共干部方面更好地提供帮助，我们请求将以下建议提交共产国际书记处审议^②：

1. 根据现有需要并考虑到近来中国事态的发展，应采取扩大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分校的方针，使1936年的学生总数达到200人到250人。其中包括：

- (1) 满洲班，从现在的40人增至150人。
- (2) 华北班(占领区)，从0增至30人。
- (3) 苏联远东班，从10人增至20人。
- (4) 党务领导工作人员班，从2人增至10人。
- (5) 研究生班，从4人增至10人。
- (6) 特别(侨民)班，从6人增至15人。

2. 将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改组成附属国际列宁学校的独立分校(按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形式)，设两个系：苏维埃中国系和非苏维埃中国系。

3. 把培养中共干部的责任交给康生同志，同时责成他直接领

^① 文件副本也送给了Г. 季米特洛夫、И. А. 米夫和国际列宁学校。

^② 见第356号文件。

导附属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附属国际列宁学校的中国分校的工作。

4. 允许从国内和苏联境内的中国同志中招收研究生,以便培养教员和高级翻译。

5. 保证通过外国工人出版社向中国分校提供必要的中文教材。

6. 责成由曼努伊尔斯基、戈帕涅尔、米夫、王明、康生、施平^①、基萨诺娃、赖特、梅利曼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审定中国分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以便使之更接近中共的需要和新的情况。

7. 在联共(布)中央面前支持国际列宁学校,特别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提出的关于给予中国分校必要的物质设备和交通工具的请求。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36,第 39—40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陈云。

344

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① 提出的 1936 年第一季度中国工作计划

1935 年 12 月 23 日于莫斯科

秘密

中国工作计划 (1936 年 1 月至 3 月)

一、组织情况通报

1. 利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研究室的力量组织定期出版每月通报^②。最近几期要阐明 1935 年度关于中国和满洲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关于国民党五大^③、关于阎锡山的土改方案^④、关于华北事变、关于今年群众性抗日运动和革命运动等的总结性材料。

2. 利用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研究所下属[中国]科研所的力量组织出版至少五天一期的中国报刊简报(文章、信息资料等)^⑤。简报上还要安排译自中文的最重要论文和刊物上已发表的文件。

① 起草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指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会中国研究室的通报(第 3 期起为信息通报)。1935 年在莫斯科出版。

③ 指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 1935 年 11 月 12 日至 23 日在南京召开。

④ 指 1935 年 9 月 16 日的《土地社会化纲领》。详见:A. A. 皮萨列夫:《国民党与中国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的农民土地问题》,莫斯科 1986 年,第 190—191 页。

⑤ 定期刊物没有找到。

3. 组织从中文翻译来自中共的最重要的秘密文件。为进行这项工作要吸收克雷莫夫^①、杨松、郑铸(音)^②和李明^③同志参加。

4. 每月至少举行一次会议,听取专题[抗日运动问题、工人问题、农民运动问题、红军斗争问题等]口头通报。

二、宣传[共产国际]七大决议^④

1. 组织翻译和认真校订还没有用中文发表的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和材料^⑤。

2. 收集关于党组织对七大决议的讨论情况的各种材料以及中国政治活动家对代表大会的各种意见。

3. 组织撰写并发表一些根据中国的情况阐述七大决议的小册子和指导性文章,其中包括:

(1)《论中共的新政策》(王明同志)^⑥;

(2)《论孙文主义与国民党》(王明同志)^⑦;

(3)《论工会工作》(康生同志)^⑧;

(4)《论土地问题》(周和生同志)^⑨;

① 郭绍棠。

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③ 李立三。

④ 见第33页注②。

⑤ 1935年在莫斯科用中文发表了共产国际七大决议,Г. 季米特洛夫、B. 皮克、И. 陶里亚蒂、Д. 3. 曼努伊尔斯基、王明的报告以及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讲话。1936年出版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各种问题的材料汇编。例如,《反对战争,拥护和平》,莫斯科1936年。

⑥ 见王明《新形势与新政策》,《共产国际》莫斯科1936年第1—2期,第3—44页。文章于1936年在莫斯科以单独的小册子出版。

⑦ 见卫华:《纪念孙中山先生》,载《全民月刊》,巴黎1936年第1卷第3期,第11—15页。

⑧ 出版物没有找到。

⑨ 出版物没有找到。

- (5)《论苏区的经济政策》(徐杰同志)^①;
- (6)《论苏维埃民主和苏维埃建设》(肖亚〈音〉同志)^②;
- (7)《论党的组织工作改革》(施平同志)^③;
- (8)《论民族革命战争》(李明同志)^④;
- (9)《论满洲的抗日运动与游击斗争》(杨松同志)^⑤;
- (10)《关于青年中的工作》(刘坎亭〈音〉和孔原同志)^⑥;
- (11)《关于中国工人运动》(梁朴同志)^⑦。

4. 为了更好地给该国提供指导性文章和材料以及关于苏联的信息,要仔细研究一下要么出版专门的中国[通讯]《国际新闻通讯》^⑧,要么更广泛地利用用欧洲语言出版的《国际新闻》^⑨的问题。

三、为纪念中共成立 15 周年做准备

1. 为纪念中共成立 15 周年准备出版下列小册子:

- (1)《中国共产党 15 周年》(米夫同志)^⑩;

① 陈潭秋。出版物没有找到。

② 吴克坚。出版物没有找到。

③ 陈云。见施平:《中共是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 1936 年第 4—5 期,第 109—119 页;《民族殖民地问题》,莫斯科 1937 年第 1(38)期,第 58—65 页。

④ 出版物没有找到。

⑤ 见杨松:《论东北人民抗日统一战线》,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 1936 年第 1—2 期,第 112—128 页。

⑥ 出版物没有找到。

⑦ 饶漱石。出版物没有找到。

⑧ 定期刊物没有找到。

⑨ 《国际新闻通讯》于 1921 年至 1943 年用德、英、法和其他几种文字出版。

⑩ 见 II. A. 米夫:《英勇斗争的十五年(纪念中共成立 15 周年)》,莫斯科 1936 年该书还用中、英及其他文字出版。

(2)《中共文件集》^①(李明、林大生^②、普拉格尔同志);

(3)《中国苏维埃》第2卷^③(王明、克雷莫夫、米夫同志);

(4)《中共人物(著名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④(博林^⑤、肖亚(音)、李明、徐杰、米夫等同志);

(5)《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⑥(工作队);

(6)《民族危机与中国共产党》^⑦(王明同志)。

2. 在中国各种政治、军事和教育人士中间调查对中共的看法,并出版单独小册子公布他们的答复^⑧。

3. 准备出版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的《共产国际》杂志^⑨、《国际新闻》专号和《真理报》专版^⑩。

四、干部工作

1. 清查在苏联境内的所有中国干部并制定动员计划。

2. 检查中共干部工作状况,拟订改进中共在苏区和国统区干部政策的建议。

3. 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审议旨在改进整个中共干部培养体制的建议,特别是关于扩充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分校,将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改组为苏维埃中国和非苏维埃中国

① 出版物没有找到。

② 武胡景。

③ 指《中国苏维埃(文献资料)》第2集,莫斯科1935年。保留了未出版书籍的大概。第1集指《中国苏维埃(文献资料集)》,莫斯科,1933年、1934年。

④ 见《烈士传》,莫斯科1936年第一辑;《中国人民的英雄》,载《民族殖民地问题》第1(38)期,第76—136页;《中国人民的三位英雄》,莫斯科1936年。

⑤ 潘汉年。

⑥ 出版物没有找到。

⑦ 见王明:《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莫斯科1936年。

⑧ 出版物没有找到。

⑨ 《共产国际》杂志于1919—1943年用俄、德、英、法和其他文字出版。

⑩ 见《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6年第14—15期;《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6年第4—5期。

的独立学校，保证给这些学校提供服务人员和各种教材等的建议^①。

4. 安排为整个中国学校网招收大学生和研究生。

5. 集中、研究和总结有关中国红军干部的材料。

6. 拟订改进在中国侨民中的工作的措施。为此要利用在欧美召开的华侨代表会议。

7. 为了加强中国方面的工作，要补足编制，特别是要挑选一名中国翻译到翻译部工作，和挑选一名通晓俄文和中文的书记（中共代表）。

五、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和[苏联外国工人]出版局系统的工作

1. 与青年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一起：(1)根据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②决议制订关于改组中国共青团的文件^③；(2)发表针对华北事变的宣言^④；(3)建立欧洲国家学生联合会与中国学生组织的联系；(4)研究中国青年组织（文化、体育、半宗教、同乡等组织）的状况，以便制订建立统一战线的具体措施。

2. 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人员一起：(1)起草关于争取工会统一问题的决议草案^⑤；(2)举行海员俱乐部工作人员会议；(3)在现有中国学校组织工会工作人员的专门培训；(4)制订针对华北事变

① 见第 356 号文件。

② 指共产国际七大和青年共产国际六大。

③ 指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 1935 年 12 月 20 日起草的《中国共青团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学生和青年同胞书》，文件于 1936 年 1 月 14 日在《救国时报》上发表。亦见《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北京 1985 年版，第 513—516 页。

④ 指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 1935 年 12 月 31 日起草的《中国青年党关于最近华北事变的声明》，载《学生救国运动》，巴黎 1936 年第 2 卷，第 67—68 页。

⑤ 文件没有找到。

的[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①呼吁书草案^②。

3. 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工作人员一起:(1)讨论并拟订改组中国整个救济会工作的计划;(2)组织支持北京^③游行示威者的运动;(3)广泛开展援助中国政治犯和赎出被捕者的活动。

4. 与[苏联外国工人]出版局的工作人员一起:(1)讨论1936年的出版工作计划;(2)保证给出版局提供必要的干部;(3)制订改变我们著作整个发行系统的措施;(4)保证向中国学校提供必要的中文教材。

六、季米特洛夫同志秘书处会议日程安排

1月5日:1. 在中国实现统一战线的具体途径(王明同志)。

2. 1936年[苏联外国工人]出版局工作计划(李明同志)。

3. 在华侨中的工作(康生同志)。

1月22日:1. 关于改组中国救济会工作(康生、杜宁^④同志)。

2. 关于中国东北省份的工作(杨松同志)。

3. 关于1935年中国农民运动的通报(克雷莫夫同志)。

2月5日:1. 争取中国工会统一的斗争(梁朴同志)。

2. 关于改革中共组织工作(施平同志)。

3. 关于海员俱乐部的工作(康生同志)。

2月22日:1. 争取青年统一战线的斗争(刘[坎亭]和孔原同志)。

2. 中国苏维埃的救济政策问题(周和生、徐杰同志)。

3. 关于1935年抗日运动的通报(克雷莫夫同志)。

① 原文如此。应为中华全国总工会。

②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就支持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告工人朋友书》，注明日期是1935年12月18日。见《中国工人运动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1986年第2卷，第280—282页。

③ 原文如此。应为：北平。

④ 杨之华。

3月5日:1. 中国学校的工作(康生同志)。

2. 红军斗争的问题(王明同志)。

3. 研究所的工作(克雷莫夫同志)。

3月22日:1. 关于准备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的工作(康生同志)。

2. 中共的刊物(肖亚同志)。

3. 关于工人运动的通报(克雷莫夫同志)。

七、关于通讯联络工作

(单列计划)^①

全宗514,目录1,卷宗836,第34—38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文件没有找到。

345

赖特就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中共 培养干部问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书记处的书面报告

1935年12月25日于莫斯科

秘密

关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中共 培养干部问题的书面报告^①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中共培养干部的工作分为两个时期：

1. 从1921年到1928年。

这个时期，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养了1119人：中国部培养了462人，军政特别班培养了687人。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毕业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育出一些中国革命英雄：陈乔年（中共中央委员，被杀害）、陈延年（中共中央委员，被杀害）、赵世炎（上海起义^②领导人，被杀害）、张太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州公社^③军事委员，牺牲）、王一飞（湖南省委书记，被杀害）、李慰农

① 文件副本送给了Г. 季米特洛夫、Л. З. 曼努伊尔斯基、王明和С. И. 戈帕涅尔。

② 指1927年2、3月的上海起义，赵世炎积极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③ 指1927年12月11日至13日的广州起义。

(山东省委书记^①，被杀害)、罗亦农(中共中央委员，被杀害)、瞿秋白(斯特拉霍夫)等英雄。

现在在中国工作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毕业生有红军总司令(朱德)、集团军和军团政治委员、大量军队政工人员、苏维埃中国共产主义高等学校和军校的工作人员。

1928年由于将中国干部集中在中国大学^②培养，我们把全部学生(138人)和教师、教学设备和器材都移交给了中国大学，停止了中国方面的工作。

第二个时期是在五年停顿之后于1933年从成立不大的满洲班开始的。在这个短暂时期内该校迅猛发展，我们已向国内派去19人，据我们所知，他们工作顺利。但有几个人已在工作岗位上英勇牺牲。

现在在校学习的达70人，到1936年春天我们应接收入学的达200人。

中国分校按其比重来说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占第一位。

然而，我们对这件事，无论在物质基础方面还是在教学干部和有关中国的教研工作方面都显得准备不足。

我们动员了自己的全部内部资源。专为印度分校建造的房子我们不得不拨给中国分校。50%—75%的运输工具交给中国分校使用。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开始聚集中国方面的干部，组建中国研究室，等等。

在组织和保证该校的正常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然而，在应该保证学校顺利工作的一切基本方面的状况还不能令人满意。

① 原文如此。实际上在1925年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

② 指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现在我们在三个地方进行培养中国干部的工作。

1. 基础学校(军训训练班)位于莫斯科近郊 30 公里的地方,绝大部分由满洲游击队和两个特别班组成:

(1)由 6 人组成的短期特别班,这 6 人是为国统区工作培训的(莫斯科高尔基大街);

(2)远东特别班(9 人)(新佩列韦坚诺夫卡)。

学生成分很好。就普通教育和政治素养而言是参差不齐的(有完全不识字的)。

基础学校分为 7 个教学班:4 个班学习期限为 18 个月;研究生班由 6 人组成,学习期限 2 年;青年班学习期限 3 年和一个由已经结业、等待派遣的特别班,对这些人正在做指导性工作。

据此制定了教学计划。

在基础班的教学计划中,占很大比重的是军事(800 小时)和普通教育科目(自然知识、地理、数学和汉语)。

整个教学计划的核心是国情问题:有关中国和满洲的专门课程,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

这些课程由中国同志(康生、杨松、克雷莫夫^①、赵毅敏)按教学大纲讲授,而教学大纲是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中共新策略制定的。

此外还讲授联共(布)党史、革命运动史和共产国际史、政治经济学基础和列宁主义基础。还拟办一个小型的日本人班。

这些科目的教学计划没有得到适合中国具体任务的教学大纲的充分保证。

(现在正在修订教学大纲。)

这些科目的教学本身很少适应中国的情况和学生的水平,主要是通过翻译用俄语进行的。

① 郭绍棠。

浪费了大量时间，主要是讲授的东西远不是所需要的。

主要原因是缺少既懂语言又了解国情的固定教学干部。

在学校工作的(除军事和普教科目外)有 15 名教员。他们中有：

5 名中国人(康生、杨松、克雷莫夫、肖亚(音)^①和赵毅敏)，固定在学校工作的只有赵毅敏同志一人。

懂中文的俄国教员 2 人(吉洪年科和科兹洛夫)，固定工作的只有吉洪年科同志一人。

略懂中文(目前还要用翻译)的教员 3 人(佩列威尔泰洛、梅利尼科夫和塔尔甘斯基)，而固定的只有塔尔甘斯基同志一人。

其余 5 名教员既不懂语言，也不了解国情。

军事科目是用俄语讲授的，而讲授的工作人员专业水平不高又完全不了解国情。

如果说在这样条件下学校还能比较正常地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代表团在学校里进行了大量的教学和党性教育工作。

鉴于中国特别需要工作人员，中国代表团完全正确地向我们提出了大大扩充我们学校的任务，以便除了为游击队培养政工人员外也培养领导地区和省一级党、工会和共青团的积极分子。

这项任务只有奠定相应的物质基础和为我校充实教学干部的情况下才能完成。

结论和建议

1. 无论是从中国同志中还是从联共(布)党员中培养中国干部的工作在[苏]联做得都极其不能令人满意。

2. 应向联共(布)中央提出有计划地从联共(布)党员中培养

^① 吴克坚。

中国方面工作人员的问题。要对联共(布)党员进行专门动员,让他们研究(中国的)语言和国情。

3. 集中查明共产国际内通晓(中国)语言和了解(中国)国情的工作人员。

4. 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分校配备一些在学校工作的教员,并向该校派一批懂得并研究(中国)语言的教员。

责成有关组织保证向中国分校提供了解该国国情的高水平军事工作人员。

5. 根据中国代表团的指示从满洲召回一些工作人员并让他们固定在学校工作。

6. 扩充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研究生班(从中国人和联共(布)党员中挑选)。

7. 保证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分校提供房屋(新建筑)、运输工具和其他必要设备。

8. 扩充并改进[苏联]外国工人出版局出版中文教材的工作。

9. 批准 1936 年从满洲招收 150 人,从华北招收 30 人,从远东招收 20 人。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 赖特

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147,第 35—39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346

库西宁书记处^①给叶若夫的信

1936年1月5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叶若夫同志

根据我们的请求,库西宁同志详细了解了卡拉—穆尔扎的声明^②。在与库西宁同志讨论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将给您寄去我们对这一声明的看法。很遗憾,由于忙于处理一些紧迫问题,我们未能早一点办理这件事。

卡拉—穆尔扎声明的主要论断是,“在中国,像在许多其他殖民地一样,实行的战略和策略不是依据列宁主义,而是依据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在第1页上是这样说的。在第47页上他把中共的基本路线说成是“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革命漫画”,而在第56页上他把共产国际的文件说成是“使中国革命威信扫地的文件”。卡拉—穆尔扎把这些哗众取宠的结论建立在对农民问题,特别是对富农问题的分析上。正如他自己所写的:“这种分析抓住了米夫在解释列宁主义对‘与全体农民一起’口号的理解上所犯的理论‘错误’,使我解开了托洛茨基反革命的整个一团乱麻”(第73页)。

实际上卡拉—穆尔扎什么也没有解开,相反,他完全搞乱了中

① 文件起草人是根据卷宗内部目录确定的(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1033,第1页)。

② 见第329号文件。

国的农民问题,歪曲了共产国际和中共首先在以下几点上的路线:

第一,卡拉—穆尔扎看不到中国农民问题的特殊性和中国富农的任何特点。然而,我们在共产国际文件中考虑到了区分中国富农社会本性的条件,中国富农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采用特别苛刻和特别残酷的方式剥削中国农民基本群众的小地主。

第二,卡拉—穆尔扎完全不了解,我们对待富农的策略是考虑到了所经历时期的情况,它不仅在不同的革命阶段不一样,而且在同一革命阶段的不同时期也不一样。例如,中共在革命遭到暂时失败情况下(1928年至1929年)是一种策略,在土地革命新的高涨时期(1930年至1932年)则有所不同。这种策略在土地革命取得胜利和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的地区又发生进一步的变化,最后在目前,当动员一切力量抗日和建立人民阵线来武装保卫中国的独立和完整的任务已经提到首位的时候,如何对待农民的这个问题就又以新的方式提出来了。

第三,声明作者把革命性质问题与动力问题不可原谅地等同了起来。例如,他维护这样一种观点:谁把富农从革命动力中排除出去,谁似乎就以此证明,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他声明的第9页)。而在共产国际文件中,相反却强调和说明,中共建议取消“联合富农”的错误口号“决不会动摇我们对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理解”(见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1929年6月7日给中共中央的信^①),而且共产国际还考虑到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殊性。

第四,声明作者为布哈林曾经提出的一种说法,即“不应激化对富农的斗争”作辩护。作者甚至确信,这种说法是布哈林与斯大林同志商讨过的(见卡拉—穆尔扎在声明第12页上的注释)。而

^①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1929年6月7日就农民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79—188页。

实际上恰恰是斯大林同志注意到了这种说法的错误,并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提议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发出了说明这个问题的专门信件。卡拉—穆尔扎整个批评的锋芒正是针对这封信的。

第五,声明作者试图歪曲共产国际1929年6月7日给中共中央的信,比如把“富农是主要敌人”的论点加到这封信上(声明第57页)。而在共产国际这份文件中说的恰恰相反:“不应忘记,虽然农民资产阶级和富农半地主成为中国反动派镇压农民运动的盟友,但地主、绅士、土豪仍然是国民党和中国反动派在农村的社会基础和主要支柱,他们在农村的统治还没有被摧毁。因此,丝毫不能对农业无产阶级与富农之间的阶级对立认识不清,必须在雇农群众面前,以及在全体农民面前,突出农村剥削者的中心人物——地主、豪绅、军阀和站在他们背后的外国资本家”。

第六,即使声明作者在援引正确的事实,说出某些正确思想的时候,他也从中得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例如,卡拉—穆尔扎利用中国苏维埃政策中的某些过火行为和错误(其中包括中国苏维埃有一个时期实行了没收富农土地的口号)来攻击共产国际的路线,贬责中共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切方针。在这里声明作者试图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他是第一个发现这些错误并给以注意的。声明作者有意避而不谈,这些错误和过火行为主要属于苏维埃运动的最初时期(1930年),正是共产国际(在卡拉—穆尔扎声明之前很久)指示中共必须同这类过火行为作斗争(见共产国际1931年的决议^①和《共产国际》杂志1931年至1934年刊登的一系列指导性文章)。

这个基本问题的情况就是这样,卡拉—穆尔扎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却试图为自己关于共产国际在殖民地革命运动问题上的整个路线具有“反列宁主义”性质的结论提出根据。至于声明中所涉及

^①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31年7月31日关于中共任务的决议。

的其他问题,在这里也明显暴露了卡拉—穆尔扎在这些问题上的政治错误,清楚地反映出了他声明的诽谤性质。

(1)例如,卡拉—穆尔扎在其声明第51页的补充中写道,李立三和瞿秋白统治被赶出中共中央。而事实上,尽管李立三和瞿秋白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们还是保留了中共中央委员资格,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承认了这些错误。

(2)接着卡拉—穆尔扎写道,王明、米夫等同志在中共四中全会^①上彻底地摧毁了中共,而实际上四中全会在使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方面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共产国际执委会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共产国际1931年的决议),后来的整个事态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个评价的正确。

(3)卡拉—穆尔扎为罗章龙作辩护,把他描绘成中共的奠基人之一,是党的最宝贵的工作人员(见第51页上的补充)。罗章龙是1931年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的。共产国际批准了对他的开除。从此罗章龙便成了南京政府的公开代理人。厚颜无耻的人现在才来为这个奸细作辩护。

(4)接着卡拉—穆尔扎十分同情地描述了瞿秋白同志同米夫同志的斗争。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30年6月28日的决议^②中可以看出,恰恰是瞿秋白同志受到了共产国际的谴责,说他在这场斗争中同中国大学^③的托派分子有密切接触。瞿秋白同志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

(5)完全不能允许的是,卡拉—穆尔扎企图诽谤王明同志(中

① 指1931年1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30年6月28日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派别斗争有关的活动问题的决议。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卷,第930—932页。

③ 指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共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波戈列夫同志^①(中共中央书记)和中共其他领导人(见第 51 页的补充)。卡拉一穆尔扎还向现在的中共领导人头上泼脏水,而他们在进行英勇斗争,不能不赢得人们的钦佩,众所周知,他们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赞赏和支持。

(6)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工作人员中暴露出伪装的敌人萨发罗夫、马季亚尔和贝格尔,这个事实成了卡拉一穆尔扎用来诽谤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全体组成人员、诋毁该机构整个工作的理由。同时,卡拉一穆尔扎还把乌里扬诺夫斯基、卢茨基和赖斯纳也列入东方书记处的组成人员,而他们从来不属于其组成人员之列。

(7)卡拉一穆尔扎试图利用米夫同志以前所犯的错误来证明,似乎米夫同志在自己工作中贩卖过“托派观点”。米夫同志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始终是在共产国际领导的监督下进行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中贩卖过托派观点。的确,他在 1926 年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提交的提纲草案中有过右的和“左”的性质的错误^②。但是,米夫同志并没有坚持这些错误,在后来的工作中未再犯这些错误。卡拉一穆尔扎认为,在米夫同志的《中国革命》(党的出版社,1932 年)一书中根本没有批判托洛茨基主义,这种见解也是不正确的。即使粗略地浏览一下这本书(前言第 5、6 页,正文第 159、160、161、162、246、247、275 和 320 页),就足以看出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卡拉一穆尔扎的声明不仅是对米夫同志和某些中国领导同志的粗暴的机会主义的攻击,而且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粗暴的机会主义的攻击,因此,我们认

① 秦邦宪(博古)。

② 见全宗 495,目录 165,卷宗 69,第 52—63 页。

为,需要按党的监察机构系统对作者采取组织措施,撤销他在共产主义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研究所殖民地研究室的工作^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033,第 87—92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联共(布)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党务委员会 1936 年 1 月 11 日决定,Г. С. 卡拉—穆尔扎“因败坏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的名誉”被取消候补委员资格(见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309,第 1 页)。

347

王明与邓文仪谈话记录^①

1936年1月17日于莫斯科

绝密

王明同志与邓[文仪]谈话的主要内容 ([1936年]1月17日晚8时)

王明：您是受蒋介石委托来同我会见还是您个人作为老朋友想同我谈谈？^②

邓[文仪]：我受到了蒋介石的委托，因为他早就想跟红军进行谈判，并想派我去四川或陕西，但我们不敢，因为事先没有征得红军方面的同意。蒋介石看了你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稿^③。后来，我去上海时，弄到了一期《共产国际》杂志，上面刊登了你关于中国反帝统一战线的文章^④。我立即找来翻译把这篇文章译出来，并把它寄往南京。此后，蒋介石就更坚持要我立即到这里来同你们谈判。

王明：关于与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任何政党和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季米特洛夫同志。

② 从1925年底到1927年初，邓文仪曾同王明一起在莫斯科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学习。

③ 见王明：《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5年第25期，第26—49页。

④ 见王明：《为反帝统一战线而斗争与中共当前的任务》，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5年第33—34期，第7—25页。

任何军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央苏维埃政府不止一次地发表过宣言、呼吁书和其他文件^①。我也在自己文章中不止一次声明过这一点^②。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公开表示,尽管蒋介石对人民和国家犯了无数罪行,但如果他真的调转枪口对准日本,我们会给他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机会,也就是说,我们将同他建立统一战线,以便共同抗日^③。

不过至今我们还没有得到南京政府对我们的建议的任何具体答复。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具体事实,表明蒋介石真的想抗日。因此我们的许多同志不相信南京政府真的想同日本作斗争。你们能用什么来证明,蒋介石真诚地想同日本作斗争呢?

邓[文仪]:蒋介石决定同日本作斗争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例如,我们组织了集会,修筑了许多公路,在庐山为南京军队的指挥人员开办了训练班^④。所有这些措施我们都是反共的借口下采取的,而实际上全都是针对日本的。只不过由于我们不想向日本公开秘密,所以至今没有公开这样讲。

王明:但事实表明,你们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反共,而同日本作斗争至今还只是空话。

邓[文仪]:我们有许多文件,以后我们可以用来表明,我们早就准备同日本作斗争了。但以前我们只是认为时候还没有到。

王明:我知道,你们在联日反共还是联共反日这个问题上有过很长时间的争论。

日本人在国民党人中间宣传过这样一种思想:在中国首先必

① 见第100、336、341、342号文件。

② 王明:《中共的新任务》,载《布尔什维克》杂志,莫斯科1935年第20期,第53—67页;王明:《给反帝统一战线敌人的答复》,载《救国文选》,第262—270;王明:《为反帝统一战线而斗争与中共当前的任务》,第7—25页。

③ 见王明:《为反帝统一战线而斗争与中共当前的任务》,第8页。

④ 国民党军队指挥人员训练班是1933年7月17日至9月14日在庐山举办的。

须建立反共统一战线。日本人装模作样，仿佛他们只反共反苏。因此，他们说什么不得不占领中国部分领土来筹建反对苏联和苏维埃中国的军事基地。所以每当日本人策划对中国的任何一次占领时，他们一定先在苏联边境进行挑衅，以便向国民党人表明，请你们等一等，我们很快就同苏联作战，那时我们的时候就到了。而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其他领导人确实始终在等待这一时刻。因此，他们以等待日苏战争为借口一个接一个地出卖中国的省份。不过现在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是真的明白了日本这种宣传的真正含义了呢，还是你们在继续相信日本这种思想并继续反共呢？中国的人民大众已经不再相信蒋介石了。例如，蒋介石召开学生会议^①，但中国各城市的几乎所有学生都拒绝参加这种会议。既然学生都不相信蒋介石，那么共产党人怎能根据空洞的声明相信蒋介石确实准备抗日。

邓[文仪]：的确，无论蒋介石还是我们，其中也包括我，确实被日本宣传欺骗了。日本收买了大量代理人，他们在南京政府的军政人士中间进行广泛宣传。日本人兜售大亚细亚主义思想。日本人把事情描绘成这样：日本人是土豪和绅士，而中国人是寡妇和无家可归的孩子。欧美大国，其中也包括苏联，是强盗。土豪和绅士有时也可能欺负寡妇和无家可归的孩子，但土豪和绅士把寡妇和无家可归的孩子毕竟看成是自己人。他们不会杀害寡妇和无家可归孩子，而强盗不仅可能抢劫寡妇，而且还杀害无家可归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土豪和绅士保护寡妇和孩子使之不受强盗的侵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日本人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反对西方列强。

在许多国民党人中间滋长了这样一种奴隶思想：反正日本人不可能真的把中国殖民化。因此我们暂时忍受一下日本的，然后

^① 指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于1936年1月15日在南京召开的学生和教授、教师代表会议。

我们先同日本一起[反对]西方列强,而后再反对日本。不过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错误。日本的进攻威胁着整个中华民族和我们个人的生命财产。因此我们深信,不反日,我们很快都完蛋。

王明:但事实证明,你们在继续进行反对中国红军的战争,你们仍在逮捕国统区的共产党员,你们仍在镇压抗日运动,因此我们的许多同志担心,你们的谈判只是一种策略,因为我们知道,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正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

一方面,中共和中国苏维埃政府不止一次地向所有政党、所有军队和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军政人士发出呼吁,建议成立抗日统一战线;另一方面,日本在公开组织反共统一战线。日本代理人殷汝耕和宋哲元在公开组建反共自治委员会^①。因此蒋介石不便继续叫嚷反共。他想制造一种假象,似乎在他与日本在华北的代理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别。也许因此,蒋介石想在人民和自己的军队面前耍花招,因此他想同我们开始谈判?

邓[文仪]:不,蒋介石确实真诚地想同日本作斗争。我同蒋介石一起工作已经八年多了。因此我本人知道,什么时候他在说真话,什么时候他在玩弄手腕。甚至在1932年上海保卫战^②的时候,蒋介石就准备动员自己的全部军队同日本作斗争的,但是由于19路军的缘故上海保卫战遭到了失败。

王明:我要坦率地对您说:您不该同我玩弄外交辞令,因为您知道,我不是在外交系统工作。虽然您现在在外交领域工作,但在我们之间还不应是外交谈话,因为中国代表团的其他同志已经在谈论,我不该同您会晤,因为不值得让我同您这位南京政府的武官会晤。而如果需要进行谈判的话,那也应同南京更为负责的人士进行。但我还是决定同您会晤,恰恰是因为我相信您不会对我使

^① 指河北东部殷汝耕的反共自治委员会和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② 见第47页注④。

用外交辞令。因此，您应该告诉我蒋介石确实同您说了什么，您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作为谈判条件。

邓[文仪]：我声明，我们确实想同日本作斗争。蒋介石真诚地希望与你们谈判。但我们之间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达成协议，这当然取决于双方可以达成协议的具体条件。因此我想从原则上征询您对抗日协议的看法。

王明：原则上我方的问题已经解决。我们的政策是公开的。我们一直公开宣布对日本进行民族革命战争。而如果您说，你方对日斗争问题原则上也已解决，那么自然一切都取决于协议的具体条件。因此，您应当把蒋介石想向中共和红军提出的条件说出来。

邓[文仪]：蒋介石谈了以下内容。第一，关于苏维埃政府问题。蒋介石建议撤销中国苏维埃政府，邀请苏维埃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

关于红军问题，蒋介石建议把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因为对日作战必须有统一的军事指挥。当然，红军可能不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在红军与南京军队之间应该交换政治工作人员，即红军派自己的政工人员到南京部队中去，而南京部队派自己的政工人员到红军中去，以表示相互的信任和尊重。

关于党，蒋介石认为：要么恢复1924年至1926年曾经存在过的那种国共合作形式，要么共产党单独独立存在。这将在以后由我们共同来解决。

蒋介石知道，红军没有弹药、武器和粮食。因此，南京政府可以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粮食，还可指派一些部队去帮助红军，以便红军进军内蒙古战线，而我们南京的军队将驻守长江防线，因为我们不可能派出很多部队去其他战场攻击日本。

我们获悉，在今后几个月内，至少在今年下半年，日本一定会

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政府已派代表^①到南京政府来征询南京政府的意见,一旦日本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准备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而南京政府和中国人民将会如何对待这种援助^②。我们表示,蒙古人民共和国表面上还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当然我们欢迎苏联方面的援助,以便共同对付日本。此外南京政府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在华中和华南战线进攻日本。不过,对日作战的全部问题应当在6月以前解决,因为南京军队将在9月开始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

王明:撤销中国苏维埃政府是什么意思?南京政府是不是也要撤销呢?

邓[文仪]:不。

王明:难道我们可以参加这个南京政府?

邓[文仪]:当然不是这个南京政府,而是将实行你们所提出的国防政府十大纲领要求的新政府^③。蒋介石说,我们子弹和炮弹很少,我们的全部储备仅够三个月战争使用,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军事装备的来源。我们想从国外购买军事器材,但你们知道,英国、美国都很遥远。我们请求它们援助,它们虽然已经表示同意,但它们毕竟远离中国。因此,不能对它们寄予很大希望。至于苏联,我们也请求它援助我们。当然,我们并不想无偿获得,我们想获得武器、弹药等形式的某种信贷。但苏联表示,如果这将是国联成员国

① 何人不详。

② 1934年11月27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缔结了一旦第三方进攻苏联或蒙古人民共和国双方将互相支援的君子[口头]协定(1936年3月12日作为互助备忘录签署了该协定)。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莫斯科1971年第17卷,第833页;莫斯科1974年第19卷,第136—137页。

③ 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和中共中央1935年8月1日就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含有国防政府十大纲领。见《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5年第33—34卷,第110—111页。

的集体行动^①，才有这个可能。那您是怎么认为的，一旦中日战争爆发苏联能提供援助吗？

王明：关于苏联的问题，也跟英国和美国的问题一样你们应该自己采取行动并与它进行谈判。您作为中国驻苏外交官，因此同苏联谈判，这是您的任务。您自己去同苏联政府谈判并从那里了解苏联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此外，我劝你们也同美国和英国进行谈判。

邓[文仪]：是的。我们已经开始在这方面采取行动。但还没有取得具体成果。

王明：依我看，红军与国民党之间的真正密切联合的初步条件应当是，第一，互相信任，第二，红军与南京军队之间切实停止军事行动。做不到这一点，任何真正的实际谈判都是不可能的，因为红军指挥员不相信蒋介石真的想同我们缔结反日统一战线，因为他们在实践中知道，你们在继续进行反对红军的战争。因此，你们应当找出某种办法来表明你们真心希望同我们联合。

邓[文仪]：当然应该停止我们之间的相互行动。但迄今为止，我们之间还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某种谈判，任何一方都不想停止军事行动。依我看，现在需要派你们的人到南京去，而我们也派人到红军那里去进行谈判。

王明：我们可以派人，但如何保证我们的人确实没有危险。我们知道，不久前南京政府还杀害我们的同志。怎么能保证南京政府不会逮捕杀害我们的代表。如果连这种起码的相互信任都没有，那就不可能就合作一事开始真正的谈判。因此我建议，你们要想出某种办法来保证我们的代表，如果他真的同您一起去南京的话，确实不会被南京政府逮捕和杀害。怎样才能得到毛泽东和朱

^① 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莫斯科 1973 年第 8 卷，第 437—438、537—539、577—578、590 页。

德的信任,使他们相信蒋介石的诚意呢?我以为,这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办到:我们的代表去南京亲自会见蒋介石,并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他本人的声明,再把同蒋介石的整个谈判情况转达给朱德和毛泽东同志。因为仅仅是南京政府代表声明蒋介石如何真诚,红军是不会相信的。

邓[文仪]:我可以同你们的代表一起前往南京。关于(安全)保证,不会有什么问题。不仅代表可以安全地去南京,而且我相信,即使您去南京,也不会有危险,因为蒋介石正要请您和其他人前往南京担任领导工作。

王明:但还是需要保证。因为虽然我个人是相信你的,但遗憾的是,你今天还不是南京政府的真正掌权人。很可惜,在国民党和南京政府里,当领导的是一些政治上衰老、而在生活和道德方面极为腐化的老头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忘记了国家,忘记了人民和民族。他们只知道个人的地位,关心的是口袋里的钱财。而你们国民党的青年,尽管有才能并胜任领导工作,但老头子们不会让你们去干。在我们党内,情况却不同。有能力担负领导工作的所有年轻干部总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他们在领导岗位上工作,他们有权决定党的政策,而你和我们其他老朋友今天在国民党内还只能在中下级岗位上工作。因此你们不能提供切实的保证。正因为如此,你应该作出某种真正具体的保证。

邓[文仪]:你们建议作出什么形式的保证?让我们这么做吧。我留在这里。如果蒋介石杀了他,那你就把我的脑袋砍下来。

王明:我不想这样做,因为他是我的同志,而你是我的朋友。如果我失去他和你,这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好处,而会使我感到非常难过。我不希望砍你的脑袋。我想得到真正的保证。

邓[文仪]:你们建议作什么形式的保证?我将尽我所能。

王明:写一份正式文件,你们在上面声明,蒋介石派你到王明这里来商谈抗日统一战线事宜,王明派自己的代表去南京会见蒋

介石，弄清蒋介石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建议，并把蒋介石的建议转达给红军。而你作为蒋介石的代表要保证王明的代表不仅在南京有安全保证，而且在南京军队的所有辖区即从南京到苏区都有安全保证。你就本着这种精神写一份文件并亲笔签字，盖上自己的印章。

邓[文仪]：好的。这个我当然可以签，因为我相信，代表不会有危险。不过对于我在苏区，你们是否也要作出某种保证，使我不被逮捕不被杀害？

王明：行，这当然可以。我们的代表也要签关于你的文件，就像你签关于他的文件一样。

邓[文仪]：你们究竟想向蒋介石提出什么具体条件？想必中国代表团在这里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王明：是的，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不应在这里提出任何具体条件，因为第一，代表团在这里不可能提出具体条件，因为它不了解前线的具体情况。当地的红军指挥部更了解这些条件。因此让他们就地提出自己的具体条件吧。

第二，我们党始终遵守自己的章程。我们的问题从来都是由政治局的大多数来决定，而中国党的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在莫斯科。因此，即使我们提出某些具体条件，也还要等待苏区政治局的决定。所以我们认为，最好不提具体条件，具体条件要同毛泽东和朱德去商谈。

邓[文仪]：不过你们究竟如何评价我们的建议，你们想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哪怕是原则性的？最好在这里说明这一点。

王明：我以为，这会使谈判复杂化，因为如果我们从这里提出一些具体条件，而苏区又提出另外一些条件，那么南京政府就会收到两种不同的谈判条件。这对南京政府和对我们党都不好办，因为如果两种条件之间有很大差别，这就会使我们的谈判遇到困难。

因此最好是干脆让南京政府提出自己的条件,由朱德和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的条件,在这两种具体条件的基础上开始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

邓[文仪]:行,这可以。不过最好还是得到你们对我们的所有原则性建议的看法。

王明:问题的原则性方针已经很清楚,因为我们的新政策在共产国际七大得到了确认。您可能看了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报告,他公开表示,共产国际赞同我们党的新政策^①。

共产国际七大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所有共产党的策略转折。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国际把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问题作为中心策略任务提了出来,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认为建立]反帝战线是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我们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始终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关于共产党执行自己任务的诚实性,法国共产党的实践可以证明,该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与社会民主党缔结了统一战线。不过想必你们也知道,最初社民党和其他政党对我们的建议抱怀疑态度,说这是共产党人的策略手段,而不是实际政策。但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共产党人确实是忠实地在执行自己的建议。此外,在法国不仅建立了各种工人组织的统一战线,而且还建立了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政党甚至部分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人民阵线。请看,在法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反法西斯斗争共产党人甚至可以与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缔结统一战线。那么为什么在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全体人民的命运已一发千钧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不能同任何政党和任何军队缔结统一战线来共同反对外来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呢?所以,原则上我们没有任何不清楚的东西。而关于具体条件最好在苏区进行谈判。

^①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62页。

邓[文仪]:我建议尽快动身,因为我知道,从海参崴开往上海的苏联轮船每两个月只有三趟。本年^①31日有一艘轮船从海参崴开往上海。今天已经17日,而我们20日就应该从这里动身,否则就赶不上轮船了。

王明:这很好,但最好是你先发电报征询蒋介石的意见,他是否同意我们的代表^②去南京同你们[谈判],他是否会给我们的代表提供安全保障,他是否同意派你同我们的代表一起去苏区。就是说最好在他答复之后我们再决定动身日期。

邓[文仪]:是的,很好。我可以发电报征询他的意见。但答复要在两三天之后。不过你们有没有护照?

王明:是的,我们的代表没有过境苏联的护照。你们能给他弄到护照吗?

邓[文仪]:当然,我们可以弄到护照,但我们不能做到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很快许可,因为外交人民委员部经常拖延签署过境护照。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份护照,而你们自己去请外交人民委员部许可并盖印,以便我们很快动身。

王明:这都是些技术性问题。我们以后总可以解决的。

邓[文仪]:如果我们晚了一点,我们则可以乘飞机到伯力或者赤塔。只是我不知道,现在苏联飞机是不是定期飞行。

王明:这我也不知道。这应弄清楚。

邓[文仪]:关于对日作战中中国所有军队的总司令问题,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这样的总司令的。因此日本很痛恨蒋介石,想把他除掉。例如,日本人收买私人厨师^③,想把

① 原文如此。应为:本月。

② 潘汉年。

③ 何人不详。

蒋介石毒死。后来日本人还收买私人卫士^①，想让他把蒋介石杀掉。南京简直到处都是日本特务。蒋介石很害怕长期留在南京。不同红军作战，蒋介石就很难呆在南京。蒋介石怕日本人。所以他总是在与红军作战的借口下从南京到南昌、成都和别的城市，从而保全自己不受日本阴谋的伤害。须知中国所有抗日军队的总司令应该是最有威信、最受欢迎的军人，蒋介石正是这样的人。

王明：若是日本人真的把蒋介石毒死了或者蒋介石由于某种别的原因死去了，难道中国人民就找不到自己的总司令了？在我看来，是有的。我们一定能找到另外一个人。而若是蒋介石死了，能怎么样，你和其他年轻干部就不再同日本人作斗争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邓[文仪]：是的，当然。即便蒋介石死了，我还是要革命的。

王明：我想问你的是怎么想的，国民党的所有老领导人都是腐败分子，他们已经不知道人民的利益，是不是还有某些国民党领导人，或多或少了解这种利益呢？

邓[文仪]：是的，国民党的许多领导人的确腐化了，特别是改组派。例如，汪精卫及其同伙都是最坏的人，他们只认钱，把什么都出卖给日本人；还有朱明利(音)^②——他是负责工作人员，但他经常在妓院同女人厮混。因此人们不尊重他。但蒋介石在这方面要好一些。此外，我可以向您声明，所幸过去同您一起学习的所有年轻干部还没有腐化。我们还想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人民而奋斗。

王明：不过究竟是谁，是怎样杀害汪精卫^③的？许多人认为，

① 何人不知。

② 原文如此。

③ 指 19 路军军官孙凤鸣 1935 年 11 月 7 日谋刺汪精卫，结果汪精卫受了重伤。

这是你们蓝衣社^①分子干的。我想,这很有可能,因为你们那里大概有这样一些年轻人,他们痛恨汪精卫这个汉奸。此外,在谋杀时蒋介石不在场。因此中外记者都怀疑蒋介石事知道这起谋杀。

邓[文仪]:不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谋杀是19路军的支持者干的。

王明:不,不能凭情报,你老实说,你知道些什么。

邓[文仪]:很难说究竟是谁谋杀他,因为据我们所知,陈果夫、陈立夫在国民党代表大会^②期间给新闻记者发了太多的票,因此各种各样的人都拥进去了。

王明:这表明,你们的国家政治保安机关干得不怎么样。

邓[文仪]:我们现在已经商定组织留苏同学会。我们已经收集了统计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在南京机关工作的约有300人曾是莫斯科的学生。

王明:不过在我们苏区早就有了留苏同学会。我们还是认为,黄埔军校学员或中山大学学生是积极的有战斗力的分子,是中国青年的精英。因此我们很喜欢他们,想在抗日救国斗争中同他们合作。所以我们决定,即使在战场上抓住他们,我们也不会杀害他们。我们知道,他们是误入了歧途,他们想为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祖国而奋斗,但他们走上了不正确的道路。现在事实向他们表明,他们犯了错误。例如,当我们一起在这里学习时,我们经常谈论为拯救中国人民、为拯救我们的祖国、反对帝国主义等等而斗争。但你们总是以为,在国民党政策下,在同帝国主义妥协、同军国主义妥协的政策下可以使中国的状况得到某种改善。但现在事实向你们表明,国民党的这种政策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我以为,你们中许多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能同我们合作共同进行

^① 见第60页注^②。

^② 指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于1935年11月1—5日在南京举行。

斗争。

邓[文仪]:是的。我就认为自己是在政治上落后的人。

王明:没有关系。如果你同意进行反日斗争,走救国的道路,并同我们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那么您和其他人很快就会回到中国青年的先进队伍中来。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76,第 3—18 页。

打字稿,副本。

348

季米特洛夫给伏罗希洛夫的信

1936年1月21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伏罗希洛夫同志：

现送上三份王明同志关于他与邓[文仪]^①谈话的记录，供您以后使用。我们最终确定，要利用机会派我们的中国人^②到那里去。如果他来得及到红军那里，转达有关我们新策略的必要信息和关于实际运用的相应警告，那是会有很大好处的。

中国同志沃罗夫斯基^③将动身。他一定要通过王明得到指示。

如果您对此有特别的考虑和指示，恳请您赶紧告诉我们。

致同志式的问候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76，第 1 页。

亲笔签字。

① 见第 347 号文件。

② 潘汉年。

③ 中文姓名不详。

349

王明与邓文仪谈话速记记录^①

1936年1月22日于莫斯科

绝密

王明同志与邓[文仪]谈话速记记录 (1936年1月22日)

邓[文仪]:蒋介石答复,我们可以立即动身去中国。

王明:大致什么时候可以动身?

邓[文仪]:24日或25日。

王明:您能出具文件保证我们代表的安全吗?

邓[文仪]:当然可以。只是这个文件大体上应有什么内容?

王明:您试写出个草稿,然后我们讨论。

我党代表团^②嘲笑过南京政府的协议条件^③,因为代表团认为,你们关于协议条件的谈话是不严肃的,因为蒋介石作为政治家不能只向红军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提出那些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而只会带来害处的条件。例如在政府问题上,你们建议取消苏维埃政府,而在军队问题上,你们建议改组红军。关于抗日前线,你们提出最困难最艰苦的前线条件,即你们给红军提出内蒙古战线。那么蒋介石给红军提出了什么有利条件呢?代表团不相信,

① 文件由Г.季米特洛夫于1936年1月29日送K. E. 伏罗希洛夫。

② 指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

③ 见第347号文件。

蒋介石希望同我们谈判而只提出这些条件。因此最好你也说一说蒋介石委托你转达给我们的、能给红军和中国苏维埃政权带来某种好处的另外一些条件。

邓[文仪]:我毕竟谈了一些条件。而你们什么也没有谈。

王明:我们怎么什么也没有谈?我们交谈了两个小时,我们关于政府和红军的条件早就明确地公开地提出来了。例如,我们在去年8月1日的告全体同胞书^①中就已经具体地提出了关于成立人民国防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的建议。国防政府应当执行我党提出的十大纲领要求,而抗日联军包括红军和所有愿意抗日的军队。所以关于政权和军队问题,我们的条件早已提出来了。

邓[文仪]:当然,蒋介石不能只要求你方作出牺牲。例如在区域问题上。我们认为,不一定把内蒙古交给你们,因为内蒙古的确第一远离中央,第二那里缺少粮食。因此我们可以把另一个区域交给你们。

王明:关于内蒙古的问题现在根本不是严重的问题,因为内蒙古已经宣布自己独立于中国南京政府。南京政府已无权把该区域交给红军,因为这个区域很快就将并入“满洲国”。

邓[文仪]:那么你们想要哪一个区域?

王明:这不取决于我们的愿望。例如,我们想要最好的富裕省份,如江苏和浙江。但你们不会把这些省份给我们。因此最好是你们自己说,蒋介石想把哪个区域交给我们。

邓[文仪]:那我们就给你们中国西北那一块地区,根据你们的意见,这意味着建立国际联系^②。

王明:而在你们看来,这意味着确立对外政策?

邓[文仪]:这是对的,因为一旦中日战争爆发,日本会封锁中

^① 见第336号文件。

^② 指到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的地区。

国所有海上通道,那时中国就不能从欧美购买武器弹药,而唯一的来源将是苏联。因此我们希望,正是要通过中国西北从苏联那里购买武器弹药。

王明:不过你们大概能把中国西北哪些省份交给我们呢?

邓[文仪]:这我们以后再具体讨论。我应该告诉你,我已同布留赫尔谈过话^①。他重病在身,但尽管有病,他还是同我进行了很友好的谈话,并且对于像中国这样伟大的民族现在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如此欺凌,至今还没有给予顽强抵抗表示遗憾。布留赫尔还对我说,我们的谈话不应传出这个房间,因此我们之间不应有任何外交谈话。我同他谈了约一小时,我们的谈话带有十分友好的性质。

王明:是的。布留赫尔病了,这我们知道,他现在在休养。请说一说,您同他就什么具体问题进行了交谈?

邓[文仪]:还没有谈具体问题。但谈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关于军队问题。蒋介石对我说,军队改编后,他将把红军看作是自己军队的一部分。他将给它提供跟自己最精锐最亲近的部队一样的装备。因此对于改编问题你们不用担心。

王明:当然,这是空谈。谁会相信蒋介石会像对待自己的军队一样对待红军?这不仅我们不会相信,而且所有中国军人,例如,甚至广东集团都不会相信蒋介石。让蒋介石去试试改编广东军队。他一定会遭到陈济棠的坚决反对。因为陈济棠清楚,改编他的军队意味着什么。所以改编军队的问题完全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实力。这个问题最好你们再好好考虑一下,以便你们今后同毛泽东和朱德进行谈判时不致提出这样一些不可接受的条件。

邓[文仪]:当然,如果进行谈判,那就需要相互让步。我所说

^① B. K. 布留赫尔与邓文仪的谈话记录没有找到。

的这些只是我们的初步意见，而决不是最后条件。一切都可以以后再具体谈。

王明：而护照问题，你们为我们的代表^①办理吗？

邓[文仪]：办，这不难。如果你们能给我们照片的话，明天我们就给你们护照。我希望下次我来莫斯科时，能直接见您，去您的住处。

王明：那好啊！那时想必我们之间的谈判真的会有成果了。

邓[文仪]：是的，我相信，谈判会顺利结束，那时我将在您的领导下工作。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76，第 38—41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潘汉年。

350

王明同邓文仪谈话速记记录^①

1936年1月23日于莫斯科

绝密

王明同志与邓[文仪]谈话速记记录 (1936年1月23日)

邓[文仪]:请原谅,后天我不能动身了,因为刚才收到蒋介石的电报,他要我立即去柏林。

王明:这很不好,这证实了中国代表团^②的预言。它早就对我说,不应与你们进行谈判,因为蒋介石只想玩弄手腕,没有诚意同我们进行谈判。代表团早就对我说过,你作为武官只会对收集各种情报感兴趣。因此,或许你是带着侦察的目的来同我们进行谈判的,而不是受蒋介石的任何真正的委托。

邓[文仪]:不,我这方面没有任何手腕。我的确都准备好要动身。但现在我刚刚收到了电报。

(他把蒋介石的电报给我看了,上面写道:来电不清楚,很多词搞不明白。以后不要再发电报,而要通过信使随邮件寄来。您立即去柏林同李荣清^③秘密交谈。)

瞧,既然有电报,我又能怎么办。我坦率地告诉您,此人不只

① 文件由Г. 季米特洛夫于1936年1月29日送K. E. 伏罗希洛夫。

② 指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

③ 陈立夫。

是来同你们谈判的，而且也是同苏联谈判的。

王明：李荣清是个什么人？他是个负责人还是比你还低的负责人？如果他是跟你一样的人，在南京是威望更低责任更低的人，那他来这里谈判又有什么意思呢？如果他跟你一样，那确实不会取得任何具体的东西。

邓[文仪]：不，这是党的一名负责人。他是比我更高的负责人。

王明：你们党内有什么负责人，我们都知道，他们当中没有叫李荣清的呀？

邓[文仪]：这大概不是真实姓名。

王明：或许这是李世清^①？

邓[文仪]：不是。此人不是老头，是更年轻的人，但比较有威信。

我对您说说与苏联的谈判。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还不能断定，他真的要同苏联进行谈判，因此我请您不要在任何地方谈这件事。

王明：那护照您是现在给吗？

邓[文仪]：是，现在我把它给您。已经一切就绪。我告诉您，约在25日或26日我从这里动身，约在2月5日或6日我将返回。那时我们再次会面，并决定我们什么时候去南京。

王明：我想，去南京的事大概再也不会实现，因为你们在抗日统一战线谈判问题上没有诚意，而且你们还在玩弄手腕。

邓[文仪]：不，请相信，协议一定会在我们之间达成的。当我返回莫斯科时，我可能同他一起来，那时我们会比现在更具体地进行谈判，因为你们任何具体条件都不想谈，而蒋介石考虑的有点不同。他认为，协议应该在这里签订，而只是把这个商定好的协议寄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李世征。

往苏区,你们却建议一切具体谈判在苏区进行。因此请您告诉我们,协议的一些具体条款能否在这里确定?

王明:我已对您说过了,协议的签署不管怎么说只应在苏区进行,因为我们不了解红军今天的具体要求。因此我们不能代替毛泽东和朱德来签署这个协议。不过关于原则性的条件我们当然可以在这里商谈。这不仅取决于我们,而首先取决于你们。如果你们仍然只提出那三条我们不能同意的条款^①,那我们当然很难同你们进行具体谈判。而如果你或者来这里的另一个人确实会提出蒋介石为同我们谈判提出的全部消极的和积极的具体条件,那我们当然可以说出对于你们的条件的一些看法。不过眼下还很难这样做,因为你们方面还没有提出对于我们来说具体的积极的条件,此外,你们缺乏诚意。您在动身前突然宣布要去柏林,这个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邓[文仪]:在柏林谈判之后我们可以更具体地同你们进行谈判。我很想在这里达成具体协议,然后再把这个协议转到苏区签字。

王明:关于所有这些问题需要等待你们新人的到来。没有他你大概什么事也不能做。

邓[文仪]:是的,过10到11天我们同您会面,那时我们再更具体地商谈。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76,第 42—44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见第 347 号文件。

351

王明给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的信

(摘录)

1936年1月23日于莫斯科

[毛]泽东、[朱]玉阶^①、[王]稼祥^②：

自我中央及苏维埃政府中央[1935年]8月1日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宣言^③及几次通电^④发表之后，深得全国各方之同情与响应。

南京军事委员长介石先生于本年1月曾派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为代表亲与弟及汉年面谈数次，表示同意我们所提出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原则。惟对于抗日救国之具体合作办法有待于蒋[介石]与诸同志直接商洽，故决由邓[文仪]君与[潘]汉年同志亲赴南京与蒋面商，并言定再由南京同去苏区与诸同志协商抗日救国的合作具体办法^⑤。

《中共党史资料》，北京1989年第29卷，第107页。

① 朱德。

② 王稼祥。

③ 见第44页注②。

④ 见第341、342号文件。

⑤ 同一天，即1936年1月23日，潘汉年给蒋介石去信，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保证邓文仪在苏区和中国红军区域内的个人安全。

352

陈丕时给米夫的信^①

1936年1月23日[无发信地址]

根据我最近一封信中拟定的计划^②,我把孙科当作中心人物,应通过他来进行工作。国民党的所有要员都已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已同于右任、冯玉祥、孙科、叶楚伦、孔祥熙、宋子文进行私人接触。已将三种不同来源的信息转告蒋介石。于右任、孙科和冯玉祥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成立一个不大的委员会来研究问题。让于右任了解不时发表的呼吁书等,以及报纸上刊登的有关统一战线的文章。胡汉民来上海时,将向他通报统一战线政策。下周将向张学良通报。宣传这一政策是对付广田[弘毅]三条^③的一个手段。正在同行政院政治部主任蒋廷黻就实行这种政策的可能性进行谈判。在他看来,条件可能是这样:(1)在新的名称下改组中共,(2)(按蒋介石军队的模式^④)改编红军,(3)中共领导人参加起草宪法,(4)中共领导人加入非常委员会。在学生代表会议^⑤期间同蒋介石进行最后谈判时,蒋廷黻十分担心中共对学生运动的影响,对问题的讨论没有得出进一步的结果。这种不希望继续

① 发信人和收信人是根据文件俄译稿附记确定的(见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74,第 3 页)。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见《中国年鉴(1936年)》,第 176—177 页。

④ 原文如此。

⑤ 见第 91 页注①。

讨论问题的情况可能是由于对胡汉民对统一战线问题的态度没有把握所致。我知道,可以使胡汉民倾向于对统一战线政策采取同情态度。一些国民党员认为,蒋介石集团镇压群众运动的任何企图都将导致国民党的分裂。目前南京政府希望,在着手实行自己政策以前摸清胡汉民的态度。

现在胡汉民是关键人物。孙科、于右任和冯玉祥将同他谈统一战线问题。我认为,他会认真对待建议的。现在在上海、南京和广州……^①的国民党人士中是这样表述统一战线政策的:“这项政策是要营造中国新的内部政治形势,以便获得信心,让全民族加入民族统一战线行列,维护中国领土、政治和行政完整,发展中国的工业、金融、贸易和文化,并为通过实行和维护民主自由……捍卫中国人民各阶级的合法利益,而在外交政策领域争取同一切支持和同情中国人民为领土、政治和行政完整而斗争的国家结成联盟,并同那些在中国与任何破坏中国领土、政治和行政主权的他国爆发战争时能持友善中立态度的民族保持友好关系”。现时内阁的危机过两三个月即将到来。人们指望利用它来责成新内阁(这在中国很有可能)通过统一战线纲领。孙科、于[右任]和冯[玉祥]准备发挥自己的作用。人们希望张学良也起重要作用。已向胡汉民介绍了上面引述的关于新的内部政治形势的说法。

蒋介石在争取使中国所有政党合法化(以此来消除国民党的影响)，“保持国际联系的政党”除外!^②，一旦实行新宪法，他将成为总统。我认为，还没有任何具体理由来进行辩论。但是一些国民运动在发展，晚些时候它们可能提出实行统一战线的要求。例

① 此处和下面删节号是原有的。

② 原文如此。

如,民族文化教育救国会^①等就属于这一类。

概括起来可以说,几乎国民党的所有主要人士都了解新政策。在国民党人士中把它看作是“现实的政策”,并正围绕它展开斗争。在有吉(明)最近拜访蒋介石^②之前两天开展了有利于该政策的强有力的宣传活动。结果有吉没有取得他所期望的成果。在南京,现在有一批能够说明新政策并能给予反华集团的种种伎俩以回击的人。同蒋廷黻的谈判已进行,大概是蒋介石授意的,但由于未弄清胡汉民的态度而中止。由于这一原因,当胡汉民来到时,会向他施加压力。但是为了进行认真的谈判应当有一个被授予一定权力的人出现。我可以为此人取得必要的个人安全保证,以及他不会被捕的保证。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努力进行联系。我只有在看到事情有了实际基础时才着手做这件事。另一个严重问题可能是由于我访问张学良而出现的。张主动要紧急同我会晤。大概他要讨论两个问题:(1)统一战线和不顾南京态度积极抵抗;(2)不顾南京态度积极抵抗,但不涉及统一战线。可能,当我到西北时,需要与毛[泽东]联系。但是,因为我无论如何不能保证个人安全,所以要交换人质。如果张学良同意这样做,那么进行抵抗的统一战线政策就会有现实的和具体的基础,以后将推动全国的运动。这就是为什么应向组织下达指令,在全国广泛宣传绥远和西北统一战线取得的成绩,而不要管官方书报检查机关和禁止对这种情况作任何报道。这一事件无疑会影响胡汉民、孙科、于右任、冯玉祥等人对新政策的態度。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74, 第 7 页及其背面。

英文打字稿, 副本。

① 可能是指 193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的以马相伯等人为首的上海文化工作者民族救国会。

② 可能是指日本大使有吉明于 1935 年 11 月 20 日同蒋介石的谈话。

353

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①

1936年1月29日于莫斯科

季米特洛夫同志：

我印好了这些文件^②，每个文件印两份，一份给你、曼努伊尔斯基和莫斯克文^③同志。另一份请送伏罗希洛夫同志。

此外，我刚刚收到邓[文仪]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他将于1月27日从这里动身，根据蒋介石新的电报，李荣清^④是同我们谈判的南京全权代表。他请求我和博林^⑤同志等他和李荣清最近来这里进行新的会晤。此致

敬礼

王明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76，第 35 页。

亲笔签字。

-
- ① 文件上有批注：一份送伏罗希洛夫同志。Г. 季米特洛夫，1936年1月29日。
② 指王明1936年1月17日、22日和23日同邓文仪的谈话记录（见第347、349、350号文件）。
③ M. A. 特里利塞尔。
④ 陈立夫。
⑤ 潘汉年。

354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 关于干部问题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书记处的书面报告

1936年2月2日于莫斯科

绝密

一、关于挑选和允许政治侨民进入苏联的制度

据我^①所知,中共没有直接派过政治侨民到苏联。这是因为:第一,国统区和满洲境内的党、共青团和工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尽管许多同志——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受到政府的逮捕威胁,我们仍然把他们派到别的地区去从事地下工作,或者把他们派到中国苏区。第二,如果同志们在中国白色恐怖条件下被捕,他们要么被枪毙,要么被判终身监禁。被捕的同志很少获释出狱。如果有同志获释出狱,经我们审查后也把他们派到别的地区或苏区工作。据我所知,没有人获释出狱后被派到苏联来的。第三,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以后,中共中央对派同志到苏联来的事非常慎重,因为我们的联络路线很重要,因此我们不愿意派那些没有经过充分审查的同志。而一些党组织甚至走极端,只派工人和农民去学习,根本不派知识分子,即使是忠诚的知识分子。第四,由于联络不畅,甚至可以派的同志及其亲属也没有派(如李大钊同

① 报告作者不详。可能是康生。

志的家属、张太雷同志的家属等)。由于上述原因,从1928年中共六大时起,据我所知,经中共中央建议只派了苏兆征同志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孩子^①。

通过兄弟党曾派一些中国同志到苏联。通过美国共产党派了魏明华(音)和谭宝(音)两位同志。通过法国共产党派了特鲁(音)同志^②,经德国共产党派了谭莫(音)同志,通过苏联机关派了汪洪(音)同志^③。这些同志被直接派往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中央。

在1928年召开中共六大以前,原中山大学和其他学校的一些学生留在了苏联。这些留下来的学生部分是原国民党党员,部分是从中山大学开除的托派分子。他们没有被送回中国,暂时留在苏联工作。另一部分学生即经过审查的共产党员,在苏联远东、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国际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工作。

从1930年起由中共中央派到苏联学校学习的学生当中,留在苏联的有8人,其中两名同志没有返回中国的强烈愿望,暂时留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辛乔(音)和霍腾奇(音)同志],一名同志病了,未能回国(谭友(音)同志),一名同志留在斯大林格勒工作(李文同志),他是右倾分子的前首领,曾进行过反对中共四中全会的斗争,并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时犯过一些错误,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不派他回中国,把他留在苏联;通过苏联机关派遣的一名女学生(她的名字叫方兰),因其行为引起一些怀疑,也被留在了苏联的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她在那里的一家纺织厂工作。此外,通过美国共产党中央派遣的谭宝同志,因隐瞒自己的社会出身被开除党籍,现在他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通过法国

① 相应是:钟荣胜、苏河清、苏丽娃。

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③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共产党中央派遣的王兰同志因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期间的反党行为被开除党籍,现在他在生产单位工作。由共青团中央派去学习的共青团员陈友新(音)同志也受到怀疑,因此取消了他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的资格,并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把他派到了生产单位。由中共中央派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分校的四人中有两名同志病了,留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工作,而另外两名同志(尤拉^①和谭新(音)同志)因行为可疑被取消学习资格并开除党籍。此外,从满洲也派遣一些学生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些学生在干部部办理了登记。

由于[苏联]外国工人出版局工作人员不够,经与中国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协商并经法国共产党推荐,该出版局接受了来自法国的四名同志。对这四名同志进行审查之后,有两名同志留在出版局工作,另外两名也是很好的同志,其中一名在接受培训,准备派到中国。

上海和满洲的一些领导同志经中国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同意来到了苏联。这些同志部分留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部分在出版局工作。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的同志中,有些人犯了错误,不过预计经过短期学习后就可以把他们派回中国。从满洲边疆区党委^②来的一名同志,即杨光华同志,在上海犯过反党错误,中国代表团认为,不能派他去满洲担任重要工作,因此中国代表团把他召回莫斯科,经我们审查后建议国际监察委员会将他开除党籍,因为他有反党、可疑和奸细行为。

国民党特务组织利用我党在国统区的暴露,企图派间谍冒充共产党员到苏联来。为此该组织甚至在北京^③成立了特别委员

① 王可欣(音)。

② 原文如此。

③ 原文如此。此处和以下应为:北平。

会，并于1935年不断派人到苏联来。在从北京派来的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朝鲜人^①，另外还派了一个名叫刘鼎的年轻人，他自称是共青团员，但经我们审查后，中国代表团认为，他不是我们的人，并被移交给有关机关。至于由该委员会从北京派来的朝鲜人和其他学生，他们没有被我们接受，而被打发返回中国。上述事实表明，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千方百计企图渗入我们的队伍进行间谍活动。这就要求我们保持更高的警惕性。当然，他们渗入我们组织的手段并不限于这些。例如，1935年有一个女人是借共产党员名义从杭州派到这里来的，她的名字叫方卫文。她说，她曾被捕，后获释出狱。但迄今为止我们还不知道是谁派她到这里来的。她的形迹很可疑。譬如，在她那里发现了关于她获释出狱的判决书，这在中国的实践中是不常有的。因此中国代表团没有接受她，把她交给了干部部进行调查。

从以上所述情况中可以看出，我党对于派遣政治侨民到苏联来是非常谨慎的。但这并不是说，阶级敌人已经停止派遣和不再派遣间谍到苏联来了。根据工作经验我们认为，敌人在采用以下手段向苏联渗透：(1)借口党组织遭破坏，冒充共产党员来到莫斯科，似乎是为了恢复与中国代表团的联系。此外，打着被释放出狱的政治犯的幌子来到苏联，似乎是要跟党建立联系并请求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给以帮助。(2)派遣奸细打入我们的队伍，如通过派学生到国际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个渠道。(3)通过中国旅欧侨民和欧美的兄弟党。(4)通过苏联机关渠道。(5)利用旅居苏联侨民中的可疑分子，特别是利用托派分子。(6)打着同共产党商谈统一战线的招牌。

因此，中国代表团认为，在派政治侨民到苏联来的问题上应该采取以下方针：

^① 何人不详。

(1)派政治侨民到苏联来必须像过去一样保持慎重态度,以不损害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中国代表团不应接受任何一个不经中共中央推荐和未经共产国际事先同意擅自来苏联的中国同志。另一方面,中共应当组织帮助并派遣那些能留在国内工作、必须派到苏联来的忠诚共产党员及其家属。

(2)从过去派遣学生学习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学生的社会成分总是好的。但这并不是说,国民党人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可能派间谍打入我们的队伍,特别是要注意,近期将有一大批学生到来,需要我们对每个前来的学生进行严格的审查。至于国内的党组织,则应纠正以前的宗派主义错误。而另一方面,也要仔细审查派来的每个学生。对于从苏区派来的学生,每次单独的派遣都必须有党中央的决定。至于从满洲和国统区派来的学生,也必须由他们所属的党组织的第一书记亲自仔细审查。到苏联后,在共产国际审查时发现不适合在国际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人要送回中国。

(3)至于从兄弟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派政治侨民到苏联来的问题,则应坚持以往的方针。中国代表团不得接受他们。至于从欧美的中共党员中挑选学生,那需要极其慎重,每次都必须征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代表团的同意,此外,还需要有相应党中央的推荐和中国代表团的仔细审查。

(4)至于通过苏联机关派来的人,中国代表团对他们将不负有责任。中国代表团认为,联共(布)代表团应当向联共(布)中央提出建议,招收在苏联国外军事机构工作的人员要特别谨慎进行。根据中国代表团掌握的情报,在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当中有一些很不好的分子,甚至有给国民党警察局通风报信的我党叛徒。

(5)至于中国各政治派别代表来商谈统一战线的问题,那只有在经过中国代表团的仔细审查并取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代表团同意之后方可让他们前来。这项工作应同我党地下工作分开,在

谈判过程中也需要特别警惕。

二、关于审查已在苏联的政治侨民和 利用政治侨民来培养党的后备队

在这个问题上应进行以下工作：

(1)对于留在苏联境内的原中山大学学生，需要由联共(布)和中国代表团进行审查。中国代表团同那些在直接与共产国际有关的工作岗位(如[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列宁学校)上工作的原学生有联系，部分地与在海参崴和伯力工作、由联共(布)管理的学生也有联系。而多数原学生与中国代表团没有任何联系，中国代表团和干部部没有在他们中间进行任何工作。中国代表团建议，共产国际干部部与一名中国同志到远东、乌拉尔、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列宁格勒等地进行一次专门出差，就地对这些同志进行一次专门审查，并确定他们中谁已经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谁可以作为党的后备干部，派到中国工作。干部部应该有这些政治侨民的姓名、地址、工作、政治面貌等总的登记表。此外，干部部和中国代表团应该挑选一名同志专门同这些政治侨民保持经常联系，并向他们提供我党报刊等。

(2)至于来自兄弟共产党的政治侨民，中国代表团同他们有经常联系，需要对他们加强培养并检查他们的工作，以便从他们当中选派最好的同志到中国工作。

(3)至于曾在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过并已留在苏联的12名学生，对他们也需要经常联系，向他们提供党的报刊，以便检查他们的工作，并把他们中一些人培养成我党干部。

三、关于争取党的合法地位和我们干部的 合法化的政治措施问题

现在我来谈干部政策问题的第二部分。首先是争取党的合法

地位和我们干部的合法化问题。

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国民党千方百计试图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土匪和阴谋家的党，并试图以此把我党与广大群众隔离开来，以后继续对共产党人采用镇压手段。

我们党是群众性的共产主义政党。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它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政党，是四亿中国人民的领袖。因此现在必须千方百计地争取党的合法地位和我们干部的合法化。而在这方面的的工作我党恰恰做得很少。

在这一工作领域中，中国代表团建议：

(1)利用一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机会来宣传和传播我党的政治观点，首先应当在中国各种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群众组织和机关中散发《救国时报》^①和党的其他文件(宣言、传单等)。

(2)在筹备纪念中共成立 15 周年的过程中，应当让在美国出版的《先锋报》^②和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在中国和国际范围内的所有著名作家、学者、政治活动家等中间进行调查，征询他们对中共的态度和看法。在收到答复后将调查表汇编成集出版，以便更加提高我党的政治威望。

(3)出版关于牺牲的同志，如李大钊、向忠发^③、罗登贤、瞿秋白(斯特拉霍夫)、邓中夏、方志敏等同志的文集，他们都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为我们党、工人阶级和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业献出了生命^④。此外，也要出版中共人物，即红军、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袖，如毛泽东、朱德、王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彭德怀等同志的单独文集，以便更广泛地宣传我们党的干部，

① 见第 63 页注③。

② 指《先锋报》，1928 年至 1929 年先在旧金山后在费城出版，1930 年至 1937 年在纽约出版。

③ 被捕后叛变。

④ (以上有一注释，但文中未标，注释内容为：出版物没有找到。)见第 74 页注④。

并对敌人的造谣诬蔑予以回击^①。

(4)出版关于在满洲牺牲的民族战士和英雄的专集和关于满洲游击队领导人和指挥员,如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等同志的文集,以便更加提高我党作为中国人民在争取社会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领袖^②的威望。此外,应当让满洲的游击队和群众团体派代表团到中国本土和国外进行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工作,从而提高我们党的政治威望,宣传我们满洲的干部。

四、关于在合法和非法条件下接受入党的手续 (防止阶级敌人的奸细渗入党内的措施)

阶级敌人试图千方百计渗入我们党内,以便把它搞垮。为了同间谍和奸细活动进行斗争,在合法和非法条件下吸收党员时需要特别地谨慎和警惕。在这方面,我们党在苏区和国统区都犯过一些错误,例如,在1932年上海战争^③后,4月份在上海曾有过自由吸收党员的情况,阶级敌人利用这一时机钻进我们的队伍。而在苏区,1933年曾有一个时期接受入党的工作带有时紧时松的性质。只注意了党员数量,而不重视质量。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代表团建议对国内作出专门指示,其中要指出在中国现在的状况下,在实行新政策的情况下,我党应该更大胆地把工农群众运动领导人、红军和游击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以及先进的知识分子吸收到我们党内来,以便不仅使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政治领袖,而且要把工人、农民和全体人民的所有优秀战士联合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同时应该指出过去所犯的错误,特别是

① 见第73页注③。

② 见王亚:《东北抗日烈士传》,巴黎1936年版;孙杰:《东北抗日联军的四军》,巴黎1936年版;孙杰:《满洲的游击斗争》,莫斯科1939年版。

③ 见第47页注④。

要重视反对阶级敌人渗入我们队伍的斗争。在国统区和满洲地区的秘密工作条件下,不容许随便接纳党员。而在苏区除自由接纳党员外,还需要秘密吸收党员,以便在红军或游击队离开后可以让我们同志留下来进行秘密工作。在日本占领区(满洲),考虑到那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性,可以而且应该让一部分党员游击队员公开身份,而另一部分党员应该保持秘密状态。至于满洲工业中心城市接纳党员的问题,那就需要我们的同志在那里特别提高警惕,以便不让日本间谍和奸细渗入我们的队伍。

五、教育年轻党员,把他们武装起来 同资产阶级法庭、警察等作斗争

近几年来,中共队伍中有许多共产党员英勇地牺牲在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魔爪下。他们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法庭面前表现出布尔什维克式的模范行为。例如,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在北京牺牲的李大钊同志、向忠发、^①罗登贤(两人都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邓中夏、瞿秋白(两人都是中央委员)、方志敏(红军领袖)、艾云亭^②(满洲游击队领导人、原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等同志都是为了党、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而英勇牺牲的。他们在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法庭面前表现出来的布尔什维克式的行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榜样,而且也是其他国家共产党人的榜样。遗憾的是,这些同志的行为还没有在我们的队伍里,在中国工人和全体居民当中充分加以宣传,以便展示我党人士在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中的英勇行为,并更加激起全体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刽子手的痛恨。

另一方面,我们党和革命的叛徒,诸如黄平、余飞、王云程、顾

① 被捕后叛变。

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顺章之流，他们背叛了我们党、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他们的可耻行为应当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加以揭露，因为这不仅不会降低我们党的威望，而且会更加提高我们党在工人和全体居民当中的威望，并在培养我们的年轻干部方面起到教育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代表团建议出版关于烈士们面对资产阶级法庭和死刑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的专集^①，以教育年轻党员。

六、关于考察党员和我们干部的制度

在国统区和满洲的秘密工作条件下，不对全体党员和我们的干部进行注册登记，因为这样做很危险。在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这会暴露大量人员。因此，在秘密工作条件下，考察党员的问题首先是支部书记要加以关注，而考察干部则是各级党的第一书记要关注的。在秘密工作条件下，不能成立专门的干部部，也不能把这项工作只委托给组织部长。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危险的。在一些地方，党组织的第一书记不想专门研究考察党的干部问题，认为这项工作是次要的。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对的，应当给予反驳。

在苏区组织合法的条件下，可以而且应该成立干部部。但这并不免去各级党的第一书记考察党员和干部的责任。

在这个问题上和下面关于提拔干部的问题上，需要向国内发出专门指示。

七、关于提拔制度

中共四中全会以后^②，在培养干部和提拔党的新干部的问题上有很大成绩。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很多不足，妨碍培养和提拔干部。主要不足是，在干部的培养和提拔问题上犯了目光短浅的

① 出版物没有找到。

② 见第 86 页注①。

错误。只考虑现在的工作范围,而不考虑将来更大的工作范围。因此常常不愿意派干部到中共中央和莫斯科接受党的教育。在提拔干部的问题上缺少有计划有步骤的工作,而工作是自发进行的。常常表现出形式主义,缺乏对新提拔的干部的帮助,存在分配不当等现象。所有这些不足妨碍提拔和培养新干部。

关于这个问题和整个干部政策问题,需要给中国发去一封专门的信。在这封信中,应当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并建议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和提拔干部。应当按下列类别来培养和提拔干部:(1)外交工作干部,这类干部要同中国不同政党和派别进行各种不同的谈判。这些同志不应同党的秘密组织有联系。(2)群众工作干部,例如在工会、农村、大中學生中间、中小商人中间工作的干部。这些干部应当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3)党内领导工作干部。(4)在白军和占领军中工作的特殊干部。(5)联络与运输干部。这类干部同地方党组织没有任何联系,而只应研究联络和运输问题。

确保完成国际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分校1936年的招生计划是中国代表团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决定性时机。

八、关于揭露不受欢迎的可疑分子 并使他们脱离工人运动的制度

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和造谣惑众者,经常派遣他们的代理人混入工人运动队伍,或者收买落后工人来通报他们需要的情报和进行挑拨离间。一旦在工人运动中揭露出这类可疑分子,应当采取工人集体行动的方式来孤立他们。例如,在报刊上刊登他们的照片,揭露他们同警察和间谍的联系。总而言之,应当造成工人和群众对他们的敌视,使他们在工人当中丧失威信,把他们孤立起来。在中国,特别是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丰富

的经验。在全党、在工会中和在工人当中推广这种经验是必要的。个人恐怖活动应当绝对禁止，因为这种做法只会给阶级敌人进一步镇压工人群众组织和工人领导人提供借口。

九、关于在工作中考验和审查被怀疑对党不忠和党性不纯者的制度

阶级敌人企图渗入我党，尤其是渗入我们的领导机关。这个问题现在需要中共特别加以重视。说特别是因为近几年来蒋介石吸取了日本帝国主义警察机关的丰富经验。

近些年来经验表明，可以用以下方式来审查这类分子：要审查他们的货币收入来源、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这类分子总是竭力去完成最危险的工作，以便取得上级党组织的信任，对于最高领导同志他们总是表现得极为殷勤。他们有专业技术素养，虽然党未曾教过他们，例如[他们]会伪造护照、印章、压模等，他们还善于办秘密印刷厂等，因为他们早已受过警察机构的训练。

一旦在我们党的队伍里发现这类可疑分子，必须由第一书记亲自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审查并加以解决。在发现这类分子时，要尽量使他们离开党的秘密机关和组织，而给他们提供合法的工作，让他们自己去暴露自己。或者把他们派到一个没有我们党的组织的地方。不能把这类可疑分子派到苏区和游击队去，也不能把他们派到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去。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没有绝对的必要，不要运用特殊手段。方志敏同志在自己的遗嘱中说，“放过一个反革命和错误惩罚一名可疑的人对党对革命同样有害”^①。这句遗言在我们党内应当得到珍视。

^① 见方志敏：《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6年第2期，第50—55页。

关于这个问题和上述问题必须给国内起草一个专门的绝密指示。

中国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1037, 第 17—30 页。

打字稿, 副本。

355

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①

1936年2月9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建议

根据博林同志^②收到的发自中国的来信,我们得知,同情中共的著名新闻记者胡愈之已于1936年1月20日离开香港前往巴黎,以便来苏联作短暂逗留并考察苏联^③。关于他来苏联的原因以及他的身份请看博林同志的详细说明^④。

我认为允许他到苏联来是合适的,因为利用他的来访,我们可以达到以下目的:

1. 从他那里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与近来抗日事态的发展和抗日统一战线有关的情况。
2. 利用他来撰写关于苏联的新作品。
3. 利用他来为我们的公开杂志和报纸^⑤做工作。

因此请您通过联共(布)中央的有关机关取得让他来访的许可。

① 文件副本由王明于1936年2月9日发送给Д. 3. 曼努伊尔斯基和M. A. 特里利塞尔。

② 潘汉年。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495,目录74,卷宗278,第9—11页)。

⑤ 指《全民月刊》杂志(1936年在巴黎出版)和《救国时报》(见第63页注③)。

此致

敬礼

王明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78, 第 8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35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关于为中共培养干部的决定

1936年2月11日于莫斯科

秘密

关于为中共培养干部问题^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决定)

1. 从中共繁重的任务出发,并考虑到中国近来的事态发展,要采取扩大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的方针,使其学生总数到1936年秋季达到200到250人,其中:

- (1)满洲班由现在的52人增至100人,
- (2)华北班(占领区)由0人达到30人,
- (3)苏联远东班由10人增至20人,
- (4)党的领导人员班由2人增至10人,
- (5)研究生班由4人增至10人,
- (6)特别(侨民)班由6人增至15人。

2. 到1936年夏季在国际列宁学校组建有两个系(苏维埃中国系和非苏维埃中国系)的中国部,总共50人,并给每个系提供一个不与国际列宁学校其他部分相连接的单独地方。请联共(布)中央立即为国际列宁学校调派3到4名汉学家工作人员。

3. 请联共(布)中央在那利曼诺夫[东方]学院、列宁格勒[实

^① 文件上有批注:最后定稿:Г.季米特洛夫。

用东方语言]学院和其他东方学院有计划地为中国党校培养工作人员,并每年都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分配一定数量的毕业生,让他们固定在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工作。

4. 要把为各校中国部服务的工作人员的注册和分配工作集中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手中。

5. 责成由曼努伊尔斯基、戈帕涅尔、王明、康生、施平^①、米夫、基萨诺娃、赖特和梅利曼同志组成的委员会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在修改时要考虑到对于不同的学校须使之有所不同并使之更接近中共的任务,还要确定每个班的学习期限。该委员会同时要审订1936年的出版计划,并把执行这一计划的责任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编辑出版部。

6. 干部部应为中国分校制定招收新学员的规章,确保学校没有奸细、异己分子、不可靠分子和敌对分子渗入。

7. 吸收法国、美国 and 所有西方国家华侨中最可靠的华人党员到莫斯科来学习,以期从他们当中培养出在法国和美国华侨中间开展工作的工作人员。

8. 支持国际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向联共(布)中央提出为中国分校提供必要的物资设备和运输工具的请求。责成国际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不晚于3月1日提交新建筑所必需的开支预算。

9. 为国际列宁学校固定现有教员名额,争取使他们转为完全由国际列宁学校任用,并使他们按党的系统划归国际列宁学校党组织。

10. 在王明同志领导下为教员安排有关中共问题的系统指导,从组织上规定这些学习课程,并给这些课程保证必要的时间。

11. 从国际列宁学校“II”部挑选出不少于三人的一个小组,

^① 陈云。

从他们当中来培养教员。

12. 将检查、监督和适当协助执行本决定的责任交给戈帕涅尔、康生和米夫同志。

全宗 495, 目录 18, 卷宗 1073, 第 182 页。

打字稿, 原件。

357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① 关于为中共培养干部的紧迫任务给 联共(布)中央的书面报告

1936年2月19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联共(布)中央

关于为中共培养干部的紧迫 任务的书面报告

关于为中共培养干部的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随着中国事态的发展而变得特别的迫切。

莫斯科是中共现在可以培养干部的唯一地点。原在老苏区有计划进行的大量的党的教育和文化政治工作目前还没有恢复。

现在在国际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有81人(14人在国际列宁学校,67人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而中共代表提出下一个学年要为两校从国内招收不少于250名新生。

然而,目前教员、组织领导者和翻译干部的状况以及物质基础状况,不仅不能保证对预定招来的这么一大批学生的接收、服务和教学工作,而且也不能满足对在校生的经常性工作所提出的要求。

^① 题目是作者根据内容确定的。

下面是关于总的情况的主要资料。

国际列宁学校担负着为国统区和苏区培养干部的任务,目前正在培养的有 14 人,由他们组成一个班(“U”部),正在了解 14 个月的基本教程大纲,该大纲稍许偏重于中国问题研究。

“U”部的干部没有保证。没有秘书和摆脱其他工作的翻译。现有的教员不能保证完成任务,尤其是从了解中国问题和中共任务问题的角度来说。现有的教员都是兼职的,很大一部分按党的系统来说不属于学校党组织,而属于其他机关的党组织。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担负着培养来自日本占领区或者处于占领威胁下的地区(满洲和华北)的干部,现在它正在培养的有 67 人:来自满洲的 52 人,大多数是游击队员;来自苏联远东边疆区的 9 人和(“特别班”)6 人。

为满洲干部办的基础(军政)学校位于离莫斯科 30 公里的地方,从校园和内部结构来说完全是一所独立的学校。它分 7 个教学班:有 4 个班的学习期限为一年半,由 6 人组成的研究生班学习期限两年,一个青年班学习期限三年,“特别班”是已经结业的学生班。为“基础”(满洲)学校制定了与国际列宁学校大体相同的大纲,但更偏重于中国问题。整个教学的中心内容是国情和中共任务问题。除军事学习占去大量时间外,相当多的时间花在普通教育科目上。

在国际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整个政治教育工作服务的领导人小组,在人员数量上是极其不够的。小组中有三类人员:

(1)来自中共的同志,其中也有来自中央的领导同志,他们首先负责教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针,特别是将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落实和领会中共的任务。没有这些同志的积极参与,季米

特洛夫同志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所阐述的党校的使命^①就不可能完成。其实两个学校的大量工作,实际上是在10个不同的班级的大量工作(几个科目的讲座、会议、对教员的指导、关于当前政策问题的课程)都落在了王明、康生和克雷莫夫^②等同志身上。施平和梁朴^③同志也开始参加这项工作。但所有这些同志都忙于自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主要工作。属于这类人员的还有杨松、肖亚(音)^④(两校的教员)和赵毅敏(为满洲同志开办的基础军政学校的主任)同志。

(2)第二类人员是懂中文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俄国教员。在国际列宁学校,属于这类人员的有熟悉中国问题(主要是满洲问题)、刚开始工作的罗戈夫同志和亨里赫松同志。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有两人:吉洪年科和科兹洛夫(后者还兼有其他工作)。

(3)第三类人员是现在刚开始学习中文和研究中国问题、需要带翻译的俄国教员。

军事课程是用俄语讲授的。

中国同志十分正确地主张,必须坚持使用那些熟悉中国问题(无论他教什么科目)并且不需要翻译的教员的方针。

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翻译问题也还极为迫切。在国际列宁学校,与口译和笔译有关的全部工作都由一名翻译担任,这名翻译在别的地方还有工作,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翻译工作由两人担任。出版社的工作也因翻译奇缺而停顿下来。

显然,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指导方针对整个教学和教育工作

① 见Г. 季米特洛夫:《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1935年8月13日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总结讲话)。Г. 季米特洛夫:《为建立反法西斯抗战统一战线而斗争》,莫斯科1937年版,第76—77页。

② 郭绍棠。

③ 分别是陈云和饶漱石。

④ 吴克坚。

进行改组的环节是教员兼领导者的业务水平以及翻译机构。

由此可见，迫切需要立即采取一些措施，以达到下列目的：

(1)要从(国内)中共队伍中挑选出(除现在在学校工作的以外)至少10名同志，要他们专职为国际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教学服务，并且在近两三年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离开这项工作。挑选工作应由经过培训(不排除在这里得到补充指导和短期补充培训)并能够担任这项工作的同志负责。

(2)力求使联共(布)的有关学院(那利曼诺夫东方学院、列宁格勒[实用东方语言]学院等)有计划地培养汉学家，并不断地从每届毕业生中派遣一定数量的人员(哪怕每届毕业生中两三人)供共产国际执委会(为学校)调配。

(3)必须立即从现在正在学习的中国同志当中挑选适合当教员的人，并由他们组成研究生班，为在国际党校工作做准备。

(4)中共应选派不少于五人(哪怕是无党派人士，但无疑是自己人)到莫斯科来学习俄语，并把他们培养成十分出色的翻译。

(5)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部与全体教员之间建立十分牢固的联系，经常不断地为教员安排有关中共问题以及共产国际一般问题的指导活动。

要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教员类型的干部(要求有很高的综合理论水平，熟悉中国问题并精通汉语、要全身心中共做工作和必然脱离任何其他工作)是非常困难的，这种困难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克服，即为这些工作人员提供不至于使他们在工作中采取手工作业方式和敷衍塞责的态度以及物质条件和生活条件。关于特殊的工资等级和住房条件的问题，而特别是关于交通的问题，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教员的时间安排和为他们保证正常备课的充分时间也需要给予特别关照。

其次，通过尽量分散各类学生班的学习区域和把中国学生与其他国家学生完全分隔开以加强保密工作的问题也极为迫切。应

该大力推广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把中国班迁往不同地区,使他们与大学其余部分完全分开的有益经验。必须为国际列宁学校的中国学生安排一个极特别的地区。

从上述中得出的结论是要大大扩大工作的物质基础。

接收一批新的而且人数众多的学生,首先需要有大片居住区。新的建筑物是绝对需要的。考虑到分散(为保密起见)的必要性,至少还需要建两栋新楼房。

过去招收和开除学生的资料表明,迄今所采用的招募学员的方法,不能完全保证学校不渗入敌对分子。

由此可见,必须制定一些新的规章,以保证学校免遭敌对分子的蒙蔽和挑拨离间的威胁。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讨论了为中共培养干部的情况后,于2月[11日]通过了我们附上的决议^①。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1037, 第 11—16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见第 356 号文件。

358

米夫关于中共干部问题的书面报告

1936年3月4日于莫斯科

绝密

关于干部问题的建议

一、关于挑选和允许政治侨民进入苏联的制度

1. 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条件,在对事情作出正确安排的情况下,可以把新的政治侨民的涌入归为个别少有的例外。在通常情况下,这是可以避免的:(1)可以把在国统区“暴露的”同志派往苏区;(2)由于国土辽阔和存在封建军阀割据,我们的同志可以通过一次精心组织的转移行动,到另一个地区去,就能销声匿迹。同时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要求同志暂时停止积极的社会活动。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为中共制订相应的指示。

2. 考虑到尽管在极少的情况下,新的政治侨民的涌入还是不可避免(例如:(1)某些牺牲或被捕同志如李大钊、张太雷等同志的家属留在国内异常危险;(2)敌人正在到处搜捕的某些著名知识分子;(3)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无法为一些有病的同志安排认真的和长期的治疗,等等),应制定专门的指示,一方面规定中共中央及其权力机关认真挑选政治侨民的责任,而另一方面规定只有经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机关同意方能允许他们进入苏联。

3.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要使阶级敌人的奸细通过政治侨民渗入苏联的可能性缩小到最低程度,要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领导提出不一定在苏联境内,而是在条件允许

的某些“民主”国家安置政治侨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把安置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机构批准的政治侨民的职责委托给有关国家的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组织。

4. 异己分子和敌视我们的分子向苏联境内渗透的最大危险在从中国人方面威胁着我们,因为中国人借口不能继续进行抗日游击斗争,擅自越过远东的边界。不能排除在这些人中间可能也有忠于我们的同志。同被拘留者中的一些人建立联系问题,以及提出利用他们的问题,只有在由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一起对每个问题进行认真仔细审查、研究和讨论之后,并经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许可才能允许。

二、关于对旅居苏联政治侨民的审查

1. 要对所有旅居苏联的中国人进行准确而全面的统计,这些中国人要么过去与我们有联系,要么将来可能为我们所利用。根据初步的统计资料,现在在苏联有以下几类中国人:

(1)在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登记入册的政治侨民——45人;

(2)在共产国际或联共(布)系统〔苏联〕外国工人出版局、远东等)工作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国际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原学生——约50人;

(3)原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国际列宁学校、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各种军校的学生,被开除出党的托派分子、反对派、可疑分子等(他们主要在西伯利亚、远东、乌拉尔、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莫斯科、斯大林格勒、高尔基等地的生产单位工作)——约100到120人;

(4)在远东、雅库特、西伯利亚等地工作的中国工人和手工业者侨民,这些人的数量我们难以确定。

我们的任务是要对所有这几类人进行准确的统计,特别是(1)、(2)、(3)类,要弄清他们的所在地、职业种类、党派属性,收集

他们的履历、政治鉴定等。

2. 一俟收到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调来的材料,就审查政治侨民的成分。特别是要查明他们的政治面貌、来苏联的情况、所在地、职业种类、利用他们在苏联境外工作的可能性。同时提出对部分政治侨民的处境需要也应该给以改善的问题。

3. 帮助有关机构准备把最有害、最可疑和最危险的分子迁往苏联境外。

4. 根据与联共(布)中央达成的协议派负责同志到远东、乌拉尔、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中国人密集的地方去,查明这些人的情况。

5. 在联共(布)中央和全苏中央工会理事会的帮助下收集旅居苏联的所有中国侨民的材料,为此目的要利用审查结果和党、共青团和工会文件交换的成果。

6. 委托一些经过考验的同志考察和监视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其他中国人的行为举止和情绪,定期向我们提供有关他们的情报。

三、关于利用政治侨民作为党的后备队

1. 拟出旅居苏联的中国人中的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来从事中共方面工作的人员的名单。制订可以用来从事以下方面工作的中国同志的单独名单:(1)在苏区工作,(2)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3)在国统区从事合法工作,(4)在其他国家的侨民中工作,(5)在我们这里从事培养干部的工作。

2. 依照所进行的挑选要为每个单独拟定的班安排政治学习和生产实践,不把他们的国际学校的主要学生成分联系在一起。

3. 继续在远东的党团员中(特别是在海参崴中国列宁学校^①的学生中)挑选最经得起考验和最有才能的中国同志到东方劳动

^① 国际列宁学校分校。

者共产主义大学专门的苏维埃班接受培训。

4. 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教研室组织对在苏联各大城市中工作的中国同志进行函授教育。这种教育主要应针对中国的问题进行。这类函授班能帮助我们改进对中国同志的考查,减轻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同他们多余的通信负担,系统地弄清楚并提高他们的政治素养。

四、关于同异己分子通过共产国际支部和政治侨民向苏联渗透作斗争的措施

1. 向中共更严肃地提出关于为国际学校认真挑选学生的问题。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前要对从国内来的学生认真做好审查和了解工作。鉴于将有大批学生到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国际列宁学校应派遣专门的同志去远东,以便在那里进行仔细的审查。

2. 只有在事先获得履历和相应鉴定并经中国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一起对每位候选人进行严格的个人审查之后方可在欧美华侨中招募学生。

3. 只有经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同意才能允许从国内招聘同志到苏联工作和做其他事情。

4. 只有经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允许才能邀请其他政党的政治活动家来进行关于统一战线和其他问题的谈判,以及同以私人身份(通过旅行社等)来到苏联的这类人士建立联系。

5. 停止邀请政治上可疑的并对当地组织有威胁的人士来苏联。同时,断然禁止中国的党组织像过去常有的那样,甚至不预先通知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和干部部就派各种不明身份和可疑的人士来苏联。今后绝对不应允许把派人到苏联来作为解决各种不明身份和可疑的分子的问题的一种方式。

6. 对于来莫斯科学习而其政治可靠性无法准确查明的一些

人要单独组织学习，不与共产国际和国际学校建立联系。

7. 转为联共(布)党员的介绍信只有在工作需要的情况下才给最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开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出具介绍信应事先征得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的同意。

8. 协助国际监察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审查已经转为联共(布)党员的中国同志，尤其要仔细审查已恢复联共(布)党员资格的原托派分子和原反对派分子。

五、关于争取利用合法机会和使党的干部合法化

1. 国内反帝斗争的迅猛高涨和一系列反帝组织的成立，为实行人民统一战线策略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大大扩展了中共可以并且应该在自己的工作中加以利用的合法机会。应该争取做到，除了在党的秘密机关从事秘密工作的一小部分党员外，有共产党员在其中工作的所有其他组织(工会、青年等组织)都要公开或者至少半公开。实践表明，在国内除共产党外存在任何其他秘密组织(左翼工会、共青团、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等)都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完全不合适的。所有这些组织都应加以改建，使之变成群众性的、尽可能是公开的或者半公开的组织。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中国同志研究和利用一切合法工作机会并具体运用人民统一战线的策略，除此以外，人民统一战线应当成为我党的一个巨大的掩体，并大大扩大它活动的合法舞台。

2. 要有步骤地揭露敌人把我党说成是阴谋者集团的企图。要利用一切机会证明，共产党人是最忠诚的爱国者和为人民群众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先进战士。例如，为此目的应当在中共成立15周年之际(1936年6月)好好筹备并广泛开展群众运动。在这个日期到来时，应当出版有关党史、烈士和党的著名领导人生平事迹等等的系列小册子。

3. 要筹备和开展抗议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人实行野蛮恐怖

的国际运动。要准备就惨无人道地对待中国政治犯和未经审讯就拷打、杀害中国革命者的事实向法英两国议会提出质询。在可能的情况下,应组织派遣国际代表团去检查在中国监狱中囚犯所受到的待遇。同时鉴于多数中国革命者在国际租界或法租界遭到逮捕,而后被引渡给中国当局,要对这种做法提出强烈抗议。

4. 要利用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情绪,通过律师协会、记者协会、慈善机构等开展群众运动,争取较好地对待政治犯,反对未经审判就拷打、杀害和监禁,争取自由选择辩护人和公开审判。

5. 我党在国统区和苏区的工作实践中应杜绝发生我们的敌人可以用来反对中共和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情况。要争取在苏区更彻底地实行革命法制,尤其应停止对传教士和其他外国臣民的镇压和惩罚措施,不应允许未经审讯就实行拷打和处决等做法。

近期要结束对上海特科工作的调查。必须从特科的可悲工作经验中吸取重大的教训,特科曾采取过轻率和多余的恐怖破坏行动,给敌人提供了不少可以用来对中共实行镇压的材料和借口。要仔细研究在反奸细和保护党的秘密机关方面的适当组织形式问题。

6. 应当认为,争取每个党员的合法地位是党最重要的措施。所有党员,甚至最重要的负责人员都应该有固定的职业和工作,应当为自己营造一种社会环境,通常,在没有公开地为自己作出相应的安排之前,在新的地方不要开始做党的负责人工作。必须认为,在国统区,特别是在上海存在着庞大而臃肿的党的机关(在一些时期那里党的机关的人员达150人),这是很不正常的。这不仅加重了党的预算负担,为奸细的活动提供了方便,而且还证明完全不正常地和不恰当地使用了党的力量。要最大限度地精简党的机关,使尽可能多的党员取得合法地位,并在合法的群众性组织的工作中最为有效地使用他们。

7. 鉴于中国国统区党的领导中心频繁遭到破坏,致使整个党的工作长时期瘫痪,要研究建立合法的领导中心的可能性和为此

利用某些合法存在的组织的中央联合会的可能性。

六、与奸细活动作斗争，审查、教育和提拔党的干部

1. 结束对 1934 年至 1935 年间在上海、满洲等地发生的重大暴露事件的调查，确保所有的党组织，无论是苏区的还是非苏区的都要对这些暴露事件的教训进行仔细的研究。争取使所有暴露党组织都经常研究警察和奸细的活动方式，讨论每起暴露和违反保密规定的事件，并采取措施，防止有可能再次发生暴露事件和阶级敌人的奸细对自己队伍的渗透。

2. “在许多国家里，其中也包括最先进的国家在内，资产阶级无疑地正在派遣而且将来还会派遣奸细到共产党里来。防范这种危险的手段之一，就是要把合法的工作和非法的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①中国的经验证明，由于没有遵照上面援引的列宁的指示办事，由于我们的党组织不善于把合法的工作和非法的工作结合起来，敌人使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要消除对利用合法机会的意义的任何低估现象，争取在这方面有相应的转变。

3. 要把在党的秘密机关工作的同志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由最经得起审查和考验的同志来充实这些工作人员。要特别仔细挑选领导核心和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考察和挑选党的干部的个人责任应当由党组织和党委会的书记承担。

4. 未经专门和认真的分析研究，党的组织不应放过任何一起有关已引起怀疑和嫌疑的人的案件。对这类案件的审理往往都是不彻底的。要要求相应的党的机构对所发生的每一起案件都要作出终结决定。绝对禁止过去所采取的把有嫌疑的工作人员从党的一个组织调到另一个组织（常常是不预先通知）的做法。在可疑者的问题解决之前，要对他们进行考察，办法是派他们去做合法的群

^① 《列宁选集》，1970年中文第2版第4卷，第202页。

众工作,在那里他们能给党造成的损失最小,但却较快和较容易暴露自己。在把不受欢迎的和可疑的分子开除出党时,务必把有关他们的全部犯罪事实作出广泛的通告,其中也包括通过分开的报刊发布通告,告诫他们有可能向党的其他组织和群众组织渗透。

5. 在同接收新党员工作中的宗派主义作斗争的同时,必须坚决谴责通过竞赛等方式大批突击征集入党的做法,就像1932年在上海的组织中和部分地在苏区发生的那样。

由于实行人民阵线策略,革命同路人和异己分子渗入党内的危险增大了。这就需要格外的警惕和划清党与任何其他政治组织和同路人团体之间的界限。应当制定接收新党员的专门细则,特别要说明接纳退出其他政党和政治团体的人入党的条件和恢复以前被开除出党的人的党籍的准则。要向共产国际领导提出关于为重新入党的人规定一定的预备期或候补期是否合适的问题,在这个期限内必须对新人党者从政治上和道德上进行培训,使他们了解党的纲领和章程、最重要的决议、纪律、党员的基本义务、遵守保密基本规定的极端必要性,同时通过合法的群众工作对他们进行考察。

6. 应当特别重视干部提拔问题。这个问题不应带有偶然性,而应该是有步骤的、循序渐进的和逐步的。党的上级机关的领导人应该定期检查每次提拔是否合适。同时应同弄虚作假行为、同某个党组织夸大不实的工作报告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这类虚假报告常常成为把那些后来发现是党的敌人的人调动和提拔到更加负责工作岗位上去的根据。

7. 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总结讲话^①中,季米特洛夫同志要求关心保护党的干部,让党的领导承担对这件事的最大责任。在中

^① 见Г. 季米特洛夫:《争取工作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1935年8月13日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闭幕词)。Г. 季米特洛夫:《为建立反法西斯反战统一战线而斗争》,第73页。

国,这种关心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屡屡暴露常常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不能允许的现象:在极其秘密的条件下,同一些同志一连几年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必须有计划地调动和调配党的干部,及时地把那些已经被警察了解并处于危险之中的工作人员调往“后方”。另一方面,由于在警察事先知道的日子(巴黎公社纪念日、五一节、反战日、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广州公社纪念日等)组织各种示威游行,党要耗费相当多的精力。在要求所有党员参加这类示威游行时,就像要求领导干部公开参加罢工发动一样,党把自己的干部,有时是轻率地把自己的干部,置于敌人的打击之下,使自己丧失了积蓄力量的机会。

为了保护好党的干部,要做到使每个党员都有专门的履历以防被捕,他本人应该熟记这份履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接受审讯时都不能弄错,同时还要准备相应的证人,将提供与其履历材料相吻合的证词。对于党的积极分子,最好让党委书记了解他们的这些情况,以便一旦某个积极分子被捕时,书记可以组织必要的营救。

在红军撤走之后,由于没有很好地组织党的干部转入地下,党的不少宝贵干部在原苏区牺牲了。应该保证为那些在苏区工作的党员可能转入地下做好经过周密考虑的和缜密的准备工作。

8. 应当广泛宣传牺牲同志的英雄行为和像季米特洛夫^①、市川正一^②、方志敏^③等这样的同志在敌人的监狱里和法庭上表现

① 指法西斯当局根据国会纵火的虚假指控逮捕Г·季米特洛夫。在来比锡诉讼程序中被宣告无罪后于1934年2月27日来到苏联。

② 市川正一——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29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并被判终身监禁,1945年在狱中牺牲。见冈野进(野坂参三):《日本人民的英雄》,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6年第14期,第105—112页。

③ 指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被捕以及他在1935年7月29日被杀害前的遗言。见《共产国际》,莫斯科1935年版第33—34期,第99—105页;王明:《英勇的布尔什维克——中国民族英雄方志敏》,见《共产国际》,莫斯科1936年版第2期,第48—49页;第1—2期,第158—166页。

出来的布尔什维克行为范例。同时应该经常不断地揭露民族叛徒,让每个党员对奸细和变节者的卑鄙行为产生本能的憎恶。

七、我们机关里的干部工作

考虑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的工作和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党的代表机构应在考察和培养中共干部方面起重大作用,在近期内必须:

1. 清查在苏联境内的所有中国干部,把他们的所有个人案卷整理清楚;

2. 检查中共干部工作的状况,拟订改进苏区和国统区中共干部政策的建议;

3. 组织为整个中国学校系统招收大学生和研究生,有步骤地帮助改进中共培养干部的整个体制,保证为这些学校提供教学和服务人员、教学参考书,等等;

4. 集中、研究和总结有关中共干部的材料,特别是中国红军干部的材料,为此目的要利用到这里来的同志的信息、所有收到的文件和档案馆中的干部材料,以及报刊上有关我们的同志被捕、判刑、释放和他们在狱中和法庭上的表现的报道;

5. 要起草一些有关党的建设、干部政策、保密工作、同奸细活动作斗争等问题的指示信和指导性文章;

6. 要研究 1934 至 1935 年间的重大暴露事件的材料,并使有关暴露事件的结论成为中国党组织的财富;

7. 要就保密、干部政策、与奸细活动作斗争等问题,对所有动身离去的同志进行细心的指导;

8. 要拟订改进在西欧和美洲国家华侨中的工作的措施。为此目的尤其要利用在欧美召开的华侨会议;

9. 讨论并制定措施,改革中国党组织的组织结构和分散党的机关,以便使党的组织结构更好地适应现时的环境和当前党的重

大任务。

米夫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1037, 第 34—46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359

米夫^①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书记处的信

1936年3月5日于莫斯科^②

绝密

建 议

1. 鉴于已有五年多时间(自1931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后)^③没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专门文件了,请[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审议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或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信或者作为结合[共产国际]七大决议^④阐述中共具体任务的供中共中央批准的决议案所提出的文件草案。

2. 关于党的组织改革

国统区党的形势极为严峻。[中共]上海中央局由于奸细活动在1935年已完全暴露,特科落入奸细手中。上海的党组织只剩下

① 写信人是根据Г.季米特洛夫1936年4月14日给斯大林的信(见第156页注②)确定的。文件上注明:选自米夫文件,1937年11月20日。

② 日期是根据文件打字稿上的手写批注:“最后稿”确定的(见全宗534,目录2,卷宗138,第67页)。

③ 指1931年7月3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任务的决议。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36—256页。

④ 见第360号文件。

了企业和群众团体中的个别基层组织和单个党员，它（他）们也不能担保不受奸细的影响。

在南方，在广州、香港和福建的一些大的中心城市，除了某些地方的小组和单个共产党员外，也未能保住党的组织免遭破坏，在南方省份的乡村地区有各种地方组织，它们与党的中心组织没有联系。

在华北，主要是在河北留下了较为坚固的组织，在河南和陕西的组织要弱一些，在山东、山西和内蒙的组织更弱。但北方的组织正在受到极大危险的威胁，因为暗探局和奸细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在国统区最后这些大的组织上。

在华中（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地）党的力量很弱。

满洲党的系统，除了合法地区内的游击区外，已经微不足道，特别是在城市里。

在江西、福建等地的原苏区内，尽管还有大量的共产党员，但党组织已受到重大损失，组织上的整体性已遭破坏。

国内的联系已经中断，只有部分联系，但不可靠。

党的改革应当是在以下方面：

1. 同那些受到奸细活动影响的党组织完全切断联系。重新建立组织，只逐步进行联系，并通过群众团体将单独的组织 and 党员吸引到自己的组织中来。

2. 分析研究上海特科的工作问题，吸取 1934 年至 1935 年间大暴露的教训。开展群众运动揭露奸细活动。

3. 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利用公开刊物以及单独发行的小册子，指出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以便领导和团结那些与党的领导机关失去联系的地方党组织和单个党员。这件事在现阶段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4. 鉴于[中共]中央远离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并同它们中断了联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必须在下列地区设立中央的全权代表

机构(全权代表)^①:

- (1)在满洲
- (2)在华北
- (3)在华中
- (4)在华南
- (5)国外局

这些机构应该是绝对保密的。它们只与[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联系,与地方组织分离。地方组织中只有很有限的人数(1人或2人)与它们有联系,而且不设单独的机关。要较经常地更换人员、所在地和联络方式。

5. 成立有首倡精神、善于独立工作的省和地区级的地方委员会,由2人到3人组成,不设各种部处,不设复杂的事务性机关,不搞很多的书信交往、报告和通告,不频繁召开会议和有许多人参加拖很长时间的会议。基层党组织应由一名党的组织者或一名党的组织者和一名助手组成。

6. 党的所有工作人员和党员都应有固定的职业和工作,固定的社会地位。通常,在没有固定的职业工作之前,他们不应开始做党的工作。必须及时把已为警察所知晓、受到逮捕威胁的同志调往后方或调到另一个地方工作。

7. 联络机构、车队和被分配从事合法工作(谈判等)的同志,不应与地方组织和党的一般组织系统联系,而应当有自己的独立组织。

8. 认为成立拥有复杂的机构和特殊的任务的所谓特科是完全多余的。党委应该直接领导旨在保护秘密机关的行动和措施,秘密机关应精简到最小限度。

9. 目前的形势使我们有可能着手改组国统区的秘密组织,派

^① 原文如此。

遣一些负责工作人员去建立联系,领导日益高涨的运动^①和恢复组织。

中共成立十五周年

6月中,要在中国境内外开展一场广泛的政治运动。

在莫斯科

1. 出版中共15年历史概论和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的提纲^②。

2. 出版中共人物文集(烈士和党的杰出领导人的传记)^③。

3. 利用共产主义学院一个组的力量制定并出版中共经济纲领^④。

4. 出版《中国苏维埃》^⑤第2卷。

5. 用各种语言出版《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通讯》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的专号^⑥。

6. 组织一系列的会议和报告,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

7. 中共应出版中文报纸(《救国时报》^⑦)专号和中文杂志^⑧,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

① 指1935年底在中国开展的以抗日救国为口号的广泛爱国运动,即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② 见第73页注⑩。

③ 见第74页注④。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见第74页注③。

⑥ 见《共产国际》,莫斯科1936年第14/15期;《共产国际》,莫斯科1936年第4/5期。

⑦ 见第63页注③。

⑧ 指《全民月刊》杂志(见第129页注⑤);见《全民月刊》,巴黎1936年第7/8期。

在中国

除了将在莫斯科印制的上述材料寄给中国各社会团体、人士和报刊编辑部以外,还必须:

1. 把有关中共活动和中共人物的一系列文章寄给半公开的反帝报刊和自由主义报刊以及文艺性刊物;
2. 在中国政治和社会活动家、科学家、知识分子中间以及外国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学者、作家等人中间征询对中共的意见。

在国外

1. 各兄弟党都要在6月中旬举办声援中国人民日或周。
2. 在这些日子里要通过中国人民之友协会、反战委员会、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工会等群众团体召开一些群众大会和集会,以示对中国革命的声援。
3. 要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有关中共成立15周年及其斗争的专号或专版,至少要刊载这种文章或短评。
4. 通过议会共产党党团组织对中国事件的质询。
5. 发起反对在中国进行恐怖活动的运动,如有可能,则派代表团去中国。

关于代表团的工作

1. 加强中文报纸出版工作^①,在巴黎组建专门的中文印刷厂,以便五天出版一次报纸。
2. 出版中文杂志^②。
3. 组建[苏联]外国工人出版局独立的中文印刷厂。

① 见第63页注③。

② 可能是指1936年在北平出版的《解放》杂志。

4. 筹备在国外召开华侨代表会议^①。

5. 在各民主国家组建一些与人员联系、协助与国内联络和散发材料的站点。

关于联络工作

目前的联络机构无论如何不能保证我们工作的开展。必须专门讨论国际联络以及国内联络的问题。

关于干部

要作出关于干部问题和党的干部政策问题的专门决议^②。

全宗 154, 目录 1, 卷宗 847, 第 27—31 页。

打字稿, 原件。

① 1936年9月20日在巴黎召开的华侨代表会议上成立了全欧抗日救国协会。详见 S. T. 崇:《走向和平的努力》,载《中国的声音》,上海1936年11月15日第1卷第17期,第10、20页;《先锋报》,纽约1936年10月24日和31日。

② 见第356号文件。

36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的 形势和中共的任务的指示文件草案

1936年3月5日于莫斯科^①

绝密

中国的形势和中共的任务 (草案)^②

1. 目前中国正经历着历史性的转折关头。在中国很大一部分土地上,人民群众已沦落到殖民奴隶的境地。中国其余地区,像整个中国一样,面临着完全的殖民奴役的危险。中国正遭受着极大的民族危机。“在这种最危机的时刻,不能用革命方式砍断绞索的人民,就只有死亡”。(马克思语)^③

日本帝国主义者拿中国的命运作赌注。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全民抗日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中心任务,其余的一切都应服从这一任务。中国共产党正确而彻底实行**统一战线策略**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建立反对日本奴役者的人民反帝统一战线是解放

① 日期是根据第359号文件标明的。

② 文件已发表,见亚历山大·达林和F. I. 菲尔索夫主编:《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的来往书信(1924—1943)》,选自苏联档案馆,纽黑文2000年英文版,第86—95页。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4月14日致斯大林的一封信中指出,该文件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详细讨论了中共在目前条件下的策略问题之后,“由米夫同志同王明同志和其他中国同志一起拟定的”见全宗495,目录74,卷宗294,第1页)。

③ 引文出处不详。

中国人民的必要的和最重要的条件。

2. 中国已经出现了实行中共新策略和建立统一战线线的特别有利的条件。日本帝国主义者肆无忌惮的侵略引起了中国民众反帝斗争的巨大高潮。国民经济的逐渐崩溃、日本帝国主义者日益加剧的侵略行动,注定要使千百万劳动群众遭受贫困和饥饿的折磨。落到中国人民头上的骇人听闻的灾难,使人民的愤怒已经忍无可忍。越来越多的民众强烈地意识到必须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坚决武装抵抗日本侵略者。

3. 这一点可以从最近中国正在发展的事态中得到证明。学生运动如暴风骤雨。日本企业工人罢工频繁发生。占领区的农民暴动正在发展,街头示威游行和中国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中国走狗的各种形式的起义浪潮越来越高涨。城市小资产阶级、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也都加入到民族解放运动中来。蓬勃发展的运动对军队,也包括对很大一部分中下层官兵,甚至一部分高级指挥人员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这个运动中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广大群众对人民反帝统一战线的极大向往。

中国共产党日益壮大的力量使它有可能以人民反帝阵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出现。苏维埃运动的成就、经过无数次战火考验的中国红军对民族革命的武装支持,这些都有利于使苏维埃和红军变成团结全中国人民为拯救自己祖国而斗争的中心。

4. 执政国民党的进一步互解和一系列反帝性质的政治团体和组织的出现,也有利于建立人民反帝统一战线。对国民党上层所执行的投降政策的绝望情绪笼罩了越来越广泛的中国居民阶层,其中也包括国民党下层人士。不能排除国民党内不仅是单个人而且是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整个团体以及国民党的一些组织,有可能在最近走上与国民党上层的政策彻底决裂的道路,并加入到强大的全民族解放斗争战线中来。

毫无疑问,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继续扩大而引发的主要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急剧紧张的矛盾也是十分有利的因素。以前作为民族革命主要障碍的帝国主义列强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开始崩溃。

5. 所有这些情况都可能导致中国局势发生这样的转折:斗争的形式和斗争力量的对比出现意想不到的和奇特的结合,就像俄国1917年2月所出现的情况那样。

关于这种情况列宁说道:

“革命所以能够这样迅速和这样(从表面上看来,骤然看来)彻底地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在那个时候那种异常奇特的历史形势下汇合起来、并且是十分‘和衷共济地’汇合起来的,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潮流,两种完全异样的阶级利益,两种完全相反的政治社会倾向。”(列宁:《远方来信》)^①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极其严峻的任务:正确和彻底地利用所有直接和间接的后备力量,引导所有民族爱国分子投入到全民的斗争中去。日本帝国主义是全中国人民的死敌。必须动员全部力量投入到反对这个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去。必须把所有表明愿意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人,吸引到人民统一战线中来,甚至包括那些暂时的、动摇的或不可靠的同盟者,而不管他的政治信仰、阶级和党派属性、宗教信仰等等。

考虑到业已形成的局势,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建立人民反帝战线和组织为中国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进行胜利的斗争的事业中,利用历史上出现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6. 尽管有种种有利的条件,如果认为,实行统一战线策略,这是很容易解决的任务,而不需要最大限度地动员党的全部力量,不需要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和最广泛的主动性,那是错误的。中国

^① 见《远方来信》,载《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6页。

共产党人必须摆脱类似的错误观点。他们必须对在这条道路上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必须估计到现有的那些阻碍掀起强大的反帝高潮和阻碍全中国人民团结的诸多因素。这些因素有：(1)国家不统一，封建军阀割据；(2)1925年至1927年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害怕独立的群众运动；(3)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分配不平衡，特别是在国统区和被占领区的最主要中心城市，党的力量薄弱；(4)无论是在国统区还是在苏区，党的“左”倾宗派主义错误还远远没有根除，甚至至今还妨碍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人民反帝统一战线而进行的斗争。尽管有种种障碍，中国共产党在克服一切困难时，无论如何都必须争取建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走狗的人民反帝统一战线。

7. 为拯救祖国，为争取国家独立和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应该是中国人民反帝战线的出发点和主要内容。同时，中国共产党应该以自己的言行来宣传这样的论点：越迅速和越有充分理由地将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贫民吸引到斗争中来，反帝统一战线就越强大和越有影响力。党越是出色地捍卫劳动群众的迫切需要，捍卫他们直接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就越能更迅速地把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团结到无产阶级骨干的周围，并吸引所有动摇不定的有爱国情绪的分子投入到强大的反帝阵线中来。人民阵线只能在共同的具体行动和发动的基础上建立和壮大。因此，在所有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运动中，不管谁是运动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都应该最积极地参与，并竭力从组织上巩固在斗争中得到锻炼的统一战线。

日本帝国主义者正打着“同共产党人作斗争的统一战线”招牌搜罗所有的民族败类，中国共产党必须向群众说明，中国正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拯救祖国，要么所有中国人将沦为没有权利的奴隶。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中国走狗的所有鬼蜮伎俩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应该号召建立强大的全民统一

战线同全体中国人民的死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8. 现时解放运动的主要弱点是一些反帝行动分散、时间不一致和缺乏联系。问题的实质在于联合所有能够进行反帝斗争的组织 and 力量,在于集中领导,在于克服运动的分散性。这就是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斗争取得胜利的保证,因为那时人民群众的压力将是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带头,并且无论面临任何困难也不停顿地开始同所有政党(民族主义政党^①、国民党组织、民族革命同盟^②)、所有群众组织(工会、学生联合会、救国会^③、律师协会、记者协会等等)、中国和华侨界的所有团体和一些政治和军事人士就组织联合行动和对抗日斗争的集中领导问题进行谈判。要把同这些组织中的每一个组织达成协议的条件具体化,同时,中国共产党应该力求使这些协议导致把所有力量,其中包括军队的力量联合起来,并根据中共中央 1935 年 8 月 1 日发表的宣言^④所阐述的条件和立场成立联合军队和联合国防政府。中国共产党应该公开地和明确地表示,他同所有那些支持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的人,其中也包括所有这样的国民党人站在一起,反对那些同人民统一战线对着干的人,其中也包括这样做的国民党人。

共产党在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同时,一刻也不放弃宣传自己的纲领和斗争目标,同时还应该最忠实地履行它所签订的协议的所有条件,并彻底地和无可挑剔地执行人民反帝统一战线的所有任务。同时,党应该揭露那些要么从外部与统一战线对抗,要么参加统一战线,试图用自己的动摇和消极态度从内部破坏它的组织和个人,并同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

① 显然是指 1929 年出现的“中国青年党”。

② 原文如此。应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见第 60 页注①)。

③ 显然是指 1936 年 1 月成立的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④ 见第 44 页注②。

9. 解放运动的另一个弱点是与下述情况有关,这就是中国军阀为数甚多的军队,是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但就其大多数而言还不属于抗日军队,常被反动军阀用来反对人民的利益,参与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必须让人民反帝统一战线的所有拥护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同时,共产党自己也应该坚决改进自己在中国军阀军队中的工作。要在停止内讧和武装抵抗日本占领者的口号下,不仅把士兵群众,而且也把指挥人员争取到人民统一战线方面来。要避免军队过早发生的分裂和骚动,要竭尽全力加强军队中的革命影响,为此要派工人和具有革命情绪的学生到军队中去。同时必须开展争取满足士兵群众的迫切要求,反对粗野地对待士兵,改善他们的饮食和衣着,增加和及时发放津贴等的斗争。

10. 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十分清楚意识到,人民统一战线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共产党自身的强大。人们越是认识到它的强大力量,也就越会自愿地和迅速地同它进行谈判并缔结协定。所以进一步巩固苏区和提高红军战斗力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是,如果说从前苏区主要是土地革命的根据地的话,那么现在它们首先就应该是抗日的可靠根据地,是人民反帝统一战线的主导力量和最牢固的支柱。中国共产党要在苏区彻底实现联合国防政府的纲领要求,同时也应该在这方面为所有认为自己是人民统一战线拥护者的人作出榜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应当满足于实现这些纲领要求。党既要重视群众本身的情绪和要求,同时还要实行超出联合政府纲领的措施,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必须考虑到组织全国解放斗争的需要。

11. 应该根据新的政策对中华苏维埃的宪法作出某些修改^①。苏区不但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民主政治,而且对于以某种方式参加

^① 见《中国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令(1931—1934)》,莫斯科1977年版,第27—32页。

抗日救国武装斗争的所有其他人来说也是民主政治。在赋予非劳动者公民权的同时,也要像从前一样在选举制度上保证工人的某种特殊权利。还应该赋予那些不反对苏维埃政权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所有非共产主义党派、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言论、集会和出版的自由。要允许那些忠诚地同苏维埃和共产党一起抗日救国的真正民族革命党派的代表参加苏维埃机关。必须不仅吸收资产阶级专家,而且也吸收其他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相应的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以便为了民族革命事业利用他们的经验、关系和资金(例如个别商人和企业家参加苏维埃工商部门的工作,等等)。

12. 为了建立全民反帝统一战线,必须把红军改编和改组为人民救国军。这应当表现在扩大军队的成分上,不仅吸收广大劳动民众,而且也吸收参加解放斗争的学生、职员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青年阶层加入它的队伍。必须加强培训指挥干部,并明确规定军队指挥员的级别和军衔。在缔结作战协议和在与其它准备抗日的军队实行联合行动方面,要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中国共产党在实行这些措施的同时,还必须采取措施加强对军队的军政领导,加强在革命军队的士兵中和指挥人员中的工作。

13. 还要根据新的形势进一步明确中国苏维埃的土地政策。要实行消除封建残余的方针,同时为了团结尽可能更广泛的人民抗日战线,要对土地政策作以下修改:第一,不应该没收那些属于手工业者、手艺人、教师、小商人和某些工人的土地,虽然这些人本身并不耕种这些土地,但是他们从前是依靠自己的勤劳、节俭才获得土地的。要么允许他们将土地继续出租(当然,不是在苛刻的条件下),要么根据农民群众的要求把他们的土地纳入共同分配,国家应对他们的土地给予价格补充。第二,不要没收富农的土地和所谓多余的工具有。如果根据大部分农民群众的要求实行平分土地,富农的土地必须纳入共同分配,而富农应获得根据共同原则应分得的那一部分。第三,不要没收那些真正参加抗日救国武装斗

争的军人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第四,对于那些同时是大地主的商人,只限于没收他们的土地,而不触及他们的商业企业。

14. 商业和工业领域的政策及劳动问题上的政策。为了保证红军的供给和改善民众的物质状况,必须:第一,不但要千方百计发展群众性合作组织和国营企业,而且还要全力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第二,苏维埃应该重新审查那些阻碍和限制自由贸易和工业发展的指令;第三,必须改变对商会的态度,特别是不要解散它们,而要利用它们来发展苏区的工商业,以及发展苏区和非苏区之间的商业联系;第四,重新审查税收政策,以便为发展私营工商业等提供更大的自由。

要坚持千方百计提高工人和雇农的物质、法律和文化地位的方针,同时要避免提出那些在目前形势下,要么在实践中无法实行,要么会加剧经济破产和失业的过分要求。其次,暂时必须放弃组织所谓“工人监督生产”的做法,现时在苏维埃中国地区尚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

15. 共产党应该力求在苏区更彻底地实施革命的法制。应当杜绝出现那些被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用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事例。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允许采用刑讯、不经审判处以死刑等做法。对于传教士和其他外籍人士,必须停止实行镇压和惩罚性措施(逮捕和索要赎金)。必须允许他们在遵守苏维埃法律的情况下继续从事自己的活动。

苏维埃应在每时每刻都把斗争矛头指向红军和人民的最主要敌人,首先是指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苏维埃不仅应当千方百计同所有正在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或希望进行这种斗争的人保持友好关系,而且要同那些由于某种想法而没有反对红军的人建立正常的关系。中共在苏区的政策和一切活动都应该服从武装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捍卫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革命统一的民族革命战争利益。

16. 反帝人民战线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中共在国统区阵地的加强。在这里,党面临的任务是保存和培养自己的干部,加强在群众中的联系和影响,争取党在政治上的合法地位,恢复和加强党在国内重要中心城市的组织。国内反帝斗争的迅猛高涨和一系列反帝组织的建立,大大扩充了中共在自己的工作中可以也应该加以利用的合法机会。除了一小部分在党的秘密机关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外,应该争取所有有共产党员在其中工作的其余组织(工会组织、青年组织等)成为公开的组织,或至少是半公开的组织。实践证明,除了政党外,在国内存在任何其他秘密组织(左翼工会、共青团、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等)都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是不合适的。所有这些组织都应当进行改组,使之成为群众性的,尽可能公开的或者半公开的组织。中国的同志们应当仔细研究和利用一切合法工作的机会。别的且不说,人民反帝统一战线就应当成为共产党的强大掩护组织,并应大大扩展其活动的合法舞台。

17. 应该不断地揭露敌人试图把共产党说成是阴谋集团的伎俩。应该利用一切机会来证明共产党人是争取民众的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最忠诚的爱国者和先锋战士。近来在中国报刊上出现了诸如章太炎、章乃器、陈铭枢等这样一些著名人士为共产党人作辩护的文章,这些文章有利于党为争取自己的合法地位而进行斗争^①。党应该全力支持并扩大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些政治活动家当中出现的为共产党人作辩护的运动。同时基于这个目的,必须很好地准备并广泛开展与(1936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党十五周年有关的群众运动。在这个日子之前,应当出版一批党史概述、烈士

^① 见《学生救国运动》,第1卷,第78—99页;另见胡秋原:《章太炎先生与共产党》,载《全民月刊》,巴黎1936年第1卷第3期,第2—3页。

传和党的著名领导人传记等著作^①。

在利用中国民众中的人道主义情绪的同时，应该通过律师协会、记者协会、慈善组织等开展争取改善政治犯的待遇，反对刑讯、不经审判就处死和监禁的做法，争取自由选择辩护人和公开审判等的群众运动。

18. 党必须比以前更加强有力地开展争取工会统一的斗争。前不久发生的七个海员工会的联合^②表明了在这方面的有利条件。党应该争取把在各种符合工人群众传统和觉悟水平以及从最原始的工会到合法的工会(包括在国民党招牌下的工会)的合法条件的群众组织中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以便捍卫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必须利用抗日运动的高涨在日本企业中开展斗争。但并非总是要采取罢工手段，而要利用与条件、工人的情绪和传统相适应的其他斗争方式，如请愿、怠工等。

19. 党在知识分子、学生和其他城市小资产阶级阶层中的工作，应该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党应该利用并激励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汉奸的爱国热情，努力在学生运动中巩固统一战线，并利用学生联合会的力量在最广大的中国居民阶层中扩大抗日宣传。党应该在为救国和争取起码的民主权利，争取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和反对宪兵警察干涉学校、出版等工作而斗争的口号下，努力把所有文化团体联合成一个强大的救国联合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也应该参加全民反帝战线。

20. 共产党应该为组织和领导日益高涨的自发的农民运动而进行斗争。党应当力求把农民群众的米骚动，饥饿远征和游击行动纳入全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走狗的斗争轨道。党还应当在反对繁重的捐税、各种名目的勒索和高额的地租及反对高利

^① 见第73页注^⑩，74页注^③、^④、^⑤。

^② 指一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海员联合会救国会同盟。

贷,争取救济饥民、修复和疏导灌溉系统等口号下,对千百万中国农民群众施加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通过在那些把农民联合起来的所有群众性的合法组织(如合作社、老式组织、自卫队等)中做耐心细致和坚持不懈的工作来争取把农民群众吸引到保卫祖国的武装斗争中来。

21.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同志要求关心保存党的干部,让党的领导承担对此事的最大责任。^① 在中国,这种关心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屡遭破坏常常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不能允许的现象:在极其秘密的条件下,同一些同志一连几年在同一地方工作。必须有计划地调动和调配党的干部,及时地把那些已经被警察了解并处于危险之中的工作人员调往“后方”。另一方面,由于在警察事先知道的日子([3月18日]巴黎公社纪念日、五一节、[9月1日]反战日、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12月11日]广州公社纪念日等)组织各种示威游行,党要花费相当多的精力,党要求所有党员参加这类示威游行时,像要求领导干部公开参加罢工发动一样,党把自己的干部,有时是轻率地把自己的干部,置于敌人的打击之下,使自己丧失了积蓄力量的机会。

22. 中国共产党应当改进在党员中的党的教育工作。应当广泛宣传牺牲同志的英雄行为和像季米特洛夫、市川正一、方志敏等^②同志在敌人监狱里和法庭上表现出来的布尔什维克行为范例。同时应该经常不断地揭露汉奸,让每个党员对奸细和变节者的卑鄙行为产生本能的憎恶。

不搞大规模征集党员的运动,同时克服对接收新党员工作的宗派主义态度。在预防异己分子钻入自己队伍的同时,中共应该

① 见Г. 季米特洛夫:《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和反对法西斯》(1935年8月13日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闭幕词)。Г. 季米特洛夫:《在反法西斯反战的斗争中》,第73页。

② 见第147页注①、②、③。

向那些热切希望在党的队伍中为中国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敞开大门。

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两条战线作斗争的同时，应该增强自己的战斗力、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一致。“左”倾错误、宗派主义是建立人民反帝战线事业和党的群众工作中的主要障碍。同时，中共应该防止和克服自己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摇摆，因为其危险性在党执行新的策略方针的情况下无疑在增加。

中国目前的形势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极为复杂和极为重要的任务。我们毫不怀疑，经历了革命斗争的严酷和英勇考验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光荣地完成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任务。我们深信，全体党员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自己久经考验的中央的周围，在它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地去建立人民反帝战线，并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新的胜利。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47，第 32—46 页。

打字稿，副本。

361

盛世才给王明的信

1936年3月15日^①于乌鲁木齐

致热爱的革命导师王明

1. 虽然我本人从来没见过您,但是我不仅打心里尊敬您,而且很早就认定,您是真正的中国青年的领导者,而读了您的大作(著作:《新形势与新策略》、《中国当前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以及《苏维埃中国》)^②之后,我深信,您不仅是未来新中国的领导者,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者。

2. 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③,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指挥部,解放全世界被压迫人类的这一神圣事业博得大家多么大的敬意啊。全世界被压迫人类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旗帜下才能获得解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光芒不仅照亮了全世界,而且也会使垂死的帝国主义列强吓得心惊胆战。这个光芒的力量已经于1917年在俄国引起了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红十月革命,在列宁领导下的这次十月革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收到信的日期。

② 见:王明《新条件与新策略》,莫斯科1935年版;《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莫斯科——列宁格勒1935年版;《苏维埃中国》,莫斯科——列宁格勒1933年、1935年版,第2卷。

③ 详见:全宗558,目录11,卷宗323,第1—31页。

论,一方面建设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使世界无产阶级有了祖国,并培育出(用雨露浇灌出)全世界被压迫人类解放的美丽鲜艳的花朵。

3. 在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攻中国的时期,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了个人的名誉、财富和地位而出卖中国人民的时期,在卖国的国民党已经丧失了中国青年对它的信任的时期,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她才能拯救中国。因此所有清楚了解国际形势和中国局势的青年男女都争先恐后地加入共产党,以便投入到同野蛮的帝国主义,同出卖中国人民的国民党的残酷斗争中去,争取中国的独立和自主,争取中国唯一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4. 我,盛世才生活在处于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双重压迫下的中国,我出生和成长在东北这个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压迫下的半殖民地,当我读了具有哲学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书籍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的正确理论,使我心中燃起了激情并决定了我的信仰(信念),1929年我曾给孙扶瑶先生写信,请求他推荐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不幸的是,由于孙(扶瑶)先生在日本被捕并被关进监狱,我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虽然我当时未能入党,但是我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始终没有改变。后来,由于我没有加入国民党,就受到蒋介石属下对我的恶劣待遇,当我看到蒋介石卑劣的自私自利行为以及军阀们的所作所为以后,我就离开了纷扰的华中,并绕过万里长城来到荒凉宁静的新疆。在完成了伟大的“4月12日革命”^①以后,我偶然地被各族人民的各个阶层推荐到新疆边防督办的职位上。在得到政治权力之后,我表示了对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兹拉特金的良好态度,然后没有

^① 指1933年4月12日盛世才在乌鲁木齐发动的军事政变。

多久就派出陈德立和姚雄带着我的亲笔信去见斯大林和去共产国际，^①我在信中讲述了我是怎样走向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信念的，表示愿意接受斯大林的领导。由于我希望接受斯大林的领导，我在各方面表现出对苏联的亲近，而且由于我不希望受到蒋介石和汪精卫的领导，我总是表现出对南京的疏远态度。此外，我在南京供职的时候，没有加入国民党，而且秘密地来到新疆并取得了督办的职位，这些情况引起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愤怒。因此，他们第一次派来军阀黄慕松，黄同国民党人陈中和李笑天以及官僚政客陶菊园(音)^②串通，预谋推翻新政府。第二次他们又派来官僚政客罗文干，罗同张培元、马仲英、刘文龙密谋推翻新政府并杀死督办。尽管黄(慕松)和罗(文干)失败以后离开此地，但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对新疆的预谋始终没有停止。同时，新疆把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和同苏联友好作为对外政策的两个基本点的对外政策引起了日本和英国帝国主义的愤怒，他们不止一次地设下圈套并对新疆进行挑衅。尽管我受到这么多次打击，但是我不仅没有消沉，而相反，我同帝国主义和同叛徒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作斗争的情绪更加高涨。

5. 新疆4月12日革命三周年就要到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新疆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新疆取得这种进步并不是有赖于我的军队，而应归功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援助，归功于斯大林遵循列宁关于援助东方弱小民族的教导，特别是归功于阿波列索夫总领事执行斯大林关于直接帮助新疆和援助我的军队的指示。新疆现在的荣誉和欢乐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以及阿波列索夫给予的。苏联对新疆的这种援助不仅使400万新疆人民有可能了解苏联，并且为有这些好处充满对苏联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可能是陶明樾——译者。

的感激之情,而且也推动全中国人民去理解和加强同苏联的友好关系。现在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国家关系有希望向着好的方面转变,尽管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因为被日本帝国主义逼得走投无路的蒋介石也在寻求同苏联的友谊,但是苏联对新疆的援助和新疆从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和同苏联的友谊中所得到的好处,都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全中国人民和蒋介石部下的军官能够从苏联援助新疆的事实中明白,苏联不是一个侵略性国家,而是一个实现列宁关于援助东方弱小民族的遗训的国家,而这种认识已经使苏联援助新疆的事实变成了很有分量的实际证据,这就是促成苏中友好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

6. 虽然我是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特别是眼界和知识欠缺的人,但是,因为我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而您是中国革命领导人中最强有力的领导人,所以我向您叙述一下我对争取苏维埃在中国取得胜利的 strategy 的一些看法。

(1) 必须使红军能够充实自己的装备(主要是武器和弹药)。

有消息说,现在中国红军的数量增加了,但是武器和弹药非常缺乏,我极为关心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红军的最终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为了尽快地完成中国革命,必须使红军能够拥有足够数量的武器和弹药。我认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当然愿意援助红军武器和弹药,问题只是他们担心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知道这件事。如果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这三位革命导师同意给红军以武器和弹药援助,那么我就承担起秘密向甘肃发送武器和弹药帮助红军的责任,使这件事绝对不让新疆居民、南京政府或帝国主义知道,以便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使苏维埃地区能够迅速得到发展和扩大,因为中国红军的胜利不仅是中国革命前景的胜利,也是世界革命前景的胜利。

(2) 在苏中友好的过程中,中共应该准备夺取政权。

为什么蒋介石这个叛徒和[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最终会希

望暂停“剿共”斗争和实行苏中友好政策呢？

据我观察，第一个原因是失去中国北方9省(这里也包括东北4省)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和新的反帝运动浪潮的高涨。现在，全国人民反对不抵抗原则，也就是反对蒋介石，反对国民党统治。如果蒋介石还不抵抗日本而继续“围剿”红军，那么毫无疑问，将会出现全国人民和蒋介石所属的军队起来援助红军并向红军投诚的危险，其结果必然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死亡或被歼灭。

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所推崇的新派别即法西斯派^①对国民党元老派和非法西斯派的攻势，以及近年来这个新派别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实行的暗杀政策，特别是对汪精卫的暗杀^②，引起了国民党元老派和除新的派别以外的其他派别对蒋介石的敌视，并使大家人人自危。所以国民党内的反蒋气氛日益强烈，这也使蒋介石陷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使他感到不安。

第三个原因是在红军得到西北这个根据地之后产生的。那里既便于“剿共”又便于防守，一方面它很容易依靠西北丰富的物质资源来补充人员、马匹、武器和干部，从而不仅能够轻而易举地发展起来，而且也能够使蒋介石的进攻变得困难重重。另一方面红军也有希望得到苏联的武器援助，因此今后红军不但有光辉的前景，并能日益发展壮大，而且这个希望也会造成一种威胁，这就是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围剿”有可能转变成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围剿”。

第四个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北方以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和美国担心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和利益有被取消的危险，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致反对日本的倾向。因此，蒋介石也想利用英国、美国和苏联来反对日本。

① 见第60页注②。

② 见第100页注③。

第五个原因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先生根据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宣布了中共有可能放弃从前的敌视态度，在反帝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同所有政党合作，并一致起来共同抗日救国。这个统一战线的提议在中国取得了成功，而这次成功一方面为全国各族人民、各阶级、各政党和各派别提供了接近共产党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使全国人民感觉到，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建议比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更加正确，同时也感觉到要去掉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军阀）这双重压迫的枷锁，只能指望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下，为争取民族生存而正在同日本作斗争的中国红军取得胜利。所以蒋介石知道，如果他继续进行同红军的作战行动，那么不仅他本人和中国将走向绝路，而且这也是违背全体中国人民意志的行为。

第六个原因是国民党不是一个革命党，而是一个只顾及个人的党，蒋介石也不是一个诚实的革命者，而是一个只关心个人威望和虚伪地表示考虑他人威信的军阀，但是只要日本帝国主义给他保留哪怕一点希望，他就会心甘情愿地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且会利用这种声望来欺骗中国人民。因此，当日本强盗侵占了东北四省时，他们（指蒋介石等人——原译者注）^①还能够用“王明忍耐一点儿，以便将来给日本以全面反击”的口号和汪精卫的先消除内部危险，然后抵御外来威胁的错误政策来欺骗人民。但是当日本匪徒占领了华北五省时，国民党和蒋介石就没有什么可以对人民说的了，也再没有可能欺骗人民了。所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压迫的加剧，蒋介石不能不走上与苏联亲近的道路。

从上述各项条件中，我们已经知道了蒋介石停止同共产党人的斗争并同苏联友好的原因，也知道了蒋介石在利用苏联的力量从中国赶走（驱逐）日本强盗的势力以后，无疑会重新采取行动消

① 原文如此。

灭共产党,并利用英国、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来反对苏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应该怎么办呢?依我看来,在这个国家崩溃祖国灭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应该同国民党和所有其他党派合作,运用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彻底消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解放中国,使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另一方面,共产党应该准备争取充分的客观条件,以便在中国铲除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不仅不允许蒋介石消灭共产党,而相反,使共产党能够消灭国民党和法西斯派别的力量,在此之后立即把中国苏维埃化。同时,共产国际方面必须准备争取充分的客观条件,以便在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战争失败以后,使朝鲜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并为日本共产党夺取政权和把日本苏维埃化提供机会。上述几点条件不仅是实现中国革命的条件,而且也是世界革命胜利的条件。

(3)您提出的同日本作斗争的反帝统一战线口号确实是正确的。它不仅是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策略,而且也是目前同帝国主义和日本进行斗争并解放中国的唯一正确的策略,因为这种策略一方面能够使所有党派抛弃他们先前所持的观点和敌对态度,齐心协力地为使中国摆脱灭亡的威胁而团结起来。另一方面,这种策略不仅能为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提供同共产党接近的机会,使它们抛弃过去那种认为共产党是一个绝对不能(同它们)共事与合作的组织看法,也使它们抛弃过去那种认为在共产党取得胜利后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的优秀人物不仅不能保持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在职务,甚至也不能保留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等看法。在抛弃了这两种看法以后,毫无疑问,共产党就一定能够得到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特别是在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士的同情,同时它还一定能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强大的农村同盟军,这就是中国农民。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这个强有力的同盟军和同情者,也就取得了保证胜利的条件。而组织这个联合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同日本作斗争的反帝统一战线的作

用,恰好符合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即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必然加强反帝斗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不久前我写了几篇文章,将您的“统一战线”理论作为其基础。既然统一战线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就应该尽快地自己站到中心位置上来,运用统一战线口号,团结我们4亿一盘散沙般的同胞,解放中国。同时考虑到中国的实际状况和当前的形势,为了工作的成功,表面上可以使国民党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而实际上要使统一战线的核心,换句话说,实际上的领导者还是中国共产党。不过我不知道,我的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7. 您每日每时所做的工作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解放全世界被压迫人类、解放中国的伟大工作。我和阿波列索夫所做的工作,即建设新新疆,也是伟大的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我现在正在欢欣鼓舞地进行着建设新新疆的这项工作。但是,由于我的知识有限,能力不强,加上我没有受过共产党的教育,虽然我也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但由于我没有参加过党的实际工作,所以不可避免有人把我看作是一个具有“不切实际信念”的人,因此我有很多担心。这些担心是,一方面我怕在领导工作方面犯错误(从我这方面),而另一方面我怕辜负了苏联友好国家的援助,辜负了斯大林的期望和我的好朋友阿波列索夫的帮助。因此,我诚恳地希望您百忙中能定期地写信给我以指导和批评,使我抛掉这些担心。

8. 我非常希望得到您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这样讲完全是真诚的,没有任何一点虚伪。过去蒋介石和冯玉祥利用并欺骗苏联,也利用并欺骗中国共产党,而谁能保证,我不是第二个蒋介石或冯玉祥呢,我自己用以下五点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点: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冯玉祥都不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他们同苏联和共产党友好并不是由于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而完全是为了自己私人事业的成功利用苏联和共产党。我

则恰恰相反：起初只是内心充满信仰，而后才实行与苏联和共产党友好的政策，但（这种友好）丝毫不带利用和欺骗的性质。

第二点，蒋介石和冯玉祥已经有政治地位，为了保持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去利用苏联和共产党。而我还在到新疆之前和担任督办职务之前，就已经信仰和希望加入共产党了。只是我在担任新疆边防督办的职务之后，才有机会利用自己的地位公开地实行与苏联和共产党友好的政策，并且我没有保持自己地位的想法。

第三点，蒋介石和冯玉祥同苏联和共产党实行友好是由于他们走投无路，所以当他们没有同苏联和共产党友好的必要时，他们就敌视苏联并残暴地屠杀共产党人。至于我，不能说没有出路。正因为同苏联友好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我才招致蒋介石、汪精卫和南京政府方面对我的敌视，若是我不信仰共产主义并放弃同苏联友好和同帝国主义斗争的政策，那么毫无疑问，我有可能同南京政府建立最密切的关系。此外，谁都知道，要想保住督办的职位，最好的办法是对南京政府表示绝对的顺从，并心甘情愿地直接充当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走卒，而间接地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我并不看重督办这个职位，我敢于同苏联友好并反对南京政府，这是因为我相信共产主义，并反对南京政府的叛卖行径。

第四点：蒋介石和汪精卫同苏联和共产党的友好带有暂时的性质并且时间短暂，而我同苏联和共产党友好是始终不渝的，我在新疆三年的工作表明，我实际上是完全站在反帝阵营的立场上。

第五点：蒋介石和冯玉祥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充当军阀，干了卑劣的自私自利的勾当，而我本人从走上督办职位之时起，就绝对忠诚，在中国近 80 年的高级军政官员和高级边疆官员中，完全没有像我这样大公无私的人。我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大公无私的人，是因为我相信共产主义。

我写这些完全不是出于担心您不信任我，而是因为以前我同

您不认识,您也不了解我的为人,因此我才写了这些并请您不要多虑。

9. 我早就想给您写信,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现在王立宪要去莫斯科,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给您捎去这封信,向您说说自己的经历并向您问安。

10. 还给您捎去我近一年里写的几篇文章^①,请您指正。我写的文章不规范(“未作加工”),而且价值不大,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才请您予以指正。

我还给您捎去胡愈之先生写的《盛世才传》^②。我认为,您从中国革命领导人的角度也需要了解我的经历。

此外,我还给您寄出我所读过的所有书籍的目录。

然后,我以我个人和邱毓芳的名义送给您和您的夫人^③一些小礼物,这只是想表达我和邱毓芳及所有在新疆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们对您的敬意。

希望您和您的夫人笑纳。

我写这封信非常匆忙,因此对您多有冒昧,但是这封信是我亲笔写的。

祝您和您的夫人健康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追随者 盛世才
邱毓芳向您问候。

随信附上我的照片。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78、第 23—30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盛世才传》没有找到。

③ 孟庆树。

362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①

(摘要)

1936年3月23日于莫斯科

秘密

王明:[……]^②我们拟作出重大的修改,要使我们的政治方针发生从未有过的转变。如果我们在苏区实行这样的政策,这将影响到全国人民。

第二项措施:应该召开所有公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拥护人民阵线的政党的代表大会。

第三,我们要成立在全国民族救国联合会集中领导下的统一的群众性组织,以便联合一切力量。

第四,这是一个基本的策略问题,这就是我们对国民党,特别是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现在想干什么呢?蒋介石在向我们挑衅。他在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在对共产党人和所有抗日运动拥护者实行恐怖,但是在这样的口号下,似乎共产党人是汉奸,是叛国者,因为他们想制造内乱。这是他的第一种手法。

2. 他声称,他主张同除共产党人以外的所有人建立统一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季米特洛夫同志。

② 发表时删去了王明的发言中带有语法和修辞性质的修改部分(全宗 495,目录 2,卷宗 216,第 164—177 页),这部分已收入他的论文《为建立中国抗日人民阵线而斗争》(见《共产国际》杂志,1936 年莫斯科第 8 期,第 27—31 页)。

战线。

3. 他在起草宪法，宪法里规定所有政党都将取得合法地位，但我们党除外。

4. 蒋介石现在在实行准备对日作战的策略，并据此他控制着自己的军队。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能怎样实行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策略呢？如果我们也进行挑衅，如果我们直接提出打倒南京政府，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这样收效就较小，而采取另一种更迂回性质的政策收效就更大些。蒋介石考虑到中国人民不希望再有战争和再打仗的情绪，希望我们抛弃主要是反对南京而不是反对日本的口号，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应当继续把抗日的口号提到首位，并在这个口号下，要求南京政府履行自己关于统一战线和对日作战的诺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揭露蒋介石的伎俩，否则我们正好中了圈套。

我们是否需要国民党和它的部分军队分裂呢？当然需要。但是我们能公开提出这种分裂的口号吗？不能，我们不能提出这种口号。我们只能这么说：我们同那些反对日本、拥护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军队站在一起，同时我们反对所有进行内战的人。在这样的口号下加以区别对待。

如果不是采取这样的立场，他们就会直接宣称，我们希望他们分裂，国民党部队也就会利用这一点说：共产党人希望我们分裂，而我们希望联合抗日。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共产党和红军是否想让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的主要部分，其中甚至包括国民党很有影响的军政领导人在目前加入人民战线？我认为，我们应当回答：是的，我们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面临一个强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利用一切力量来进行这场斗争，因此我们越能争取更多的国民党组织投入这场斗争，就越容易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所以，

我们的口号是：我们希望同所有国民党军队，其中包括南京军队联合起来，这不是一种手腕，而是我们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真实口号。

但是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能够借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途径。这应当意味着，没有分裂，没有国民党军队的进一步瓦解，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现在在国民党内部已经出现一些派别，或多或少公开地维护我们的政策，例如最近，当日本驻华大使^①同蒋介石进行谈判时，在南京内部就有这样的派别，它们能够解释我们的政策，把我们的政策与日本的政策作对比。这说明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的分裂是可能的，是能够把它们争取到我们方面来的。

现在中国的形势是，人民要求真正的立即联合。这是中国人民的条件，这也是曾经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的西班牙和法国统一战线取得成功的条件。现在有些组织这样说，既然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能够使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民就不能联合起来同外部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呢。

第二，日本最近的事件^②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南京政府现在也比从前更倾向于进行反战斗争，因为它看到了日本军阀的弱点。

第三，就是斯大林同志就苏联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同记者的谈话^③。这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说国民党估计日本人在最近将进攻蒙古，因而日本暂时难以在华中地区进行战斗，那么现在在得知这则消息之后，他们会这样认为：（第一），鬼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不）再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二，中国不知道，如果

① 有吉明。

② 指 1936 年 2 月 26 日东京发生的法西斯军事政变。

③ 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 19 卷，第 105—106 页。

[一方面]在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爆发战争,而另一方面在日本帝国主义和蒙古之间爆发战争,那时苏联将持怎样的立场;他们始终在考虑这个问题,而现在他们得到了明确的答案。这就会唤起中国人民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例如德国事件、莱茵区事件^①,这些事件都会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因为中国非常清楚地记得,每当欧洲出现麻烦事的时候,日本人就会对中国发动进一步的进攻。所以中国面临着新的、更为严峻的进攻华中地区的危险。另一方面,中国有条件进一步开展抗日运动,这是第一。第二,红军会进攻华北。

如果说我们红军至今还不能在实践中表明,它真诚地想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那么在出兵山西^②之后,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报刊上立即出现了对红军的新的评价。《申报》^③就此写道,共产党现在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必须更认真地对待进攻山西这件事,因为红军进攻的那些地区现在都处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之下。红军出兵山西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同情,这种同情是前所未有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同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党派建立统一战线,所以中国的客观条件对建立统一战线是有利的。

最后一个问题:统一战线策略是否有危险?当然有,而且危险很大。如果我们不正确地实行这一政策,我们就可能重犯以前中国第一次革命^④时期所犯过的老错误。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十分严肃,而且还要始终不渝地实行这项政策。

最近是否有可能建立这种包括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在内的抗日统一战线呢?我的回答是,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为什么?因为第

① 指德国军队 1936 年 3 月 7 日破坏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进入莱茵中立区。

② 指红军于 1936 年三四月间出征山西西部。

③ 1872 年至 1949 年在上海出版。

④ 指中国 1925 年至 1927 年革命。

一,就红军同国民党的斗争形势来说,在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红军从前在华中地区,直接威胁着南京政府,而现在我们远离他们,威胁就小些。其次,南京的军队和蒋介石本人都确信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它已经有了惊人的发展。在红军成功地完成了向中国西北的历史性长征以后,我们得到很多情报(我曾亲自同一些国民党人士交谈过),说蒋介石相信红军是不可战胜的。这就在我们的斗争中造成了新的形势。为什么?因为从前蒋介石指望,他首先必须消灭红军,然后进行对日作战。

第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动的新的进攻,同过去的进攻不同,这次进攻威胁到蒋介石在华中地区的主要基地,这样在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内部就会出现进一步的分化和分歧。

昨天我们得到消息说,在中国庆祝新年的时候,有3万国民党军队,其中包括南京军校学员,以庆祝新年的名义在整个南京公开打着反日标语,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

这是来自国民党军队的压力,所有这些条件决定了在我们党和国民党之间要建立统一战线。如果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功,那是由于以下情况造成的。

首先,因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是如此害怕革命和人民,以至他们把群众的每一次发动都看成是对自己的威胁。其次,蒋介石迄今为止尚未抛弃这样一种幻想,他有这样一句口号,先和日本一起消灭共产党人,然后再和共产党人一起消灭日本。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先和日本一起消灭中国共产党人,然后再和苏联共产党人一起消灭日本。他至今还没有放弃这个幻想,所以要分化国民党军队,要坚持这一点,并要加速这一过程,建立统一战线。

现在我来谈谈中国的反战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国我们实行的策略是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斗争。这是我们反对战争的具体策略。所以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不仅

是中国人民的斗争,也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反对战争威胁的斗争,如果在远东爆发日本对苏联的战争,(那么)这就意味着西方战争的开始,因此,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越是强有力地发展,远东战争威胁的阻力也就越大,我们起来保卫苏联也就越重要。

因此我必须指出,迄今为止我们的兄弟党还没有这样来认识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它们认为,我们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带有纯中国的性质,对于它们的斗争没有意义。这是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在国际范围内,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过反对日本进攻中国的运动。我们迄今还没有看到这种运动,所以我认为,今后我们当然要利用一切机会来发展进一步的不仅反对日本法西斯,而且也反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法西斯的斗争,把它们,把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战争贩子、作为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敌人来加以反对。

但是与此同时,我要请求所有兄弟党密切关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问题。季米特洛夫同志曾经声明说,他应以所有党的名义支持中国人民的民族斗争^①,当时你们都表示同意季米特洛夫的声明,并应该去执行。但是,半年过去了,而你们却没有贯彻执行季米特洛夫同志的这个声明。我认为,我们完全有权要求所有兄弟党在共同反对战争方面,要像季米特洛夫同志建议的那样去做:共产国际加上第二国际的所有力量,并正确利用建立广泛反战战线的活动作为争取和平的斗争手段,不仅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反战战线,而且建立全体人民、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反战战线,我们应该本着这种精神开展反战运动。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在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方面和反战方面的

^① 见Г. 季米特洛夫:《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和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摘自1935年8月2日和13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闭幕词,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5年第23—24期,第42页。

工作的基本总结。最后我要说,我们希望所有兄弟党在这场斗争中真正给中国人民以援助。

(鼓掌)

全宗 495, 目录 2, 卷宗 216, 第 178—185 页。

打字稿, 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

363

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 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的对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的 形势和中共的任务的指示文件 草案的补充建议^①

1936年3月27日^②于莫斯科

绝密

关于中国问题的补充建议

1. 为了使中共的组织建设更好地适应现时的局势和党当前的重要任务,特建议如下:

[1]成立[中共]中央局,或者成立中央驻(1)满洲、(2)华北(天津)、(3)华中(上海)、(4)华南(香港)等地的专职特派员系统。这些机构必须非常擅长进行秘密活动。它们应该与[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保持联系。在地方组织中它们应该与一个、最多与两个十分可靠的同志保持联系;

[2]在国统区建立有首创精神的,能够独立在州和地区工作的地方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应由两三名可靠的同志组成,不应设任何部门和复杂的事务性机关。委员会应当竭力避免文牍主义,过

^① 见第359、360号文件。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收到的日期。

多的报表、信件往来和频繁而没有必要的会议，它们应当建立起对基层组织的实际而有效的领导；

[3]在所有基层党组织建立党的组织干部系统。在一些大的党组织中，除党组织负责人外，允许为他设一名助手。

2. 应该认为，争取每个党员的合法地位是党最重要的措施。所有党员，甚至最重要的负责人，都应该有固定的职业和工作，应当为自己营造一种社会环境，通常，在没有公开对自己作出适当的安排之前，在新的地方不要开始做党的负责人工作。

应该认为，在国统区，特别是在上海存在庞大而臃肿的党的机关(在一些时期那里党的机关人员多达 150 人)，这是很不正常的。这不仅加重了党的预算负担，为奸细的活动提供了方便，而且还证明完全不正常和不适当地使用了党的力量。要最大限度地精简党的机关，尽可能使更多的党员取得合法地位，并在合法群众组织的工作中 most 有效地使用他们。

3. 认为现有的所谓担负着特殊任务并设有复杂机构的特科是完全多余的。党委会应该直接领导那些旨在保护秘密机关的行动和措施，党委书记应对研究和选拔党的干部负有个人责任。已经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党的秘密机关的组成人员，应该由经得起审查和考验的同志来充实。

4. 党的组织应当深入仔细地研究 1934 年至 1935 年间大暴露的教训。未经专门和认真的审理，党的组织不应放过任何一起有关引起怀疑和有嫌疑的人的案件。对这类案件的审理往往都是不彻底的。应当要求相应的党的机构对所发生的每一起案件都要作出终结决定。绝对禁止过去所采取的那种把有嫌疑的工作人员从一个党组织调到另一个党组织(常常是不经过预先通知)的做法，更不要遣送到苏联。在可疑者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要对他们进行考察，办法是派他们去做合法的群众工作，在那里他们能给党造成的损失最小，但却较快较容易暴露自己。在把不受欢迎的和

可疑的分子开除出党时，务必把有关他们犯罪活动的全部事实作出广泛的通告，告诫人们他们有可能向其他党组织和群众组织渗透。

5. 由于实行人民阵线的策略和加强招募新党员入党的活动，形形色色的偶然同路人和异己分子钻入党内的危险增大了。这就需要格外警惕和建立党与任何其他政治组织和同路人团体之间的明确界限。中共中央应当制定接收新党员的专门细则，例如规定接纳退出其他政党和政治团体的人入党的条件，以及恢复从前被开除出党人员党籍的准则。

要承认对于那些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规定一定的预备期是适宜的，在预备期内必须从政治和道德上对入党者进行培训，使他们了解党的纲领性文献和党的章程、党员的基本义务、遵守保密基本规定的极端必要性，同时通过公开的群众工作对他们进行考察。

6. 中国共产党应该特别注意干部提拔问题。这个问题不应带有偶然性，而应该是有步骤的、循序渐进的和逐步的。党的上级机关的领导人应当定期检查每次提拔是否合适，同时应同弄虚作假行为，同某个党组织夸大不实的工作报告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这些虚假的报告常常成为把那些后来发现是党的敌人的人调动和提拔到更加负责工作岗位上去的根据。

7. 为了保护好党的干部，要做到使每个党员都有一份专门的履历以防被捕，他本人应该熟记这份履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接受审讯时都不能弄错，同时还要准备相应的证人，提供与履历材料相吻合的证词。对于党的积极分子，最好让党委书记了解他们的这些情况，以便一旦某个积极分子被捕时，书记可以组织必要的营救。

在红军撤走之后，由于没有很好地组织党的干部转入地下，党的不少宝贵干部在原苏区牺牲了。要保证为那些在苏区工作的党员可能转入地下做好周密而细心的准备工作。

特别几点

1. 委托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部：

(1)精心准备并广泛开展一次纪念中共成立十五周年(1936年7月)的群众运动。在此日期之前出版一套中共党史论文集、烈士以及党和红军著名领导人的传记^①，出《共产国际》^②和《国际新闻》^③专刊，中文报纸(《救国时报》)^④出专号，同时保证为国际共产党报刊提供相关的资料。

(2)准备和开展抗议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共产党人实行野蛮恐怖的国际运动。准备就惨无人道地对待中国政治犯和未经审讯就拷打和杀害中国革命者的事实向法英两国议会提出质询。在可能的情况下，应组织派遣国际代表团去检查在中国监狱中囚犯所受到的待遇。同时鉴于多数中国革命者是在国际租界或法租界(租借地)遭到逮捕，而后被引渡给中国当局的，应当对这种做法提出强烈抗议。

2. 为了改进在欧洲和美洲各国华侨中的工作，允许组织两次代表会议(一次在欧洲，一次在美洲)。在这两次会议上应该讨论以下问题：(1)抗日救国问题；(2)在华侨中成立互助团体问题。法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⑤的殖民地委员会应当积极参加这两次会议的筹备和举行工作。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47，第 47—51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见第 73 页注⑩，74 页③、④、⑨。

② 指《共产国际》杂志(见第 74 页注⑨)。

③ 见第 73 页注⑨。

④ 见第 63 页注③。

⑤ 关于西欧代表会议见第 155 页注①。关于旅美华侨代表会议举行情况的资料没有找到。

364

王明和康生关于抗日统一战线 问题的书面报告

1936年4月16日于莫斯科

绝密

近期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资料和计划

一、资料

根据我们在香港的工作人员^①的最近通报^②，以及前不久抵达莫斯科的著名记者吴玉才(即胡愈之，1933年入党，是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人)的汇报^③，还有同陈铭枢(19路军代表，今年4月13日来到这里)和他的秘书(他们两位都是共产党员，是党专门派去做19路军工作的)的谈话^④，可以得出结论，最近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动，就是说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方面，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由于东京发生军事暴乱^⑤和日本进一步进攻中国的威胁在日益增长，以及斯大林同志同戈瓦尔德关于在日本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时苏联将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的

① 何人不详。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谈话记录没有找到

⑤ 见第180页注②。

谈话^①(尤其是苏蒙关于互助^②和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打击日本部队的备忘录的公布)^③,还由于德国撕毁洛迦诺公约^④而加剧的欧洲局势的复杂化,以及西班牙和法国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胜利,另一方面,由于要求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和停止内战的民众反日斗争的日益高涨,蒋介石集团与其反对派之间的斗争的尖锐化,以及中国红军公开打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向山西和绥远边境地区的进攻,特别是由于中共的新政策在民众中和军队中逐渐深入人心,不仅民众,而且中国军队的许多高级军事指挥人员和将领都开始寻求在国内同红军和共产党联合和在对外政策上同苏联联合的自救道路。我^⑤举出以下具体实例:

1. 关于原满洲军队,即张学良军队

根据以下事实可以判断在这些军队中反日情绪是多么强烈:

(1)王以哲军的一位换穿士兵服装的团长^⑥在陕北被红军俘虏。红军对他一无所知,但是在红军隆重地接待俘虏以后,这位军官自己从被俘士兵中站出来说:“我不是士兵,而是团长。是否枪毙我你们自己决定,但是让我说几句话。”在得到允许后,他说:“从前我不知道什么是红军,而现在我知道了,它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军队。让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收复满洲吧。我们之间没有必要打仗。如果你们不枪毙我,就放我回去,我就号召所有的东北军同你们联合起来抗日。”红军把他放了。他先来到自己的师长面前说,他拥护红军的三个口号,即反日,反蒋,联合苏联。师长对他

① 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19卷,第105—106页。

② 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19卷,第136—137页。

③ 显然,这里指的是1936年2月抗击日本军队向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渗透的企图。

④ 指1925年关于德国西部边界的性质及仲裁的洛迦诺公约,1936年3月7日德国单方面撕毁了洛迦诺公约,并派军队进入莱茵河非军事区。

⑤ 原文如此。

⑥ 高福源。

说,这个问题太大了,让他去找军长谈谈。当这位团长把所有这一切都告诉军长王以哲时,军长回答他说:“我无力做所有的事,但是我现在能做一件事——就是真正停止军事行动。”王以哲派他去见张学良。张学良接见了,并对他说:“我赞成抗日,但我没有能力同蒋介石作斗争,而同苏联联合的问题,应该由南京政府外交部决定。”在所有这一切之后,有六个师长^①提出辞职,以表示反对内战,并要求同红军缔结对日作战的统一战线。

(2)现在围绕这六个师长,以及围绕一批年轻军官正在进行紧张的拥护抗日统一战线的运动。由杜重远(著名的抗日活动家,后来根据日本的要求把他逮捕,他成了民族英雄,逮捕他的理由是他写了一篇有辱日本天皇的文章;他的立场同我党非常接近)推荐的我们的记者吴[玉才]不止一次地亲自会见张学良军队的三位著名代表,并同他们就与共产党和红军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交谈。今天,张学良的这些军队还服从蒋介石,因为他们怕失去供给(蒋介石每月拨给他们70万中国元)。

2. 关于广西派

由于南京军队要占领广西的威胁日益增大(蒋介石现在制定了所谓的国防计划,按此计划他只保卫以下五省不受日本侵犯: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和广西。因此,蒋介石在自己军队中开展了一场关于为对日作战就必须占领广东和广西的运动。在此基础上,蒋介石和所谓西南集团之间本来就很尖锐的斗争更加激化)和财政困难,李宗仁和白崇禧将军曾不止一次派代表去香港找我们党的工作人员,就与红军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和同苏联和中共联合抗日的问题进行谈判^②。现在在广东和广西人士中间,在胡汉民的领导下正在加紧准备同蒋介石作斗争。虽然今天他们不只是想抗

① 何人不详。

② 见第373号文件。

日,而且更想反蒋,但是他们的反蒋的口号,不能不成为反对南京政府卖国的口号,因此他们的斗争在客观上不能不促进群众的抗日斗争并有利于红军同蒋介石的斗争^①。

3. 关于阎锡山

阎(锡山)现在处境最为艰难。日本人和宋哲元从北面威胁着他,蒋介石军队从东面,而红军从西南、南面和西北面威胁着他,阎(锡山)不止一次派代表找我们在上海的同志,特别是找吴(玉才)同志,建议与中国红军和苏联缔结抗日统一战线。阎(锡山)现在走投无路:要么像宋哲元那样向日本投降,要么让蒋介石军队把他赶出山西,要么同红军一起反对蒋介石和日本,因为他知道,红军今天不可能占领他的中心城市。

4. 关于杨虎城

杨(虎城)面临着被蒋介石军队从陕西赶走的直接威胁,从未积极进行反对红军的斗争。此外,他和中国红军之间经常进行单独的联系和谈判,他希望和红军以及其他军队,首先是张学良的军队一起参加抗日统一战线。

有一次在太原的会议上^②,杨虎城和阎锡山一起提出了建立西北四省,即山西、陕西、甘肃和绥远,还包括中国红军力量在内的抗日同盟的想法。但是张学良不同意,结果事情无果而终。

5. 关于 19 路军集团

这个集团现在已经没有真正的军事力量,但是由于它在上海进行过反日战争而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1933 年至 1934 年福建事变^③后,这个集团同中共保持着政治接触,它去年年底还成立了

① 1936 年 7 月,蒋介石和西南集团首领之间的矛盾演变成公开冲突,1936 年秋首领们通过和平途径得以解决。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一开始表示支持西南集团的行动。

② 有关会议的资料没有找到。

③ 指 1933 年 11 月至 1934 年 1 月间 19 路军在福建的反蒋行动。

所谓的中华民族救国同盟^①。它作为唯一的政治军事派别比所有其他派别都更早和更公开地表示希望并准备同红军和中共缔结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现在来到这里的它的代表陈铭枢向我们提出了三个具体问题^②：

[1]对重建 19 路军的支持问题。19 路军指挥员，首先是蒋光鼐、蔡廷锴和翁照垣，现在要开始在收罗人民军的战斗力量的基础上在福建组建抗日军队。

[2]一旦中国爆发抗日作战行动苏联的援助问题。陈[铭枢]转交给我们一封有 11 位原黄埔军校学员、南京军队的军长和师长签名的信^③，在信中这些指挥官提出了三个纲领性口号：(1)为了救国必须对日作战；(2)为了加强抗日战线必须同蒋介石作斗争；(3)为了保证抗日战争的真正胜利必须联合苏联。此外，这些指挥官在信中还表示拥护同中国红军和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据陈[铭枢]说，这些指挥官在对日作战行动爆发之前，不需要苏联方面的援助，但是他们要求陈[铭枢]同苏联进行谈判，要苏联在他们对日作战开始后给予援助。

这封信引起了我们和他的共产党员秘书^④的怀疑，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指挥官给予他如此大的信任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但是，与此同时还应当指出的是：(1)他对待这封信极为严肃并说，这是他两年工作的结果；(2)在这些指挥官中，特别是在黄埔军校学员中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骚动和强烈的反日情绪，(例如，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⑤前夕，蒋介石借口准备对日作战在京汉铁路沿线和江苏、浙江动员近 20 个师的兵力，就是迫于几百名指

① 原文如此。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见第 60 页注①)。

② 见第 367 号文件。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何人不详。

⑤ 见第 71 页注③。

挥官的请愿压力进行的。)所以,这种可能性也许不能排除。

(3)19路军集团和中共在国统区宣传鼓动工作方面的合作问题(在香港、上海等地出版报纸和杂志)。

6. 关于马(占山)将军集团

马占山将军不止一次派代表^①到吴(玉才)同志那里建议同苏联和中共缔结统一战线。马(占山)说,在今天“满洲国”的军队中,有很多(约五六万人)是他的军队,他至今还同他们保持着秘密联系,其中包括同“满洲国首都”——长春卫戍司令的联系^②。马(占山)建议苏联允许他到这里来,以便以后潜入“满洲国”去领导他的军队作战。马(占山)表示,他的军队在“满洲国”的作战行动将与保卫苏联的总计划相协调。李杜将军和王德林将军至今仍同中共保持着联系,并准备同我们合作。

7. 关于抗日性质的群众组织

在上海、北平、天津和中国其他大城市,近来在学生、文化工作者、律师、新闻工作者、编辑记者、妇女和部分工人中间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救国会,几乎所有这些组织都表示拥护建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走狗的全国统一战线。

二、计划

1. 近期计划

(1)把党的精力集中在争取张学良在甘肃和陕西的12到15万军队上,以便在中国西北省份建立抗日同盟(参加同盟的除了红军外,还应有大约30万军队参加,即张学良的12到15万军队,阎锡山的8到10万军队,杨虎城的3.5到5万军队,傅作义的2万军队)。

(2)党要在红军同桂军、粤军和川军建立统一战线方面开展活动,以便共同同蒋介石作斗争。

① 何人不详。

② 何人不详。

(3)成立一个共同的政治组织,也就是以集体或个人资格参加的所有抗日政党和团体的同盟,以便在统一的政治领导下,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和群众组织,首先是把 19 路军集团、原满洲抗日将领、方振武集团(方至今还在等待我们对他的请求作出具体答复),以及所有著名的抗日人士和群众组织的活动联合起来。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切,那么全国的形势将会完全不同于现在,特别是南京政府军的状况必然会发生有利于抗日斗争的变化。

2. 今天的直接行动计划

(1)必须争取使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阎锡山的军队切实停止在山西和陕西对红军的作战行动。

(2)在我们的江西和福建的游击队同隶属于 19 路军集团的所谓人民军及其他队伍之间缔结统一战线,进行共同的抗日活动。

(3)同 19 路军集团和其他组织在抗日宣传和鼓动方面进行合作。

实施这一计划的必要条件如下:

(1)加强党在国统区的领导工作,改善它同共产国际的联系。

(2)加速同中国红军和中共中央的直接实际联系。

(3)确定红军的行动方向,以保证它有最佳的内外斗争条件。

(4)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相应帮助^①。

(5)加强党对满洲抗日游击队斗争的领导工作,安排好满洲抗日游击队和军队同国内政界人士之间的经常性接触。

王明

康生

全宗 495,目录 75,卷宗 275,第 15—22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下面第 5 点是王明的手迹。

36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会议第 43(A)号记录

(摘录)

1936 年 5 月 19 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2.[371]——王明、康生、戈帕涅尔、切尔诺莫尔季克和米夫关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外国部的建议。

决定:2.(1)批准米夫同志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外国部校长,(2)建议米夫同志与干部部一起不晚于(1936年)5月26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提交关于该部领导成员和教员人选的建议。(3)责成米夫和赖特同志于[1936年]5月26日前就与改组有关的所有物资方面的问题(楼房、办公室、图书馆、科研团体等),向莫斯科文^①同志委员会(见[1936年5月7至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记录])^②提出建议。(4)建议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办公室保证学校在改组期间不中断工作。

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Г.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 目录 18, 卷宗 1088, 第 1—2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M. A. 特里利塞尔。

② 原文如此。在 1936 年 5 月 7 日至 8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记录中没有这一项内容。

366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 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 45(A)号记录

1936 年 5 月 20 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1. (374)——关于为中国干部工作设立顾问问题。

决定:1. ——(1)为安排中共的系统干部工作,特成立一个由三名同志组成的小组(两名顾问和一名助理)。

(2)任命施皮纳(领导人)和克雷莫夫^①同志为中国干部工作顾问。

(表决人:季米特洛夫、皮克、哥特瓦尔德、库西宁、艾尔科里^②、王明、莫斯科文^③)

共产国际总书记:Г. 季米特洛夫

附:[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关于施皮纳和克雷莫夫的建议以及克雷莫夫的简历^④。

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091,第 3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郭绍棠。

② П. 陶里亚蒂。

③ M. A. 特里利塞尔。

④ 附件没有发表(见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091,第 5 页)。

367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为同中共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进行谈判提出的建议

1936年5月20日^①于莫斯科

绝密

为同共产党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进行谈判提出“民族革命同盟”^②的基本原则草案。

一、合作的三个基本原则

1. 抵抗日本侵略

中国的唯一出路是立即成立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组织,为收复失地、为民族独立而斗争。

2. 同共产党合作

在抗日救国统一战线中中共是实际领导者。因此,民族革命同盟应当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最密切的合作,以便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民族力量。

3. 同苏联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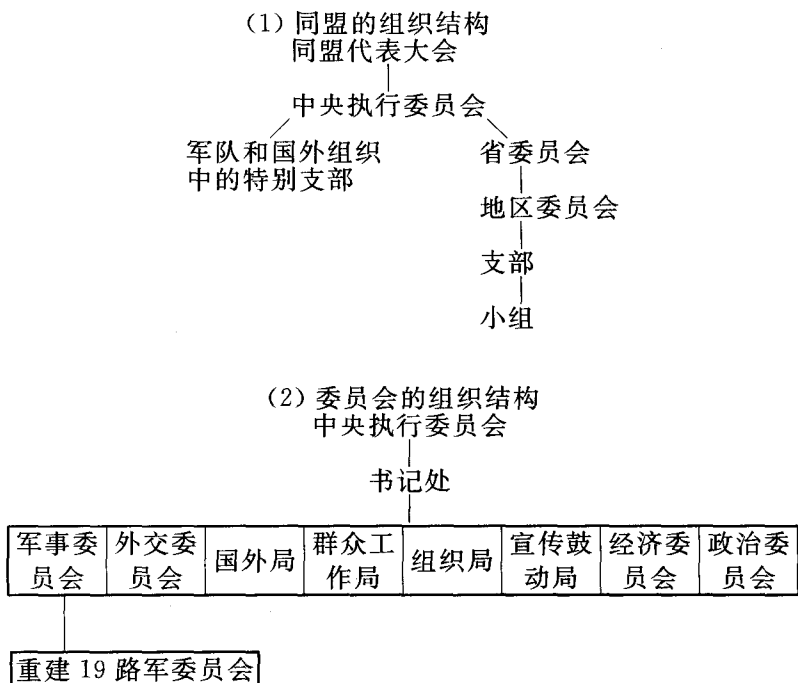
除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外,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并同苏联这个中国的命运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最紧密的联盟。

二、组织方面的合作

1. 同盟内部的组织机构: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收到建议的日期。

② 见第60页注①。



2. 组织合作的形式

(1) 干部的合作和补充：

- ①一定数量的中共代表参加同盟委员会。
- ②吸收 19 路军高级指挥官(于学忠、朱绍乾等)以及最著名的政治和文化人士作为委员会成员。
- ③吸收抗日军事首领、抗日政治和文化人士以及历史上与同盟有关系并在群众中享有广泛影响的人士作为委员会成员。

(2)中央执行委员会同地方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在必要时，召开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席会议。

三、建立统一战线——筹备成立人民战线政府

1. 统一战线组成

(1)所有希望同日本作斗争的政党和派别。

(2)抗日首领。

(3)所有支持抗日战争和学生运动的社会组织及学生联合会的代表。

(4)政治、文化和社会各界最著名的抗日人士。

2. 建立统一战线的方法。

(1)中国共产党、民族革命同盟、东北(满洲)抗日军事组织、学生界代表应当组成发起中心。

(2)在上海、北平、香港、南京和国外建立初步的基地,以便向全中国推广。

(3)六个月内在中国相应的地方召开代表大会,以便为以后成立国防政府奠定组织基础。

四、武装斗争方面的合作

1. 成立革命武装力量:

[1]为了成立抗日联军呼吁重建 19 路军。

[2]民族革命同盟和中国共产党共同组织一支由原 19 路军中、下级指挥人员组成的 1000 人的队伍,并派他们去秘密培训班重新培训干部。(具体办法是:在香港成立所谓的“成年人进修班”。这应当是为期两周的短期培训班。每一期大约 100 人参加。这样经过 5 个月我们就将有 1000 人。在培训班毕业后,应派他们到各地参加作战行动。具体计划可与共产党共同制订。)

[3]行动方面的具体措施:

A. 行动方式:

(1)集中 19 路军余部。

(2)集中民众武装力量。(例如:在福建可以集中大约 1 万名

“人民军”，还有傅柏翠在福建事变^①时领导的农民军队，以及李牧（音）领导的农民组织。我们同盟可以把这些部队联合在 19 路军内。在这一地区还有几万人的红军，他们也可以集合起来并同 19 路军一起转为抗日联军。）

(3)我们同盟派人到红军和其他抗日队伍中参加作战行动。

B. 在各地以 19 路军名义进行活动。

C. 联合 19 路军、红军和其他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

D. 在必要时派下面四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于学忠中的一人去苏区或其他合适的地方，同红军共同成立联军总司令部。

2. 瓦解敌人的武装力量。

(1)派我们的干部到敌军中瓦解敌军。

(2)同在敌军中工作的、具有抗日情绪的军政界人士建立联系，瓦解敌人的力量。

(3)就重建 19 路军、成立抗日军队、与共产党和苏联合作等问题进行公开的谈判，从而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和揭露敌人。

(4)在敌军中工作的中共秘密工作人员和我们同盟在敌军中的秘密工作人员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五、文化组织系统的合作

1. 成立文化方面的民族斗争同盟：

(1)上海、北平、香港和国外，作为初始行动地点。

(2)中共党员、我们同盟盟员和其他进步的文化人士应当加入该同盟。

2. 所有文化组织同中共组织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1)吸收几名共产党员加入“神州国光社”（一个设有出版社的文化组织）管委会。以共产党与我同盟合作为基础在地方上成立该社的分支机构。

^① 见第 192 页注③。

(2)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日报》的编委会^①。

(3)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在菲律宾出版的《先驱日报》的工作^②，以便确定该报的政治目标。

(4)在英国创办由“中国人民之友协会”出版的英文刊物，等等。

3. 同共产党一起在文化中心建立青年教育机构，同时可利用这些机构掩护我们的工作。

六、我们期待来自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帮助

1. 人员帮助

(1)请中共派代表参加我们同盟的委员会。

(2)请中共派代表和我们同盟的代表一起到国内各地做组织和领导工作。

(3)请派人在文化机构做军事训练方面的工作。

2. 物资帮助

(1)请给予 10 万到 15 万中国元的资助，我们必须进行以下最低限度的开支：

用于军事的开支：

(1)培训 1000 名军事干部，按每人约 100 元开支计算，需 10 万中国元。

(2)购买军用物资(2000 支步枪及子弹)需 20 万中国元。

(3)用于秘密军事开支，需 5 万[中国元]。

(4)用于其他军事开支(例如：1000 人按每人 50 中国元计算用于派遣)需 5 万中国元。

用于文化工作的开支：

(1)增加“神州国光社”资本 1 万[中国元]。

① 《大众日报》于 1935 年至 1939 年在香港出版。

② 《先驱日报》于 1933 年至 1936 年在马尼拉出版。

(2)增加《大美晚报》^①资本每月 1000 中国元,总共 10 个月需 1 万中国元。

用于同盟事业性开支(宣传、组织和交际工作)共 3 万中国元。

这样一来,至少需要 35 万中国元;其中 25 万中国元将由同盟自己提供,其余部分请求你们资助。

3. 经济委员会中应有中共代表参加,而所有开支都应经双方同意才能进行。

七、保密问题

同盟方面有权了解秘密的只有以下人员: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和参加同中共谈判的人员,而其他人员未经我方和中共方同意,不得了解任何秘密,无论是全部还是部分。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75,第 38—44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大美晚报》于 1929 年至 1949 年在上海出版。

368

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

1936年5月25日于莫斯科

季米特洛夫同志：

请看一下陈铭枢的书面报告^①，他要就此报告同我们进行谈判。我同康生和施平^②同志正在准备同他协商的方案。

近几天我们将把方案呈送给你^③，以便得到您的指示，尽快地^④结束谈判并着手做实际工作^⑤。此致

敬礼

你的王明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75，第 45 页。

手稿

① 见第 367 号文件。

② 陈云。

③ 原文如此。

④ 原文如此。

⑤ 见第 369 号文件。

36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共代表同陈铭枢谈判的指示

1936年6月19日于莫斯科

机密

就同陈铭枢谈判问题[给]中共代表的指示^①

1. 在同陈铭枢的谈判中,中共代表必须做到:(1)考虑到在陈铭枢集团中有相当多无原则的政客,要加倍小心;(2)不要让陈铭枢集团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们同中共代表进行的谈判是在苏联领导人知道,并得到他们支持或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3)不要把陈铭枢集团看作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救国同盟^②,而应看作是原19路军和前福建政府的拥护者集团;(4)大力提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的威信和中共中央作为一个拥有全权解决与具体实施抗日统一战线策略有关的问题和以共产党名义承担相应义务的唯一机构的声望。

2. 满足陈铭枢集团与中共缔结关于在抗日救国斗争中友好合作和互相帮助的协议的意愿,同时中共代表应当向陈铭枢及其拥护者说明,关于具体合作形式的谈判(特别是关于成立抗日联军问题和关于为克服抗日运动中的分散局面而建立统一的政治组织问题的协商)只能在当地由中共中央特派全权代表进行。中共代

^① 指示原稿是王明、И. А. 米夫、陈云和康生起草的,文件中有Г. 季米特洛夫作的修改和批示:“发出”,还有曼努伊尔斯基和莫斯科文(M. A. 特里利塞尔)的签字。

^② 原文如此。关于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问题,见第60页注^①。

表应请陈铭枢说明,中共中央特派全权代表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和怎样才能同陈铭枢集团的代表见面,来进行相应的谈判。

3. 关于一些具体互助问题,中共代表可以同陈铭枢集团达成口头协议,属于这类问题的有:

[1]关于加强和扩大活动问题以及对下述机关报的资金支持问题:(1)香港的《大众日报》^①;(2)菲律宾的《先驱日报》^②;(3)上海的中文每日晚报《大美晚报》^③;

[2]关于共同努力在香港成立培养民族革命干部学校的问题;

[3]关于中共派干部到上述机关报编辑部工作和帮助在香港组建学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代表应该预先说明,他将把陈铭枢的要求转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则在当地派出相关的同志到学校和出版机关工作。

[4]关于加强法国和英国华侨中的共同活动问题,特别是加强这些国家的中国人民之友协会的问题。

4. 为了安排对上述机关报和培养干部学校的财政支持,从中共的经费中拨出2万美元,这笔款项应当由中共代表提出申请,根据实际需要分批支付。

大宗 495,目录 74,卷宗 281,第 1—3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见第 202 页注①。

② 见第 202 页注②。

③ 见第 203 页注①。

37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 中国共产党成立 15 周年的决定^①

1936 年 6 月 23 日于莫斯科

秘密

1. 中国共产党成立 15 周年的庆祝活动推迟到 8 月 7 日举行,以使该活动不与 8 月 1 日的运动^②重合。

2. 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部筹备并用中文、英文、法文、日文、西班牙文、安南文和乌尔都文在 8 月 1 日前出版:(1)小册子——中共党史概述^③;(2)为中国的解放而牺牲的烈士的传略文集^④;(3)党和红军著名领导人的传略文集(注意保密)^⑤。

3.《共产国际》^⑥和《国际新闻》^⑦编辑部保证在 8 月 1 日后出的最近一期上发表三到四篇纪念中国共产党和专论全民抗日任务的文章^⑧。

4. 责成宣传部组织一些兄弟党(法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美

① 文件标题。决定是由王明和 П. А. 米夫起草的(见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096,第 154 页)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 1936 年 6 月 23 日会议上被批准(见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096,第 1—2 页)。文件上有批注:“最后稿”和“交康生”。

② 指与 8 月 1 日——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红色日有关的运动。

③ 见第 73 页注⑩。

④ 见第 74 页注④。

⑤ 见第 73 页注③。

⑥ 指《共产国际》杂志(见第 74 页注⑨)。

⑦ 指《国际新闻通讯》(见第 73 页注⑨)。

⑧ 见第 74 页注⑩。

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给中国共产党发贺信,并在巴黎、伦敦、马德里、纽约、旧金山、马赛、布拉格等城市举行群众声援集会,并使之与保卫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任务相结合。

5. 责成国际列宁学校校长^①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外国部)校长^②为学生组织一系列报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允许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外国部)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内部展览。

全宗514,目录1,卷宗847,第60页。

打字稿,副本。

① K. И. 基萨诺娃。

② И. А. 米夫。

371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 表决结果整理的第 53(B)号记录

1936 年 6 月 23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1. (405)——关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外国部。

决定:1. ——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中分出外国部作为独立的高等学校,出于保密考虑,表面上将其作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分部——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会。

为东方各国培养干部的共产国际学校,应当以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会名义取得合法地位,并在今后以这个名称和在这个外表掩护下存在。

(1936 年 6 月 23 日飞行表决:季米特洛夫、艾尔科里^①、库西宁、曼努伊尔斯基、莫斯科文^②、王明。见附录。)

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Г. 季米特洛夫

附:飞行表决结果^③

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096,第 182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П. 陶里亚蒂。

② М. А. 特里利塞尔。

③ 附录没有发表(见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096,第 183 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决议草案是由 П. 米夫于 1936 年 6 月 23 日起草的。文件上有 Г. 季米特洛夫的批示:“通过!”飞行表决参加者的签名。

372

陈铭枢给中共中央委员们的信^①

1936年7月1日^②于莫斯科

绝密

中共中央委员同志们：

由于南京政府在1931年9月18日^③实行投降主义政策，有几个省的土地已经丧失，从那时起，我(陈铭枢)和19路军的领导就决心为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战斗。

1932年1月28日^④，一方面是外敌的进攻、国内叛徒的迫害，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沸腾的^⑤抗日浪潮和他们进行斗争的钢铁意志，为19路军进行独立的抗日斗争创造了条件。

根据上海保卫战^⑥的教训，考虑到各民族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同贵党友好的可能性，以及消灭国内卖国贼的极端必要性，在福建发生了革命^⑦。当时我们坚决实行民主自由，成立了民族革命组织，同贵党缔结了作战协议^⑧，起来反对卖国政府，反对国民党独裁。但是福建事变由于不利的地理条件、我们内部准备之不足和缺少所有抗日力量的一致行动，特别是缺少贵我双方之间的密切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季米特洛夫同志”。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1936年7月25日收到文件。

③ 指日本侵占满洲开始。

④ 指上海同日本军队作战开始。

⑤ 原文如此。

⑥ 见第47页注④。

⑦ 指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19路军在福建举行的反蒋起义。

⑧ 指关于停战和抗日反蒋的临时协议。

联系和实际合作而遭到了惨痛的失败。

然而,我们没有退却,也没有气馁。相反,更加加强了我们为拯救祖国使之免于灭亡而斗争的愿望和意志。

我们深信,为此必须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但要进行全民的抗日战争只有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联合一切政党和派别,联合一切社会力量,而不管过去这些政党和派别之间的关系怎样。为此特别需要 we 和贵党之间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我们所面临的任务。

贵党 1935 年 8 月 1 日发表的宣言^①确实是中国民族革命历史上的一个标志。1935 年我们也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②,联合 19 路军的所有忠诚干部、福建事变的主要干部和所有在政治、文化、军事方面与我们有密切联系的人,以及决心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斗的战士。

此外,我们还在 1935 年 8 月初发表一个声明^③,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贵党的宣言。这再一次证明,救国的道路是一致的,我们和贵党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上是休戚与共的朋友。

贵党抗日先遣队领导人方志敏同志的英勇牺牲和你们领导下的贵军在中国东北抗日斗争中的英勇战斗,都证明贵党在抗日救国方面的忠贞不渝。

贵党十分鲜明的立场和行动为最广大的群众所有目共睹,此外,我和我的两三位与贵党同志有接触的亲密同志也尤为钦佩,并受到鼓舞。在福建和香港同潘汉年(伯林)同志的会面和谈判更加使我确信,贵党中央委员同志们领导之正确。

这次我们到这里来同王明和康生同志谈判,了解了贵党实际

① 见第 44 页注②。

② 见第 60 页注①。

③ 见《学生救国运动》,巴黎 1936 年版第 1 卷,第 63—67 页。

的和果敢的新政策,再一次使我们相信贵党对革命事业的坦诚和忠贞。

我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和 19 路军领导的名义阐明我们的意见,并向贵党提出有关我们合作前景的建议。

1. 关于我们的立场。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声明中可以看到我们的立场。我们同盟的基本政治立场是:

(1)为民族独立而斗争。

(2)为建立人民政权而斗争。

我们同盟在现阶段的基本行动纲领是:

(1)集中所有力量进行民族革命;

(2)动员各种武装力量:海军、陆军、空军、人民武装进行收复沦陷区的抗日战争;

(3)推翻南京卖国政权。召开由人民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解决国家事务;

(4)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所有力量赶出中国,没收卖国贼的所有财产;

(5)同所有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和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6)同所有同情、支持中国抗战或在这一战争中严格实行中立政策的国家友好。同所有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和阻挠中国抗战的人敌对。

(7)同贪婪卑鄙的土豪劣绅作斗争,废除所有苛捐杂税;

(8)为言论、出版、集会、宗教信仰的完全自由和人身不可侵犯而斗争;

我在纪念 1935 年 9 月 18 日(侵占满洲的日子^①)四周年的文章中还提出了救国的主要初步措施:

^① 见《学生救国运动》,第 84—90 页。

(1)掌握抗日的主动权并立即抵抗日本；

(2)全国动员起来，武装民众；

(3)没收日货，没收敌人财产；

(4)成立人民政府和人民法庭；

在我们同盟的声明中还提出了统一战线的问题：

“民族革命战争是联合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战争。不管属于哪个党派，所有认为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其他利益的人都应该捐弃前嫌，站在人民的最前线，同日本进行殊死的毫不调和的斗争。只有那时我们才会找到摆脱民族危机的出路和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

我们总的立场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立即停止内战，成立抗日救国政府，开展全民抗战，消灭所有汉奸，联合一切友好国家，保障中国领土完整。”

基于我们上述与形势要求相适应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和鉴于贵党和我们同盟的一致立场，我将旧的行动纲领材料和主要的救国措施修改为八条，作为当前的行动纲领并向我们的同志和中国民众提出。

1. 召开民族救国大会讨论救国措施。

2. 全中国人民都负有救国责任。我们建议召开有各政党和政治派别的代表，以及各社会团体，如商人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学生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军人救国会以及华侨团体、退伍军人团体、自由职业者、作家、律师、医生、教师、宗教界、知名人士和老资格的国务活动家的代表参加的人民救国大会，讨论救国措施。

3. 成立抗日国防政府和组建全国抗日联军。在民族救国大会上选出抗日国防政府来领导实现抗日救国的任务。这意味着各民族力量的代表都肩负着救国事业的责任。

至于抗日联军，在各地都可以组织，例如，在 19 路军部队驻扎

的地方,在附近有红军部队的地方或者在驻有希望参加抗日斗争的政府军的地方,或者在有诸如“商团”、“民团”^①、农民自卫队、“红枪队”等也希望进行抗日斗争的人民武装的地方。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组建抗日联军,在一定的时候可以把全国范围内的所有这些力量联合起来。或者比方说,在成立抗日国防政府的时候,授权抗日联军总司令或者全国联军军事委员会,来领导全国所有抗日武装力量的行动。

3^②. 在各地武装民众,在全国开展自发的抗日斗争。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不应只是正规军队同日本的战争,而且应动员全国民众。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抗日战争的胜利。

不能认为,只有现代武器才是真正的武器,而且剑、别丹式步枪(一种旧式单发军用步枪——译者)、原始武器、猎枪等也是武器,同样可以在对日战争中使用。必须向国家献出所有的财产,投入自己的全部力量,以便调动一切斗争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胜利。我们必须在各地发动抗日战争,使敌人无力应付,使汉奸也无力耍花招,并用武装力量迫使政府不得不^③转到抗日战争方面来。

4. 释放所有政治犯,让爱国运动完全自由

耗尽国力和违背民意是近几年来南京政府最可耻的罪行之一。逮捕和枪杀爱国人士,解散爱国组织,所有这一切把国力推向衰竭。取缔爱国发动和运动自由的权利是违背民意的。

如果我们真的想动员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那么首先就必须释放所有爱国的政治犯,必须为救国运动的完全自由而斗争。

5. 恢复 19 路军,扩大民族抗日战线

19 路军在中国民众中是对日斗争的象征,而 19 路军的战士

① 分别为商人和地主的自卫队。

② 原文如此。

③ 原文如此。

一如既往地眷恋和忠诚于自己的军队。为了联合抗日力量和取得人民大众的同情，我们必须尽力恢复 19 路军，恢复 19 路军的运动就是集合抗日力量的运动，而为了扩大抗日力量就必须同贵党和所有其他抗日力量建立牢固而广泛的统一战线。

6. 鼓励保护民族产业和彻底排斥敌国货物

我们应该支持和鼓励民众特别是学生的抵制日货运动。在我们军政力量控制的地区必须立即没收日货，这不仅是反击敌人经济扩张的办法，而且也是断绝外交关系的手段。与此同时，还必须千方百计争取降低捐税，摆脱捐税负担，鼓励发展民族产业。

7. 实行抗日教育和弘扬民族精神

南京政府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企图扼杀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感情。这个政府不仅禁止所有的抗日活动，而且还清除教科书中的各种抗日的民族情绪。我们应该把学校看作是群众性的抗日宣传者和组织者；所有的教科书，军事课程，课外活动都应该包含民族精神。

在教科书和书籍中必须尽量避免出现日文术语，今后也要禁止使用新的日文术语。我们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提高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

8. 联合国际朋友，保证中国领土完整。

抗日战争不是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战争。应该寻找友好国家，必须利用保障和平的国际组织。相反，苏联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我们必须与它缔结同盟。此外，同英国、美国、法国和其他在远东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的国家也要建立正常的关系，至少不要采取同他们敌对的立场。至于那些被压迫民族，它们的命运和我们类似，要同它们建立最紧密的友好关系。国际联盟和九国条约^①也要为我们所利用。

^① 指在九国华盛顿会议(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上签订的条约。

三、^①我们对贵党的看法

1. 我们认为,贵党是中国目前唯一一个最伟大和最巩固的政党。国民党不仅在其活动中叛变了革命,背叛了中华民族,而且在组织方面也混乱不堪。我们早就预见到,国民党将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障碍,因此在福建革命时期,我们就坚决声明退出国民党。国内现有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同贵党相比。贵党不仅有始终一贯的原则,巩固的组织和符合形势要求的正确政策,而且还有英勇的武装力量,它不但能够击溃蒋介石的六次“围剿”^②,而且能够完成伟大的西征^③,克服途中的艰难险阻——无数的崇山峻岭和荒无人烟的地区。这种英雄主义、顽强奋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令我们无限钦佩,对我们而言,你们的武装力量无疑是抗日民族解放武装斗争中的一支主要的伟大力量。

2. 我们认为,贵党的新政策是走向中国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在武装抗日和建立国内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一步都不能迈得太左,因为这将意味着空谈,也一步不能迈得太右,因为这将是卖国。

贵党1935年8月1日的声明与我们同盟的纲领精神完全一致,特别是关于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什么名称并不重要)。所提的十条行动纲领^④也都符合当前形势的具体要求。我们保证竭尽全力来加以实现。

王明同志在其《抗日救国的政策》小册子中提出了“工作转变”、“经济和土地政策”、“商业和工业政策”、“劳动”、“政治制度”、

① 原文如此。

②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

③ 指红军主力从东部向中国西北部的撤退。

④ 指1935年《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国防政府十点政策。

“对外政策”等问题^①，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合作的基点。

3. 我们真的理解和尊重贵党的诚意。国民党说贵党政策没有诚意的诬蔑，由于我们三年的友谊，已被彻底戳穿。例如，在关于福建革命的问题上，在共产国际的报告^②中，在北部地区的宣言^③中，贵党都坚定地承认了错误，这就是对朋友的诚恳态度。

当贵党提出某种艰巨任务的时候，你们都不惜任何牺牲和任何代价地去实现它。但同时，如果你们发现自己政策中的错误，你们也坚决不惜任何牺牲和代价去加以纠正。所有这些都让人相信贵党在实现自己新政策中的坚定和真诚。贵党对自己政策和对群众的忠诚和真挚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一点是贵党精神在中国革命中最可贵的体现。

4. 我们提出以下几个合作的基本点：

(1) 在政治方面。首先，我们应该召开人民代表救国大会。在国民党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时，可以利用这个会议，通过民众要求改变国民大会的组织和选举制度来为真正的救国大会奠定基础，把国民大会变成真正的救国大会，同时揭露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的阴谋。其次，积极筹备成立国防政府。再次，在共产党执政的地区和在我們执政的地区，应当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即地方统一战线政府。

(2) 在军事方面。首先，在红军控制的地区和我们军队控制的地区，我们可以相互邀请参加彼此的作战行动和组建抗日联军。其次，我们应当在反动军队中共同进行工作，使这些军队转到抗日

① 指王明的文章《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而斗争和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5年版第33—34期，第7—25页。

② 指王明1935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5年版第26期，第26—49页。

③ 可能是指1936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抗日救国的呼吁书》，载《一二·九运动》，北京1987年版，第36—61页。

军队方面来。再次,在培养军队干部方面,我们应当合作,例如,派遣学员到红军军事学校去学习,你们也可以派人到我们合法的军校来学习;需要的话可以成立特别班。

(3)在群众运动方面。在既没有我们的组织也没有你们的组织的地方,我们可以为工人、农民、商人、士兵、学生、妇女等组织救国会。在那些有你们组建的或者我们组建的群众组织的地区,它们应该像救国会一样取得合法地位。我们可以参加彼此的这些组织。为了隐蔽以不公开人士的政治面貌参加^①,但现有组织本身不能改变。此外,在这些主要组织的基础上可以组建临时的辅助组织。

(4)在文化方面。首先,我们可以组织民族文化同盟来统一文化运动。其次,我们同盟组建的所有文化组织(香港的《大众日报》^②,上海的亚洲民族荣誉会^③等),都需要资金和干部方面的援助。另一方面我们也将尽可能地给予你们的文化组织以财政和干部方面的援助。再次,如有必要我们可以共同组建新的文化机构。

(5)在组织方面。首先,我们希望得到贵党的组织经验,所以恳请派你们的代表来参加我们同盟上层机关的工作,并欢迎以个人身份加入我们同盟。其次,我们应当掩护彼此的组织。例如,在我们有合法权力的地方,我们将为贵党的组织、工作和人员的安全提供掩护。

(6)在我们统治地区内对贵党的态度:我们是在中国革命道路上最亲密的朋友,所以在我们地区也像在你们的地区一样,我们将像保护自己的组织、运动和干部一样保护你们的组织、运动和干部。具体地可以大致提出以下几点:

1. 如果需要,贵党党员可以公开或者秘密地(视情况而定)参加我们的政府。

① 原文如此。

② 见第 202 页注①。

③ 指的是“神州国光社”(见第 367 号文件)。

2. 军事合作采取抗日联军或其他形式。
3. 贵党的组织也像统一战线内其他政党的组织一样享有合法地位。
4. 在群众运动中进行合作。
5. 贵党党员、民众和所有支持抗日救国运动的各政党和派别的成员都享有充分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和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

总之，我们深深地感到，如果不立即组织军事抵抗，中国的继续生存就不可能。这场战争只有在动员全中国人民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和贵党有一致的见解，有同样艰苦战斗的历史，有光荣的相互合作的过去。在今后抗日救国的道路上我们应该建立更加紧密的友好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我们所面临的民族解放的伟大任务。

我（〔陈〕铭枢）不谙理论，缺乏经验，但是我唯一能引以为傲的就是我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我不吝惜自己的生命，要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不搞阴谋和欺骗，我要忠实地同我的忠诚的、始终不渝的同志们一起在需要我们的地方，沿着贵党同志的足迹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而进行斗争。

我衷心地希望，你们这些拥有丰富经验并掌握彻底理论的同志们，给我们以领导^①和指示，这也是你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应尽的义务。

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签字：陈铭枢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75，第 46—59。

打字稿，副本。

① 原文如此。

373

潘汉年给王明的信^①

1936年7月1日^②于香港

绝密

伯林同志^③的密码信

陈济棠已经同意同我们的项英和张鼎丞部队缔结协议(这两支部队驻扎在江西和福建——王明注)。已经派人去找他们^④,但没有把握会找到,因为他们的驻地不详,而且也没有他们认识和信任的人^⑤。很希望唐古^⑥同志立即来中国,否则就可能错过时机。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都希望同我进行谈判,但是眼下未必能达成具体的协议,因为他们都希望弄清楚有关苏联援助的可能性问题。

南京和西南之间的战争是否爆发,这首先取决于蒋介石。如果蒋介石发动进攻,那么西南集团就将被迫自卫。我们应该利用这次事变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并减轻项英和张鼎丞同志部队的困境。

有消息说孔祥熙(南京财政部长——王明注)和宋子文(前南京财政部长——王明注)希望同我们进行谈判,这得到了实际情况的证实。宋(子文)已经派董健吾牧师去苏区,他是穿过张学良军

① 收信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1936年7月19日收到信的。

③ 潘汉年。

④ 何人不知。

⑤ 原文如此。

⑥ 曾山。

队的辖区到苏区去的,但没有结果。

同张学良已经达成协议,我们在他那里已设有代表^①。

冯雪峰同志(一位著名的左翼作家,中共老党员。近几年在苏区工作——王明注)和另一些人已从苏区被派往上海。现在冯雪峰同志同全权代表鲍戈莫洛夫一起派李杜和张学良的代表取道法国去苏联,与他们一起去你们那里的还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②和一个女共产党员^③。30日他们已动身(或将动身)绕过^④香港前去。冯雪峰同志同苏区有联系,可是我还没有可能经过上海和西安府去苏区。但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准备派人去那里。

董健吾牧师派人^⑤带一封信通过朱德去见毛泽东^⑥。该人曾公开活动并被逮捕,在此之前一直关在南京监狱中的一间特别优待的囚室里。

为了谈判,陈立夫和陈果夫积极寻求同我们联系,但是他们没有同邓[文仪]联系(即驻莫斯科的武官——王明注)。

冯[雪峰]同志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机关并派代表到处进行活动,他们已经欠债7000元^⑦。他对新政策的了解还不够系统。我叫他来香港进行私下交谈。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派施平^⑧、唐古和李光^⑨同志到这里来。

为了进行群众工作和同各派谈判,需要有干部。我活动频繁,

① 刘鼎。

② 毛岸青和毛岸英。

③ 杨辰芳(音)。

④ 原文如此。应为:途经。

⑤ 何人不详。

⑥ 原文如此。在王明的翻译手稿上为:见毛泽东和朱德(见全宗495,目录74,卷宗280,第8页)。

⑦ 外汇名称不详。

⑧ 陈云。

⑨ 滕代远。

只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

到处都非常需要钱,特别是联络工作需要钱。为数众多的各地信使和各地代表来来往往,旅费需要很多,发电报也很贵。从前与您一起确定的预算不够。冯雪峰同志非常需要钱。

请立即按我离开时给你留的地址给我电汇 4000 美元。请先寄 2000 美元,待您收到我确认收到第一次 2000 美元之后,再寄另 2000 美元。

邹韬奋的《生活》日报^①(邹是共产党员,以前是《新生活》杂志^②编辑,该杂志在上海被南京当局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查禁——王明注)可以从香港迁到上海,该报的计划和所有活动可以完全由我们来领导。这个团体要比民族救国同盟集团^③(即 19 路军集团——王明注)好得多。但是他们经费很少。他们请求我们给他们的报纸投入 1 万中国元(约 3000 到 3200 美元)。这是一项很可靠的事业,因为这些人都是很忠实于我们。这家合法的大型日报不应该带有短期的宣传鼓动性质,它应该成为用民族革命斗争精神对群众进行深入和系统教育的报纸。这家报纸有广泛发行的前景。此外,报纸还可以成为他们活动的合法掩护。杜重远(《新生活》杂志原主管,在上海被南京政府按日本人的公开要求逮捕并关在上海监狱,因此他成了很有名的民族英雄,他是一个非常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人——王明注)、章乃器(浙江工业银行副经理,贫苦家庭出身,著名的新闻记者和抗日活动家,中共党员——王明注)和邹韬奋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80,第 13—15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指《生活日报》,1936 年六七月间在香港出版。

② 指《新生》周刊,1935 年 2 月到 6 月在上海出版。

③ 文件原文如此。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见第 60 页注释①)。

374

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①

1936年7月初^②于莫斯科

绝密

致斯大林同志

自中国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和福建后中断的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已由共产国际无线电台恢复。

经过(一些监控电报)检验，现在可以认为，同中共中央的无线电联系已稳定地建立起来。

现将我们上个月收到的中共中央的以下主要电报转给您。

“致王明——第一号电报，首先向您报告西北地区的局势和我们的打算。

(1)[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已于去年冬季来到陕西省，并粉碎了张学良和蒋介石的进攻，这就使我们党有可能在西北建立革命指挥部的基地。

(2)今年2月红军主力在中国人民红军和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下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省并取得重大胜利。这次行动在政治上起到了在全国面前推动抗日救国的作用。在军事上给了阎锡山将军以沉重的打击，而红军本身也得到扩充。由于蒋介石派出10个师

① 文件已发表，见亚历山大·达林和F.I. 菲尔索夫编：《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1934—1943）》，选自苏联档案馆的书信》，第96—100页。

② 日期是根据内容标明的。

增援阎锡山,并给(军事要塞)造成威胁,所有主力部队又渡过[黄]河向西撤退。

(3)现在红军主力打算在甘肃省北部、宁夏(省)东部和陕西省西北部建立根据地,并在第一阶段已经取得成绩。

(4)在陕西和甘肃苏区驻有红军,由三部分红军组成:1. 中央苏区红军;2. 由鄂豫皖苏区撤出的红军;3. 陕甘红军,总数 2.5 万人。这块苏区土地辽阔,北到万里长城,东到黄河边,南临渭河,西到塔(音)河附近,还包括以下县城:延川、安塞、怀南(音)^①、清……^②宁条梁、环县,这些县城均在我们控制之下。这一地区多山、贫瘠、人烟稀少。这个地区大约……50 万人口。群众斗志昂扬。此外,在甘肃北部、宁夏西部和三边(即陕西西北部的靖边、安边和定边县——王明注)^③还建立了新的苏区。

(5)张国焘同志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由于红军中的军阀作风以及政治和军事战略上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去年下半年拒绝接受我党中央的政治和组织领导,推行自己的打通西康省(藩人^④少数民族区)的计划,并成立了我党的第二中央。但是在今年 1 月,张国焘同志开始改变自己的立场,同意接受我们建立反日和反蒋广泛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声明撤销他成立的第二中央。今年 5 月,由于当地歉收,红四方面军已不能在这里坚持,人数急剧减少,尤其是朱德同志促使其接受建立中国西北国防政府的方针,现在他们准备北上。如果没有新的障碍,他们有可能在两个月内到达甘肃省南部。但是,张国焘同志在组织上还不承认我党中央,并自称为中央西北局,而我们中央他认为是中央北方局,这表明他把自己置于

① 原文如此,地名不详。

② 此处和下面的删节号是原有的。

③ 原文如此。

④ 藏族部落名称。

与党中央平行的地位。现在我们正在竭力争取在坚持原则政策的基础上同他和解,以便团结成一个整体,争取成立西北国防政府,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更高的阶段。红四方面军以前有4万多人,现在大概总计约有2万人。

(6)红二方面军在贺龙和肖克等同志的领导下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去年12月他们已经撤离湖南省,现已到达金沙江上游,并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两个月内,红二方面军可以到达甘肃南部,约有2万人,在政治上强于红四方面军。

(7)现在驻扎在西北的敌军部队如下: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73个团,张学良军队——65个团,阎锡山军队——69个团,杨虎城军队——21个团,宁夏的三马将军^①——21个团,青海省两马将军^②——约15个团,陕西(地方武装)——10个团以及甘肃(地方武装)——约12个团。总计286个团。蒋介石任讨伐西北红军的总司令,直接率领武装力量的是副总司令张学良,绥靖公署主任:在太原是阎锡山;在西安是杨虎城将军;在兰州是朱绍良将军。省长:陕西是邵力子,甘肃是朱绍良将军。

(8)去年12月,我们在上述所有部队中开展了争取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运动,在东北军中取得了巨大成绩,居第二位的是杨虎城(部队),在其他部队里成绩不大。随着建立上层统一战线,我们在东北军内部非常……我们的负责同志^③已经几次同张学良进行谈判。现在恰好确定了给张学良寄(?)^④钱的问题。在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正在进行准备,以便尽快达到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的目的。现在鉴于两广运动在展开,又出现了宋哲元在华北、

① 马鸿逵和马鸿宾,另一个马不详。

② 马麟和马步芳。

③ 李克农。

④ 原文如此。

刘湘在四川的骚动等,有必要加速在中国西北地区的运动。尽管东北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还有很多弱点,但是我们有 8 万多人的盟军在日益成为越来越有觉悟的军队,其中抗日反蒋、联合苏联和共产党的情绪也越来越高。除了在下层群众和中间阶层中有一些较优秀的干部外,最能有所作为的是陕西省的杨虎城和甘肃省(?)^①的邓宝珊。我们已经开始谈判,已宣布……还有五位马将军同我们有联系,但是……还没有……结果。

在红军和东北红军开始行动后,中国西北的这两个主要因素将在整个西北具有决定性影响,并将为西北国防政府奠定牢固的基础。

(10)^②我们请共产国际就我们这个问题作出指示。我们认为,当前对我们来说最难解决的问题是财政和经济问题。

东北军战士每月的薪饷支出是 200 万元^③,全部靠南京拨款,若是军队发动起来,那么这些拨款就会完全停止。困难就相当大。陕西省……^④靠自我的供给。杨虎城的军队有 3 万多人,供给已经不够了。甘肃省有 600 万人口,税收收入也不够供给 20 万红军和东北军的,在他们加入抗日联军后,必须向七八万红军战士支付和东北军同样数目的薪饷,否则红军就很难扩充。

请您在共产国际了解一下,能否每月给我们 300 万元的援助,并开始在国外华侨和全世界工人当中募捐,我们对此寄予很大希望^⑤。

除财政问题外,军事问题也同样很重要,我们希望得到飞机、重炮、弹药、步枪、高射炮、浮桥……等等。请了解一下,政治局势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缺(9)。

③ 此处和以下货币名称不详。

④ 删节号是原有的。

⑤ 页边上的批注辨认不清。

是否允许给我们提供援助和能提供多大程度的援助,我们期待您的答复。

关于中国西北部为支援广东、广西和华北[运动?]^①的发动,已就……军队发动的日期作出决议。我们预计,在两个月内……根据靠近苏联和在中国西北部铲除蒋介石势力的原则,将会出现军队的普遍发动。

总的说来,第一路红军……在甘肃北部,第2、4路军在甘肃南部,东北军部队将占领兰州和肃清朱绍良部,并控制从兰州通往哈密的道路。鉴于黄河的阻挡,眼下黄河尚未结冻,红军没有办法渡河……

对于中国西北国防政府来说兰州是中心。张(学良)被推选为政府主席和抗日军司令。我们提出……副主席。

(11)现在已经集合了许多政治局委员同志:洛甫^②、周恩来、博古^③、毛泽东、邓发、[林]仲丹^④、凯丰^⑤、直玉(音)^⑥和德华(音)^⑦。书记有四位同志:洛甫、周恩来、博古和毛泽东^⑧。下个月我们将派博古同志作为北方的代表去平津地区,本月初我们已派邓发同志去苏联,12号他已抵达兰州。7月初他可能在新疆哈密市。请注意同他取得联系。现在工作非常多,希望您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中国同志。您派来的林仲丹同志已于去年11月初到达,

① 原文如此。

② 张闻天。

③ 秦邦宪。

④ 林育英。

⑤ 何克全。

⑥ 王稼祥。

⑦ 彭德怀。

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的1936年6月16日电报的引文中说,进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有:洛甫(书记)、恩来、博古、泽东四人。见《张闻天年谱》(1935—1938),北京1997年版,第97页。

闫红彦和罗银^①同志也已抵达。其余七人携带无线电到达了同苏联交界的地区,其中六人被民团士兵杀害,剩下一个人带着电台在安边镇(音)被民团扣押。七大决议已在3月收到^②。王明的讲话^③在5月收到。所有其余问题将另行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6月26日——陕北,瓦窑堡”。

1936年6月30日致王明的电报:“中共中央2月的政治决议^④,完全贯彻了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已着手坚决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抗日反蒋广泛统一战线路线。政治局在后来的多次会议上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通过了具体的政治决议,这样不但团结了我们自身的力量,而且赢得了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所有不想当殖民地奴隶的人的热烈支持和同情,也赢得了抗日武装力量的支持和同情。”

见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报告^⑤。

从上述电报中可以得出三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商量和得到您的指示:

(1)关于中共和中国红军在西北的政治军事计划,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共在建立抗日人民统一战线问题上总的政治方针。

(2)关于向中国红军提供物资援助,以及

① 刘长胜。

② 可能是指共产国际七大关于Г.季米特洛夫1935年8月20日报告所作的决议。见《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5年第23—24期,第144—145页。

③ 指王明1935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见《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5年第25期,第26—49页。

④ 原文如此。显然是指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1936年2月21日《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文件中没有针对蒋介石个人的批评,但提到同卖国贼的斗争。见《张闻天年谱》(1935—1938)第67页。

⑤ 可能指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年12月17日瓦窑堡会议上的报告(见《张闻天年谱》第52—53页)和毛泽东1935年12月27日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7—162页)。

(3)关于中共中央书记处多数成员与其个别成员张国焘之间的分歧。

(季米特洛夫)

附:1.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北方局关于抗日救国的声明^①。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49, 第 8—17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见第 217 页注^③。

375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①

1936年7月23日于莫斯科

秘密

季米特洛夫：我讲几点意见：我们需要根据关于力量状况、党的状况的通报，对中国党的政策、组织、领导、干部、工作方法等作出严肃而有根据的决议^②。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在另一次会议上讨论，越快越好。

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在发展壮大，它已经是一个拥有军队，拥有武装，在其红军带领下完成了英勇的长征的党。这始终鼓舞着我们，令我们钦佩。应该坦率地说：我个人在回来^③后的这两年，对这些事情是怀着某种崇敬的心情。我深受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钦佩、这种热爱的感染。但是我们对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人、我们的中国同志批评不够。

这里需要的是更具批评精神的态度。应该强调指出积极的方面，也要指出缺点和弱点，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克服这些弱点、这些缺点、这些消极方面。

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优秀的、英勇的年轻小伙子，仗打得很漂

① 经过校订的Г·季米特洛夫发言的速记记录已经发表(见《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63—266页)。除对发言稿进行文字加工外，Г·季米特洛夫还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在本次发表稿的注释中对此作出了说明。

② 见第380号文件。

③ 指Г·季米特洛夫于1934年2月从德国返回莫斯科。

亮。但是，不能说在政治方面，在中国如此复杂的形势下，他们已经非常成熟和很有修养。我认为，王明同志就[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①向书记处提出的批评性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既适用于王明同志本人，也适用于我们这里的一些中国同志。这些批评性意见应当在我们这里的中国同志们的发言、文件和文章中有反映。

所提出的建议，我们当然可以基本采纳。这些建议是正确的，但还是需要作一些修改。其中一部分将来要转交给在国内的中国同志们去采纳和审议。

现在在中国的任务不是扩大苏区和扩充红军，而是要寻找一些机会、一些途径、一些合适的口号和合适的方法，争取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联合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

我们的红军作为一个武装的铁拳需要加以保护和加强。我们的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需要加以发展和巩固。但是，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扩大苏区，为了中国的直接苏维埃化，为了在中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现在应该强调，成立中华民族共和国、中华民族议会，通过该议会解决土地问题，就能够在反对外部敌人——日本侵略者的共同纲领基础上把中国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激进的知识分子(而这意味着中国人口和中国人民的90%)联合起来。将来我们同国民党和直接同蒋介石进行谈判时(因为我们打算进行这种谈判)，我就应该对从前提出的以及王明同志在这里阐述的条件作些改变，从政治上加以把握。例如，我们共产党人和我们红军、我们苏区就要表示，愿意在普选基础上为建立统一的民族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而斗争。

在这个斗争过程中，群众性的有组织的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时刻就将到来。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条件下，就会出现我们

① 王明的发言没有做速记记录。

在苏区拥有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那种局面。我们现在应当利用这一点,这种局面是中国革命取得的,应该利用这些条件更好地完成中国革命目前发展阶段的任务。

同志们,如果看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各民族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已经联合起来,已经团结起来^①。在这方面资产阶级为自己捞到了资本。现在蒋介石也想捞到这种资本,他把自己装扮成主张中国统一的人,并打着争取国家统一反对中国分裂的旗号反对苏区。但现在日本人正在进攻,他们占领了满洲、华北,并准备继续向前推进,这对于中国人民团结和联合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对于保障自己的自由和民族独立来说,应该是一个强大推动力。这样一来,这场斗争的发起者就应该是中国共产党,是有自己的红军、自己的队伍作后盾的中国共产党人。其余一切都要服从这一基本任务。

由此可以得出,对南京、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方针是多么不正确。这是以往的残余,可以说耽误了两三年时间。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现在必须向正确方向转变。

蒋介石本人不想建立统一战线,害怕统一战线,但是必须在中国创造这样的局面,在蒋介石的军队中,在国民党中造成这样的运动,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建立这样的抗日统一战线,使蒋介石及南京军队的其他总司令们进一步同意建立共同的抗日统一战线。原来是蒋介石利用了中国革命的民族因素。原来是蒋介石成功地将国家的四分之三组织起来了,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为统一中国、反对各种军阀集团、反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分裂而斗争的斗士。明天他就会在统一全中国反对地方割据的口号下,派军队进攻我们的苏区。必须利用这一点。如果我们共产党人向国民党这个政党、向

^① 下面两句话是季米特洛夫在修改速记记录稿时加进去的。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①提出这样的具体政治建议，我们的总司令部向蒋介石，向南京军队的这位总司令提出这样的具体政治建议，那就对了。我们的同志应当向“中华救国会”^②，向这个协会的组织者发出呼吁。这样，我们的（同志们）就应该作为共同抗日战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那时在斗争和实现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就应该力求实现我们在前面谈到的中华共和国、中华议会。那时，我们的苏区也会向这个议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就能够提出建立苏维埃作为共同的中华共和国的民主机构的问题，并能够继续巩固自己的地位，直到中国劳动人民在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③。

我认为，我们今天应该把我们对中国同志的指示限定在这一点上，而最需要的是等待那些新鲜的、真正的通报，以便更好地了解怎样帮助中国同志。其实很清楚，王明同志对党的批评态度绝不意味着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这种批评态度应该是有利于党的。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可以比对爱沙尼亚党、对拉脱维亚党等的要求更多。中国的事变具有世界意义并将产生世界的后果。

我建议以王明同志的建议为基础委托王明同志和一些中国同志跟我一起校订^④这份简单的决议和指示。至于所有其余问题，必须推迟到新同志们到来之后讨论^⑤。

在为开展中国革命而进行的斗争事业中，现在还存在许多问

① 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② 指以宋庆龄为首的全国各界救国会。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成立。

③ Г. 季米特洛夫在速记记录中删去了下面一段话：必须考虑一下，在中国能否实行历史性的跳跃，过渡到苏维埃化，我们将继续前进吗？——当然不是。必须根据条件和状况，特别是现在中国人民所处的状况行事。

④ 原文用词有误。应为：审订。

⑤ 下面的建议是 Г. 季米特洛夫在修改速记记录稿时加进去的。

题。以华侨问题为例,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或者满洲问题,在那里我们中共中央还不能做什么特别的事情。这里出现很多问题,需要进行专门的讨论。必须看看,往后怎样组织这一事业,怎样具体地对待这一事业,以及在这方面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做什么工作。

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101,第 17—20 页。

打字稿,原件,校对过的速记记录。

37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会议第 60(A)号记录

(摘录)

1936 年 7 月 23 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1. (430)——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抗日人民阵线问题的决议^①。报告人:王明。参加讨论者:皮克、马尔蒂、康生、季米特洛夫^②。

决定:1——采纳王明同志的建议作为基础^③。责成王明同志和中国同志——康生和施平^④以及米夫同志和曼达良同志最后审订这些建议,并呈报季米特洛夫同志批准^⑤。

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 目录 18, 卷宗 1101, 第 7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指中共中央 1935 年 12 月 25 日关于当前局势和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 以及 1936 年 6 月恢复电讯联系后,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见第 374 号文件)。

② Г. 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见第 375 号文件。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陈云。

⑤ 见第 379、380 号文件。

377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①给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

不早于 1936 年 7 月 25 日^②于莫斯科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

转去陈铭枢给中共中央委员们的信^③的简要内容供你们参考。陈铭枢说明了与共产党合作的必要性并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双方观点完全一致,他认为,他的集团和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上是休戚与共的朋友。他提出以下几点作为共同行动的纲领:(1)召开有各政党、政治派别和社会团体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来讨论救国措施;(2)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3)普遍武装民众,在全国开展自发的抗日斗争;(4)释放全部政治犯,爱国运动完全自由;(5)恢复 19 路军,扩大民族抗日战线;(6)鼓励和保护民族产业并彻底排挤敌对国家的商品^④;(7)实施抗日教育和发展民族精神;(8)联合国际朋友,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在实际工作中陈铭枢建议:(1)共同鼓动成立联合政府,在条件允许的地方,着手建立联合政府的地方机关;(2)共同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在培养军事干部方面进行合作,协调附近红军部队和隶属于他的集团的部

① 发件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日期是根据第 372 号文件标明的。

③ 见第 372 号文件。

④ 原文如此。

队的行动,为建立联军奠定基础;(3)利用一切合法的掩护,在所有群众组织中,包括文化团体在内,共同开展工作。陈铭枢请求中共中央派一些共产党员到他的同盟^①上层机关工作。他以自己集团的名义保证要像保护自己的干部和组织一样保护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的干部和组织。他表示相信,只有紧密的合作才能完成伟大的民族解放任务。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81,第 12—13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见第 60 页注^①)。

378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 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 61(A)号记录

(摘录)

1936年7月26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3.(435)——王明同志请求解除他的中南美国家党的领导职务的申请^①。

决定:3.——接受申请。委托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暂时担任中南美国家党的领导职务。

(1936年7月26日表决: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莫斯科文^②、马尔蒂、皮克、王明。)

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季米特洛夫

① 见附录。

② M. A. 特里利塞尔。

[附录]

王明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书记处的报告^①

绝密

致书记处

季米特洛夫同志：

鉴于我承担着繁重的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工作，并应为预期的回[国]做准备，特向书记处提出解除我所担负的拉美国家方面工作的问题。

王明

1936年7月14日

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101，第 51、55 页。

记录为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附录为俄文手稿。

① 文件上有 Г. 季米特洛夫的批示：“满足王明同志的请求。有关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作暂时交给曼努伊尔斯基同志”，还有飞行表决参加者的签字。

379

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①

1936年7月27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们认为需要紧急向我们在这里的中国同志(在同您的最近一次谈话之后^②)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作出一些补充说明和建议^③。

鉴于该文件特别重要,我不想得到您可能提出的意见之前就将其发出去。

恳请您作出指示。

致同志式的敬礼!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75, 第 1 页。

手稿。

① 信上有斯大林的批示：“同意”。文件已发表，见《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1934—1943）选自苏联档案馆的书信》（英文版），第 101 页。

② 谈话日期和内容不详。

③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 1936 年 7 月 27 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草稿，见《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1934—1943）》，选自苏联档案馆的书信》（英文版），第 102—105 页。电报的最后定稿已在 1936 年 8 月 15 日发出，见第 380 号文件。

38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 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①

1936年8月15日于莫斯科

绝密

你们1935年12月25日的决议^②和你们的通电^③已知悉,基本上同意你们所采取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但是我们认为,党和红军的领导必须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和性质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会给中国劳动人民造成致命的后果。

1.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决不是要削弱苏维埃,把红军融化在共同的抗日军队里,把共产党融化在中国某个共同的政治团体里。

在政治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其他组织在保持它们各自政治和组织完全独立的条件下,在共同抗日立场上的协商一致。在军事方面,抗日战线应该是红军和其他武装力量之间就组建抗日联军达成的一致意见,而每一支军队都保留其独立性,并对自己的防区负责,但是在执行共同的军事计划中的任务时,要服从统一的指挥。国防政府应该成为所有加

① 收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文件上有批注:已转发。Г. 季米特洛夫,[19]36年8月15日。文件已发表(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66—269页)。

② 指中共中央1935年12月25日关于当前政治局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98—623页。

③ 见第374号文件。

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政党和组织的真正代表机构。

我们要特别强调指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要求大力加强党和红军。因此,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的决议说:所有希望入党的人都可以被接受入党,不管他们的社会出身如何,党不怕某些追逐名利的分子钻入党的队伍,以及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和团结一致。要有条不紊地做好征集党员的工作,特别是在国统区要加强这项工作,同时必须避免大规模地接收新党员的做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

我们还认为,不加选择地接收学生和其他军队的(旧)军官加入红军队伍,也是错误的做法,因为这有可能破坏它的统一和团结。

我们同意你们的想法: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应该对自己从前的经济政策作出重大修改:停止执行没有必要的没收政策,如停止没收出租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以及停止没收那些积极参加抗日斗争的士兵和军官的土地,允许自由买卖。

但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允许有产阶级的代表参加苏区的政权管理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有可能从内部破坏我们的权力机关。

2. 中国出现的内外形势向党提出的直接的重要任务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保卫中国领土完整和防止中国人民遭受完全的殖民奴役。

因此,中国共产党声明,它主张成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主张在普选基础上召开全国议会和成立全国国防政府这是适宜的,这是在目前条件下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民主力量,抗击日本侵略和保卫自己祖国的最好办法。

中国共产党还可以表示,在成立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条件下,苏区将成为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将参加全国议会并

在自己的地区实行为全国确立的民主制度。

3. 我们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该服从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此外,不能同时顺利地进行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所有军队都是日本的同盟者。为了对日本进行真正的武装抵抗,还必须有蒋介石军队或者其绝大部分的参加。

出于以上这些考虑,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商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方针。尽管蒋介石和国民党迄今为止仍然害怕同任何人达成抗日协议,但这是必要的。

基于这个目的,我们觉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指挥部有必要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进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缔结关于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指挥部应该宣布准备立即派代表团进行这些谈判,或者在苏区接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团。

在谈判期间应该讨论的我们的要求,大致应有以下几点:

(1)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所有武装力量,真正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2)在保持红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独立的情况下,成立共同的司令部和制定共同的抗日军事计划,红军在对日作战中负责一定的防区。

(3)向红军提供相应的基地并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和给养。

(4)释放被囚禁的共产党人和停止迫害国统区的共产党人。

如果蒋介石不顾关于谈判的建议,不顾同他缔结协议的所有努力,继续进行反对红军的军事行动,那么红军就应该同蒋介石的部队进行战斗,不得不进行自卫,同时要继续开展运动和采取具体

的措施,旨在同国民党及其军队达成一致意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我们觉得,你们号召支持西南集团反蒋[介石]行动的声明^①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更正确的做法是坚决反对继续煽动由日本帝国主义者挑起的内讧,集中主要火力对准日本帝国主义者。

4. 我们还建议改变你们提出的“立即对日宣战”的口号。你们的口号应该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战争的侵略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斗争的防御性质。所以提出“日本侵略者从中国滚出去!”的口号,保卫领土完整,保卫民族独立和争取中国人民自由的口号要更好些。

5. 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在他的所有部队中加强我们的阵地,在士兵群众和军官中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特别是在西南(集团)失败后,张学良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我们期待你们代表的到来,以便详细讨论你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并作出全面的答复。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75, 第 5—9 页。

打字稿, 原件。

^① 指 1936 年 6 月 12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广东广西抗日北伐的声明》,这是由于以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将军为首的西南军政集团发动反蒋暴动而通过的。1936 年 6 月 4 日,他们宣布开始“抗日北伐”,到 1936 年 9 月前夕,南京通过与叛军将领谈判才把这场日益迫近的冲突化解(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 1991 年版,第 11 册,第 23—27 页)。

38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中国共产党成立 15周年给中共中央的贺电草稿^①

1936年8月23日于莫斯科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之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谨向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致以热烈的祝贺^②。

十五年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政党，它在国内战争中经受了考验，创立了苏维埃地区和革命武装力量——红军，红军表现出了令人赞叹的英雄主义，敌人的六次讨伐^③也未能将它摧毁。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取得了这些成就，是因为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用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像爱护眼珠一样维护党的团结，不怕以布尔什维主义的方式揭露自己的错误，从这些错误中学习并及时纠正错误，不许任何异己分子来玷污党，同时从自己的军队中清除各种投降分子和阶级敌人的帮凶。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满足于自己这些初步的成就。他们看到在中国领土上横行的日本军阀奴役中国人民的危险在日益增

① 第1页和签字被Г·季米特洛夫勾掉。文件中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部分收入Г·季米特洛夫的文章《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中，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6年第14期，第78—81页。

② 193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日期确定为1921年7月底8月初。

③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几次“围剿”。

长。他们知道,今天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最重要历史任务,就是充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联合所有民主力量和中国人民真正的民族力量,拯救中国,使她免遭瓜分和完全的奴役。

中国共产党为停止国内战争和同国民党和中国所有政治团体及武装力量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达成协议所展开的斗争,以及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作为当前条件下联合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反对它在现阶段的最凶恶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最好办法,并一切都要服从同日本军阀的斗争的主张,在全世界劳动人民当中赢得了极大的同情、赞许和支持。

共产国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定决心,为便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相应地改变自己在苏区的经济政策,同时继续巩固苏维埃,因为苏维埃是目前中国唯一的民主发源地和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可靠支柱。

中国共产党在完成其历史任务,即组织中国人民抗日的事业中,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她必须克服还没有下决心站到抗击侵略保卫祖国立场上来的国民党及其军事领导人的动摇。中国共产党必须动员千百万中国民众投入到斗争中来,他们的口号是“日本侵略者从中国滚出去!”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困难的条件下加强红军,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必须反击自己队伍中的宗派主义分子,因为他们不懂得在当前形势下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道路就是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还要打击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分子,因为他们准备牺牲党和红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它们溶入其他的组织和军队。

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个阴险狡猾的敌人进行斗争,需要全力调动全体中国人民的力量,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中国内部的各种争斗来达到自己的侵略目的,他们竭力分裂中国,分散它的力量。

共产国际坚信,大力加强共产党同工农群众的联系,以他们起码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彻底捍卫者和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彻底斗士身份出现,中国共产党人就能克服所有困难和障碍,实现民族统一战线和同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胜利的斗争。

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斗争和胜利的组织者万岁!

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军阀即中国人民的压迫者和远东新战争的挑拨者的民族统一战线万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81,第 5—7 页。

打字稿,原件。

382

赖安^①关于艾萨克斯的书面报告

1936年9月7日于莫斯科

绝密

哈罗德·艾萨克斯

艾萨克斯是一位比较富有的美国律师的儿子，他曾在法国学习并作为[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的工作人员来到上海。我不确切知道他何时出现在上海，但应该是在1931年，据我所知^②，他当时还不是美国共产党或者法国共产党党员^③。

在上海他开始“向左”转。他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南非记者，这个人的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④。关于这位记者我知道，他是一个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是托洛茨基在上海的密使。我怀疑这位“记者”是英国反侦察机关的密探。（在1933年至1934年间发自上海报告中可能会提到艾萨克斯的这位朋友，在那里可以确定他的姓。）

艾萨克斯和他的这位朋友不遗余力地企图和宋庆龄相识，并建立友好关系。好像艾萨克斯是通过宋庆龄参加《中国论坛》出版社工作的。

作为《中国论坛》的编辑，艾萨克斯这个美国人可以更好地为这家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杂志提供“保护”。他也因此从党那里领

① 报告人是根据第309、310号文件确定的。

② 原文如此。

③ Г. 艾萨克斯曾是美国共产党党员。

④ Ф. 戈拉斯。

到了《中国论坛》出版和印刷的补贴，在美国领事馆那里他以自己的名义办理了《中国论坛》的出版手续。得到党资助的这家印刷所也是作为属于艾萨克斯的美国企业注册登记的。

党还派遣中国同志到编辑部进行合作，并为印刷所提供了工人。

关于艾萨克斯不可靠的最初警告是来自宋庆龄，她曾详细地把她同艾萨克斯的谈话告诉了我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①，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在努力用托洛茨基的思想说服她。

后来，《中国论坛》很少刊登有关苏联的材料，甚至从来不提斯大林的名字，这一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当我们送去一篇关于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文章^②，而那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斯大林同志的报告时，艾萨克斯这个托洛茨基分子完全暴露了自己的面目，他消极怠工，想方设法规避在《中国论坛》上刊登这篇文章。

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坚持要求，我们要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美国共产党内物色一位可靠的同志，由他来接替艾萨克斯的工作，并在美国领事馆面前以印刷所主人的身份出现。驻莫斯科代表^③的征询和从美国派一位同志的事情拖下来了。这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仍资助《中国论坛》，并且超过了原来用于扩建印刷所的数目。而且，当已经知道，艾萨克斯可能是公开的敌人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还介绍其他同志与艾萨克斯认识(我避免与艾萨克斯结识，而他也不认识我这个人)。

当福建 19 路军事变^④发生的时候，艾萨克斯又去了福州，而

① A. 埃韦特。

②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于 1934 年 1 月 26 日到 2 月 10 日在莫斯科举行。

③ 指美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 C. 达西。

④ 见第 192 页注③。

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交给他一笔钱,并同福州 19 路军中党的地下代表联系^①。从福建回来后,艾萨克斯在自己的文章中挑衅性地“暗示”,在江西苏维埃政府和 19 路军司令部之间存在着协议^②。应该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和艾萨克斯持同样的看法,认为需要公开这个协议,尽管这样做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见背道而驰,而且中央断然禁止这样做。这个协议在《中国论坛》上的发表^③给江西苏维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后来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一意孤行,引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了强烈的抗议^④。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037,第 53—54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潘汉年。

② 见第 183 号文件。

③ A. 埃韦特以“中共领导和负责成员”名义同记者的谈话。

④ 见第 211 号文件。1934 年 2 月中国共产党出版机构曾发表专门文章批评 Г. 艾萨克斯和《中国论坛》(见《红旗周报》,上海 1934 年第 64 期,《列宁生活》,上海 1934 年第 34 期)。

383

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①

1936年9月8日于莫斯科

绝密

索契 致斯大林同志

中国红军指挥部报告了中国红军下一步行动的两个方案^②。

按第一个方案,在黄河封冻以后,第一方面军将于1936年12月前占领宁夏地区(距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界400公里);第四方面军将出动占领兰州,然而向肃州(甘肃省西部)推进;第二方面军固守甘肃南部。

中国同志认为,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巩固目前的陕甘苏区,向苏联靠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抵制日本切断苏联和中国之间联系的企图。该方案的完成将取决于苏联方面的援助。

按第二个方案,该方案是在万一不能得到苏联的援助时提出,预计要让所有三个方面军向甘肃、陕西南部 and 四川北部以及河南、湖北西部运动,“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

按中国红军指挥部的意见,鉴于需要离开现在的苏区,不可避免要同南京发生军事冲突,第二个方案是不合适的。这一方案“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明年军阀们将会强化自己的堡垒战术并更加依靠日本,其结果是今后中国红军部队向前推进的困难

① 文件已发表,见《斯大林与卡冈诺维奇书信集(1931—1936)》,莫斯科2001年版,第668—669页。

② 指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和毛泽东1936年8月21日给王明的电报,详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 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206—208页。

将会更大。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红军指挥部认为,第一个方案是主要的,他们请求予以同意并给予武器装备、资金和人员方面的援助,同时他们还指出,财政、粮食和武器装备问题已经极为突出。

我们认为可以这样:

1. 同意中国红军的第一个行动方案,即: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坚决地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因为这样做可能使红军脱离中国的主要区域。

2. 事先确定,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将给予大约 1.5 万到 2 万支步枪,8 门加农炮、10 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外国型号弹药的援助。

武器在 1936 年 12 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并通过著名的乌里茨基外国公司出售^①,同时准备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

请告您的意见^②。

卡冈诺维奇
莫洛托夫

全宗 558,目录 11,卷宗 94,第 68—69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公司名称不详。

② И. В. 斯大林 1936 年 9 月 9 日答复:同意(见全宗 588,目录 11,卷宗 94,第 65 页)。1936 年 9 月 11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和博古,说明同意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地区的计划,同时指出决不允许红军以后向新疆前进,因为这可能使它脱离中国主要地区(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 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 209 页)。

38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格伯特 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

1936年9月29日于莫斯科

关于上海工作(1932—1935)

1932年春天我来到上海。以阿布拉莫夫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首先给我提出的近期任务是,恢复在努伦斯(鲁埃格)同志^①暴露后同中共中央、苏区和朝鲜业已中断的联系,第二任务是建立同日本、菲律宾的联系,如果有可能,还同印度支那和印度建立联系。

我在上海只碰到了安德烈同志^②,他是派来做共青团工作的^③。从他那里我接受了工作并通过波戈列洛夫和伊思美洛夫^④同志与中共取得了联系,之后我首先做了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的工作。我带着介绍信,作为“国际音乐协会”会员,同上海音乐学院和该市最杰出的音乐家们取得了联系,然后,根据他们的建议我承担了一位中国音乐教授^⑤秘书的工作,负责收集古代中国的音乐作品和戏剧作品。同时我还学中文,这使我有可能会扩大认识人的

① Я. 卢德尼克。

② С. 茨维伊奇。

③ 此处及以下均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④ 分别是秦邦宪和张闻天。

⑤ 何人不知。

范围。事情进行得相当顺利。我排演了两部中国舞蹈哑剧。美国报纸采访了我,并介绍了我的活动和几篇文章^①(曾寄给阿布拉莫夫同志)。就在我离开之前,通过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外甥(我曾不收报酬地教他拉小提琴)我应邀加入政府组织的“中国音乐戏剧演进”协会。参加这个组织的除了我之外,只有两个欧洲人:一个是最著名的美国评论家、中国音乐通^②,另一个也是著名作曲家^③。

建立联系

同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代表金同志^④联系上之后,主要的任务是建立同苏区、上海和莫斯科之间的稳定联络。这个任务在我到达后的最初几个月中就完成了。建立了三部无线电台:一个是为上海同苏区联络服务,另一个(电台)是为上海同莫斯科[联络]服务,第三个备用。按照我们制定的线路,这三部电台彼此严格隔绝,我同它们之间的联系通过[中共]中央专门为此指定的几个同志进行,这些同志不参加积极的政治工作。这种联系我在上海工作期间几乎没有间断过,直到第二任书记米茨凯维奇^⑤被捕。此外,还出色地承担了上海——厦门——汕头——江西之间的信使服务。同党代表的会面是在专门为此租用的房子里进行的,在那里安有信号装置,可以长时间提供进门的安全保证。后来,随着新同志的到来,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会面的房间,在这方面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通常,一旦来访者当中某人形迹败露,所有房间就立即被取消。同朝鲜共产党代表也进行了联系。

① 文章没有找到。

② 何人不详。

③ 何人不详。

④ 何人不详。

⑤ 盛忠亮。

新同志按先后顺序到来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指出,按雷利斯基同志的主张,需要同驻上海的军事机构保持联系。我曾反对这样做,但是不得不服从,于是同詹尼(安德烈耶夫)同志建立了联系。这样一来,大约在我到达上海一年以后,先来了一位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美国人哈里^①,而后为了帮助安德烈做青年团工作,又来了一个美国人哈韦。我同安德烈和哈韦的联系就成了向他们提供会面的房子和给他们做共青团工作和给他们发工资支付款项,至于哈里,则给他提供了第一次会面的地点,而他以后的联系是按他的系统由他自己安排的。后来施密特(施皮纳)同志又从哈尔滨派来了哈赞金同志来帮助我,他开了一个理发店作为来这里的中国同志的接头地点。接着还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埃韦特、米尔顿^②做反帝大同盟的工作和菲律宾(共产党)的工作,为帮助我派来了基奥尼格同志,[以及]奥托·布劳恩、弗雷德^③、无线电报务员帕斯卡利^④、红色工会国际的新代表贝克同志、接替离去的哈赞金同志的泽利特利曼同志、译电员迪尔,最后是来上海军事爆破学校的教员(德国人,名字记不得了)。

每个人的鉴定

(1)安德烈同志:是一位出色的认真的同志,党对他的工作是满意的,但是由于共青团组织遭破坏和一些奸细认识他,根据我的请求把他召回去了。(2)哈韦:一开始认真地做工作,[中

① 乔治·克拉克,1932年8月到上海。

② T. 赖安。

③ M. 施特恩。

④ I. 沃尔什。

共]中央对他还满意,但是从埃韦特到来之后他就开始酗酒,成了一个危险分子,根据我的要求被召回。此外,他在共青团的一次暴露后名声扫地。(3)哈赞金:是一位出色的同志,但是他和他的妻子^①不能忍受上海的气候,很快就离开了上海。从哈尔滨派来接替他的是(4)泽利特尔曼同志,这是一个忠于事业的非党同志,但却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他在我这里主要做货币兑换工作。(5)埃韦特同志:他是一个不受任何纪律约束,嗜酒成性而且不承认有任何秘密的人。他既没有威信,也没有取得(中共)中央的信任。(6)米尔顿同志:骄傲自大,粗心大意,党希望摆脱他。埃韦特经常的同路人。基奥尼格同志:一个好同志,但遗憾的是他是一个病人(糖尿病),妨碍他工作。(7)奥托·布劳恩:酒鬼,在秘密工作中是一个危险人物。(8)弗雷德同志:是位认真的同志,但当时犯了很多错误(受埃韦特影响)。(9)无线电报务员帕斯卡利:平庸无能,一年时间也未能同莫斯科联系上。(10)贝克同志: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出色而谨慎的同志,(中共)中央对他非常满意。(11)迪尔同志:是一个为数不多的能够很好地为自己取得合法地位的人(关于她的交往我一无所知。我离开后她是否出了事?)(12)教员:是一个很谨慎的同志,中央对他很不满意。

第二时期的国际联络部机构

1934年初,国际联络部机构连我在内由五个人组成。必须合理分配工作。我只负责同中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代表联系,再就是同译电员迪尔联系,在机构内谁都不知道有她这个人。基奥尼格承担了机构内的所有联系和在日本人来到时同日本同志的联系,但这种情况很少,再就是同我们信使的联系。此外,我还把拍

^① 何人不知。

摄文件的工作交给了他。他以几家德国公司的代办处做掩护。

中国共产党的暴露

我在上海期间发生了中国共产党一些组织的暴露事件,我只说一说最重要的几次。从波戈列洛夫和伊思美洛夫去苏区(由于许多奸细都认识他们,所以他们已不可能继续留在上海)时起,斯拉文^①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我同他保持着联系,直到他本人被捕时为止。在专门指定的房子里同他会面的还有埃韦特和弗雷德。在斯拉文被捕之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共产党党团]书记沃罗夫斯基^②被捕,上海组织的组织书记^③被捕,江苏组织发生了一系列暴露事件。斯拉文被捕情况如下:他同米茨凯维奇和科尔萨科夫同志^④正在同埃韦特开会。前面两个同志先离开,当他们走近斯拉文住所时(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们都住在一起(!)^⑤),看到了表示“不要进入”的信号。他们调头往回跑,想警告斯拉文,但是为时已晚,他已经走了,并且没有注意到信号,一进去就被捕了。很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特科在一个小时之前就已得到了要进行搜索的消息,但由于组织联络不好,未能够及时作出预告。

暴露的原因

原因很多。我认为组织方面的错误和中国一般组织技术机构而特别是联络机构的错误是主要的,中国同志疏忽大意,常常缺乏纪律性,不善于同奸细活动作斗争,而这种活动逐渐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事务秘书)。规划设计联系路线是好的,但不贯彻执行。斯

-
- ① 李竹声。
② 黄平。
③ 周宪臣(音)。
④ 黄文杰。
⑤ 原文如此。

拉文宁愿亲自去会见所有的人,在遭到重大破坏之后也不暂时缩小工作范围。例如,有情报说,在江西省里有 15 个奸细,他不但不停止与该组织的同志会面,而且增加了会面的次数,多数会面都是在他的房间里进行(!)^①。只是在特科预先通报要搜查他的房间并立即变换住所的情况下才拯救了他。这种情况有过三次。

斯拉文被捕后国际联络部采取了什么措施

逮捕事件发生之后,我被召到所谓的“上海局”^②,去那里的除我之外,还有埃韦特、贝克、米尔顿、弗雷德和先前的安德烈。向我提出的问题是:上海局同斯拉文的被捕有没有什么关系。局里得出结论:鉴于这以前的所有被捕事件都发生在上海局成员从来没有与之进行过任何联系的组织 and 人士当中,所以上海局同斯拉文的被捕没有任何关系。尽管上海局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但我还是觉得在上海的任何一位欧洲同志都不要同中国同志会面,上海局服从了这一决定。根据党的坚决要求,我保持了同它的联系。这是必要的,因为[中共]中央把自己的所有经费都交给了我,它不敢自己保管这些钱,此外,保持同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络也需要这样做。很清楚,会面已减少到最低限度,斯拉文所熟悉的工作方法都作了改变(在欧洲人房子里同前来的信使的会面,不是像从前那样在夜里进行,而是在早晨六七点钟等)。同时,我们把大笔款项转寄到苏区去了。

重新任命的[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米茨凯维奇同志不能长期待在这里。被任命后他就打电话给[中共]中央、苏区^③和莫斯科,要求派接替者,借口是他太有名。他还要求派一些同志来,因为干部

① 何人不知。

② 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③ 见第 295 号文件。

已经消耗殆尽。但是无论从莫斯科还是从苏区都没有人来。由于缺少人手,虽然有制订得很好的联络路线和[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职责,但也无法履行。情况一团糟,其不可避免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必然是他被捕,果然他被捕了。通过信使连同电报和信件一起还给莫斯科寄去了对暴露的分析报告和工作前景报告^①。从我这方面来说,我也谈了危急的局势、党中央暂时离开上海的必要性和与此相联系国际联络部机构进行改组的必要性。米茨凯维奇被捕以后,所有三部电台都暴露了。报务员^②不知道米茨凯维奇已经被捕,来到他的住所时也被逮捕(显然,由于缺少人手,米茨凯维奇曾亲自同他会过面)。被捕者立即供出了所有其他电台,电台的位置他是不应该知道的。接着重新组建的组织部的书记暴露了,他从前是河开省^③的书记,在上海并不出名^④,同时暴露的还有同北方各省联系的信使机构。每次暴露时,警察都搜查一些重要文件和没有加密的地址。根据特科的情报,国民党警察局投入所有警力企图搞清楚党同莫斯科的实际联系,这个情况我们也注意到了。我不得不很少同重新任命的[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科尔萨科夫会面,并且只是在需要转交钱款时才会面,而且经常是夜里在空旷的马路上进行,还要预先多次更换出租车和人力车。科尔萨科夫根本没有能力重新安排工作,但是除他之外,没有任何人了。据说他在自己家里被捕了,但是他住在哪里,我们不知道。

机构的瓦解

讲机构的瓦解,我指的是埃韦特和布劳恩对某些侨民所产生

① 见第300号文件。

② 何人不详。

③ 原文如此。可能是河南省。

④ 吕文远。

的致命影响。最初的受害者是哈韦和米尔顿同志。埃韦特经常举办小型宴会,纵酒无度,纪律松弛。他不考虑要求,也不注意为自己营造某种掩护,甚至在自己家里建立重要文件档案。阿格妮丝·史沫特莱,甚至宋[庆龄]夫人常常到他那里去。怎么能应付这种情况呢?我不止一次地就这个问题给莫斯科去过电报(或许在档案馆里还能找到这些电报^①)。莫斯科发来复电^②,但他不予重视。只是当我报告说,从警察局那里弄到的特科名单上,在被监视人当中有埃韦特、米尔顿以及我那位深受米尔顿感染的同事基奥尼格的姓名和地址时,他们才被召回。

新机构

1934年底,我收到一份电报,建议把工作交给新来的威廉^③同志,并在作出最后决定前去中国某地呆上三个月。在复电中我请求允许我立即回家或者到苏区去,因为[中共]中央曾叫我去那里,或者在得到新护照的情况下去日本。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就去了北京^④。只是到1935年4月,才来了一份电报,要求我返回。于是我在5月1日就回去了。

新来的同志威廉一开始就在和白人联系时犯了一个错误。他开了一家有俄罗斯医生^⑤的牙科诊所,并建议所有同事都去那里看牙。在俄罗斯侨民当中都知道,诊所没有收入,只是作为某种掩护。他还同两个当年从苏联逃出来的俄罗斯姑娘联系,打算给他们租用住所,可用作接头的地方。他的行为很不谨慎,和同事们一起散步,常到他们那里去,等等。我认为,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同事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273号文件。

③ B. 弗洛赫。

④ 原文如此。

⑤ 何人不知。

恩斯特都已经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我到莫斯科后，我提出必须立即把他们召回。关于恩斯特我能说的不多。他的缺点是记忆力不好。新机构的其他人我不认识。

我所描述的极为简要。关于1932年至1935年这个时期，也许可以写成一整本书，但也许这在目前并没有意义。

最后我可以这样说，到莫斯科后，有人指控我说，我不顾电报要求，拒绝返回，并认为我对中国（共产）党屡遭破坏负有责任。无论是第一次指责还是第二次指责，都经不起任何批评。迪尔同志用书面形式^①证实（该信保存在伯蒂^②处），唯一一封召回电报是在1935年4月才收到。至于中国的暴露事件，则我没有丝毫权力干涉党的内部事务，或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我只能向莫斯科预报他们的错误，这项工作我做了。

H. 格伯特

全宗 495，目录 23，卷宗 267，第 28—33 页。
手稿。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何人不知。

385

季米特洛夫给王明的电报

不晚于 1936 年 11 月 20 日^①于基斯洛沃茨克

致王明

我认为完全正确的做法是：(1)必须保持领导的团结一致，保持我们的组织系统、我们的指挥人员，不允许蒋介石和国民党干涉红军的内部事务；(2)同意在建立全国抗日战线和着手采取具体对日作战行动的条件下，成立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统一司令部；(3)红军在共同抗日战线的规定地区执行统一司令部的命令；(4)红军保留自己现在的名称，但宣布自己和南京军队一样，是全国救国军的一部分。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目录 73，卷宗 15(1)，第 5—6 页。

手稿影印件。

① 日期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 1936 年 11 月 20 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确定的，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58、81 页，其中重复了该文件的主要论点。

386

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

1936年12月14日于莫斯科

绝密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现将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邓发同志的书面报告^①寄给您，他是派到这里来报告党和红军的状况的。

他差不多是在六个月前从那里动身的，他的信息已相当陈旧了。但是与最近的事变相联系，他的报告还是有价值的。报告表明，中国党中央不顾我们的警告^②，实际上已同张学良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友好关系，邓发本人就是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过来的，他个人去过张学良那里，并认为张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忠实拥护者。虽然我们还没有直接来自[中共]中央的通报，但很难想象张学良在采取冒险行动时没有同他们商量或甚至没有他们的参与。

对于我们党和红军来说，出现了非常困难的局面，我们认为，有必要劝告我们的中国同志采取独立的立场，反对任何内讧，以便和平解决冲突，一切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党派在民主的基础上协商一致和所持共同行动，同时强调党以前在给国民党的公开信中和毛泽东答记者问中^③所持的立场。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380号文件。

③ 指毛泽东1936年7月16日和9月23日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见《为实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莫斯科1937年版，第42—53页。

请告您的意见和指示。

致同志式的敬礼！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94, 第 6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38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6年12月16日于莫斯科

急件

中共中央

答复你们的来电^②，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

1. 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损害中国人民的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2. 既然这次行动已经发生，就应该考虑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冲突：

(1) 通过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

① 文件是由Г·季米特洛夫最后定稿的。电报的简略文本已经发表，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70页。

② 在1936年12月12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电报中，中共中央证实了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逮捕之事。中共中央还报告说，叶剑英和王稼祥已经动身去西安，而周恩来在最近也将去那里。中共中央通报说，打算在西安成立由周恩来、张学良和杨虎城组成的领导机构；任命叶剑英为参谋长主持工作；在西安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红军、东北军和17路军，以及山西省和绥远省军队的基础上组成抗日联军；争取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军队参加进来以便抵抗日本可能发动的进攻；促使林森、孙科、冯玉祥、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等人暂时领导南京政府，阻止亲日派同日本相勾结进攻上海和南京，并为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做准备，最后力求把蒋介石的所有军队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中共中央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批准这些计划，特别是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世界舆论的支持和英国、法国和美国对中国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的行动的赞助，以及苏联对中国的积极援助（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 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298页）。

家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办法改组政府；

(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3)停止实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合作抗击日本侵略；

(4)与同情中国人民反击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实行合作。

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同苏联联合的口号。

请通报国统区的党组织。

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81，第 11 页。

打字稿，原件。

38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给中共中央的信^①

1936年12月23日于莫斯科

致中共中央

根据书记处1936年4月27日^②决定,在国际列宁学校组织讲座培训班,任务是造就具有马列主义思想修养、足够的理论素质和政治坚定性的讲师和宣传干部,以便领导对党的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

为了专业化,根据培训大纲的两个方案将讲座培训班的学员分成两个班:(1)第一班以经济类课程为教学中心;(2)第二班以历史类课程为教学中心。两个班都要重视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列宁主义。培训期限两年。招生工作每年进行。第一批招生工作于1937年2月1日开始。书记处建议你们不晚于2月1日派来6个人参加培训班,要十分重视对学员的挑选。讲座培训班接收的同志要有足够的理论素养,具有党的工作经验、理论工作兴趣、教学能力和坚定的党性。绝对不宜派遣有病和体弱的同志。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全宗495,目录18,卷宗1131,第13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通过王明同志”。信是由C. A. 戈帕涅尔和K. И. 基萨诺娃同志签发的。

② 原文如此。应为:1936年5月7日至8日(见全宗495,目录18,卷宗1085,第4页)。

389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 表决结果整理的第 106(B)号记录

(摘录)

1937 年 1 月 17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2.(562)——米夫同志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研究生班的建议。

决定:2.(1)同意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在研究生班一年级成立一个 21 人的学员班,由中国部的教员和翻译组成,目的是从中培养学校经济、历史和汉学三个系的高水平教员。

(2)规定学期为三年。

(3)批准提出的教学计划(见附录一)^①,历史系的教学大纲补充上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课程。

(4)原则上批准提出的学员名单,责成研究所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商定最后人员组成(见附录二)^②。

(飞行表决:季米特洛夫、艾尔科里^③、弗洛林、库西宁、曼努伊尔斯基、莫斯科文^④、皮克、王明。)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季米特洛夫

① 附录一没有发表(见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155,第 79 页)。

② 附录二没有发表(见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155,第 82 页)。

③ П. 陶里亚蒂。

④ M. A. 特里利塞尔。

全宗 495, 目录 18, 卷宗 1155, 第 75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39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7年1月19日于莫斯科

绝密

我们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特殊意义^②。但是,这种解决可能遭到破坏,这不仅是由于竭力挑起内战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在搞阴谋,而且也是由于你们党采取了错误的步骤。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党以前所采取的争取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办法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不正确的。尽管近来党对自己的政策作出一些修改,但还没有彻底摆脱这种错误方针。特别是[中共]中央在蒋介石被释放后^③发出的指示证明了这一点。党实际上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同蒋介石和南京达成的协议本身被看作是蒋介石和南京的投降。同西安人的合作被当作是反对南京的同盟,而不是同他们采取联合行动反对共同的敌人。所有这一切助长了亲日派的气焰。

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切实停止内战,首先是使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放弃消灭红军的政策,争取同南京采取联合行动反对日

① 文件上有Г·季米特洛夫的签名和修改。文件已发表。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70—272页。

② 见第387号文件。

③ 指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41—142页)。

本侵略者，即使在初期没有正式协议。由此出发，党应该公开宣布和坚决实行这样的方针：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独立，反对日本侵略的措施。

同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军队的合作问题必须服从实现这一主要任务的需要，在这方面要对这些军队施加一切可能的影响。在西安人的地区，不应进行共产党的公开发动；不应对蒋介石在西安作出的承诺发表议论^①；不应提出立即对日宣战的要求；不宜过分强调同苏联结盟的口号。

同时在全国，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必须加强群众运动争取实现全国的统一和平，以反对外来侵略，尤其要要求制止亲日派集团策划的讨伐行动，而一旦讨伐军派出，你们的任务就是自卫，但是你们自己无论如何不应为这种事态转折提供口实。

在任何情况下，尤为重要的是保持共产党和红军的统一，因为这是顺利克服你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的保证。

必须极其认真地注意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他们在西安同在全中国一样，企图用自己的挑衅性活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事业，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仆从。

我们觉得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行为相当可疑。最后，必须取消她以共产党人的名义和似乎他们所信任的人的身份发表演讲

^① 释放蒋介石的秘密条件于1936年12月26日在西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上公布。又见《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1960年版，第231—242页。

的机会^①，必须在报刊上谴责她的所作所为^②。

电报收到后请确认。等候你们关于根据本指示精神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的通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81，第 17—18 页。

打字稿，原件。

-
- ① 指 A. 史沫特莱在西安广播电台用英语和德语发表的讲话。见《一位美国女人，活跃在西安的共产党人》载《密勒氏评论报》，上海 1937 年 1 月 16 日第 79 卷第 7 期，第 231—236 页；又见《帮助中国叛乱的美国女人》，载《纽约时报》，1937 年 1 月 8 日；《中国谴责美国女人》载《纽约时报》，1937 年 1 月 10 日；《中国叛乱中的妥协》载《纽约时报》，1937 年 1 月 17 日。
- ②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 1937 年 1 月 21 日给潘汉年的电报中提到，他们不知道 A. 史沫特莱在西安的错误宣传活动，还提到她来苏区后，将劝她在自己的言论上更加谨慎一些，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北京，1985 年版第 2 卷，第 371 页。

39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会议第 107(B)号记录

(摘录)

1937 年 1 月 20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2. (564)——中国最近的事态和中共的策略。报告人:王明。参加讨论者:季米特洛夫、库西宁、皮克。

决定:2. ——(1)批准季米特洛夫同志宣读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电文见国际联络部密电处存件)。

(2)改变党在苏区的方针,即从苏维埃体制转变为在民主基础上的民族革命政府体制,并为建立全国民主共和国而斗争,这种改变是否合适,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156,第 189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见第 390 号文件。

② 见第 392 号文件。

39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7年1月20日于莫斯科

绝密

鉴于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特别是在日本侵略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变化,你们不认为,在你们的地区从苏维埃体制转变为在民主基础上的人民革命管理体制是适宜和适时的吗?

这首先意味着:(1)将苏维埃政府变为人民革命政府;(2)将红军变为人民革命军;(3)只在中心城市保留苏维埃,并且不是作为政权机构,而是作为群众组织;(4)放弃普遍没收土地的做法。

方针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有利于团结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来保卫中国和建立全国民主共和国的事业?

请你们极其认真地考虑和讨论这个问题,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我们,然后我们这里也可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81, 第 21 页。

打字稿, 原件。

^① 文件由 Г. 季米特洛夫最后审定。电报已发表(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与资料集)》, 第 272 页)。

393

宋庆龄给王明的信

1937年1月26日于上海

致王明同志

亲爱的同志：

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我提出这些情况供您研究，希望您能着眼于业已发生的情况，给我提供关于今后行为方式的建议。

一段时间以前，作为对毛泽东同志请求帮助提供资金的来信^①的答复，我在三个月前给他寄去了一笔款项。此事在这里只有一个人^②知道，他起了联络人作用，通过他我收到了来信和转寄了钱款。

几周前，宋子文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③从西安回来后，想与我见面。他对我说，蒋介石获释有一些明确的条件，这些条件经商定是严格保密的，并且蒋介石在过一段时间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说，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通过西安电台公布了这些条件，而其英译

① 指毛泽东1936年9月18日给宋庆龄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1983年版，第61页；斯图尔特·R·施拉姆编：《毛泽东走上权力之路，革命信件（1912—1949）》，（纽约，伦敦，1999年英文版第5卷，第356—357页）。

② 潘汉年。

③ 指西安事变（见第387,390号文件）。

稿也经史沫特莱^①报道出去了。史沫特莱小姐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并补充说,周恩来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了谈判,等等。宋子文说,我们说好了,所有这些事情要绝对保密。

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他对宋子文说,别指望同这些人合作,“他们没有起码的诚实”等等。这使宋子文极为不安,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协议]保证人的地位。

我自自然为我们的同志们辩护,我说,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应该是杨虎城干的,还说,无论如何史沫特莱不是在为共产党做工作,而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当时宋子文问我:“要是我告诉您,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②,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至于史沫特莱小姐,我想说,她不顾不止一次的指示,继续保持着不好的关系,向他们提供资助,然后就要求党来补偿那些由她提议花费的款项。实际上这里的人认为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她把《[中国]工人通讯》^③的出版者^④、工会书记^⑤、[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⑥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

① 见第271页注①、272页注①。

② 指毛泽东请求共产国际通过宋庆龄转交给中共中央的5万美元。

③ 见第《中国工人通讯》是中共中央的新闻通讯,于1930年至1935年在上海出版。

④ 董维江(音)。

⑤ 指全中华全国总工会总书记饶漱石。

⑥ 何人不详。

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①，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忠实您的 宋庆龄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81，第 34—35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见第 390 号文件。

39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①

1937年1月28日^②于莫斯科

绝密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

莫斯科正在对以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里尼科夫等人为首的反苏托洛茨基总部进行审讯^③，该总部是与8月审讯^④揭露出来的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总部平行活动的。

被告承认，他们的罪恶活动是根据托洛茨基同希特勒副手赫斯的协议进行的。预见到战争提前来临，托洛茨基分子竭力促成苏联失败，恢复资本主义，把最重要的企业交给德国资本家，作出领土方面的让步：将乌克兰给德国，而滨海和阿穆尔边区给日本。同时，托洛茨基分子也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他们答应协助日本侵占中国，而一旦日本同美国发生战争他们还要帮助日本。

① 文件上有Г. 季米特洛夫的签署和修改。

② 文件产生的日期被错误地写成了1936年1月28日。

③ 指1937年1月23日至30日在莫斯科对所谓的“反苏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进行的公开审讯。涉及此案的有以Ю. П. 皮达可夫、Г. Р. 索柯里尼科夫和К. Б. 拉狄克为首的17人。

④ 指1936年8月19日至24日在莫斯科对所谓的“反苏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联合总部”进行公开审讯。涉及此案的有Г. Е. 季诺维耶夫和А. Б. 加米涅夫为首的16人。

他们答应帮助德国人占领多瑙河流域国家和巴尔干。

与此相适应,这些不止一次地发誓忠于党的托洛茨基两面派分子展开了广泛的间谍活动,向德国和日本侦察员转交国家机密和军事机密,组织对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党的政府的其他领袖的暗杀活动,策划颠覆列车,以及在工厂和矿井,而主要是在具有国防意义的重要企业和交通运输中的爆炸和纵火活动。

审讯查明,托洛茨基分子为进行骇人听闻的罪恶活动拥有以右派布哈林、李可夫等人为代表的同谋。

你们应当从这次审讯中吸取严重的教训。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对党的敌人的警惕性;必须仔细和系统地研究和审查干部,揭露一切隐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及其帮凶。你们应当在广大群众中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运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对作为日本侵略者的直接帮凶的中国托洛茨基分子。

必须特别仔细和审慎地对待那些在某个时期参加过托洛茨基组织的人。我们觉得,你们对兰斯基^①和左权过于信任,在左权那里曾经发现地下托洛茨基著作,他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持反党的立场,并同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而你们在不久前任命他担任极其重要的军事职务。在苏区发现托洛茨基著作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甚至在中国苏区也有托洛茨基的代理人。对这一事件你们应该给以特别认真的关注。

根据我们的情报,在阎锡山和杨虎城周围,有很多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冒充共产党人。我们毫不怀疑,他们是按照日本情报机关分配的任务为其工作的。你们必须向阎锡山和杨虎城说明这一点,并同他们一道采取措施制止托洛茨基分子的罪恶活动。

等候你们关于同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的

① 吴亮平。

通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81, 第 22—23 页。

打字稿, 原件

395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 表决结果整理的第 109(A)号记录

(摘录)

1937 年 1 月 29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1. (657)——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建议任命徐杰同志^①为国际列宁学校“И”部主任,免去康生同志^②该部主任职务,另有任用。

决定:1. ——通过建议。(1937 年 1 月 29 日飞行表决:季米特洛夫、艾尔科里^③、弗洛林、库西宁、曼努伊尔斯基、莫斯科文^④、皮克、王明。)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Г.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162,第 1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陈潭秋。

② 在 1933 年 12 月 21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会议上曾被任命为国际列宁学校“И”部主任职务(见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273,第 8 页)。

③ П. 陶里亚蒂。

④ M. A. 特里利塞尔。

39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7年2月5日于莫斯科

绝密

我们觉得,你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②的电报中,最好仅限于声明共产党和红军决心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各种旨在停止内战和团结全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措施,以及共产党和红军准备同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进行协商,以使用民主的方式对苏区政权进行改组,并在承认南京政府为全国政府的基础上调整南京中央政府同这些地区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们建议,暂时不发表关于我们苏区政策作哪些根本改变的具体声明。这个问题需要仔细讨论,并需要所有党派、亲近我们的人士和民众对我们政策的这一急剧转变做好认真的准备。请尽快将你们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步骤告诉我们。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81, 第 24 页。

打字稿, 原件。

① 文件由 Г. 季米特洛夫最后审定。电报已发表, 见《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 第 272—273 页。

② 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已于 1937 年 2 月 10 日发出(见《为实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第 121—122 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1 册, 第 157—158 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在 1937 年 2 月 15 日至 25 日召开的)。

39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
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①

1937年3月2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

(1)很遗憾,从我们方面缓解西路军^②的处境是不可能的。你们讨论一下并从你们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拯救西路军并与红军主力建立联系。为此目的,你们要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进行谈判,看能否从他们方面对马步芳施加压力,如有必要并同他们协商你们的部队和他们的部队作相应调动。

同时我们觉得,你们建议南京政府为了共同的和解对马步芳施加影响,并争取停止那些违背你们意志的军事行动,这也是合适的。

(2)拨出80多万美元供你们支配。转交给你们这笔款项的指令已发出。除这笔钱外,你们还可指望得到与这笔款项数目相当的一笔补充经费。转交款项的技术困难很大,你们方面要尽一切可能使转交简便些。

(3)我们已采取措施加快派遣你们所需要的人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全宗495,目录74,卷宗281,第28页。

打字稿,原件。

① 文件由Г.季米特洛夫最后审定。

② 指中国红军第四方面军西路军。

39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7年3月5日于莫斯科

我们觉得,就国民党三中全会决议^②大致可以作出这样的回应:中共为全体中国人民要求国内和解,以便团结一切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之意志所感动,准备以三中全会提出的条件^③为基础开始进行具体的谈判,调整两党之间的关系和两党在准备和实行联合抵抗外来侵略者方面的合作关系,在中共告国民党全会书^④中已经确定更改红军和苏维埃的名称,服从统一的指挥和服从中央政府。关于三民主义,中共以前也未曾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并且她准备为实现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人民福祉这些原则而奋斗。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中共不止一次地证明自己真诚地希望将中国人民的各个阶层联合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来共同反对外来侵略。为此目的,中共已不止一次地呼吁停止内战,并自动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等。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81, 第 29 页。

打字稿, 原件。

① 文件已发表,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273—274 页。

② 指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见第 282 页注②)。

③ 指 1937 年 2 月 21 日《关于根除红色危险的决议》(见《中国国民党历届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 2 卷,第 433—436 页)。

④ 指中共中央 1937 年 2 月 10 日给全会的电报(见第 282 页注②)。

39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 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1937年3月5日于莫斯科

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防止讨伐红军危险的最重要条件是：

(1) 在国统区开展反对继续进行内战的群众运动。

(2) 加强红军自身的队伍。

(3) 正确处理与张学良和杨虎城军队的关系，以便共同进行防御，并在同国民党合作的基础上，联合一切力量投入抗日斗争。

(4) 我们本着这种精神在南京政府军队中，特别是在驻扎在与我们部队相邻的军队中有效地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要采取果断措施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因为他们竭力企图破坏和平调整中共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挑起一切内部冲突，以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必须仔细审查党的机关、红军等周围的人员，并对可疑分子和挑拨分子采取必要的措施。再次提醒你们必须重新审查甘泽民的问题^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81，第 29—30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以前曾询问过中共中央，是谁在上海推荐甘泽民做党的工作的。

400

王明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①

1937年3月13日于莫斯科

致中央书记处

我们得到消息说,周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谈话时似乎向后
者通报了宋庆龄给红军寄5万美元之事^②。此外,他似乎还对宋
子文和宋美龄说,他们可以直接通过宋庆龄同红军的代表取得
联系。

请核实,周恩来和宋子文是否真的有这样的谈话?

蒋介石和宋子文对我们的同志不顾保密协议,把蒋介石在西
安承认的条件泄露出去非常不满,特别是对史沫特莱把这些消息
播送给英语听众感到不满^③。

我们再次坚决主张你们方面必须公开声明,史沫特莱同中共
或共产国际没有任何关系,使她没有可能以共产党的名义发表演

① 文件上有Г·季米特洛夫的签署。

② 见第276页注②。

③ 见第393号文件,第271页注①,272页注①、②。

讲和同革命组织取得联系^①。

王明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81, 第 31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1937年4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正式声明说, A. 史沫特莱与中国共产党没有组织联系(见《中国共产党说与史沫特莱小姐没有“组织”联系》, 载《中国周刊》, 上海1937年4月10日第80卷第6期, 第259页)。早先, 史沫特莱曾驳斥《中国周刊》的报道, 说她似乎是“前共产党军队的顾问”, 并强调指出, 她从事新闻记者工作, 只试图向外界报道关于中国西北部省份的真实情况(见《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不是以前红色领袖的顾问》, 载《中国周刊》上海1937年4月3日第80卷第5期, 第174页)。

40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7年3月22日于莫斯科

致中共中央

对你们第64号电^②答复如下：我们没有十分准确的情报能够使我们对张国焘问题作出明确的表态。我们不相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③。我们认为，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④以前的错误作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展开讨论。要千方百计避免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时局要求团结党和红军的一切力量来对付敌人，并有必要准备齐心协力地反对无论来自何方的对红军的打击。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请将这一点告知全体政治局委员。

建议今后不要再让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实际上面对已成既成事实的这类问题，这一点从你们要求在一天内作出答复就可以

① 文件上有Г. 季米特洛夫的签署。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西路军，中共中央企图将其失败的责任加在张国焘头上。

④ 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64—168页）。

看出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81, 第 36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40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 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1937年3月28日于莫斯科

[中共]中央书记处

第68号电^①不清楚。请重复一遍,西路军^②还有多少人。为什么徐向前和陈昌浩离开了军队,他们现在在哪里?你们为援救西路军采取了什么具体措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全宗495,目录74,卷宗281,第37页。

手抄稿,原件。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西路军。

403

乌里茨基给季米特洛夫的信

1937年4月3日于莫斯科

绝密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谨向您报告来自上海的可靠消息：

1. 中共代表周恩来在杭州同蒋介石进行了两小时的谈话^①，谈话结果周[恩来]作出以下概括：

(1) 蒋介石知道，要解散中国共产党，使它脱离共产国际并对它实行监督是不可能的；

(2) 考虑到来自国民党元老方面的强烈反对，蒋介石认为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3) 如果中国红军指挥部同意把苏区改名为特区，把中国红军改名为人民革命^②军并编入南京军队，那么蒋介石建议派一位南京的代表作为特区的主席，而且红军有权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成员中指认他们可以接受的人选，因为特区和人民革命军的其余职位将照旧由红军来出任；

(4) 中国红军的编制不得超过三个师，总人数4万；但是中国红军指挥部可以有地方卫队，约1万人；

① 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见是在1937年3月26日举行，谈话内容详见：1935年4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谈过程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78—184页）。

② 原文如此，应为：民族革命。

(5)蒋介石坚持要求今后不再没收土地并将已经没收的土地返还给地主；

(6)关于红军在国民大会的代表权问题和释放政治犯问题，蒋介石未作肯定回答。

2. 周恩来对中国的主要政治派别作出如下评价：

(1)所有抗日派别都拥护同中国共产党和解，但是害怕公开维护自己的纲领；

(2)以南京军队指挥人员为主要支柱的黄埔军系^①要求向中国红军派出自己的代表，出任中国红军副总司令，并带一个政治工作人员小组；

(3)陈氏兄弟^②集团反对中共合法化；

(4)“政学系”^③和其他一些亲日分子，在西安事变^④前积极反对与中共合作，现在表现消极并持观望态度。

3. 用周恩来的话说，中国红军现在控制着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南部的 18 个县，总人口达 80 万。该地区贫困，没有铁路和公路；粮食供应问题十分突出；手工作坊也感到严重不够，所以中国红军的物品供应问题难以解决。经常有红军战士冻坏的事发生。

4. 在谈话结束时，周[恩来]建议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蒋介石对此原则上表示同意。周[恩来]认为，蒋介石在目前不会发动新的内战。

5. 为养活中国红军，蒋介石一次性地拨出 50 万墨西哥元，但迄今尚未同意定期每月按照给南京政府军队规定的标准

① 指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人员，其核心是黄埔军政学校毕业生。

② 指 CC，即中央俱乐部，由陈立夫和陈果夫于 1929 年成立的国民党派系。

③ 以著名的亲日派活动家杨永泰和黄郛为首的政治派别，该派别没有明确的组织机构和政治纲领。

④ 见第 387、390 号文件。

拨款。

乌里茨基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79, 第 39—41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404

瓦尔加关于中国主要发展趋势的报告的基本论点

1937年4月20日于莫斯科

近年来中国发展的基本路线 (代提纲)

近年来在中国,无疑有一个向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转变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在首先受资本主义总危机所制约的极其特殊的形势下进行的。其基本特征可归结如下:

(1)前资本主义的土地关系,地主、高利贷者和国家对农民的惊人剥削,迄今为止基本上仍然存在。

(2)国家的半殖民地性质已经有所减弱,但尚未消除。

(3)转变是在革命力量发展达到很高水平,并存在着红军和苏区的情况下实现的。

(4)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恐惧(这种恐惧因与苏联毗邻而加剧)阻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展,并一次又一次地推动进步的资产阶级力量与反动的地主结成反对劳动农民和工人的联盟。

(5)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恐惧阻碍了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蒋介石政府在日本、盎格鲁撒克逊列强和苏联之间巧妙周旋。它阻碍了反日反帝运动的开展,因为它担心这种运动会酝酿成一场地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将会威胁执政阶级的统治。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制度的资产阶级化过程是在特殊的条

件下发生的：这就是上层对各种群众运动，对资产阶级革命总是感到恐惧，而同那些可能发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势力总要进行斗争^①。由此产生了一个极不寻常的事实，即在中国资产阶级改革尚未完成之前，那里就已经出现了法西斯运动，它得到蒋介石（蓝衣社）^②的支持，国家机构也暴露出鲜明的法西斯特征（只有一个合法的政党^③，禁止组建阶级工会，残酷迫害共产主义运动）。

※ ※ ※

中国资产阶级改革的最重要方面有哪些？

(1) 在中国有中央政府。南京政府的权力大大加强了，今天几乎扩展到整个中国本土（除日本控制的北方地区和苏区外）。

(2) 作为省际间的关税“厘金”^④已经取消；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在关税方面是统一的。

(3) 中国实现了关税自主；代替从前由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的每百抽五的关税，现在根据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规定了关税。

(4) 中国已经确立了统一的货币。如果说从前每一家银行都拥有纸币发行权，那么现在只有三家半国家性质的银行^⑤才有这种权力。所有其他的银行券都将逐渐退出流通。1935年秋天，中国货币已经与白银脱钩，并与英镑和美元确立了稳定的比值。银行的所有白银储备已被国家管制。中国新纸币的汇率（也像在英国那样）是由稳定的储

① 发展与欧洲 17 世纪的所谓“开明的君主制度”具有某些相似的特点，当时的专制君主试图加强资产阶级力量同封建主作斗争，但同时又想避免资产阶级革命。（文件原有注释）。

② 见第 60 页注②。

③ 指国民党。

④ “厘金”是地方当局在省界甚至在县界收取的内部关税。

⑤ 原文如此。实际上 1935 年底纸币的发行权已经交给三家国有银行：中国中华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还把有限的数目交给私营的中国农民银行。详见：《中国年鉴（1936 年）》，上海，1936 年版，第 196 页。

备金来调节的,这种储备金主要靠向国外出售白银得到补充。

(5)中国**迅速修筑了交通线**。1936年正在建设中的新铁路线大约有2500公里;1500公里已在1935年竣工^①。现在中国的铁路建设不仅英国人在进行,而且还有德国人、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在进行。

近年来公路建设迅猛发展。用于汽车运输的公路总里程按整数计,现在已经有10万公里,而1927年只有3万公里。与南京相毗连的8个省将由统一的公路网连在一起^②。

随着空中航线的开辟,这当然大大便于中央政府行使权力。

(6)开始统一军队和建设南京政府的现代化军队。尽管还有各省军队和一些军阀私人军队的大量残留,但是终究有了一支按现代标准武装起来的正规军——蒋介石的军队^③。蒋[介石]得以轻易地镇压了南方军阀(广东、广西)^④的起义,以及张学良军队的起义(众所周知,不久前张将他扣作人质)^⑤。这只能说明他在财政上和军事上比反对派占有优势。

(7)趋向于资产阶级统一国家的一个有意思的征兆,是在全国所有学校实行所谓“官方汉语”义务教育(因为在中国辽阔的领土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汉”语,口语只能在一个地区听得懂,而受过教育的人则用书面语进行说明,汉字的意思相同,但在国内不同地

① “英中联委会”主席关于铁路建设拨款的讲话。(文件原有注释)。J. 伯纳德的讲话没有找到。

② 铁路和公路建设的经济意义现在并不大,因为乡村的贫困极大地限制了国内市场,但是铁路和公路建设具有巨大的战略和行政意义。(文件原有注释)。

③ 《纽约时报》记者加列特·阿本德在他的《中国能活过来吗?》一书中写道,在中国大约有200万“军人”,但是他们当中能算作正规军的只有大约30万人的蒋介石军队和红军;所有其他的军队在对外敌斗争中都不中用(文件注)。实际上,书中讲250万士兵、25万红军战士和同样数量的直接隶属于蒋介石的部队(见加列特·阿本德和安东尼·比林汉姆:《中国能活过来吗?》,纽约1936年版,第218、223页)。

④ 指广东和广西军阀1936年6月初的反蒋发动。

⑤ 见第381、390号文件。

区发音却不相同；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就像在印度一样，用英语进行说明）。现在开始进行全民汉语教育。

统一的行政机构，拥有自主关税主管部门的统一关税区，统一的货币，公路建设，开始建立统一的军队和推广统一的、所有中国人共同使用的语言——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统一进程的最重要的因素。

※ ※ ※

资产阶级改革的致命弱点就在于（根据现有资料可以作出判断），这一改革没有波及土地关系！近年来，以前半封建的土地关系看来基本上没有变化，或者说只有很微小的变化。耕地缺乏、掠夺性的高额租金（达到总收入的一半）、高利贷的盘剥和惊人的苛捐杂税至今依然存在^①。

虽然如此，中国农民的状况近年来还是有些改善。这有以下原因：

(1)随着军阀混战的停止，军阀和他们的军队对农民的公开而

① 除了国家对盐、煤油，有时还对牲畜征收消费税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省和各县的捐税。下面摘自中国《中央日报》的报道片断，说明了江苏省的这种情况（1936年10月24日报道，但对现在来说基本上也适合）：

“各省的特别捐税名目相当简单：教育税、水利税、道路建设税；而各县的附加捐税名目有以下各项：

(1)教育开支，(2)按亩征收土地税用于维持社会，(3)按亩征收土地税用于自治，(4)按亩征收土地税用于建立粮食储备，(5)用于国民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税收，(6)用于改善农业的税收，(7)按亩征收土地税用于公共教育，(8)按亩征收土地税用于补充地方预算，(9)耕种贫瘠土地特别税用于自治，(10)用于国民党的特别税，(11)用于抵偿土地测量开支的税收，(12)农村警察税，(13)河道警察开支，(14)警察开支，(15)生产登记开支，(16)按亩征收用于手工（劳动教养）学校开支的税收，(17)教育特别税，(18)师范学校开支，(19)警卫开支，(20)地区开支，(21)维护堤坝税，(22)乡村政权开支，(23)维持农村秩序开支，(24)社会福利事业开支，(25)与预报水患有关的开支，(26)防止（公共工程、堤坝等）毁损开支，(27)建设水道闸门开支，(28)与全国各省选举有关的开支，(29)出版各省和各县手册的开支。”（文件原有注释）。

《中央日报》是日报，1927年开始在武汉出版，后在上海出版，1929年在南京，1938年在重庆，1949年在台湾出版。

野蛮的抢劫也多少有所收敛。

(2) 税收也不再像从前那样预收 10 年到 30 年。

(3) 随着货币统一和币值稳定,减少了由于某些军阀银行发行并强加给居民的一文不值的银行券的贬值而给居民带来的损失。

这可以作如下归纳:

中央政府试图(效仿开明的君主制度)限制地主和地方政权的勒索,以便自己更多地榨取农民;它企图用农民逐渐的破产来取代不经常的掠夺。

(4) 近年来没有发生重大水灾。中央政府近年来拨出巨资(多达 1 亿元^①)用于整治河道,还动员农民投入这项工作。在这方面国际联盟、饥民救济组织提供了帮助;从庚子赔款^②总额中也拨出一部分用于这项事业,等等。

(5) 近年来中国没有发生歉收。

其结果是耕地面积大大增加^③,收成提高^④,粮食进口急剧减

① 《中国经济杂志和公报》,1937 年 1 月号第 9—10 页。(文件原有注释)。见:吴庭昌(音):《工业重建一年的进步》,载《中国经济杂志和公报》,上海 1937 年 1 月第 20 卷第 1 期,第 9—10 页。

《中国经济杂志和公报》于 1936 年至 1937 年在上海出版。

② 指中国应付给英国和其他列强在 1899 至 1911 年义和团起义中所受损失的赔款。

③ 耕地面积(百万亩),(水稻、高粱、小麦、大豆、棉花等)。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1934 年	1935 年	1936 年
657	665	751	742	737	734

(《收成报告》,1936 年 10 月 15 日)(文件原有注释)。

《收成报告》(农情报告)——月刊,1933 年至 1939 年在南京出版。

④ 收成(百万担)。

	水稻	高粱	黍类	棉花
1931	817	132	129	14.6
1935	871	136	136	14.3
1936	903	150	141	21.1

(《收成报告》,1936 年 10 月 15 日)(文件原有注释)。

少,在几年前粮食进口已达到危险的地步。

归纳起来可以说:剥削农民的制度没有改变,但在这个制度的框架内有了一定的改善。这决不意味着中国的土地问题已经解决,无论从前还是现在不进行土地革命是不可能解决的。

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土地革命(例如像法国革命中发生的那样),无论从前还是现在都不可能进行的。资产阶级本身占有土地,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地主融为一体的,它关心的是对农民的封建剥削的继续存在,它在国民党的框架内同地主结成反对农民的政治联盟。农民要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只能通过在不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人民革命来实现。

当然,还非常软弱的工业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从前,外国商品几乎是免税地(只有价值的5%)进入中国,而且可以不收取任何厘金(在某些省份边界征收的税金)深入到内地省份,而中国商品却必须交纳厘金。现在税金达到30%—50%,而内部税收已取消。其结果是大大提高了中国工业对外国商品的竞争能力,特别是从币值稳定以后。在中国境内开设的外国企业从中得到了主要好处。但是中国资产阶级也从中受益,特别是在中国内陆地区,他们在内地开设了为数众多的工厂,尽管是些小工厂。

日本借助武力在中国北方进行的走私活动明显妨碍了这种发展。每天的报纸都报道这种情况:日本的军阀和舰队使用武力妨碍中国北方海关当局履行自己的职责,武装的朝鲜人(他们作为“日本的臣民”在中国享有特权)护送未交税运人的商品,等等。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的恣意妄为使一部分中国资产阶级(企业家、商人)在自己国内的物质利益受到了直接的损害,这无疑加强了中国的反日运动。

另一方面,日本的走私活动对在华其他列强的利益也构成了

严重威胁,不仅对商人,而且对贷款人也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中国的外债利息主要是用关税收入来保证的^①。

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的改变

近年来中国的外交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十年前,在日本侵占满洲的初期,出现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前景;现在,却出现了英国、美国和法国保护资产阶级中国使之免遭日本损害的统一战线,尽管还不巩固而且充满矛盾。

这一政治变动的原因是:

(1)意识到日本不希望瓜分,而是想独自占领全中国。

(2)意识到不在亚洲大陆建立一个更靠近日本的基地,缺少有战斗力的盟友,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他们两国加在一起都不能进行一场有望胜利的对日战争(从香港、夏威夷群岛和阿拉斯加对日本进行攻击距离都太远)。

有可能成为这样基地的不是我们的远东,就是中国。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与苏联结成反日军事同盟使盎格鲁撒克逊列强的资产阶级政府感到恐惧。这就说明了英国和美国的政策:在军事方面加强蒋介石,同时促进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共发展。显然,由于日本的“单方面行动”和反帝运动的加强,最终和平地瓜分中国已经不可能,在这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宁可要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

① 1936年8月21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公报》刊登了一封在上海的英国商会主席和美国商务部秘书1936年6月1日发给本国政府的电报。他们在电报中指出,由于日本走私造成海关收入不足,使英国和美国贷款利息的支付处于危险的境地。(文件原有注释)。

实际上,这里讲的是1936年6月1日相应由P.科德尔元师和J.豪斯发给本国政府的两份电报(见艾伯特·T.卢:《中国北方有增无减的走私形势》,载《新闻公报》1936年8月21日南京第1卷第11号,第13、14页)。

《新闻公报》,1936年至1937年在南京出版。

的中国,也不要一个处于日本一国统治下的中国^①。

这就是为什么盎格鲁撒克逊列强在近年来始终支持蒋介石致力于在资产阶级基础上把中国统一在自己的统治之下。

支持货币改革(盎格鲁撒克逊银行向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白银储备),提供贷款,进行铁路建设,供应飞机和其他军用物资,等等^②。

英国和美国愿意武装中国对抗日本,以便不使它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实际上蒋介石现在已经拥有一支约有30万人的现代化军队,并在认真准备对日本侵犯华中地区进行军事抵抗,虽然他在尽一切可能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是英国和美国也想防止把反日运动变成普遍的反帝运动,特别是防止把这个运动发展成共产主义运动。

※ ※ ※

正如我们看到的,现在中国的内外政策全面地交织在一起了,其结果是出现了异常复杂的局势,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深思熟虑的、灵活的和大胆的政策。

间接地可以作出判断,现在使广大人民群众焦急不安的是两个问题:

(1)对日本侵略的愤怒。

(2)没有解决的土地问题(不应忘记,中国有80%以上的人口

① 附记:尽管德国和日本之间存在反苏同盟,但根据众所周知的事实判断,在中国没有法西斯国家的合作。相反,德国是日本在中国的最激烈的竞争对手之一。特别是德国军事教练参与组织蒋介石的军队和德国资本(和英国一起)参加中国的铁路建设,都遭到了日本方面的强烈谴责。(文件原有注释)。

② 宏大的英荷防线工程(新加坡——帝汶岛——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特别是当前进行的把香港变成第二个新加坡的改造,都是针对日本的。为对付日本还建设了经过美国的旧金山——夏威夷——中国空中航线、阿拉斯加的荷兰港工程等。(文件原有注释)。

是农民,他们由于现行制度而饱受苦难)。

蒋介石的政策始终是指望让人民相信,似乎由于中国红军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存在,军事抵抗日本的侵略是不可能的。“剿共才能抗日”——这是蒋介石的基本口号,无疑这也是盎格鲁撒克逊列强所赞同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议同中央政府军队联合对日作战,极大地削弱了这一政策,并在国民党阵营内部引起了一定的混乱(蒋介石在西安被逮捕等)。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方针是十分明确的,也是成功的。

另一个应该解决的问题:当前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问题上应该采取什么立场?这方面的长远前景只能是进行土地革命。这一点不能有任何怀疑。目前正在确立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和军事上层建筑是建立在没有变化的半封建土地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必将使劳动农民的状况更加恶化。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是否应当采取等待的立场,以不给建立抗日人民战线制造麻烦?

我认为,这就是现在的主要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与日中关系的发展速度问题密切相关,或者与日本进攻苏联的时机问题密切相关。如果我们这样来看问题,也就是日本和苏联之间的军事冲突,或者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已为期不远,如果它是最近几年的事,那么在土地革命的问题上就可以采取等待的立场!而如果这样来估计形势,即这种冲突有可能长时间处于潜伏状态,那么在土地问题上就应该采取另外一种策略。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会议^①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68, 第 20—32 页。

德文打字稿, 副本。

^① 会议召开地点不详。

405

上海党的工作者给中共驻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

1937年5月14日^①于上海

绝密

上海来信

王明、康生及其他同志：

我^②必须告诉你们，尽管敌人进行骇人听闻的挑衅，尽管客观形势困难重重，我们不但能进行工作，而且还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总的说来这里的工作非常薄弱，原因是：（1）这里的干部多数都迷恋老的历史传统，丧失了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2）在我们的政策发生急剧转折的时期，中共中央对地方同志进行政治领导不够，我特别提请你们注意第二点。

现在多数同志和进步群众都有惊慌失措和悲观失望的情绪。民族改良主义深深植根于广大群众之中，而托洛茨基的走狗们利用当前的局势表现得极为活跃。这对于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极大的危险。

至于总的局势，则是人民群众的反日情绪在日益高涨，他们的民主要求越来越强烈。特别是近来罢工斗争在日益扩大。诚然，

① 日期是根据王明给 II. 米夫的附信注明的（见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037，第 89 页）。

② 何人不知。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党过去工作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好好进行工作,那么这些成就就会被敌人用来扩大他们的成绩并使我们陷入困境。

现在我们在尽一切努力培养那些有能力在群众中独立做工作的同志,同时,我们要求[中共]中央改变上海的状况。你们曾正确地提醒我们要防备阴险的挑衅和多次的破坏,我在回国后,还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但这不是放弃建立和发展新组织的理由。

我在国外的时候,你们对我说过,[中共]中央将很快派人来恢复组织。回国以后,冯[雪峰]告诉我不久将从中国西北来一个人^①,并且谈到已经有一个人从巴黎来了,但至今没有来一个更负责的同志,[我们]也没有一个坚固的组织。

从上个月开始,根据冯[雪峰]的指示,我们在下面组织了一个由四个人组成的核心,作为建立新组织的准备步骤,而在部分可以合法活动的地方,同志们也建立了固定的联系;这两个组织建立后,我们虽然进行了一些工作,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政治组织上的领导。

因此,我们首先要求:[中共]中央必须立即派一位负责同志来建立组织和积极开展工作。

我应该向你们报告下述情况:

(1)现在民族改良主义的思潮大大加强了,这个思潮的中心是《大公报》^②和《国闻》周报^③。它们在“团结建国”的口号下,将问题的重心转移到国内,认为如果国内能够和谐一致,那么日中冲突自然可以消除。实际上这是一种新的改头换面的“安内攘外”理论。

① 何人不详。

② 指1937年至1938年在汉口出版的《大公报》。

③ 《国闻周报》1924年至1937年在天津出版。

这种思潮自西安事变^①以来大大加强了,因为国内在团结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此日本的在华政策表面上表现出了一定的温和^②。

(2)托洛茨基派和极右派联合在一起,表现得极为活跃。在广西,他们与黄旭初、王公度等人结成同盟在群众中宣传同白崇禧作斗争(其中一些人还当上了县长)。在上海,他们利用《时事新报》^③、《文化建设》杂志^④进行所谓“斯大林分子投降”的卑鄙诽谤。在群众组织中(特别是在店员和部分工人中)提出了“打倒国民党!”和其他一些挑拨性口号,批评“民族救国同盟”^⑤上层领导人投降,他们鼓动这些团体重新改组为非法的小组织,以便今后像他们在北平、天津、太原和西安所做的那样,逮捕他们的积极分子。

托派的机关报《斗争》^⑥在继续出版,在第2卷第2期(11月28日)上刊登了《国民党三中全会与斯大林党》一文,文章写道,在三中全会上国民党不可避免地更加表现出它的投降主义叛卖实质,还说共产党的“忏悔”表明它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政党。

还刊登一篇重要文章,标题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是所谓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共产主义同盟^⑦的政治决议)。由所谓的临时委员会2月21日通过。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1. 西安事变和国际关系(这里主要指出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说共产党是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工具)。

① 见 387、390 号文件。

② 原文如此。

③ 1911 年至 1949 年在上海出版。

④ 指《文化建设》杂志,1934 年 10 月至 1937 年 7 月在上海出版。

⑤ 见第 233 页注②。

⑥ 该刊物 1932 年至 1934 年在上海出版。

⑦ 成立于 1935 年 12 月,见: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 1994 年版,第 203—205 页。

2. 中国阶级变动。

3. 斯大林党的罪责：

(1)在同日本作斗争的口号掩盖下，放弃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

(2)农民游击队的危机，即它们的瓦解和失败；

(3)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过早地走向低潮。

4. 建立新党的必要性和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务。

5. 国民大会的纲领和我们斗争的策略(国民大会是民族民主斗争的中心口号^①)。

托派通过《时事新报》所谓《学灯》的副刊公开进行宣传鼓动，该副刊的主编是徐伦山(音)，他得到了郑学稼的帮助。最近还出版了月刊《中国问题》^②杂志，编辑朱启华(音)，对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攻击。

在这方面，我们请求你们通过《国际新闻通讯》^③和《救国时报》^④对各国托派的叛卖行为和危害活动，对他们在中国的可耻行径进行一切可能的揭露，特别要指出我们的政策和他们的政策之间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根本区别。

我还向你们报告一些小消息：

(1)近来我们在上海集合了几个人，办了一份晚报^⑤，已经从4月份开始出版。

(2)上个月我们在南京，从宋[庆龄]团体那里得到为数不多的钱，并成立了一个不大的通报^⑥编辑部，已经开始工作。

① 详见唐宝林：《中国托派史》，第207—209页。

② 刊物名称不详。

③ 见第73页注②。

④ 见第63页注③。

⑤ 晚报名称不详。

⑥ 刊物名称不详。

(3)有7个人已被捕^①,不像会被释放。几天前传说又要抓人,其中也包括我。

(4)我已经同冯[雪峰]见面,但尚未见到潘[汉年]。

今天早晨我得知,我的朋友^②今天中午一点乘船回家。我匆忙地写了这封信,请他转交给你们。《全民[月刊]》杂志^③出版了吗?为什么我们没有收到^④?请寄来,哪怕是过期的也好。此致
敬礼

全宗514,目录1,卷宗1037,第90—94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指1936年12月23日“中华救国联合会”的7名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邹韬奋、史良、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于1937年8月1日获释。

② 何人不详。

③ 见第129页注⑤。

④ 可能是朱立(音)。

406

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①

1937年6月17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到达新疆的一批“游牧人”(393人)通过派去见他们的中共中央委员施平同志^②，坚决要求我们让他们到苏联来学习，使他們有机会受到真正的政治军事训练。

为了到新疆，他们在途中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些“游牧人”希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取得这里的同意后，被派到苏联学习。

据我们现有的情报，这批人是优秀的和经过考验的西路军指战员残部，从中可以真正培养出优秀的干部。在新疆没有进行这种培训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觉得，把“游牧人”留在那里是不适宜的，更何况他们现在无所事事，不可避免他们的队伍有分化的危险。

我们建议：

1. 将这些“游牧人”转到苏联进行学习。
2. 在学习问题安排好以前，暂时安置他们到克里米亚军营。

我们能够接收100到150人去我们的中国分校^③，其余的人

① 文件上有B. M. 莫洛托夫的批示：最好让他们在新疆学习。我们可以给予部分教员和资金方面的帮助，盛[世才]督办也应该给予他们部分帮助。

② 陈云。

③ 指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分校。

将在以后安排到其他学校,当然是在进行相应的仔细挑选之后。

请您作决定并就这个问题作出最后指示。

致同志式的敬礼!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94, 第 21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407

中共中央关于周恩来同蒋介石第二次 谈判情况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书记处的报告^①

1937年6月17日于延安

国际书记处

周[恩来]同志第二次见蒋谈判多日,现返西安,兹将周15日来电所述谈判结果如下:

蒋[介石]在庐山的最后表示如下:

一、两党合作部分:

(1)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介石]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目之干部合组之,蒋[介石]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2)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

(3)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

(4)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之联合。

^① 关于周恩来同蒋介石的前几次谈话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已于1937年4月5日呈报共产国际。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78—184页。另见第403号文件。

二、目前有关部分：

(1) 共党根据以前申明，发表对外宣言。

(2) 政府在上项宣言发表后，即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三个师仍照 12 个团编制，人数可容至 4.5 万人，其编制办法与顾“祝同”商定。三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朱[德]、毛[泽东]两同志须出来做事。编就后部队可移防。

(3) 陕甘宁边区政府，仍由中央方面派正的官长（可由共方推举方面的人），边区自己推举副的，可由林伯渠担任，事情可由边区政府自己办。

(4) 经费，军队照人数编制的一般规定发给。行政经费亦照规定发给。善后费用可由中央另发。

(5) 各边区由共方派人联络，经调查后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

(6) 在狱共党，可由国方开始分批释放。

(7) 国民大会之 240 名指定名额中，可指定共党出席代表，但不以共党名义出席。

(8) 国防会议尚未规定会期，开会时可容共党干部参加。

(9) 对其他各党派不必谈合作，由中央尽量收容。

最近庐山训练班，即拟收容各方人员训练，陕北如有人来受训练亦可。此外并欲拟召集各方人来庐山谈话。

(10) 凡有破坏合作及与共党为难者，由蒋自负责任解决。但为避免国内外恐惧与反对，共党应避名干实，不必力争目前所不能实现之要求。

三、蒋[介石]又告宋子文声明：

(1) 共党目前不要太大，易引起外方恐惧。

(2) 共党应该首先取得全国信用。

(3) 共党不要使蒋[介石]太为难，以便将来发展。

四、我因(二)项组织原则及(三)项编制，与边区政府等问题，

都不能同意。尤其是指挥与人事问题,与蒋争论很久不能解决。经宋子文、宋美龄和张冲往返磋商,仍不能解决。蒋仍坚主设政训处指挥,我只有回来讨论。我并最后声明:不能解决时,要张冲进苏区来谈判。

[中共]中央书记处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65—267页。

408

王稼祥关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中共的任务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提纲^①

1937年7月10日于莫斯科

绝密

报告提纲

《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中共的任务》^②

1. 在过去的半年中(从去年12月的西安事变^③至今)中国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在我们党、中国红军和人民群众为停止内战和联合中国一切力量抗日救国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西安事变的压力、要求停止内战的广泛运动、东北军^④和17路军^⑤与红军的友好相处、南京军队下层指挥员和士兵群众不愿意同红军打仗——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南京和蒋介石至少暂时停止同我们作战。于是国共之间开始了关于建立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谈判。目前由于南京亲日派的主导作用和强烈的反共不妥协态度,在一些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莫斯科文同志(M. A. 特里利塞尔)。

② 注:我(王稼祥)于今年2月离开苏区,所以关于近几个月的形势和党的工作的资料,我是在上海同丘同志(可能是朱立)的谈话中了解到的。当然了解得并不详细和确切。(文件原有注释)。

③ 见第387号、390号文件。

④ 指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

⑤ 指杨虎城指挥的西北军。

主要问题上还没有达成任何具体的结果。但是不应忽视国民党三中全会后^①国民党政策的变化和一些新的因素。我们党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和所取得的成绩、我们在全中国舞台上的活动和政治作用的扩大、反红军战争的停止、国民党内部及其政策上的变化,都意味着中国政治生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期带有过渡性质。中国抗日势力与亲日势力正在进行一场严酷的斗争,正是这场斗争将决定国家今后的命运和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以及南京政府的命运。

2. 作为对我们关于建立统一战线和国共两党联合日本和国内亲日派作斗争的建设的答复,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在三中全会上和会后通过和实行了新的政策。这一新政策的特点是,如果说南京在从前以某种方式公开地实行亲日政策,公开地反对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坚持同红军作战和公开敌视反日群众运动的话,那么现在南京和蒋介石则抓住并打出民族团结和抗日救国的口号。从前南京的口号是“先安内后攘外”,而现在,在这一陈旧的口号破产之后,他们提出了新的口号:“统一国家抵抗外敌入侵”。这还不是接受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和我们提出的国共联合的建议,而相反,蒋介石拒绝了我们的共同行动纲领,否认所有政党建立统一战线和国共两党实行平等的必要性。南京和蒋介石不打算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同日本进行认真的斗争。他们实行消极抵抗和维持“现状”的政策,也不放弃对日让步和妥协。而在国内,南京不是积极地同日本的占领行动作斗争,不是唤醒和组织人民群众,而是继续镇压反日群众运动。在南京,亲日派还占有统治地位。蒋[介石]同他们作斗争,而是保持他们以前的立场,以不破坏“中日友好”。蒋介石不久前在上海还亲自同日本大使进行了谈判^②。在统一国家的口号

^① 见第 282 页注^②。

^② 可能是指蒋介石 1937 年初同川越的谈话。

下,南京政府的国内政策提出的目标是: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和势力,使全国各地都服从他的领导,但不是通过统一战线和国家民主化的途径来实现,而是通过征服和击溃所有反对派势力,特别是左派革命势力的途径。蒋[介石]在同其他军阀作斗争,目的是使他们臣服于自己和夺取他们的军队(关于东北军、17路军、四川和北方的问题等),消灭国民党内的反对派(逮捕胡汉民派的刘芦隐,起诉和审判陈铭枢的拥护者)。持续不断地迫害和镇压反日群众运动、逮捕和审判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导人^①,不久前逮捕了200到300名联合会成员,利用“CC”派(中国的法西斯分子)^②分化北方的学生联合会^③。国民党利用同我们的谈判,一开始想给左派群众以沉重的打击,用卑鄙的蛊惑宣传手法挑拨我们同这些左派的关系,使他们疏远我们党。由此可见,国民党的目的是使我们党和红军同那些对我们和对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比较好的左派群众和其他政治派别以及军队隔离开来。

3. 上面所指出的国民党政策的特点决定了南京和蒋介石对待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立场。对红军作战暂时停止了,这是我们争取停止内战和联合全国一切力量进行抗日的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但是蒋[介石]和南京也利用这一短暂的和平在英国、美国和中国人民面前提高自己的威信,同时加强自己在反对日本、国内军阀和政治派别斗争中的地位。蒋介石暂时停止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决不意味着我们之间斗争的结束。相反,这一斗争将以其他方式继续进行下去。作为对我们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议^④的答复,蒋介石在南京进行了卑鄙的蛊惑宣传和各种挑拨活动,目的

① 见第307页注①。

② 见第292页注②。

③ 指国民党人建立的北平市学生民族救亡联合会,该组织的建立是为了对抗左翼的北平市民族救亡联合会。

④ 见第282页注②。

是使我们党和红军人心涣散、纪律松弛。国民党把 1925 年至 1927 年革命中统一战线破裂和进行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到我们的头上,同时公开要求中国共产党投降、承认错误和服从国民党。在答复我们党和人民群众关于民主权利以及国家制度民主化的建议时,国民党除了做出召开国民立宪会议之类的姿态^①之外,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而实际上却在反对所有民主运动,残酷压制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审判反日运动领导人和逮捕其参加者)。至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问题,蒋介石则在谈判中公开宣称,我们党不应进行任何独立的宣称鼓动工作。蒋[介石]建议,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应该成立一个联合行动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就是蒋[介石]本人。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和鼓动工作应该服从这个委员会。所有这一切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在全国人民面前解除我们党的武装,使我们党脱离人民群众并把他们控制在自己手里,从而把我们封锁在红军所在的有限区域内。至于我们的军队和苏维埃政权,蒋介石则提出了这样一些条件,有这些条件他就可以使我们失去领导、人心涣散、分化瓦解、夺取领导权,进而将红军这样的军队消灭掉。这些条件是:朱德和毛泽东应该辞职出国。红军部队应该改编成三个师,直接和单独地隶属于南京军事委员会并驻扎在不同的地区。原苏区的行政首长应由南京派人担任。南京应有权派政治工作人员到红军中去^②。此外,南京和蒋[介石]还利用我们地区经济和粮食供应的困难状况,企图用财政压力

- ① 指 1935 年 11 月 21 日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召开国民大会和公布宪法草案的决议。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于 1935 年 12 月 4 日决定公布 1936 年 5 月 5 日的宪法草案,并于 1936 年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 2 卷,第 310—313、384—385 页)。实际上国民大会的选举是在 1946 年由国民党进行的。
- ② 王稼祥概括地阐述了国共谈判的过程。国民党要求中共高层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离职是在西安事变之前提出来的。

和饥饿迫使红军一再让步。同赤色游击队的战斗仍在继续。已经开始并在继续进行间谍活动，试图通过特务收买个别红军指挥员，在红军中进行分化瓦解工作。我们已经抓到国民党当局派来的特务和法西斯分子。他们企图暗杀周恩来同志^①。日本、亲日派和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一直还在挑唆南京重开反对红军的战争，而蒋[介石]和他的集团也不希望我们的势力扩大和我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增长，他们给自己提出了用其他办法消灭红军的任务。如果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作出这种过分的让步，国民党就会以封锁、中断谈判和新的战争相威胁。同时，日本特务、中国托派和右派就将成为日本的忠实走狗。他们用各种反对中国共产党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无耻蛊惑宣传来挑拨我们同国民党和地方当局的接近，企图进行瓦解和破坏工作。从所有这些情况中可以看出，重新同红军开战的危险还没有过去。

4. 中国政治局势的上述这些特点说明了什么？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前景到底怎么样？为了说明这些问题，必须注意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和阶级力量对比的特点。共产党和红军倡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应该而且能够包括全体人民、所有团体和政党。人民群众对于统一全国和团结一切力量同日本作斗争的愿望和要求十分强烈。国民党的某些上层人士和高级军政领导人也倾向于支持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口号。我们的口号的迅速普及和我们的影响的广泛传播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也迫使南京改变自己的政策。但同时还存在一些阻碍统一战线发展的因素。南京政府作为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也不能实行独立的民族政策，民族资产阶级比较软弱，而地主豪绅和东方式的官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国民党政权中占据着绝大部

^① 可能是指1937年2月二十几号，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对周恩来从延安赴西安所乘坐的卡车进行的一次未遂袭击。

分职位,特别是由于长期同红军作战,这些人是最反动和最具有叛卖性的。此外,中国的主要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两个敌对阶级的政党,一个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另一个是无产阶级以及站在它一边的农民和城市下层群众的政党,这种情况又使形势复杂化了。其次,这两个政党都掌握着政权,虽然共产党只统治一个地区,但是这两个政党毕竟都拥有军队和领土,所以统一战线不仅涉及两个政党的行动,而且还应该解决两支军队和两个政权的问题。更何况,这两个政党和他们的军队已经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残酷血战,他们之间的仇恨和敌视情绪很大。最后,现在的统一战线在中国已经不是第一次,在1925年至1927年革命中,国民党背叛了人民的事业,分裂了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破裂后,国民党同反动势力沆瀣一气,而它本身也变成了军阀和官僚的组织,丧失了以前的革命传统。但是过去革命的经验教会它仇视和害怕群众性的工农运动和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正是中国和国民党内的这两大潮流(为建立统一而斗争的潮流和反对建立统一战线的潮流)的斗争,成了现阶段中国政治局势的特点。也正是这一斗争决定了中国统一战线今后的发展前景。

5. 在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中,我们拥有以下有利条件:我们党团结一致,有以红军和游击队为代表的武装力量,恢复了北方各省的党组织,学生组织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党的口号和纲领有很大的影响,同独立于南京的军事领导人有着外交关系并在他们的军队中做了一定的工作,在南京政府中存在同情统一战线的派别,各界人士和军队中有反内战的情绪,普遍希望统一,民众普遍反对亲日政策和对日让步。

我们的弱点是:我们的主要力量限定在一个比较贫困和人口稀少的地区;我们在国统区,特别是在大的中心城市的工作和组织还薄弱;在军队中,特别是在蒋介石的军队中的工作还薄弱;在我们党内和群众中对南京新政策的解释工作不力;由于党和军队中

的农民成分占绝大多数，为适应新的情况迅速调整我们的工作遇到一些困难；红军的财政和粮食供应有困难。

6. 考虑到当前局势的特点以及我们的力量和弱点，中国共产党过去和现在都提出了如下任务：

(1) 继续同南京和蒋介石进行谈判。可以作些让步，并已作出了一些让步，但有一定的限度。必须保留红军力量及其领导权，保留党及其宣传和工作的独立性，保留对南京政策批评的自由。尤其应该批评国民党近来的政策。如果事情发展到谈判破裂和重新出现同红军作战的威胁，那就应该全力拖延决定性的谈判，使它不致破裂，以便为我们的工作和力量对比的变化赢得时间。

(2) 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以使社会各界都了解我们的新政策和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必须对国民党的政策进行广泛而灵活的批评。必须派遣有理论素养的同志去领导例如在上海的公开和半公开的报刊工作。在党内和红军中必须加强对南京的新政策和对这一政策的正确性的解释和教育工作。我们在同国民党谈判中所做的一切，我们提出了哪些总的政治条件，必须让党和红军了解。这项教育工作应该做到每一个党员、每一个红军战士身上。我觉得，这项工作还做得不够，我们在谈判中提出的条件和对南京每一项政策的态度还没有做到人人皆知，而这就孕育着很大的危险。

(3) 必须利用暂时的和平来对红军进行再教育，加强和发展红军。必须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和坚定性。必须有计划地在我们的军队中进行军事和政治工作，以使法西斯分子、反动派、托派及其各种代理人的蛊惑宣传、挑拨离间、间谍活动和分化瓦解工作失去作用。红军应该时刻准备作战和保持战斗精神。必须使红军指战员去影响国民党军队而不是相反。必须始终坚持同游击队的联系和下达指示，以便他们正确地行动和工作。要想一想，通过什么途径

向发生人民反日起义^①的察哈尔派去抗日先锋队。如果现在还不能这样做,那就应该派我们的同志到那里去领导运动。这可以提高我们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并推动统一战线向前发展。

(4)必须恢复我们在国统区,特别是在大城市和华中地区的组织。情况是这样:如果我们在这些地方没有党组织和不能把群众运动提高到应有的水平,那么南京和国民党就不会作出大的实质性让步。争取民主的斗争只有在恢复我们的组织和我们的领导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和卓有成效的。就我个人的经验,上海的条件还是较为宽松的,可以开展工作。至于干部,则可以从苏区培养和派出一定的数量。从这里可以派出一个小组。此外,从北方各省还可以调拨一部分学生党员到华中和华南地区去。然后还应该从国统区派一批同志到苏区去学习,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然后派他们回去工作。必须用新的方式进行工作和实行新的政策。应该研究过去我们的组织被破坏的痛苦经验,特别是在莫斯科,以便帮助新组织不再重犯老错误和正确地进行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应该介绍自己在党内和群众中的工作经验,应该在党内做解释工作,让干部了解在国统区工作的重要性。

(5)要继续发展我们同一些省的军事首领及其军队的关系,以便争取他们对统一战线的同情,这样可以对南京施加压力。在军队中的工作,特别是在南京军队中的工作还很薄弱。要利用和平时机来安排联欢、访问、参观并向他们的军队派代表团,等等。要培养一些特殊的干部,深入到他们的军队中去。改善苏区同中国其余地区的联系。

(6)我觉得,同托派、间谍、破坏分子、日本特务和反动集团的斗争还不够。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同这些匪帮的斗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必须重新审查我们在苏区和国统区组织中原有的那些托

^① 指抵抗 1935 年底至 1936 年初占领察哈尔数县和省会张家口的日伪军队的进犯。

洛茨基分子和可疑分子的问题。必须对第4军^①中的那些因企图杀害负责同志已被捕的公开敌对分子进行调查。必须提高全体党员和红军战士的布尔什维克式的警惕性,以便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特务分子进行斗争。在报刊上,特别是在上海和北方,必须经常不断地进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7)为党的团结而进行的斗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共]中央是团结一致的,只有以前张国焘同志曾同[中共]中央进行过斗争。中央关于张国焘路线错误的决议^②为重新教育第4军的干部和保证中央对第4军的正确领导提供了可能性。这场斗争为揭露那些以前受到张[国焘]庇护的公开反党分子提供了可能性。张[国焘]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除一小撮人(15到20个人)外,第4军中绝大多数干部都站到了[中共]中央的方面。现在张[国焘]和他的追随者已经没有能力分裂党和红军,但是为党的团结,为在新政策上的一致而斗争无论如何也不能放松。政治局、[中共]中央和书记处以正确的策略和工作保证了党的团结。现在政治局还没有满额,因为一部分在莫斯科,一部分在其他地方。应该充实和加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应该准备召开六中全会^③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④,以便深入讨论当前的所有问题,增补中央委员会和总结过去的经验。应当改善中央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以便及时地和更详细地收到指令、指示和书籍。

打字稿,副本。

全宗495,目录20,卷宗318,第1—10页。

① 原文如此。这里与下面应为:红四方面军。

② 见第288页注④。

③ 中共六届六中扩大全会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

④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

附

录

毛泽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

1939年8月26日于莫斯科

绝密

关于博古、李德^①等同志在领导党和红军的工作中所犯的
错误

1. 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是，他们刚从国统区来到苏区，未研究红军在几年的作战期间所处的环境，而只是主观地处理问题。他们认为，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没有巩固的后方，没有足够数量的军事和技术干部，也没有得到外部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他们不知道，红军不得不在很艰苦的斗争条件下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它没有可能从什么地方得到物资和财政援助，而相反，它必须不间断地进行战斗，因此它没有任何可能来培训自己的干部。而且红军不得不同数量上比自己多许多倍的敌人作战，但在这些战斗中，它总是取胜。例如，在第二次反“围剿”时，红军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其中有8000多支枪，等等。然而，红军虽然缴获了大量武器，但有时它不得不放弃，因为它无法携带。例如，红军在占领长沙后缴获了大炮，但没有炮弹，因此不得不把它们扔掉。此外，大炮也不适用于山地运动战。还有这样的情况：地方武装从国民党银行缴获大量中国钞票，但地方领导不知道如何处理，看到钞票上印有国民党党徽，就把它们烧掉了。这是很可笑的事情。

^① 相应是：秦邦宪、O. 布劳恩。

在土地革命斗争时期,工人、农民热诚地为自己的解放而战,但他们对资产阶级现代生活没有起码的了解。加之我们的朱德同志在生活中非常俭朴,要求自己 and 其余所有群众一样。他的形象和他的行为使人们都很尊敬他。下级工作人员和普通战士对待他始终像对待自己的同志一样。红军战士把他称为大师傅。有过这种情况:红军战士买来白菜,让朱德做,当然朱德也和他们一块儿吃。朱德同志不遵守指挥员同其部署关系的老规定。

此外,朱德和毛泽东同志没有博古和李德同志那样深厚的政治知识,没有进过李德上过的那样军校,没有读过博古和李德读过的那些德文版和俄文版的马列著作。特别是朱德和毛泽东没有指挥过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的那样现代的战斗。在很有学问的博古和李德同志的眼里,朱德和毛泽东好像是“农村傻瓜”。

此外,朱德和毛泽东同志处在很艰苦的条件下。大革命失败后,他们不得不在最艰苦的条件下靠自己的力量和资金建立苏区和红军。毫无疑问,红军要比敌人弱许多倍,但它需要反击来自巩固的大城市中的国民党军队。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红军必须进行游击战和运动战。1927年底至1931年,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三次“围剿”,但一次接一次都遭到了失败。

上述所有主观的和客观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方面,李德和博古都没有从客观上和主观上进行研究。他们也不想研究。同时,那个时候党在同立三路线作斗争,在纠正“左”的和右的倾向、教育自己的干部,这个情况,李德和博古也没有注意到。

李德和博古否认所有积极的和消极的情况,按照自己的看法反复说明一点:毛泽东按照游击方式领导苏维埃运动,朱德和毛泽东是游击主义的领导人。博古和李德指责朱德和毛泽东搞游击主义。

这就是他们的错误根源所在。

2. 因为博古和李德不想深入研究红军所处的环境,所以只

看到了红军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并在客观上否定红军在艰苦斗争中所取得的所有成绩。尽管毛泽东同志本人反对游击主义，反对让自己的军队去冒险和不为自己建立后方的李立三主义，尽管那个时候游击战是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基本方式，尽管毛泽东同志确实是游击战的战略家，这一点甚至全世界都承认，但是博古和李德指责毛泽东同志搞游击主义，并撤销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工作，因为博古所领导的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再也不能领导红军了。

3. 攻打抚州和赣州的战斗为上述情形提供了帮助。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①之后，驻扎在宁都的国民党军队中发生了有名的起义^②。国民党第26路军在赵博生和董振堂同志的领导下起来造司令部的反，整个建制转到红军方面，红军出人意料地扩充1万多人。这支国民党军队改编为红五军团。

随着红军力量的增强和影响的扩大，毛泽东同志向党提出了占领抚河流域，把闽浙赣所有苏区连成一片，并在抚州建立苏区中心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建议遭到了一些同志的反对，其中也有项英同志，他们主张占领赣州和吉安，把江西苏区同湖南苏区连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反对这样做，他说，赣州和吉安的地理位置不利于在这些地区加强人数不多、装备很差的红军。

但是党还是作出了攻打赣州的决定。因为毛泽东同志忙于刚刚建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工作，未能亲自指挥占领赣州的战役。赣州之战的结果是，我们遭到了很大的失败。这就恶化了红军的处境，改善了国民党军队的处境。

由于赣州战役的失利，粮食问题再次变得严重了。为了解决

^① 这次会议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叶坪村举行。

^② 指1932年12月14日第26路军在宁都的起义。

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建议党夺回龙溪和漳州。党批准了这次进攻,但只允许毛泽东带1军团和5军团一部分。尽管如此,战役还是进行得很顺利,漳州被我们拿下。在一个月期间,毛泽东缴获105万中国元、大量军人装备和一架飞机。此外,在战利品中还有各种机器、藏书、仪器、印刷设备、纸张等。这是红军的一次很大的胜利。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同志不承认这是红军的胜利,而相反,认为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冒险主义,是毛泽东试图占领大城市。李德继续反对毛泽东。

这次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建议党派红军前往福建北部,同福建苏区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建议在抚河流域建立大苏区,从而巩固中央苏区的地位,然后一有机会,再占领抚州(江西省,在抚河河畔)并给南昌造成威胁。这样就可以切断驻扎在吉安地区的蒋介石军队同南昌军队的联系。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战略计划,中央没有采纳。同粤军在太守岭(音)的战斗受挫后,毛泽东同志被撤销了在红军中的军政工作,但他仍在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这是李德、博古等人反对毛泽东在红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胜利。

4. 自称共产国际代表的李德和中央总书记博古所领导的中共中央,在撤销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工作之后,开始同那些曾和毛泽东一起组建了红军的老的经受过锻炼的干部进行斗争。这个中共中央实行了所谓的“短促突击”战术,用它取代了运动、游击战战术。在实行“短促突击”战术情况下,因长期作战感到疲劳、又人数不多、装备很差的红军,必须同武装精良并且有外国专家做顾问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正面战斗。国民党军队在高虎脑和广昌战斗中取得的所谓胜利,使红军受到了惨重的损失。在这些战斗中牺牲了一些老的经受过锻炼的干部。伤亡约有1万人,特别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其中有许多优秀的军事干部。虽然红军在三个月期间内可以补充新生力量6.2万人,但是在高虎脑和广昌战斗中

的这种惨重损失,对于我们来说是承受不了的。这再一次证明“短促突击”战术是错误的。这个战术给红军带来了很大损失。

5. 李德同志来到苏区后冒充共产国际代表。每一个党员、每一个苏维埃工作者、每一个红军战士和指挥员,对李德同志都特别尊重,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既然共产国际派代表来直接领导中国共产党,那就需要对共产国际的这个代表特别的尊重。

但是,李德在感到全党对他的尊重后,开始在博古同志的直接帮助下拼命把一切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党和红军的所有重大事项,只有在取得他的同意之后才能贯彻执行。如果有什么事情没有取得他的同意或者没有按照他的愿望做了,那么他就会开始训人,不管谁都训。例如,他当红军学院院长时,就连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都无权召集学院学员会议,或者同这个学院部分工作人员谈话。徐梦秋同志一个时期担任这个学院的政治部主任。根据所有学员的要求,朱德同志(当时朱德同志正好从前线战场上回来)给学员们作了关于前线形势的报告。因为这次会议是由政治部主任徐梦秋同志召集的,没有取得李德同志的批准,所以李德就严厉训斥徐梦秋同志召集这样的会议,并当即下令不经过院长批准谁也不能召集学员会议,没有他本人的批准,一切军事行政事项都不能贯彻执行。

但是,李德同志的想法和计划也是变化的,朝令夕改。他的下属不知道怎么办,感到特别为难。李德常常下达完全不符合实际或与以前的命令相抵触的命令,而且在这些命令中不作任何说明,因此下属不知道怎么办。没有人敢去李德同志那里让他作出口头说明。如果有谁去他那里让他作出说明,此人必定受到严厉训斥。如果你执行他充满矛盾的命令,而以后他发现是错误的,那他必然狠狠地惩罚你。李德惩罚无辜同志的情况是很多的。在他那里担任过学院政治部主任的徐梦秋同志,回忆起李德同志无理训人的

情况时说,他回忆起这种情况,简直感到痛心。由于李德同志的专制,很多有利的作战机会都错过了,也就是说,当地指挥员没有取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批准(即没有李德的同意),就没有权利在同敌军的作战中表现出主动性。红军的一个有战斗力的军团,按照李德制订的计划,在一年中驻守在一个地方,防守敌人筑起了碉堡的战线。这个军团,即使在有利和可以进攻的情况下,也不能进攻。

例如,红军的一个在林彪和聂荣臻同志指挥下的军团,驻扎在闽西水口地区。这个军团的司令部请求革命军事委员会准许组织一次歼灭敌人一个旅的战役,但未能得到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认可,因此军团司令部自己主动进行了这场战役,歼灭了敌人一个师,并用战利品补充了自己的军队。战胜敌人后,林彪和聂荣臻同志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写道:“我们的军队,一年中在西面很艰苦的条件下作战,未能缴获任何战利品来补充自己的队伍。由于困难越来越大,我们队伍中出现了不满情绪。虽然我们同敌人作战没有得到你们的准许,但我们打胜了,歼灭敌军一个旅,缴获大量战利品,从而我们补充了自己的队伍。我们这样做是迫于客观形势。”^①

由此可见,一些部队指挥员处在艰苦的条件下,很难克服这些条件。

由于党尊重和服从共产国际,高级军事干部对李德等人的独裁行为不得表现出不满情绪。这就是红军在敌人最后一次“围剿”时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只是今天 we 才知道,李德同志是自称的共产国际代表,但是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当然,这不能怪罪共产国际,而应该怪罪中共丧失了高度的警惕性。

^① 文件没有找到。

6. 在反击敌人第六次“围剿”^①的事情上,福建事变^②对我们是有利的。虽然表面上我们采取了同福建政府合作的政策,但实际上,而特别是在军事问题上,我们采取了与福建政府相对立的态度。为了镇压福建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蒋介石从江西和福建调来大量原来用以“围剿”红军的军队。当时我们不仅没有向闽北调动一军团和五军团,以利用蒋介石军队调动的时机用运动战歼灭这些军队,从而给予福建人民政府以援助,反而我们把三军团从(福建)延平调到江西,占领赣州和吉安,然后威胁南昌。这样一来,蒋介石的大量军队没有任何障碍地从江西来到福建,迅速打败了福建人民革命军,从而为蒋介石军队完成对红军的第六次“围剿”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李德的这种反动的军事战术得到了博古同志等的支持。它帮助了敌人。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恐怕不是偶然的错误。

7. 博古和李德的反动政策和错误,致使红军未能利用福建事变来反击蒋介石的第六次“围剿”。相反,博古和李德的这种政策给蒋介石包围中央苏区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为了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不得不进行艰苦的长征。博古和李德的这种政策是反对所谓的游击主义(而实际上是反对游击战的战术和战略)的结果和贯彻执行“短促突击”战术的结果。这种政策致使红军未能反击敌人的第六次“围剿”和守住巩固的、在几年间建立起来的苏区。这种政策迫使红军离开 200 万老百姓,其中包括忠于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共产党员。这 200 万老百姓在红军走后遭到了国民党的残酷镇压。苏区老百姓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取得的所有优待和成果都被地主、绅士和反动派夺回。另一方面,红军本身也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消耗和人员减少。再说,像红军长征这样重大的事情,甚至

① 这里和下面都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② 见第 192 页注③。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都没有进行过讨论,而只是由博古、李德等一小撮人决定的。以军事秘密为借口,军事行动的主要措施和计划都没有在政治局讨论,而是由这些人决定的。甚至连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洛甫^①同志都不知道远征计划。何况红军高级指挥员和主要干部,他们对远征更是一无所知。只是在远征开始前三天,召开了中央委员积极分子会议,会上顺便谈到中央转移的必要性。会上只讲必须暂停工作,而接下来怎么做,要转移到哪里,谁也不知道。

师长和师政委根本不知道远征的目的和任务,以军事秘密为借口,不告诉他们。此外,还建立了所谓的后勤部队,约有2万人。成立了15个运输队,有五六千人。这些运输队搬运很重的物资,如机器、印刷设备等。这种物资给红军的转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使红军无法自由行动。1、3、5、8、9军团不得不保卫这些物资,因而它们不能参加运动战和作战行动。这些作战军团没有去歼灭沿途遇到的敌人,反而遭到了敌军的进攻和袭击。特别是在湖南和贵州地区,有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但李德和博古以需要保卫物资为借口,不允许我军同敌军接触。由于实行这种错误的方针,运输物资的人数和保卫运输的人数日益减少。红军不断遭到敌人袭击,人员日见削减。22师的战士专为运输物资服务,这个师被敌人彻底消灭。一句话,自己将自己消灭了。红军从中央苏区撤出时有8万多战士,而到达遵义时剩下五分之二。运输物资的军队沿途损失了十分之九。预定援助运输物资军队的补充师被敌人彻底歼灭。机器、印刷设备等物资沿途相继丢掉,没有带到遵义。

这就是李德的反革命战术带来的结果。李德的反革命战术带来的结果是明摆着的。红军的军政干部和毛泽东、洛甫等同志,不

^① 张闻天。

得不开始同博古和李德领导的错误作斗争。在紧张的作战形势下,召开了有名的遵义会议^①,会上揭露了博古和李德在领导红军工作中的主要错误。李德和博古被撤销了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工作,由洛甫和毛泽东同志取代。这次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使之避免了彻底的灭亡和危机。由于有了新的正确的领导,红军克服了不同寻常的困难,而党战胜了张国焘的有害路线。在同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决裂后,红军主力开始履行自己抗日的使命,经过艰苦的西征之后转为北上。1、3 军团和(中共)中央干部胜利抵达陕北。从这时起,开始组建现在的八路军,这支军队已在全世界的抗日战争中赢得了荣誉。

8. 党内有名的宗派主义助长了整个这种有害行为。搞宗派主义的最有代表性的领导人是罗迈(他是湖南人,即李维汉)。当时他任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并是博古的出色助手。同时罗迈是李立三路线的最忠实和最坚定的贯彻执行者。在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期间,他任湖南省委书记。当时他采取了最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的立场。他对湖南省委所犯的错误都负有责任。在中央苏区,罗迈成了搞宗派主义的领导人,因为他与博古和李德气味相投。在动听的反罗明路线^②口号下,搞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是废除党内一切民主。在执行这种路线情况下,党的基层工作人员被禁止发表自己对党的上级机关的意见。

另一个例子:在中央苏区发生了反对四个同志(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的党内斗争。虽然这些同志有一些不足之处,但他们都是党在基层、在地方工作的骨干,他们是党最宝贵的

^① 指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

^② 详见肖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西雅图 1961 年版,第 230—247 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卷,第 459—469、474—482、491—502 页。

资本。他们都是县委书记和省委委员。这些同志在搞宗派主义的领导的压制下,没有权利发表自己对党的领导的意见。因为这些同志在前沿阵地工作,在艰苦条件下领导游击战,并在工作上给予毗邻县帮助,因此他们的工作条件比中央苏区要困难得多。有过这种情况:大量敌军进攻他们县时,红军部队离他们很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从当地农民中动员自己的力量进行游击战,打退敌人的进攻。在力量悬殊的战斗中,这些同志领导的游击队,有时遭到了失败。为了顺利完成任务,这些同志有时向中央提出意见,请求中央改变某些计划和战略步骤,以便更好地完成中央的任务。但以罗迈同志为代表的宗派主义领导人,不注意客观条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否定这些同志的任何建议。如果这些同志无法执行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指示,搞宗派主义的领导就指责他们犯了“机会主义”,执行“罗明路线”,或者更糟糕的是不服从组织领导,搞派别活动等等。

党的工作人员同志都怕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这些同志,由于大胆提出建议,曾被指责为搞派别活动。邓小平、毛泽覃和谢唯俊同志被撤销了党的工作,他们之中有的受到一般处分,有的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而古柏同志因所谓的机会主义被开除了党籍。现在邓小平同志做第八军政治部副主任工作,而毛泽覃和古柏同志被留在了中央苏区。红军走后,毛泽覃在中央苏区领导游击队,1935年被国民党军阀俘虏,因他是毛泽东同志的弟弟而被枪杀。就这样,毛泽覃同志为了党的事业英勇地牺牲了。古柏同志至今下落不明,他失踪了。谢唯俊同志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后被任命为边区特委书记,他被土匪野蛮杀害。可见,他也在战斗岗位上为了党的事业牺牲了。

瞧,搞宗派主义的在反对什么人。而且罗迈搞的这个宗派主义也反对毛泽东同志,指责他搞游击主义。

所有干部和所有普通战士,都知道李德“短促突击”战术的错

误，而正确战术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却受到谴责。所有战士和指挥员都希望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术领导下工作，并且他们知道，只有在他的领导下才能打退敌人的包围，挽救当时的危险局面，但宗派主义，即上面所说的这个宗派主义，不让基层干部发表意见，更不让任何人反对对马列主义有较好研究的博古和自称为共产国际代表的李德。基层干部怕这样做犯政治错误，怕这样做会把自己的炮火转向共产国际和党。博古、李德、罗迈等人利用党员的这种觉悟来干他们的有害勾当。他们妨碍了土地革命事业，妨碍了红军打退敌人的第六次“围剿”。正是这个宗派主义帮助了李德的专制独裁。这是革命遭到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罗迈宗派主义领导的最大罪过所在。

一句话，李德、博古和罗迈的问题应该认真地彻底地弄清楚。

我上面讲述的材料只是零星的。这些材料只能证实他们罪过的一部分。关于他们的罪过，还有许多重要材料，但我不知道。例如，遵义会议的这样重要的决议，由于罗迈宗派主义抱有偏见，我都不知道。就在遵义会议进行的时刻，我被罗迈免去了15队政委职务，因此当时不认为我是积极分子和干部。根据这一点，罗迈不让我出席这次会议。这之后我表示抗议，罗迈对我更加恼火，为了报复，他在长征期间抢走了我的马。他试图在长征中把我累死。我向施平^①和周恩来同志申述，他们当时指派我做总务工作。我当时得了疟疾，考虑到这种状况，他们把马还给了我。这才使我免于—死。但是遵义会议决议还是没有向我宣布。毛泽东同志不想给别人提供多余的口实，虽然我是他的弟弟，他并没有给我看党的许多重要文件，也没有向我讲党内的斗争。因此我只知道我上面所说的情况。

我是已经有18年党龄的中共党员。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上

① 陈云。

述情况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使中国共产党不再遭到这些害虫的损害。

借此机会,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声明,我准备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任何任务,以加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走上正确的胜利的道路。

周求安(毛泽民)

翻译 张(绥山)^①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96, 第 115—131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曾秀夫。

410

布劳恩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的 关于福建事变的调查材料

1939年9月21日于莫斯科

绝密

关于1934年初福建事变的调查材料

1. 19路军在1932年初的上海战争^①中,在蔡廷锴的指挥下,为自己树立了抗日和进步军队的名望。共产党在该军中建立了相当大的组织,有几百人。19路军调到福建后,进行了清洗,大部分共产党人和同情者被清除。19路军和中央苏区红军之间以前的那种不很敌对的关系,在1933年到来之前急剧恶化。在这里,什么条件起了作用,或者说共产党对待19路军有什么错误,我说不好。

但是,19路军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在上海战争期间和之后也一直不好。蔡廷锴被认为是蒋介石的反对派,他同在上海的孙逸仙夫人^②、在香港的胡汉民等人保持着联系。据说,他接近所谓的第三党(社会民主党)^③,而这个党在苏区被视为反革命组织。

2. 1933年夏,在蒋介石对赣北的第四次(按莫斯科的算法是

① 见第46页注④。

② 宋庆龄。

③ 指当年中共文献和书籍中通用的由蔡廷锴所建的组织的称谓。

第五次)进攻被击溃之后,根据军事顾问(代表?)^①弗雷德(M. 施特恩)的建议,展开了对 19 路军的进攻战役。这次战役大约从 1933 年 8 月持续到 10 月,由中央红军^② 1、3 军团部队进行,结果相继占领了闽西的一些城市,缴获了大量物资。原来,19 路军已经没有多大的战斗力了。的确,这次战役有不足之处,以致在战争期间蒋介石平静地准备了第五次(第六次)进攻,并在 10 月^③出人意料地占领了我们中央苏区东北地区首府黎川,当时红军的主力部队还在福建活动。

3. 从 10 月起就有传言说,由于蒋介石发动新的攻势,蒋的反对派在加强,如有来自财政部长宋子文方面(宋后来引退^④)和 19 路军方面的反对意见。红军 1933 年夏季战役对这种发展有没有影响,是推动了还是阻碍了,我说不好。一方面,当然,19 路军受到了我们的进攻;另一方面,蒋介石根本没有支援它。至少从 11 月^⑤起就已经清楚,蒋介石和蔡廷锴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因此提出了如何更好利用这些矛盾的问题。

我要强调指出,据我所知,就是谈到了红军如何利用矛盾的问题,而不是真正援助 19 路军同蒋介石作斗争的问题。我和(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其他同志,如果我没错的话,就是这样理解 1933 年 12 月来自弗雷德的建议的,实质上是要利用蒋介石和蔡廷锴之间的冲突,率领我们的所有军队渡过赣江向赣西北挺进,并对蒋介石的战略性翼侧和后方南昌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收到这个计划时,博古和我就在朱德总司令部,朱德和周恩来同志原则上同意这个计划,而项英同志从瑞金电告,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同意。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指中央苏区红军。

③ 原文如此。黎川是在 1933 年 9 月 28 日被占领的。

④ 1933 年 10 月,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务。

⑤ 原文如此。应为:从夏季。

当时还没有详细研究细节。

4. 当蔡廷锴(好像在1934年1月^①)公开宣布成立抗日人民政府时,对他政府的政治评价是不一致的。因为,我记得,中共上海中央局(斯拉文、米茨凯维奇)^②提出看法,认为这是军阀之争,而我们只需多加利用。可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埃韦特同志也有这样的看法,不过这方面的准确情况我不记得了。我认为,博古同志在取得中央的同意后断然驳斥了这种看法,并提出了直接进行联系和给予支持的必要性。这似乎就解决了政治评价问题。

5. 同蔡廷锴很快就建立了直接联系。他的代表^③来到苏区,的确,他不具有具体的全权,或者关于同苏维埃政府相互采取行动的提议。(苏区)派出了政治代表和军事代表(潘汉年和张云逸),他们要商量向蔡廷锴提供经济和物资援助,而不是军事援助。实际上,据我所知,这两位代表只签订了(某种)划定领土分界线的互不侵犯条约^④。在第一个时期,蔡廷锴明显不希望得到我们的军事支援,他担心这会在政治上给他造成损害,特别是在广东,而面临灾难时,他改变了态度,但为时已晚。

这样,蔡廷锴始终不接受我们向闽北(延平)推进的建议,而延平陷落后,在闽中只同意我们推进到(闽西)归化,这还是在那里的52师师长^⑤公开转到蒋介石方面之后。

在这种情况下,给我们代表^⑥的最后指示是,要从失败中做些挽救工作,可能的话,可将蔡廷锴的残部转入到红军之中。但这个

① 原文如此。应为:1933年11月20日。

② 相应是:李竹声和盛忠亮。

③ 陈公培。

④ 即中央苏区和19路军代表1933年10月26日签署的停战和反日反蒋临时协定。

⑤ 李明。

⑥ 潘汉年和张云逸。

尝试也未取得结果。

6. 在约5个星期的事变期间,我们的军事决策很不果断。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上海和瑞金之间有矛盾,这种矛盾不仅在政治评价上,而主要是在军事思想^①上。

弗雷德的12月计划,革命军事委员会基本上是赞成的。根据这个计划,主力部队进行了调动:1军团作为先遣队已调到永丰以南,3军团作为主力进入广昌地区。9军团(3个师)和5军团(13师和新15师)在北线牵制敌人,而独立的19、20、21和34师向闽北方向运动。侦察的结果和1军团在赣江以东作战的结果表明,由于敌人有稠密的碉堡网,作战计划无望取得成功。这一点已得到17师和18师(然后是6军团)经验的证实。至少,需要有很多时间(两三个月)才能完成这样的战役,并且苏区的保卫工作还是个大问题,而19路军单独未必能坚持这么长的时间。

当时从上海收到了由弗雷德制订的详细行动计划^②(已是在福建事变时期),责成我以军事纪律捍卫这个计划,并且这个计划得到了中共上海中央局的赞同。这个计划把整个战役期限缩短为1个月左右(实际上即使没有敌人也是无法实行的),扩大了行动范围(推进到湖南边境地区,是占领长沙最大限度的方案)并提出了^③按日历安排的计划。

当时已经知道,蔡廷锴不能支持多久。这个计划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专门会议上被彻底否定,认为它不符合实际情况。当上海接连不断地发来电报时,问题已交共产国际去决定了(至少,这是我得到的信息)。

7. 当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放弃西部战役,进攻闽西北蒋介石

① 原文如此。应为:军事计划。

② 可能指弗雷德1933年11月27日计划。

③ 原文如此。应为:含有。

军队的右翼时,军事形势是这样的:

(1)蒋介石军队(约10个师)从赣江和抚河之间的北部战线调往福建。堡垒里留了守备部队(三四个师)。沿赣江一线的湘军没有减弱。陈诚的主力部队仍留在东北战线,即沿南丰、建宁一线。它们没有对我们采取积极的行动。

(2)在福建,蒋介石的军队(15到20个师)已经占领延平并向福州推进。19路军当局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已开始瓦解。

(3)我们的主力(1军团和3军团,共5个师)进入福建,占领了52师的地区,即归化、沙县、尤溪一带。34师单独向邵武和更东的地方推进,但它未能渡过闽江。7军团(19、20、21师)开始是同34师一起行动,后来作为先锋队进军尤溪地区。5军团和9军团(共3个师)在北部战线牵制敌人。结果红军在闽中占领了很大的地区(除了指出的地方,后来还占领了永安),但已经不能对福建事变和蒋介石与蔡廷锴之间的战争结局产生影响了。

8. 蒋介石军队占领福州后(好像是在1934年2月^①),19路军迅速瓦解,大部分投靠蒋介石。在闽南还继续了一些不大的战斗。陈诚的军队(8到10个师)一直在东北战线待命(显然,是准备在我们主力部队远离苏区进入福建或渡过赣江时采取翼侧行动),这时出人意料地向建宁发起攻势,但是5军团守住了这座城市。蒋介石的军队开始往回调动,迫使我们从福建调回1军团和3军团,让它们回到北部战线。为了阻止在福建形成新的战线和蒋介石彻底控制福建,选出了7军团(改编为1个师)、新24师、暂时的9军团(也是1个师建制)和1军团(已是在1934年秋)来完成这项任务。

9. 对在福建事变中所犯错误的评述:

(1)政治上的错误是:中共上海中央局对19路军作出了错误

^① 原文如此。应为:1月底。

的评价,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估计不足,认为福建事变只是这种矛盾表现的一部分。

(2)战略上的错误是:中共上海中央局提出了红军向西和向西北的冒险的、不符合实际的行动计划(弗雷德计划),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行动中犹豫不决,摇摆不定(对此我应该负责)。

(3)在上海指令的影响下,由于摇摆不定和犹豫不决,未能及时对东北战线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作出评估,向那里调动部队迟了,因此红军已无法援助 19 路军和改变事态发展进程。

10. 由于发生福建事变和所犯的错误,红军反击蒋介石第五次进攻的作战条件明显恶化:

(1)蒋介石不仅战胜了 19 路军,而且变得更强大,他在各处的反对派都被削弱了。

(2)他完全可以集中所有力量对付中央苏区。

(3)他在 1934 年包围了中央苏区,从而给中央苏区造成了特别困难的经济条件,迫使红军在被包围情况下在内线作战,而自己得以巩固后方。

因此后来出现了斗争的持久性,最后红军必须突围和放弃苏区,当然在这里,其他因素和 1934 年夏所犯的错误,也额外地起了作用。

注:我没有材料,根据记忆,对福建事变作出的描述,可能有一些错误,但对事变的实质,我是保证的。

瓦格纳^①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98, 第 91—96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O. 布劳恩。

411

布劳恩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

1939年9月22日于莫斯科

绝密

关于我在华工作中的错误的书面报告

现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我在华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同时我认为,也需要指出我犯错误时起作用的一些情况。因为手头上没有任何材料,我很难准确地记住一些细节,但我尽量准确地叙述一些事件,我对报告内容负全部责任。

我的错误犯在以下时期:

1. 蒋介石对赣闽中央苏区实行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即1933年秋至1934年秋。
2. 为实行中国中央红军^①第一阶段长征(即1934年秋至1935年初的长征)做准备的时候。
3. 1936年初在陕北讨论红军战略行动计划的时候。

我的错误都涉及中国红军的战略战术及其军事领导权,也就是说这些错误都在军事工作方面。但我清楚地知道,它们不是技术方面的错误,而“对于党的整个政治路线来说不过是部分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年1月8日扩大会议决议^②语),并产生

① 原文如此。指中央苏区红军。

② 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见《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1920—1949)》,莫斯科1981年版第2卷第5册,第5—28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452—475页。

于对当时中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评价。

一、五次“围剿”时的错误

1. 1933年秋,我来到中央苏区后遇到了以下情况:

(1)在前线:蒋介石已按新的计划发起第五次进攻,这个计划在作战方面含有通过全面封锁和缩小苏区的办法消耗我军力量的战略。在战术上表现为依靠碉堡体系步步推进。由于红军滞留在福建(同19军进行夏季战役^①),蒋介石得以占领和固守中央苏区东北部首府黎川。

(2)在红军领导中:1932年发生意见分歧,红军的行动受到了批评(好像是在宁都会议^②上),这以后,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很少参与军事领导工作。这项工作在中共中央主要由博古^③同志负责,在军队中主要由周恩来同志负责。

2. 在这种情况下,我犯了两种错误:

(1)我是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来到[苏区]的,由于在上海时我与博古同志有工作联系,所以我单方面地同他保持联系,实际上我掌握了红军行动的决定权。这大大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在客观上篡夺了红军在一年期间的指挥权。表面上看,我没有摆出大人物的样子。我不只一次地强调说,我作为顾问没有任何权力或全权(关于顾问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有相应的电报^④),我认为自己是听从中共中央指挥的,而实际上我对每个涉及红军的问题都提出了建议,并且直到红军进入贵州省之前我的所有建议均被采纳。除此之外,一些建议只由几个同志进行了讨论,主要是博古同

① 见第410号文件。

② 指1933年6月上旬在宁都举行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

③ 秦邦宪。

④ 文件没有找到。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中强调指出,它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指示,最后的决定直接由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见第168号文件)。

志和周恩来同志,因此造成了对集体领导原则的部分违反。最终我直接干预了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我自己起草了作战文件。我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更何况当时我本人的东方工作经验很少。我没有为做这种工作做好准备(不懂语言,不了解决定中国红军斗争特点的特殊条件,等等),更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学习而不是领导。

(2)为维护自己的观点,我表现出过于固执和强硬,结果,确实在中共中央书记博古同志支持下,其他意见受到压制,前线指挥官的提议也常常不予考虑。特别是当毛泽东同志和洛甫^①同志(在1933年底浒湾战役和1934年5月广昌战役失利后)提出尖锐批评时,我完全不作自我批评地捍卫自己的意见,而且认为,在五次“围剿”的新形势下已经不能利用红军以前的丰富经验。这样一来,工作方式方法大部分都是错误的。

3. 我对红军在五次“围剿”条件下的战略战术所阐发的观点和我在红军中所实行的主张实际上都是完全错误的。红军在五次“围剿”以前的经验表明,在技术条件薄弱情况下,只有实行机动灵活的进攻才能成功地保卫苏区,而且必须利用群众武装来牵制和骚扰敌人,而主力要形成拳头,出乎意料地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并以决战制胜打败敌人,打破敌人的包围。在内线斗争中,甚至应牺牲土地诱敌深入,用“捕鼠器”歼灭敌人,收复和扩大苏区。

对于这个宝贵经验,我根本未予重视。当时我觉得,在五次“围剿”中,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业已形成包围圈(自1933年12月和1934年夏天福建事变之后^②)和敌人借助碉堡体系缓慢推进情况下,我机械地把“一切为了前线”、“不放弃苏区寸土”等政治口号搬到作战行动上。我不相信,敌人会离开碉堡,不相信可以

^① 张闻天。

^② 原文如此。应为: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

在决战中消灭它的大部力量,我逐渐发展了通过部分胜利取得战略胜利的理论,依靠自己的堡垒对来犯敌人实行短促突击,分散兵力实行短促突击。客观上因此丧失了作战的主动性,全线实行单纯防御,受敌人行动左右,搞堡垒主义,而在作战中,是进行绝望的战斗,对胜利没有信心。

(1)通过小的胜利取得战略胜利的理论。这明显放弃了在决战中靠闪电战取胜的做法,结果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如“阻止敌人进攻”(博古同志语),这反映了自己的机会主义思想,不相信能取得最后胜利;“国民党和红军兵力竞赛”(周恩来同志语),这明显是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因为国民党的资源要比我们多得多,而自己的政治优势没有为取得决定性胜利加以利用,而是在持久战中耗费掉了。

(2)短促突击。对这个理论,我一个人应承担全部责任。这是试图在敌人走出碉堡向前推进时突击敌人,但实际上很少成功,因为敌人仔细侦察,受到打击时立即退回碉堡。自然这种突击不止一次地在追击过程中发展成为对碉堡的无目的的进攻。在不能通过这种突击消灭敌人时,它渐渐发展成了反击,而战斗的主要方式,已从进攻转换成防御。

(3)堡垒主义。主观上我只打算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线上设一些支撑点和地区,我甚至反对过火行为。在文章^①中,我对弗雷德^②固守从赣江到抚河整个战线的建议提出异议,但是客观上在我的影响下,堡垒体系发展到很大规模,所以一时整个的兵团(5军团两个师、9军团一个师、两三个独立师)变成了守备部队,不再习惯于采取机动灵活的行动。

① 可能指华夫(李德)的文章《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见 O. 布劳恩(李德)的《中国纪事(1932—1939)》,莫斯科 1974 年版,第 355—358 页。

② M. 施特恩。

(4)分散兵力。由于实行短促突击,认为已经不需要经常集中主要力量,在多数情况下,红军分两部分作战(1军团或3军团作为突击力量,而另一些部队作为辅助力量),这样一来,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性不止一次地被减少了,甚至在具有客观条件的情况下。

(5)根据上述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部队在敌人挑衅情况下频繁调动,疲劳不堪,因为敌人兵力在总体上占有很大优势(多9倍),在各个战线轮番进攻,而我们的部队等待他们的进攻,实行“短促突击”,在最后一刻要转入立即作战。这是放弃主动性的结果,经常造成部队行动不及时,至少损失过多,争取不到全胜。

(6)绝望的战斗也是总的错误目的所致,它掩盖了我提出实行的错误战术的不成功。这明显歪曲了顽强战斗的原则。

这些错误,我认为,是1934年夏五次“围剿”决定性时期的主要错误。由于犯了这些错误,红军的战斗力减弱了,苏区大部分土地丧失了,苏区总的条件已恶化到红军主力不得不离开的地步。这些情况反映出对敌人作出了过高的机会主义估计,低估了自己的力量和能力,不相信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些思想不仅背离了当时的具体情势,而且也违背了所有军事战略战术原则。

4. 1934年初^①的福建事变是我的错误表现的转折点。这以前,我在很大程度上还努力在敌人翼侧实行运动战(所谓五次“围剿”第一阶段)。福建事变之后,上述错误的发展已无节制。

在福建事变中,我认为,我的错误主要是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中共中央和它的上海局有不同的政治评价。在军事方面有两个相互抵触的计划。一个是由弗雷德提出的,以军事纪律强加给了我,规定红军主力越过赣江向蒋介石大后方南昌长距离运动。另一个计划是革命军事委员会赞同的,并且我认为也是正确的,规

^① 原文如此。应为: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

定出兵支持闽北 19 路军。但这个计划没有实行,因为由于犹豫不决,行动迟了,已把部队派往闽中。(关于福建事变,见单独材料^①)。

5. 与上述错误相联系,也有部队组建方面的一些次要错误:

(1)随着对群众的大规模动员,1933年至1934年间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大量有生力量储备,主要用于组建新的部队(第3、14、15、22师和其他师)。虽然指挥干部部分调自老军团(第1、3、5军团),但它们的战斗力仍很薄弱。这些部队以及部分老部队的训练和充实工作没有系统地进行。这些错误主要发生在1933年,那时我还没有来。我曾尝试纠正这些错误(如扩大军校规模,建立教导团等),但我自己也部分地陷入了改组和组建新部队的错误,特别是从1934年夏季开始,新部队没有完全组成和做好准备。因此一时遇到了新部队的充实问题。

(2)军队的训练,特别是干部的培训,由于存在错误的战略战术理论,在质量上降低了。虽然我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的、我认为不是完全没有益处的工作,但无疑我也应为这方面的错误负责,因为它们与总的错误领导有关系。

二、与长征有关的错误

1934年五次“围剿”时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错误,在长征第一阶段的准备工作中也有反映。

(1)自1934年夏提出以后的行动问题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我的影响下立即提出两个方针:一个是竭尽全力保卫苏区;另一个是疏散。这对那些在为业已提出的目标继续战斗并且没有得到足够休息的军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2)准许携带大量的辎重。我本人虽然反对最初的计划,极力减少,但还是做得不够。这里反映出对远征的错误概念,认为这是

^① 见第410号文件。

一般的转移,没有充分考虑到军队在国民党地区即将面临的变化了的条件。

(3)由于有庞大的后勤部队,又低估了敌人的行动,作战部队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非作战部队的掩护部队。它们行动缓慢,调动困难,因而造成了纵队不止一次地受到敌人部队的进攻,有掉队的,失去联系的,损失惨重。

(4)远征的最终目的不明确,在完全越过敌人的防线之前(即在到达贵州之前),我极力避开决战,因此放过了同敌人的有利作战机会(在湘桂黔边区)。

由于犯了这些错误,在长征第一阶段的损失是很大的,军队疲惫不堪,2、6军团会师未成。

在另一方面,与远征相联系,也有一些问题,我认为需要作出说明:

(1)对远征的政治解释和关于远征的决定。无论是1933年夏秋战略计划,还是关于远征的决定,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一致赞成的,如果说在其他领导机关没有进行讨论,我认为,这个责任以及向群众解释不够的责任,我不能分担。

(2)在技术方面,我认为,远征的准备工作是好的。突破四道防线的计划也一样,比较容易地克服这些防线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说明,当然不应减轻这个时期我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性。

三、在中共北方战略上的错误

1. 1936年初,中央军队到达陕北并同15军团汇合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制定了战略计划,其第三(实际)部分提出了以下任务:

(1)总的目标:取得苏联的技术援助。

(2)红军的战略方针:向北推进,以靠近外蒙古并通过它与苏联建立联系。

(3)红军在三个阶段的行动:第一阶段:巩固陕北地区,准备渡

过黄河；第二阶段：消灭阎锡山部队，在陕西建立新的根据地；第三阶段：(可能向绥远、察哈尔一带)进行北征。

这个计划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赞同^①。

2. 我不同意基本目标和红军第三阶段行动，在部队(和中共中央)向黄河出发时，我给中共中央发去一封个人信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在调动主力部队进行远征的情况下，巩固和保留陕北地区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力部队有可能由于敌人的行动回不来。

(2)根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任务，军队的主要任务现在不是取得苏联的技术援助，而是在中国内部活动，旨在建立这种统一战线和消灭叛徒军队。

(3)走出去靠近外蒙古，可能破坏苏联的和平政策，并在客观上成为促使日本进攻蒙古的挑衅性行为。

总之，我建议，既然战役已经开始，那就把它局限在山西境内，从计划中取消第三阶段^②。

3.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烈地和一致地驳斥了我的看法，认为这是我以前的机会主义方针和战略的继续，不相信苏区和红军的力量，过高估计了敌人，不懂苏联和平政策的实质，因此这是对中共中央没有根据的指责。

我收到中共中央的结论后，立即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根据中共中央的讨论作出说明。这个错误行动没有造成实际有害的后果，因为在中共中央内立即得到了解决。

※ ※ ※

在评估我在中国所犯的错误时，我请求要考虑到在客观上促

① 指东征计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1936 年 1 月 10 日和 17 日会议上作了研究。

② 指李德 1936 年 1 月 27 日关于战略问题写给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信，见《李德与中国革命(有关资料)》，北京 1987 年版，第 146—153 页。

使我犯这些错误的一些情况,虽然从另一方面说,我所处的特殊环境也加大了这些错误的影响。

(1)我没有经验,对在中国受委托的工作没有做好准备,这些对我犯上述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起了很大作用。我从1932年底到达上海时到1939年8月离开延安时,从未收到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什么指示、通报,或者哪怕是同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取得什么联系。埃韦特同志是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代表,他根本不干预军事工作,而弗雷德在1933年至1934年间是我的直接上司,从未帮助过我,而是阻碍我制定正确的方针。

(2)我未在任何时期同中共中央进行斗争。1934年,我同中共中央书记博古同志协调工作,我的印象是,他代表党的领导的意见。当党内情况发生变化时,我真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加以纠正。1936年的行动完全发生在中共中央内部。

(3)几年间,在困难的形势下,我努力在工作中,主要是在军校和红军部队、八路军部队开展的教学中纠正错误,并积极在中国党内支持中央的路线,诚实地完成它委托的任务。特别是1935年中央军队在云南发生危机^①和在张国焘搞分裂^②情况下,我坚定地站在中共中央一边,并为它的路线而斗争。

请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我的错误并作出必要的结论和关于我的结论。

① 指1935年4月红军经过云南省时,1935年3月成立的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同林彪、杨尚昆和刘少奇在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上发生的意见分歧。详见A. C. 季托夫:《毛泽东政治生平资料》,莫斯科1970年版第2卷,第130—132页。

② 详见A. C. 季托夫:《中共领导内部斗争分裂史略(1935—1936)》,莫斯科1979年版。

瓦格纳(李德)^①

注:我建议利用我提供的书面材料作为单独问题的说明材料。

1. 关于我到中国出差的任务^②。
2. 关于福建事变^③。
3. 关于中国红军的发展^④。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98, 第 80—90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O. 布劳恩。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见第 410 号文件。

④ 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98, 第 1—63 页)。

人
名
索
引

人名索引*

A

阿本德,加列特(1884—1955)——1927年至1941年为《纽约时报》驻华记者。

阿布拉莫夫, A. JI. (化名:米罗夫, A.) (1895—1937)——1926年6月至1935年11月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部长。1935年11月至1936年9月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1936年9月起任工农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助理、西班牙方向领导人。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阿布拉莫维奇, P. (赖因, P. A.) (1880—1963)——崩得派首领之一,20世纪20年代起侨居国外。

阿布拉姆松, M. M. (化名:马祖林、马荪) (1898—1941)——1927年至1937年先后在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1928年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通称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研究所、共产主义科学院(1936年起改名为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阿尔图佐夫, A. X. (原姓:弗拉乌奇) (1891—1937)——1931年8月至1935年5月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 鉴于本卷提及的人名数量很大,这里按通常做法只介绍1931年至1937年间情况。有些人的情况资料没有找到。书籍和文章作者的名字以及纳入各种机构、企业和公司名称中的人名未列入索引。译者注: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外国处处长。同时 1934 年 5 月至 1937 年 1 月任工农红军参谋部(1935 年起改名为总参谋部)第四局副局长。1937 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务局局长。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阿尔维斯(原名:克利莫夫,А. Я.)(1898—1970)——1930 年至 1931 年任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局主席,尔后至 1932 年 3 月任红色工会国际宣传鼓动部部长。后来从事外交、科研工作。

阿赫马托夫,И. И.(1886—?)——1929 年至 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中亚局指导员,1931 年 2 月至 1932 年 11 月先后任共产主义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32 年至 1934 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教研室主任。1934 年至 1935 年任国际土地研究所农业工人研究室主任。

阿基莫夫,В. М.(1901—1957)——1932 年至 1936 年先后在工农红军参谋部(1935 年起改名为总参谋部)第四局情报处和东方处工作。1937 年至 1938 年为驻兰州中国军事供应线负责人。

阿库洛夫,И. А.(1888—1937)——1927 年至 1930 年为中央委员。1930 年至 1934 年为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1 年至 1932 年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组织局书记。1933 年起任苏联检察长。1933 年至 1937 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阿利明,马斯·布拉维罗季日奥(化名:桑托斯·黄,季尔贾)(1894—1964)——1924 年起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1928 年至 1930 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1931 年至 1933 年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驻上海代表。

阿鲁季尼扬,А. А.(1902—1971)——1930 年至 1934 年在共产主义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任研究

室主任。同时 1932 年至 1937 年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934 年至 1938 年任共产主义科学院(1936 年起改名为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副所长。

阿伦贝格, 菲利浦(罗森菲尔德, 阿尔弗雷德)(1885—?)——1928 年至 1934 年在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工作。

阿普列索夫, Г. А.(1890—1941)——1932 年至 1933 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驻塔什干全权代表。1933 年 9 月至 1937 年 3 月任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遭非法镇压, 逝世后恢复名誉。

阿瓦林, В. Я.(原姓: 阿博尔京)(1899—1978)——1931 年至 1935 年在共产主义科学院(1936 年起改名为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935 年至 1937 年任塔斯社驻北平记者。后来又从事科研工作。

埃斯勒, 格哈德(化名: 罗伯特·罗伯特斯)(1897—1968)——1927 年至 1928 年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1967 年起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1929 年至 1931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成员。1932 年至 1933 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英美书记处顾问。1936 年至 1937 年在德共中央驻布拉格外国局工作。

埃万赫利斯塔, 克里桑托(1888—1942)——1927 年起任菲律宾工人党副主席。1929 年起任无产者同盟总书记。1930 年至 1933 年任菲律宾共产党总书记。1938 年起任菲共主席。1933 年至 1936 年被监禁。1938 年起旅居苏联。在日本监狱中逝世。

埃韦特, 阿图尔(化名: 阿图尔, 吉姆)(1890—1959)——1927 年至 1928 年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9 年至 1931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1932 年至 1934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

艾杜斯, 哈雅马(1896—1972)——1928 年至 1931 年任红色工会国际东方部副部长。1931 年至 1972 年先后为苏联科学院世

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东方学研究所科研人员。1934年至1941年在莫斯科东方学院执教。

艾尔科里,帕尔米罗(原姓:陶里亚蒂)(1893—1964)——1922年起为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1923年起为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起任意共总书记。1924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1935年至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委员。1937年至1939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西班牙代表。

艾萨克斯,加罗尔特(化名:伊罗生)(1910—1986)——美国新闻记者,1932年至1934年任在上海出版的《中国论坛》报(1933年改为杂志)主编。

安德烈耶夫,М. 3.(化名:约翰、约翰尼)(1888—?)——20世纪30年代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工作。

奥尔宗尼启则,Г. К.(1886—1937)——1921年至192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至1926年任外高加索和北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1926年至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26年至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人民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会议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1年任全苏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年起任重工业人民委员。自杀身亡。

奥沙尼娜—福尔图纳托娃,Е. Е.(1907—?)——1928年至1933年任红色工会国际国际联络部秘书。

奥斯马诺夫——见乌斯马诺夫,哈利姆。

B

巴比塞,安里(1873—1935)——法国作家。

白崇禧(1893—1966)——1931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委员。1928年至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兼新编第13军军长,后任第15军军长。1936年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37年至1938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部副参谋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白里安,阿里斯蒂德(1862—1932)——1926年至1931年任法国外交部部长。

白阳(金伯阳)——1931年至1932年任中共满洲省委职工部部长,为满洲省委候补委员、委员。1932年至1933年参加了满洲游击斗争。在战斗中牺牲。

白云梯——见布扬泰。

鲍曼,К. Я.(1892—1937)——1925年到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年至1932年为中央组织局委员,1929年至1930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年至1932年任党中央书记。1931年至1934年任党中央中亚局第一书记。1934年至1936年先后任党中央计划财政部、科学部部长。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鲍戈莫洛夫,Д. В.(1890—1937)——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贝尔,托马斯(1882—1940)——1921年至1929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政治书记处委员。1936年至1939年在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工作。

贝尔加维诺夫,С. А.(1899—1937)——1932年至1933年任远东边疆区委第一书记。1933年至1934年任东南铁路政治部主任。1934年至1937年任北方海上航线管理总局局长。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贝格尔,И. М.(原姓:兹日利克)(1904—1938)——1932年至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近东部顾问。遭非法

镇压,已恢复名誉。

贝克,雷蒙德(1897—?)(化名:杰克)——1924年至1934年为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34年至1935年任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1935年至1936年任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驻美国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美国局主席。后来在美国共产党内做党的工作。

贝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工作人员。

比森,托马斯 A.(1900—?)——美国东方学家。

别尔津,Я. К.(原名:屈吉斯,彼得里斯,化名:老头)(1889—1938)——1924年至1935年、1937年任工农红军参谋部(1935年起为总参谋部)第四局局长。1935年4月至1936年6月任特种红旗远东集团军副司令。1936年至1937年任西班牙共和国军总军事顾问。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波波夫,Н. Н.(1891—1938)——1930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3年至1937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书记。1922年至1932年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杂志编辑委员会工作。1935年至1938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波戈列利斯卡娅,А. В.(1902—?)——1932年至1934年为共产主义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实习研究员。1934年至1938年为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波捷帕洛夫,Н. П.(1907—?)——20世纪30年代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研究生。

波克利洛夫——见张闻天。

波斯特舍夫,П. П.(1887—1939)——1925年起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起为中央委员。1926年起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年起为中央组织局委员。1930年至1933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34年至1938年为中

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先后任几个州委的书记。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伯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工作人员。

伯克,戈登,L.——20世纪30年代任美国驻福州副领事、代领事。

伯纳德,达拉斯(1888—1975)——20世纪30年代任“英中联合会”主席。

卜士奇(化名:普罗列塔里耶夫)(1902—1964)——1926年至1933年在苏联学习和从事教学工作。1933年夏回国后投靠国民党。后来从事翻译、教学、外交和科研工作。

布哈林,И. И. (1888—1938)——1917年至1934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年至1929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年至1929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年至1932年为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后为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1934年至1937年任《消息报》主编。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布拉特科夫斯基(原姓:索哈茨基),叶日(1892—1933)——1929年至1932年为波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1月至12月任波兰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委员。1932年至1933年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工作。遭非法监禁,自杀身亡,逝世后恢复名誉。

布兰德勒,根里赫(1881—1967)——1919年至1923年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1年至1923年为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21年至1922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4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农民国际合作社部代表团领导人。1929年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联共(布)和共产国际。1933年起侨居法国和瑞士。

布劳德,埃尔(1891—1973)——1921年起为美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1929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年起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1924年至1935年为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31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33年起为政治书记处委员,1935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46年被开除出美国共产党。

布劳恩,奥托(化名:瓦格纳、卡尔、李德、华夫)(1900—1974)——1928年至1932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至1933年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成员。1933年至1935年任苏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后来从事教学、翻译和文学工作。

布龙科夫斯基(原姓:博尔特诺夫斯基,化名:布龙尼斯拉夫)(1894—1937)——1930年至1933年为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至1936年(间断地)任波兰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36年至1937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布留赫尔,B.K.(化名:加伦、乌拉尔斯基)(1890—1938)——1934年至1938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至1938年任特种远东红旗军司令。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布扬泰(白云梯)(1894—1980)——1924年至1928年、1931年至1933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年至1929年、1933年至1952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至1933年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1933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34年至1947年为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后来还在中华民国和国民党中担任一些行政和党的职务。

C

蔡廷锴(1892—1968)——1930年至193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

19 路军总指挥。1934 年至 1937 年引退。1937 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1939 年任第 16 集团军总司令。后来还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陈昌浩(化名:伊祖姆鲁多夫)(1906—1967)——1934 年至 1945 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6 年至 1937 年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成员。1932 年至 1933 年任红四军政治委员。1933 年至 1937 年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后来从事教学和翻译工作。遭非法迫害,逝世后恢复名誉。

陈诚(1898—1965)——1935 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 年至 1931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 11 师师长。1932 年至 1935 年任第 18 军军长。1936 年至 1937 年任晋陕绥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37 年任第 4 集团军总司令。

陈公培(1901—1968)——1932 年至 1934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 19 路军司令部参谋。1934 年起侨居国外。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一些政府职务。

陈果夫(1892—1951)——1929 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 年至 1932 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1928 年至 1932 年任监察院副院长。1933 年至 1937 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后来在中华民国担任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职务。

陈济棠(1890—1954)——1929 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 年至 1937 年任广东省国民革命军第 1 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次“围剿”南路军总司令、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总司令。1936 年至 1937 年侨居国外。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陈立夫(1900—2001)——1929 年至 1950 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 年至 1932 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2 年至 1939 年(断续)任部长。后来还在中华民国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陈铭枢(1890—1965)——1929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年至193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总司令。1933年底1934年初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1934年引退。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些职务。

陈丕时(1901—?)——新闻记者、企业家。20世纪30年代中期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驻苏联代表。1936年至1937年任中国政府经济委员会顾问。陈友仁之子。

陈乔年(化名:克拉欣)(1902—1928)——1927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年至1928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被国民党杀害。陈独秀之子。

陈潭秋(化名:徐杰)(1896—1943)——1927年至1928年、1930年至1943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4年至1937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1932年至1933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33年底1934年初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为中共驻江西中央分局委员。1935年上半年为福建游击运动领导人之一。1935年至1939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后来在新疆做党的工作。被盛世才杀害。

陈延年(1898—1927)——1927年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5年至1927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27年任中共江浙省委书记。被国民党杀害。陈独秀之子。

陈耀汉——1932年至1934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58师师长。

陈仪(1883—1950)——1935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年至1933年任军政政务次长。1934年至1937年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后来还担任一些政府职务。被蒋介石杀害。

陈友仁(化名:叶甫根尼·陈)(1879—1944)——1931年底

1932年初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3年为西南政治委员会委员。1933年底1934年初任福建省人民革命政府外交委员会主席。1934年至1938年侨居国外。

陈云(原名:廖陈云,化名:施平)(1905—1996)——1930年至1931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至1969年、1977年至1987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31年至1969年、1982年至1987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至1937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至1933年任中共中央特科科长。1932年至1933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1934年任中共中央驻红五军团特派员。1935年夏任中共中央驻上海特派员。1935年至1936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1936年至1937年在新疆做党的工作。后来还担任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职务。

程道南(化名:斯塔康诺夫)(1904—1963)——1930年至1933年任海参崴中国苏维埃党校校长。1933年至1938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海参崴站工作、在中国边疆列宁学校执教。后来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

褚民谊(1884—1946)——1926年至1928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年起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起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年至1935年任行政院秘书长。1938年底投靠日本。后被处决。

楚卡尔, М. И. (1897—?)——1931年至1934年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934年至1935年任红色工会国际出版委员会主席、《工会共产国际》杂志副主编。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川越茂(1881—1956)——1932年至1933年任日本驻“满洲国”大使馆参赞。1933年至1934年任日本驻广州总领事。1934年至1935年任日本驻天津总领事。1936年至1938年任日本驻

华大使。后来任日本外务省顾问。

茨维伊奇,斯特凡(1905—1936)——1934年至1936年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至1931年为青年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工作人员,1931年至1933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1933年至1935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35年至1936年任在维也纳出版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主编,1936年至1937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美国代表。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D

达西,塞缪尔·亚当斯(原姓:伦道夫)(1900/04—?)——1926年至1927年、1930年至1935年为美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1935年至1937年任美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英美书记处工作。1944年被开除出党。

大桥忠一(1893—1975)——1932年至1938年任“满洲国”外交次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外交职务。

德莱塞,特奥多(1871—1945)——美国作家。

邓发(化名:方林)(1906—1946)——1930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34年起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至1935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6年至1937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后来从事党的工作。在空难中牺牲。

邓尼金,А. И.(1872—1947)——1918年4月起任志愿军司令,10月起任总司令。1919年1月起任俄罗斯南方武装力量总司令。1920年起侨居国外。

邓文仪(1905—?)——1925年至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学习。后来在国民革命军中从事军政工作。1932年为“蓝衣社”组织者之一。1935年任中华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领导职务。

邓锡侯(1889—1964)——1932年至193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8军军长。1935年至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45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军政职务。

邓小平(1904—1997)——1945年至1969年、1973年至1987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55年至1969年、1977年至1987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至1966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75年至1976年、1977年至1982年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年至1976年、1977年至1981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1年至1989年任主席。1982年至1987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1931年至1933年先后任江西省中共瑞金县、会昌县县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红军报纸《红星》报主编。1934年至1937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邓演达(1895—1931)——1926年至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1927年至1930年侨居苏联、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1930年至1931年任与蒋介石相对抗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干事会总干事。后被蒋介石杀害。

邓颖超(1904—1992)——1945年至1956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56年至1985为中共中央委员,1978年至1985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3年在中共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部工作。1933年至1937年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周恩来之妻。

邓中夏(1894—1933)——1927年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委

员,1928年至1933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至1933年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1933年任全国互济总会党团书记兼主任。被国民党杀害。

迪尔——1932年至1936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站译电员。

丁超(1883—?)——1929年至1932年任东北边防军东路前敌总指挥。1932年任吉林省政府主席,后向日军投降。

董健吾(化名:王牧师)(1900—1970)——20世纪30年代为牧师,先后在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特科工作。遭非法迫害,逝世后恢复名誉。

董维江(音)——1935年任中国工农通讯社社长、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中国工人通讯》发行人。

董亦湘(化名:奥尔林斯基)(1899—1938)——1928年至1932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和工作。1932年至1933年在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933年至1937年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远东边疆区全权代表处工作人员。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董振堂(1895—1937)——1931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第25师第73旅旅长。1931年12月为第26路军起义部队领导人之一。1932年至1935年任红五军团军团长,1935年11月起任红五军军长。在战斗中牺牲。

杜克洛,扎克(1896—1975)——1926年起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31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至1964年任法共中央书记。1930年至1933年任法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35年至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杜重远(1897—1943)——1929年起任奉天工会会长。1931年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兼政治部副部长。1934年至1935年任《新生周刊》发行人兼总编辑。1936年至1937年因刊物

载文犯禁被监禁。1937年起新疆从事文教工作。后被盛世才杀害。

段锡朋(1897—1948)——1931年至1945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45年至1948年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为江西省秘密反共组织“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组织者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该组织瓦解。1932年至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后来还担任政府的一些职务。

多尔夫, M. A. (化名:涅姆琴科)(1897—?)——1928年至1930年任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20世纪30年代初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顾问。

E

恩斯特(原姓:詹姆斯)——1935年9月至1936年9月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

F

方振武(1882—1941)——1933年任察哈尔抗日民众联军总司令及北路前敌总指挥。1933年秋军队失败后引退。1937年任在巴黎出版的《国民公论》杂志总编辑。日军占领香港时牺牲。

方志敏(1899—1935)——1934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31年至1935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至1933年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1934年至1935年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后被俘,被国民党杀害。

樊嵩甫——1933年至193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79师师长。

菲赫曼, Д. М. (1903—1938)——1932年至1935年在党的出版社国际政治和共产国际部工作。1935年至1937年在红色教授

学院学习。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费迪,贝克(原名:谢菲克·梅赫迈特·休斯尼·奥格雷)(1900—?)——1925年至1927年、1935年至1937年任土耳其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先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几个书记处工作。1928年至1937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冯菊坡——1928年至1929年任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被捕后投靠国民党。

冯雪峰(1903—1976)——1934年至1937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2年任左翼作家联盟中共党团书记。1933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1933年至1936年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副校长。1936年至1937年任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后来从事党的工作和文学工作。

冯玉祥(1882—1948)——1928年至1929年、1931年至1948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3年5月至9月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1936年起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因轮船失火遇难身亡。

弗赖耶尔,Б.С.(1897—1937/38?)——1932年至193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英美书记处顾问。1934年至1936年在联共(布)中央工作。1936年6月至1937年7月任库西宁的政治助理。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弗洛赫,威廉(1897—1939)——1932年至1934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经济技术部工作。1934年12月至1935年6月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弗洛林,威廉(1894—1944)——1923年至1944年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9年为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年至1933年任德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31年为来自德共的共

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2年至1933年、1935年、1941年(断续)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1933年至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5年至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候补委员,1935年至1939年为书记处委员。1941年起为驻苏的德共外国局委员。

伏罗希洛夫, K. E. (1881—1969)——1921年至1961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年至1960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5年至1934年任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年至1940年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福京, H. A. (1899—?)——1930年至1933年任红色工会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傅伯翠 (1896—?)——20世纪30至40年代为闽西农民运动领导人。后来还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政府职务。

傅作义 (1894—1974)——1935年至1949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至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后来还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G

冈野进(野坂参三) (1882—1993)——1925年起为日共中央委员。1946年至1970年为日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前为政治局)委员。1931年至1936年任日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35年至1939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高福源——193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67军团长。

高文华(化名:老高) (1904—?)——1931年至1932年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3年至1934年在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机关工作。1935年至1936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书

记。1936年至1937年在延安学习。后来还从事一些党政工作。

高自立(化名:周和生)(1900—1950)——1934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土地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8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1935年至1938年为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后来从事一些党政工作。

戈利采夫, A. K. (1902—?)——1931年至1934年在苏联驻德国商务代表处工作。1934年至1935年6月为外贸工作人员。1935年7月至12月任季米特洛夫的政治助理。

戈帕涅尔, C. H. (1880—1966)——1918年至1919年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1925年至1927年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1928年至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1931年至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部部长,1935年至1936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干部培训部部长。1945年起从事科研工作。

戈瓦尔德, 罗易(1883—1964)——美国新闻记者和报纸出版商、《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主编、“斯克里普斯—戈华德”报刊联合企业董事长。

哥特瓦尔德, 克列门特(1896—1953)——1925年起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至1945年任总书记,1945年起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1945年起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理,1948年起任总统。1928年至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格伯特, H. H. (原姓:塞德勒,化名:库尔特·埃尔温)——1931年至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格拉斯, 弗兰克(化名:李富仁)(1901—1988)——南非新闻记

者,1932年至1933年在塔斯社驻上海记者站工作。

格雷,艾尔内(原名:津格尔,З.) (1893—1980)——1931年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顾问。1934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西班牙代表团成员。1936年至1939年任匈牙利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

格列尔,Л. Н. (1875—1938)——1930年起在国际列宁学校执教。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格斯,鲁道夫(1894—1987)——1925年至1933年为希特勒的私人秘书,1933年起为其副手,1939年起为其继承人之一。后自杀身亡。

古柏(1906—1935)——1931年至1933年任江苏省苏维埃政府法庭庭长、内务人民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委员。1934年至1935年任闽粤赣游击纵队队长。在战斗中牺牲。

古特曼,约瑟夫(1902—1958)——1929年至1933年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治局委员。1931年至193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政治书记处委员。1933年被开除出党。

顾顺章(1904—1935)——1927年至1931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年至1928年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年至1931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11月至1931年4月任中共中央特科科长。1931年4月被捕叛变,后被蒋介石处死。

顾作霖(1908—1934)——1928年起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1934年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至1933年为中共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任共青团苏区中央执行局书记。1933年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1934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广田弘毅(1878—1948)——1930年至1933年任日本驻苏联大使。1932年至1938年(断续)任日本外相。1936年3月至

1937年2月任日本首相。被东京国际法庭处决。

郭绍棠(化名:克雷莫夫)(1905—1989)——1925年至1927年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9年至1932年先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机关工作和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2年至1933年为联共(布)中央指导员。1934年至1938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遭非法迫害。1938年至1954年被监禁和流放,后被平反。1955年起在苏联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

H

哈迪,乔治(化名:格奥尔格,乔治)(1884—1966)——1929年至1930年任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1930年起在红色工会国际机关工作。

哈赞金, M. A. (1906—?)——1928年至1932年先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上海站和哈尔滨站工作。1933年至193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务部供应代理人。

豪兹,詹姆斯——20世纪30年代任美国驻上海商会秘书。

郝德杰,安德留(1884—1951)——1935年至1937年任香港总督。

何长工(1900—1987)——1934年至1937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红五军团第13军政治委员。1933年至1934年先后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粤赣地区军区司令兼政治委员。1935年至1936年任第9军团政治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何键(1887—1956)——1935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年至1937年先后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第4路军总指挥。1937年任内政部部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何克全(化名:凯丰)(1906—1955)——1934年至1945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34年至1937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年至1945年为政治局委员。1931年至1935年为共青团中央委员。1934年至1937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至1932年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1932年至1935年任共青团中央执行局书记。1934年至1935年任中共中央驻第9军团代表。1936年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党的职务。

何香凝(1879—1972)——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廖仲恺遗孀。

贺国光(1885—1969)——1932年至1934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副厅长,1934年任第二厅副厅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参谋团主任。1935年至1937年任重庆行营参谋长、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秘书长。后来还在中华民国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贺龙(1896—1969)——1945年至1969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56年至1959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至1937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至1934年任红二军团总指挥。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领导职务。

赫尔岑, А. И. (1812—1870)——俄国革命者、作家、哲学家。

黑克尔特, 弗里茨(1884—1936)——1919年起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8年至1929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3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1934年至1935年为委员。

亨里赫松, Г. М. (1905—?)——1931年至1935年为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学生。1935年至1937年先后在共产主义科学院(1936年起改名为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在国际列宁学校执教。

胡鄂公(1884—1951)——20世纪30年代任财政部长孔祥熙

的私人顾问。

胡汉民(1879—1936)——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至1936年旅居香港。

胡秋原(1901—?)——1931年至1933年任《文化评论》杂志主编。1933年底为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员。1934年至1936年侨居国外。后来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和教学工作。

胡适(1891—1961)——1931年至193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来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和外交工作。

胡愈之(1896—1986)——1932年至1933年任《东方杂志》主编,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至1937年任《世界知识》杂志主编。后来还从事编辑、出版工作。

胡鹤——1930年至1931年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1931年至1932年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被捕后投靠国民党。

胡宗南(1896—1962)——1930年至193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师长。1936年至1937年任第1军军长。

黄郛(1880—1936)——1933年至1934年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黄慕松(1884—1937)——1931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1年底任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指导委员兼参谋本部次长。1932年任中国出席国际军缩会议全权代表,9月任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1933年9月任陆军大学校长。1934年任中国政府赴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特使。1935年至1936年任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至1937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黄平(化名:沃罗夫斯基)(1901—1981)——1927年至1928年、1930年至1932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至1932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委员。1931年至1932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1932年12月被捕,1933年投靠国

民党。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翻译和教学工作。

黄任寰——1932年至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1军独立第1师师长。

黄文杰(化名:科尔萨科夫)(1902—1940)——1932年至1933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3年至1934年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职工部部长。1934年10月至1935年2月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执行局代理书记、书记。1935年至1937年被监禁。后来还做党的工作。

黄文容(化名:黄玠然)——1934年1月至3月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组织部部长。1934年4月被捕。

黄旭初(1892—1975)——1931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5年起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至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第15军军长。20世纪30至40年代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后来还在中华民国担任一些党政工作。

J

基奥尼格, A. E.——20世纪30年代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站工作。

基洛夫, C. M. (1886—1934)——1923年起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年起任列宁格勒省委(州委)第一书记和联共(布)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1930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被暗杀。

基萨诺娃, К. И. (1888—1947)——1925年至1937年任国际列宁学校副校长、校长。1932年至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妇女书记处主任。后来从事党的宣传工作。

吉巴尔蒂, 路易(原名:多博什, 拉斯洛)(1895—1967)——1933年至1934年为国际工人救济会驻德国和法国工作人员。

吉布列尔, 格尔曼(1901—?)——1932年至1935年为工农红

军参谋部(1935年改名为总参谋部)第四局驻华工作人员。

吉洪年科, B. A. (1905—?)——1930年至1933年在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当翻译。1933年8月至12月为共产主义科学院科研人员。1933年12月至1937年9月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执教。

吉鸿昌(1895—1934)——1930年至1931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2路军总指挥。1931年起引退。1933年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2军军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被国民党杀害。

吉佐(原名:拜伊,爱德华)(1906—?)——1931年1月起为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1927年至1932年为法国共产党在巴黎区的几个委员会的成员,1929年至1930年为法国共产党在巴黎区的军事机关的工作人员。1932年起为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1932年至1933年为反帝联盟机关工作人员。1932年2月起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英美书记处副主任。

季米特洛夫, 格奥尔基(化名:格尔穆特)(1882—1949)——1948年起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14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5年起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至1934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34年起为主席团委员。1929年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西欧局主席。1934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和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委员。1935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1943年至1944年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新闻部部长。1946年起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季诺维也夫, Г. Е. (原姓:拉多梅斯利斯基)(1883—1936)——1907年至192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至1927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年至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1928年起任喀山大学校长。1931年起为教育人民委

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1932年至1933年在库斯塔索市流放。1933年起为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管理委员会委员、《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纪德,安德烈(1869—1951)——法国作家。

加尔维, П. А. (1881—1944)——工会活动家、孟什维克。1922年起侨居国外。

加拉罕, Л. М. (原姓:加拉罕尼扬,化名:米哈伊洛夫,沙赫)(1889—1937)——1918年至1920年、1927年至1934年任苏俄(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1923年至1926年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加米尔顿,杰拉德——20世纪30年代为英国反战委员会委员。

加米涅夫, Л. Б. (原姓:罗森菲尔德)(1883—1936)——1917年至192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至1925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1年至1924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至1926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1923年至192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会议副主席。1922年至1924年任苏联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4年至1926年任主席。1923年至1926年任列宁研究所所长。1932年至1933年在米努辛斯克市流放。1933年任“学院”出版社社长。1934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贾德干,亚历山大(1884—1968)——1933年起任美国驻华公使、1934年至193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

蒋鼎文(1895—1974)——1935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至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9师师长。1933年至1934年任第2军军长。1934年至1936年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1936年至1937年任西北军前敌总司令。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蒋光鼐(1888—1967)——1932年至193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总指挥。1933年底任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1934年至1937年旅居香港。后来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蒋介石(蒋中正)(1887—1975)——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至1937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至1938年任主席。1932年起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28年至1931年任国民政府主席。1930年至1931年、1935年至1938年任行政院长。1932年起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后来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领导人。

蒋经国(化名:叶利扎罗夫)(1910—1988)——1925年至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至1930年在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至1937年在苏联工作。1937年起在中国担任一些党政职务。1978年至1988年在台湾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之子。

蒋廷黻(1895—1965)——1929年至1935年任北平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35年至1936年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1936年至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后来还担一些行政院和外交职务。

杰伊温·弗里达——20世纪30年代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工作。

金——20世纪30年代初为朝鲜共产党中央驻上海代表。

K

卡冈诺维奇, J. M. (1893—1997)——1923年至1924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年至195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年至1926年、1928年至1946年为中央组织局委

员。1926年至1929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至1957年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

卡拉-穆尔扎, Г. Е. (1906—1945)——1928年起在中国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932年至1939年在莫斯科东方学院执教。1939年至1941年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执教,同时在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939年至1941年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空难中牺牲。

凯洛格, 弗兰克, Б. (1856—1937)——1925年至1929年任美国国务卿。

坎宁格, 埃德温 (1868—?)——1919年至1935年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

康生 (张叔平, 化名: 老板、赵容) (1898—1975)——1934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 1934年至1956年、1962年至1975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6年至1962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3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5年至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 1933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候补委员。1931年至1933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至1937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后来还担任一些党的领导职务。去世后于1980年被开除出党。

科尔德-马歇尔, 罗伯特——1928年至1945年任英国驻上海商会会长。

科捷利尼科夫, Ф. С. (1893—1972)——1931年至1940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1937年至1939年任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代所长。1936年至1939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党委书记。

科斯坦尼扬, Г. (1895—1938)——1931年至1934年任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执行局共产党党团局书记、委员。遭非法镇

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科兹洛夫斯基,Б. И.(1899—1975)——1927年至1936年任苏联驻上海总领事。1936年起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二司司长。

克拉克,乔恩(化名:久蓬)(1890—1938)——1932年至1933年任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

克诺林,Б. Г.(化名:索科利克)(1890—1938)——1926年至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年至1928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35年任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28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西欧局候补委员。1929年至1932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欧书记处领导人。1931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31年至1933年为政治书记处委员,同时在1932年任红色教授学院院长。1933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孔宪荣(1881—1948)——1931年起任东北抗日救国军第1路军副司令。1933年至1937年任东北抗日救国军副司令。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自杀身亡。

孔祥熙(1880—1967)——1929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1年起为委员。1933年至1944年任财政部长。后来还担任一些行政职务。

孔原(陈铁铮,化名:田夫、田心)(1906—1990)——1934年至1945年、1956年至1969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73年至1982年为中央委员。1932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至1935年任中共中央驻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1935年至1938年在苏联工作和学习,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后来做党的工作。

库恩,贝拉(1886—1938)——1920年至1936年为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1935年至1936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委员。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库丘莫夫, В. Н. (1900—?)——1929年至1930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副部长,1931年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杂志主编。1933年至1935年在国际列宁学校执教。1935年至1936年为王明的政治助理,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美中美书记处副主任。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库特尼克, Э. Г. (1899—?)——1931年至1932年任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弗拉迪沃斯托克局副主席。1932年至1935年任红色工会国际英美部副部长。1936年至1937年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洛佐夫斯基的第一助理。

库西宁, 奥托 (1881—1964)——1941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至1939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执行委员会书记。1926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1928年至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主任。

库兹涅佐夫, М. К. (1891—1937)——1931年至1932年任中东铁路管委会副主席。

匡会安(音)——1932年为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人员。

L

拉狄克, К. Б. (原姓:索贝尔松) (1885—1939)——1932年至1936年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新闻局局长,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拉霍米亚吉, П. И. (1906—1981)——1930年起在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政治工作,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战委员会领导人。1933年至1934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新闻

局局长。1934年至1936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美书记处主任。1934年至1935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杂志主编。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莱特—罗斯,弗雷德里克(1887—1968)——1932年为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同时为国际联盟经济委员会委员,1936年至1938年任经济委员会主席。1935年至1936年任英国研究中国财政状况代表团团长。

莱谢,卡尔(化名:马利、季奥尼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工作人员。

赖安,蒂姆(原名:沃尔德龙,弗朗西斯,化名:詹尼斯,尤因、米尔顿)(1904—1961)——1931年至1934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1937年至1938年任美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38年起为美共全国委员会委员,1946年至1957年任总书记,1957年至1959年任书记,1959年至1961年任全国委员会主席。

赖赫曼,路德维希(1881—1965)——1933年10月至1934年夏任国际联盟与中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代表。

赖斯纳,И. М. (1898/99—1958)——1925年至1935年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学院执教和在国际土地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同时在1934年至1938年间任莫斯科大学教研室主任。

赖特,И. Л. (1892—?)——1928年至1937年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

兰普森,麦尔斯(1880—1964)——1927年至1934年任英国驻华公使。

雷利斯基,И. А. (原名:柳比涅茨基,Я. А.,化名:奥斯藤)(1893—1937)——1930年至1931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1931年至1934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工作人员,1934年至1935年任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遭非法镇压,逝

世后恢复名誉。

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2年至1923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3年起为中央委员。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被张作霖杀害。

李得钊(化名:莫杰斯托夫)(?—1934)——1931年至1932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33年至1934年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长。1934年3月至7月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被国民党杀害。

李杜(1880—1956)——1932年任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同年被张学良委任为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1933年1月在日军逼迫下,率领军队进入苏联境内。1934年至1935年为中华全国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委员。1936年至1942年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1942年引退。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担任一些行政职务。

李复生(原名:林育英,化名:林仲丹、张浩)(1897—1942)——1930年起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0年至1932年被监禁。1932年至1933年任中国海员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1933年至1935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红色工会国际代表。1936年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后来还从事一些军政工作和党的工作。

李济深(1886—1959)——1926年至1933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年至1931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1932年至1933年任鄂豫皖地区国民革命军司令。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任福建省人民革命政府主席。1934年至1938年旅居香港,系中国国民革命同盟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李可夫, А. И. (1881—1938)——1907年至1912年、1934年

至193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05年至1907年、1920年至1934年为中央委员。1924年至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1926年至1930年任苏联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1931年至1936年任邮电人民委员。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李克农(1899—1962)——1931年至1932年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1932年至1935年任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1935年至1936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联络局局长。1937年为中共驻西安办事处成员。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务部门和外交部的领导工作。

李立三(化名:柏山、拉宾、李明)(1899—1967)——1927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年至1931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年至1945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1932年至1935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8年至1940年被监禁,后恢复名誉。回国后,1949年担任一些党政职务。1967年自杀身亡。

李默庵(1904—?)——1930年至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10师师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李石曾(原名:李煜瀛)(1881—1973)——1924年至1952年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至1937年任北平研究院院长。

李士超——1934年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李维汉(化名:王金、罗迈)(1896—1984)——1925年至1928年、1930年至1931年、1956年至1969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34年至1956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至1931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至1933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1933年至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4年至1937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还从事一些党政工作。

李维诺夫, M. M. (1876—1951)——1934年至1941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0年至1939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期间1934年至1938年任苏联驻国际联盟代表。

李慰农 (1895—1925)——1925年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被奉天军阀杀害。

李侠天 (音) (?—1934)——20世纪30年代任新疆空军司令。被盛世才杀害。

李延禄 (1895—1985)——1931年任抗日救国军团参谋长,1932年至1933年任团长。1934年至1938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军长兼政委。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李延年 (1904—1974)——1932年至1934年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88师副师长、第9师师长、徐州警备司令。1934年至1945年任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李云杰 (1893—1935)——1931年至193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7军军长。

李宗仁 (1891—1969)——1929年至1931年任桂系军队总司令。1932年至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李竹声 (化名:斯拉文) (1903—1978)——1931至1934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至1934年任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1934年6月被捕后投靠国民党。

利顿, 维克托、亚历山大、乔治、罗伯特 (1876—1946)——勋爵, 1931年至1932年任国际联盟日中冲突调解委员会主席。

梁冠英 (1895—1968)——1932年至193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2师师长。后来还担任军事职务。

廖承志 (1908—1983)——1945年至1949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49年至1969年、1973年至1981年为中共中央委员, 1981

年至1985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年至1933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1933年3月至9月被监禁。1934年被张国焘逮捕。1936年获释,在党内恢复名誉。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廖划平——1930年至1931年任中共河北省军事委员会书记。被捕后投靠国民党。

列别杰夫——1931年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塔什干代表。

列梅勒,戈尔曼(1886—1939)——1923年起为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1924年至1933年任德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年至193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后来从事科研和宣传工作。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列宁,В. И.(乌里扬诺夫)(1870—1924)——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和学说的继承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苏联的缔造者。

林彪(1906—1971)——1945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55年起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31年至1936年任红一军团军团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化名:科米萨罗夫)(1885—1960)——1938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45年起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至1926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6年至1927年为委员。1928年至1933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1933年至1934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人民委员、财政人民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林炯——见王德。

林云陔(1881—1948)——1928年至1931年任广州市市长。1931年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1932年至1936年任广东省政府主

席。后来还担任一些行政职务。

刘长胜(化名:罗英)(1903—1967)——1945年起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56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26年至1933年在苏联远东学习和工作。1933年至1935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1936年至1937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局执行局主任。后来还从事党的工作和工会工作。

刘鼎(1903—1986)——1929年至1933年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工作人员。1933年至1935年在闽浙赣苏区从事军事政治工作。1935年至1936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36年任中共中央驻张学良东北军代表。后来还从事一些军政工作。

刘和鼎(1895—1969)——1924年至193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56师师长。1933年至1937年任第39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刘芦隐(1894—1969)——1929年至193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至1932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主任、考试院副院长。1932年至1935年引退。1935年至1937年在华东南从事行政工作和党的工作。1937年至1949年被监禁。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科研和政协工作。

刘文辉(1895—1976)——1928年至1933年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31年至1933年任四川省政府民政厅厅长。1934年至1936年为国民党西康省党部领导人。后来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担任一些军事、行政职务。

刘文龙(1870—1950)——1928年至1933年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主席。1933年至1934年因与盛世才矛盾被软禁。后来还担任政府的一些职务。

刘亚楼(刘振东)(1910—1965)——1956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31年至1933年任红1军团第11师政治委员,1933年至1935年、1936年任第2师政治委员,1935年任第1师政治委员。

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刘湘(1888—1938)——1935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至1934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1934年起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37年任国民党第23集团军总司令。

刘英(1903—1942)——1932年任红15军第44师政治委员。1933年任红9军团第3、第14师政治委员。1934年任红7军团政治部主任、红10军团军团长。1935年至1938年为闽浙边区游击运动领导人,任中共闽浙边区临时委员会书记。后来还从事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被国民党杀害。

刘镇华(1882—1955)——1933年至1937年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11路军总指挥。1937年引退。

刘中华(音)——1935年3月至7月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执行局代理书记。

卢茨基, В. Б. (1906—1962)——1932年4月至8月任红色工会国际东方殖民地部阿拉伯国家顾问。后来从事科研教学工作。

卢福坦(1890—1969)——1928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28年至1930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至1932年为政治局委员。1931年7月至8月任中共中央代总书记。1931年至1932年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党团书记、组织部部长。1933年1月投靠国民党。1951年起被监禁,后被判处死刑。

鲁德尼克, Я. М. (化名:牛兰、鲁埃格)(1894—1963)——1928年至1931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上海站工作。1931年至1937年在中国被监禁。1940年起在苏联从事教学工作。И. Н. 莫伊谢延科—韦利卡娅之夫。

鲁特, 埃利——1931年至1932年为红色工会国际打字员。黄平之妻。

吕文远(化名:阿英、李亚英)——1934年9月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34年10月至11月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组织部部长。1934年11月底被捕。

罗炳辉(1897—1946)——1930年至1934年任红1军团第12军军长。1935年任红9军团军团长。1935年至1938年先后任红3军军长、红32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罗传华(1902—?)——1928年至1934年任中国基督教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工业问题书记。1934年至1937年任中国饥民救济国际委员会新闻处主任。

罗登贤(1905—1933)——1928年至1933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8年至1931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至1933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年至1931年(断续)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中共党团书记。1931年至1932年任中共中央驻满洲特派员,后任满洲省委书记。1932年至1933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局书记。被国民党杀害。

罗戈夫, B. H. (1906—?)——1930年8月至1934年8月任哈尔滨中东铁路管理局翻译处处长。1935年至1937年先后在国际列宁学校执教和在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罗米纳兹, B. B. (化名:伯纳)(1897—1935)——1925年至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为中央委员,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1925年至1926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6年为青年共产国际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年7月至11月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1931年至1932年从事经济工作。自杀身亡。

罗明(1904—1984)——1932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代书记,为福建省苏区政府成员。1933年至1934年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院教

务部主任。1935年任红3军团政治部科长。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教学工作和担任政府职务。

罗斯福,富兰克林 D. (1882—1945)——1933年至1945年任美国第三十二届总统。

罗文干(1888—1941)——1931年至1934年先后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外交部部长。后来还担任政府的一些职务。

罗亦农(化名:布哈罗夫)(1902—1928)——1927年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主任。1927年至1928年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被国民党杀害。

罗易,马纳本德拉·纳特(1892—1954)——1927年至1928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1928年被开除出印度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罗章龙(1896—1995)——1925年至1927年、1928年至1931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9年至1930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秘书长。1930年9月至1931年1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1931年1月因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后来从事教学工作。

罗卓英(1896—1961)——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1师师长,1933年任第5军军长,1933年至1935年任第18军副军长,1935年至1937年任第18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洛吉诺娃,Л. А. (1901—?)——1931年至1932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秘书。

洛加诺夫斯基,М. А. (1895—1938)——1931年至1934年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34年至1937年为外贸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任外贸副人民委员。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洛佐夫斯基, C. A. (原姓: 德里佐, 化名: 亚历山大) (1878—1952)——192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1937年起为中央委员。1921年至1937年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24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6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委员。1937年至1939年任国家图书出版社社长。1939年至1946年任外交部副部长。遭非法镇压, 逝世后恢复名誉。

M

马步芳(1903—1975)——1931年至1934年任国民革命军第9师师长。1934年至1935年任第2军军长兼第100师师长。1936年任青海省政府代主席。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外交职务。

马纯古(音)——1934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秘书。

马尔戈利斯, П. A. (1878—?)——1931年至1937年任国际列宁学校副教授。遭非法迫害, 后恢复名誉。

马尔利, 达德利, J. A. (1884—1952)——英国工党活动家。1930年至1941年任英国上议院副议长。

马尔蒂, 安德烈(1886—1956)——1931年至1932年为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年至1932年任法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32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委员。1935年、1939年为政治书记处委员。1935年至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1935年至1941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英美加拿大书记处委员, 同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代表。

马鸿宾(1884—1960)——1933年至1937年任革命革命军第35师师长。后来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一些军事、行政职务。

马鸿逵(1892—1970)——1931年至1948年任宁夏省政府主

席。后来在中华民国担任一些军事、行政职务。

马季亚尔 Л. И. (米尔高夫, 莱奥什) (1891—1940)——1929年至193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遭非法镇压, 逝世后恢复名誉。

马克思, 卡尔 (1818—1883)——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

马麟 (1876—1945)——1931年至1933年任青海省政府代主席, 1933年至1936年任主席。1936年至1937侨居国外。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马秋什金, С. В. (1903—?)——1932年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责任秘书。

马相伯 (1840—1939)——学者、社会活动家。

马占山 (1885—1950)——1931年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32年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1933年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马仲英 (1912—1937)——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6师师长。1933年为新疆省政府成员。在空难中牺牲。

马祖特, И. Д. (迈兹利克) (1899—1937)——1931年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1933年起先后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从事党的工作和经济工作。遭非法镇压, 逝世后恢复名誉。

曼达良, Т. Г. (1901—?)——1933年至1934年在苏联驻法国商务代表处工作。1935年在沃罗涅日州工作。1936年7月至1937年1月任季米特洛夫的政治助理。

曼努伊尔斯基, Д. З. (1883—1959)——1923年至1952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4年至1928年为中央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毛岸青 (1923—)——毛泽东之子。

毛岸英(1922—1950)——毛泽东之子。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

毛秉文(1891—1970)——1932年至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7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毛维寿(1897—1937)——1931年至193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第61师师长。1934年至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7路军总指挥。

毛泽东(1893—1976)——1923年至1924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5年至1927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30年至1934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4年起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至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至1932年为中共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代书记、书记。1931年至1937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领导工作。

毛泽民(化名:周彬)(1896—1943)——1932年至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行行长、财政部长。1935年任红一、四方面军总供应部副部长。1936年至1937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人民委员。后来在新疆工作。1939年至1940年在苏联治病。后被盛世才杀害。毛泽东之弟。

毛泽覃(1905—1935)——1931年至1933年任中共永丰、吉安、泰和县特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员。1934年至1935年为闽赣边区游击运动领导人。在战斗中牺牲。毛泽东之弟。

梅尔纳尔克(斯)尼斯, A. И.(1905—1990)——1930年至1933年先后在共产主义科学院中国研究所、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梅龚彬(1900—1945)——1931年至1933年任《文化评论》杂志总编辑。后来从事教学工作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人大担任一些职务。

梅利曼, C. M.(1896—1978)——1926年至1936年在东方劳

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外国部执教并任教学部主任。1930年至1934年为红色教授学院学员。1934年至1936年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干部处处长。后先后在苏联科学院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梅利尼科夫, Г. И. (1905—?)——1934年为国际土地研究所研究生, 同时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执教。

梅灵, 里哈德 A. (1900—1938)——1923年至1928年为来自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组织局)成员。1930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几个书记处的工作人员。1935年至1937年任爱沙尼亚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遭非法镇压, 逝世后恢复名誉。

孟庆树(1905—1983)——王明之妻。

米夫, П. А. (原名: 福尔图斯, M. A.) (1901—1939)——1928年至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1935年至1936年任季米特洛夫的政治助理。1937年任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所长。遭非法镇压, 逝世后恢复名誉。

米哈伊洛夫, Б. Д. (化名: 威廉斯) (1895—?)——1926年至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欧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的代表。1934年8月至1935年任季米特洛夫秘书处责任秘书。1935年至1938年任《真理报》外国部主任。

缪勒, 海因茨 (原姓: 格雷布, 化名: 亚洲人、希佩、汉斯、埃里克) (1897—1941)——1926年至1927年、1932年至1941年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在同日本人的战斗中牺牲。

缪岑贝格, 威廉 (1889—1940)——1927年至1938年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4年至1933年为来自德共的德国国会议员。1921年至1922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至1938年为国际工人救济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领导之一。1927年至1933年任反帝联盟书记。1938年被驱逐出德共中央,

1939 年被开除党籍。

明古林, И. Г. (1900—1937?)——1928 年至 1937 年(断续)在国际列宁学校执教。1933 年 2 月至 9 月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英美书记处责任秘书, 1933 年 9 月至 1935 年 6 月为英美书记处执行局候补委员, 1935 年 6 月起任英美书记处副主任。1935 年 12 月至 1937 年 1 月任马尔蒂的政治助理。

莫尔德维诺夫, Г. И. (1896—1966)——1930 年 12 月至 1935 年 11 月先后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中国和驻蒙古的工作人员。1935 年至 1936 年在莫斯科东方学院学习。1936 年至 1938 年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8 年 8 月至 1940 年 9 月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高级顾问。

莫罗佐夫——1932 年任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俱乐部主任。

莫洛托夫, В. М. (1890—1986)——1920 年至 1931 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1921 年至 1927 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1 年至 1930 年任中央书记, 1921 年至 1926 年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候补委员, 1926 年至 1957 年为委员。1930 年至 1941 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1939 年至 1949 年、1953 年至 1956 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

莫伊谢延科—韦利卡娅, И. Н. (化名: 牛兰、鲁埃格) (1891—1964)——1930 年至 1931 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上海站工作。1931 年至 1937 年在中国被监禁。1941 年至 1943 年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后来从事编辑、出版工作。Я. М. 卢德尼克之妻。

墨索里尼, 贝尼托 (1883—1945)——意大利的独裁者、意大利法西斯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犯之一。

N

纳尔逊, 斯蒂文 (化名: 埃万斯、斯蒂文) (1903—1993)——1931 年

至1933年为国际列宁学校学员。1934年至1936年在美国从事工会工作和党的工作。1936年至1939年任西班牙第十五国际旅政治委员。

纳奇布尔—休格森, X. M.——1936年任英国驻华大使。

纳索诺夫, H. M. (化名:查理、小青年)(1902—?)——1932年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黑人部部长。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内田康哉(1874—1965)——1930年至1931年任日本驻法国大使。1931年任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团团长。1932年任日本外相。1932年至1940年任日本议会上议院议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外交职务。

涅夫勒, H. M. (1896—1938)——1931年至1932年任北满委员会书记。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聂荣臻(1899—1992)——1945年至1982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59年至1969年、1977年至1982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至1937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红1军团总政治部副主任、政治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和党的职务。

牛曼,海因兹(1902—1937)——1927年至1929年为德共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至1932年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1929年至1932年任《红旗》报主编。1924年至1931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1931年至1932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35年起任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翻译。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P

潘家宸(化名:克柳耶夫)(1904—1932?)——1928年至1930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1931年起在鄂西苏区做党的工作。在

党的机关和红军部队的“肃反”运动中被镇压。

潘汉年(化名:伯林、小K、小开)(1906—1977)——1934年至1937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副外交人民委员。1931年至1933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特务部情报科科长。1933年至1934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1934年至1935年先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5年秋至1936年秋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1936年至1937年在中国从事党的工作。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潘问友(化名:多罗宁)(1906—?)——1925年至1928年在苏联学习。1928年至1930年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被捕后投靠国民党,后被国民党杀害。

佩里,加布里埃尔(1902—1941)——《团结》报编辑。被盖世太保逮捕、杀害。

佩列维尔泰洛, A. C.(1897—1990)——1932年至1935年为莫斯科东方学院的学生、研究生。1935年至1937年在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同时在莫斯科东方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937年至1942年任莫斯科东方学院教研室主任、副院长。后来从事科研工作。

彭德怀(化名:清宗)(1898—1974)——1934年至1936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6年至1969年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至1937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至1937年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领导职务。

皮克,威廉(1876—1960)——1928年至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年至1931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1935年至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和主席团委员。

皮利尼亚克, Б. А. (沃高)(1899—1941)——苏联作家。

片山潜(1859—1933)——1922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年至1933年(断续)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美英书记处委员。1928年至193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委员。

皮亚塔科夫, Г. Л.(1890—1937)——1923年至1927年、1930年至1936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0年至1932年为全苏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任全苏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起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皮亚特尼茨基, И. А.(原姓:塔尔希斯,化名:米哈伊尔、皮亚特尼查)(1882—1938)——1920年至1931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年至1927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至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起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1926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1928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普拉格尔, П. А.(1901—?)——1933年至1935年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工作。1936年至1937年为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研究室副主任。

溥仪(1906—1967)——1909年至1912年为中国皇帝。1932年至1934年为伪满洲国统治者,1934年至1945年为伪满洲国皇帝。1945年至1959年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禁。

Q

齐华[谢云山(音)](1900—?)——1931年至1932年任在柏林出版的中共中央新闻通讯《中国工人通讯》主编。

齐默尔曼, Б. Г.(1902—?)——1924年5月至1933年1月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新闻部和组织部的速记员、打字员、秘书兼翻

译。1933年至1937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工作。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钱壮飞(1895—1935)——1930年至1931年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工作，后转入江西瑞金，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至1932年任红军国民军事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2年至1933年任红一方面军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3年至1935年任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二局副局长。1935年任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在战斗中牺牲。

切贝金, A. B. (1904—?)——1935年至1937年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同时1935年10月至1937年11月在国际列宁学校执教。

切尔诺夫, И. Е. (奥瓦季斯) (1900—1959)——1932年至1935年为塔斯社驻上海记者。后来从事编辑、出版和翻译工作。

切尔诺莫尔季克, М. Б. (1889—1937)——1931年至1932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指导员。1932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务部副部长。1932年至193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副部长。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秦邦宪(化名:博古、波戈列洛夫)(1907—1946)——1931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31年至1945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9月至1934年1月、1935年至1945年任中共中央书记。1934年1月至1935年2月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35年至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4年至1937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至1936年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1936年至1937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任。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党的职务。在空难中牺牲。

秦曼云(化名:阿基莫娃)——1934年为中共上海中央局会计。盛忠亮之妻。

琼森, K. 3 (原姓:扬松, 化名:陈查理)(1882—1939)——1929年至1930年任红色工会国际东方殖民地部副部长, 1930年至1936年任部长。1930年为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符拉迪沃斯托克局领导人。1933年起在国际列宁学校执教。遭非法镇压, 逝世后恢复名誉。

邱毓芳——盛世才之妻。

瞿秋白(化名:狄康、斯特拉霍夫)(1899—1935)——1925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年至1930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委员。1928年至1930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团长。1931年至1935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至1935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被国民党杀害。

R

任弼时(化名:布林斯基)(1904—1950)——1927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 1927年至1928年、1931年至1950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至1933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中央局委员。1931年至1937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委员。1933年至1934年任中共湘赣边区省委书记。1934年至1936年先后任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中共湘鄂川黔委员会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后来还担任党的一些职务。

S

萨巴季耶, Г.——1936年任法国驻华武官。

萨发罗夫, Г. И. (1891—1942)——1929年至193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遭镇压, 未恢复名誉。

萨拉托夫采夫, П. Г.——1935年至1937年任苏联驻华代表处新闻处处长。

赛克特, 汉斯·冯(1866—1936)——1920年至1926年任德国陆军总司令。1926年起引退。1930年至1932年为德国国会议员。1934年至1935年任中国政府总军事顾问。

瑟索耶夫, B. E. (1904—?)——1929年至1930年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顾问。1930年至1931年为中东铁路工作人员。1931年10月起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人员。1932年至1934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主任。

邵力子(1882—1967)——1932年任甘肃省政府主席。1933年至1936年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来在中华民国从事外交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政府的一些职务。

绍尔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信使。

绍姆贝格, P. (1880—1958)——英国军人、外交官。

舍伊纳赫, 保尔(原名: 霍韦尔别克·冯)(1860—1954)——1922年至1933年为德国民权保障联盟成员。

盛世才(1897—1970)——1930年至1932年任新疆边防督办公署参谋。1932年至1933年任新疆国民革命军第1师师长。1933年至1944年为新疆省实际统治者。1940年至1944年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后来还在中华民国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盛忠亮(化名: 米茨凯维奇、盛岳)(1906—?)——1926年至1933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1933年至1934年为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成员, 1934年6月底至10月初任执行局代理书记。被捕后投靠国民党。

施皮纳(卡拉伊万诺夫, И. Г., 化名: 施密特)(1889—1960)——1929年至1934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哈尔滨和上海工作站工作。1934年12月至1937年任季米特洛夫的干部

问题助理。

施特恩,曼弗雷德(化名:弗雷德)(1896—1954)——1930年至1931年为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驻美国侦察员。1932年为驻满洲侦察员。1932年至1934年任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主任助理。1936年任西班牙第十一国际旅旅长。1937年至1938年任库西宁的政治助理。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施瓦博娃,马利亚(1902—1992)——1929年起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1931年至1933年任捷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31年12月至1933年1月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1933年至1938年任捷共《布尔什维克》杂志主编。

史沫特莱,艾格妮丝(1892—1950)——美国作家、新闻记者。

市川正一(1892—1945)——1922年,1926年至1929年为日共中央委员。1923年至1924年,1926年至1927年被监禁。1928年,1935年至1941年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日共(缺席)委员。1929年被判处终身监禁,后在狱中逝世。

斯大林,И.В.(原姓:朱加什维利,化名:科巴)(1879—1953)——1912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任党中央总书记。1920年至1921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年至1943年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斯拉文斯基(原姓:卡恰罗夫斯基),亚当(1890—1937)——1930年至1933年任波兰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31年12月至1933年1月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候补委员。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斯拉武茨基,М.М.(1898—1943)——1931年至1937年任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1937年6月至1939年9月任苏联驻日本全权代表。

斯诺,埃德加(1905—1972)——美国作家、新闻记者。

斯诺,托马斯——1933年4月至12月任英国驻日本临时代办。

斯塔索娃,Е. Д. (1873—1966)——1918年至1920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30年至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年至1926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局委员。1935年至1943年为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至1937年任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斯托莫尼亚科夫,Б. С. (1882—1941)——1926年至1934年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1934年至1938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宋美龄(1901—2003)——蒋介石之妻。

宋庆龄(1893—1981)——1926年至1935年、1945年至1949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至1945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2年起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36年起任中华全国救国联合会领导人。后来还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职务。

宋哲元(1885—1940)——1931年至193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1933年任第3军团总指挥。1932年至1935年任察哈尔政府主席。1935年至1937年任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市长、河北省政府主席。

宋子文(1894—1971)——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至1933年任行政院副院长、代院长、财政部长。1933年至1935年为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32年至1933年、1935年至1939年任中国中央银行董事长。后来还担任中华民国政府的一些职务。

苏河清(1922—)——苏兆征之子、电影文献学者。

苏霍鲁科夫,Б. Т. (1898—?)——1931年至1934年先后在国

际列宁学校、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执教。

苏丽娃(1920—)——苏兆征之女。

苏兆征(1885—1929)——1927年至1929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年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28年至1929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至1929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年至1928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主席。1928年至1929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7年至1929年任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主席。

孙殿英(1889—1947)——1931年至1933年先后任张学良军队第40师师长、第41军军长、华北第9军团军团长。1936年至1937年任察北保安司令。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1947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在狱中病死。

孙广英(化名:留姆金)——1933年至1934年任中共吉东局委员会书记。

孙际明(化名:卡纳洛夫)(1908—?)——1933年初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局组织部部长。被捕后投靠国民党。

孙科(1891—1973)——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至1949年任中苏文化协会会长。1932年至1948年任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

孙连仲(1893—1990)——1932年至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0师师长。1933年至1937年任第42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孙逸仙(1866—1925)——中国同盟会、中国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奠基人和领导人。1912年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1917年至1918年、1921年至1922年和1923年至1925年领导广州政府。

索柯里尼科夫, Г. Я. (原姓:布里连特)(1888—1939)——

1917年至1919年、1929年至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0年至1936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至1932年任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1933年至1934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部务委员会委员。1935年至1936年任林业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T

塔尔冈斯基, M. A. (1906—?)——1932年至1933年在工农红军参谋部管理局工作。1933年至1934年任苏联上海总领事馆秘书。1934年至1937年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执教。

台尔曼, 恩斯特 (1886—1944)——1923年起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5年起任德共中央主席。1924年至1928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8年至1943年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年至1931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1年至193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委员。1924年至1933年为德国国会议员。1933年被盖世太保逮捕, 后被杀害。

汤玉麟 (1871—1937)——1928年至1933年任热河省政府主席。1933年从前线开小差。

唐云山——1933年至193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5军第93师师长。

特里利塞尔, M. A. (化名: 莫斯科文) (1883—1941)——1930年至1934年任俄罗斯联邦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候补委员。1935年至1938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委员和主席团委员。遭非法镇压, 逝世后恢复名誉。

特利特, 伊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信使。

特列季亚科夫, C. M. (1872—1939)——苏联作家。

特罗扬诺夫斯基, A. A. (1882—1955)——1927年至1933年

任苏联驻日本全权代表。1933年11月至1939年任苏联驻美国全权代表。

滕代远(化名:李光)(1904—1974)——1945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31年至1937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年至1932年任红5军党代表。1932年至1934年任红3军团政治委员。1934年至1937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天羽英二(1887—1968)——1933年6月起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副部长,1934年6月至1937年4月任情报部部长。

田颂尧(1888—1975)——1928年至1931年任四川省政府民政厅厅长。1932年至1934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1935年起引退。

田中义一(1863—1929)——1927年至1929年先后任日本首相、外相和殖民地相。

土肥原贤二(1883—1948)——20世纪30年代任日军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领导人。

托洛茨基,И. Д.(原姓:布龙施泰因)(1879—1940)——1917年至192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至1926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18年至1924年任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6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9年至192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后被暗杀。

W

瓦尔加,Е. С.(原姓:欧义根)(1879—1964)——1928年9月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至1947年任共产主义科学院(1936年起改名为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

瓦西里耶夫, Б. А. (1889—1937)——1929年至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1926年至193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常务委员会主席。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瓦西里耶夫, В. Я. (1900—1959)——1931年至1938年先后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几个书记处的顾问,同时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939年至1957年先后在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瓦扬—古久里, 波尔 (1892—1937)——法国作家、新闻记者。1921年起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6年至1927年任《人道报》主编。

汪锋 (1910—?)——1931年至1932年任中共陕西省军事委员会书记。1933年任红26军政治委员。1934年至1935年在中共中央上海局工作。1936年起先后在陕西省和中国东北从事党的一些工作和军政工作。

汪精卫 (1883—1944)——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至1935年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1932年10月至1933年3月赴欧治病。1935年11月遭暗杀受伤,1936年2月至12月再次赴欧治病。1937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议长。1938年任国民党副总裁。是年底投靠日本方面,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11月正式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

汪盛狄 (化名:阿尼西莫夫) (1898—?)——1927年至1932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1932年秋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

王炳南 (1909—1988)——1931年至1933年在德国工作:任德国共产党中国支部书记、国际反帝联盟东方部领导人。1935年至1936年任中国共产党德国支部领导人。1936年至1937年在中国西北做党的工作。后来还从事一些党政、外交工作。

王德(化名:林炯、乌格拉诺夫)(1900—?)——1926年至1927年、1928年至1933年在苏联学习。1927年至1928年在上海工作。1933年至1935年在满洲做党的工作。1934年至1935年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代书记。1935年至1937年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王德林(1879—1938)——1932年至1933年任东北救国第1路军司令。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河南郑州组织吉林光复军,任总司令。

王德泰(1908—1936)——1932年任(吉林省)中共延吉县委书记。1934年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政治委员。1935年至1936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副总司令兼第2军军长并被选为中共东满特委委员、中共南满委员会委员。在战斗中牺牲。

王公度(?—1937)——20世纪30年代为广西省政府委员、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37年9月被李宗仁逮捕。

王稼祥(原名:王稼蕃,化名:科穆纳尔)(1906—1974)——1934年至1945年、1949年至1969年、1973年至1974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45年至1949年为中央候补委员,1934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至1945年为政治局委员。1931年至1933年为苏区中共中央局委员。1931年至1936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外交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7年至1938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后来还从事一些党政工作。

王明(原名:陈绍禹,化名:伊万诺夫、戈卢别夫)(1904—1974)——1931年至1969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31年至1945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至1937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1931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1933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

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委员,1932年至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5年至1939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候补委员,1939年至1943年为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党的职务。

王世英(1905—1968)——1931年起在南京、上海、天津做党的工作。1933年至1934年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特科科长。1934年至1935年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军事委员会书记,1935年至1937年在中国北方和西北做地下工作,后来还从事一些党政工作。

王一飞(1899—1928)——1925年至1927年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秘书长、代部长。1927年10月起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后来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被国民党杀害。

王以哲(1896—1937)——1933年至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67军军长。被暗杀。

王云程(化名:梅尔库洛夫、张汉清)(1905—?)——1931年9月至1932年7月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至1930年在苏联学习。1931年6月至1932年7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2年11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1932年12月被捕后投靠国民党。

魏甘,马克西姆(1867—1965)——1931年至1935年任法国军队总参谋长、总司令。

温桑,让·加布里埃尔(1906—1989)——1944年至1987年为瑞士劳动党中央委员,1944年至1983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4年至1978年任中央主席,1978年起任名誉主席。1932年为Я. М. 卢德尼克和И. Н. 莫伊谢延科—韦利卡娅在上海的律师之一。后来在瑞士从事政治工作。

闻廷(音)(1904—?)——1934年至1935年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后来在中国做党的工作。

维经斯基,Г. Н.(原姓:扎尔欣,化名:斯蒂文松)(1893—

1953)——1932年至1933年任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海参崴局主席。1934年起从事科研、教学工作。

维欧维奇,沃雅(1897—1936)——1931年7月至1933年5月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巴尔干书记处顾问。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魏特麦尔,伊列涅——20世纪30年代为上海“时代精神”书店经理。

沃尔什,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上海站无线电报务员。

沃龙斯基,Л.——见黄平。

沃伦斯卡娅,Л. Г.(化名:罗莎)(1901—1937)——1930年至193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秘书。后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工作。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乌里茨基,С. П.(1895—1938)——1931年至1932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参谋长。1935年4月至1937年6月任工农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局长。1937年6月起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委员。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乌里扬诺夫斯基,Р. А.(1904—1995)——1930年至1932年在莫斯科东方学院执教、任副校长。1932年至1935年在国际土地研究所东方殖民地部从事科研工作,任副主任。

乌斯曼诺夫,哈里姆(1896—?)——20世纪30年代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吴克坚(1900—1986)——1927年至1932年在中共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至1936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1936年至1937年在法国从事党的工作。后来还从事党的工作。

吴亮平(化名:兰斯科伊)(1908—1986)——1925年至1929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1929年至1930年任《环球》周刊主编。

1930年至1932年被监禁。1933年至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任红3军团政治宣传部部长。1935年至1936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来还做党的工作。

吴奇伟(1890—1953)——1932年至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军政职务。

武胡景(化名:安德烈耶夫、林大生)(1899—1936)——1931年至1933年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1933年至1934年任军事委员会书记。1934年至1935年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特科科长。1935年起在苏联学习和工作。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X

西纳尼(斯卡洛夫,Г.Б.)(1896—1940)——1925年至1927年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1927年至1928年为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学员。1930年至193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导员。1932年至1934年先后任中美南美书记处主任和拉丁美洲书记处主任。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希特勒,**阿道夫**(1889—1945)——德国法西斯头子、纳粹德国头号战犯。1933年1月在垄断集团支持下出任德国总理。1934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元首,解散国会,取消所有反对派政党,残酷迫害和屠杀共产党人,实行法西斯专政。1936年法西斯德国与意大利建立柏林—罗马轴心,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1939年9月侵入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6月进攻苏联。1945年4月30日,盟军包围柏林时自杀。

夏曦(化名:梅塔洛夫)(1901—1936)——1931年至1936年

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31年至1934年任中共湘鄂西苏区中央分局书记。1934年至1935年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红6军团政治委员、湘鄂川黔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渡河时不幸牺牲。

谢尔盖耶夫(科廖夫),斯维亚托斯拉夫(1889—1950)——1933年至1943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1935年至1941年任季米特洛夫的政治助理。1939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执行局主席。

谢苗诺夫,Г. М. (1890—1946)——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首领。1921年起为旅居中国白匪领导人之一。1945年9月在满洲被苏军抓获,后被处决。

谢文东(1884—1946)——1934年至1939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后投降日军。

谢唯俊(1908—1935)——1931年至1933年任福建省中共永兴县委书记。1932年至1933年任红军第5独立师师长。1934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1935年在红军总政治部机关工作。在同土匪的战斗中牺牲。

肖克(1908—)——1956年至1969年、1977年至1982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73年至1977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任红一方面军第5师师长。1932年至1933年先后任第8军军长、第17师师长。1934年至1936年任红6军团军团长。1936年至1937年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红31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向忠发(化名:特生)(1880—1931)——1927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28年至1931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1927年至1928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1928年至1931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被捕后投靠国民党,被国民党处死。

项英(1898—1941)——1923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28年起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至1937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临时中共政府副主席。1931年至1933年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书记。1934年至1937年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司令员。1937年至1941年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东南局书记,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副军长兼政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4军书记。被叛徒杀害。

辛克莱,埃普顿 B.(1878—1968)——美国小说家。

徐宝铎(化名:王青)——1931年至1932年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1933年至1934年任共青团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1934年6月至11月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组织部部长。1934年11月被捕,后投靠国民党。

徐梦秋——1934年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1934年2月任红军大学代理政治委员。

徐名鸿(1897—1934)——1932年至193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秘书长。1933年至1934年任第19路军政治部主任。被暗杀。

徐向前(1901—1990)——1945年至1985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66年至1969年、1977年至1985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至1937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至1935年任红4军参谋长、红4军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1935年任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1936年至1937年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路军总指挥。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许包野(化名:包二)(1900—1935)——1931年至1934年任福建省中共厦门市委书记。1934年7月至10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4年至1935年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在狱中因病逝世。

许克祥(1890—1967)——1930年至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4师师长。1933年至1937年任第37军副军长。后来还担任一

些军事职务。

许伦山(音)——1937年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

许念曾——1934年至1935年任中华民国驻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总领事。

宣侠父(化名:杨永清)(1899—1938)——1930年至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5路军总参议。1933年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2军政治部主任兼第5师师长。1934年至1935年为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工作人员。1935年至1936年任中共华南工委书记。1936年任第19路军政治部主任、第61师参谋长。1937年任西安红军联络处主任。被秘密绑架杀害。

薛岳(1896—?)——1933年至1937年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5军军长、第6路军总指挥、第2路军总指挥。1937年至1938年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第19集团军总司令。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Y

雅科夫列夫, Я. К. (1894—?)——1925年至1937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汽车库司机。1936年为王明的私人司机。遭非法镇压。

雅罗斯拉夫斯基, E. M. (原姓:古别利曼, M. И.) (1878—1943)——1919年至1921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39年至1943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3年至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1934年至1939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阎红彦(1902—1967)——1931年至1932年为陕甘晋边区游击运动领导人之一。1933年至1934年在中共河北省军事委员

会工作。1934年至1935年在苏联学习。1936年至1937年任陕北游击队队长、红30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和党政职务。遭非法迫害，逝世后恢复名誉。

阎锡山(1883—1960)——1929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至1937年任山西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来还在中华民国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颜惠庆(1877—1950)——1931年至1933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1933年至1936年任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1936年起引退。

杨光华——1933年至1934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34年至1935年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来到苏联后于1935年遭非法迫害，后恢复名誉。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1940)——1932年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军事委员会代理书记。1933年任南满游击队政治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师长。1934年至1935年任第1军军长、中共南满省委书记。1936年至1940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长、第1路军总司令。在战斗中牺牲。

杨虎(1889—?)——1927年至1936年任上海警备司令。1936年至1937年任淞沪警备司令。

杨虎城(1893—1949)——1930年至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总指挥。1930年至1933年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37年至1949年被监禁。后被蒋介石杀害。

杨铨(化名:杨杏佛)(1893—1933)——1928年至1933年任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3年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总干事、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遭暗杀。

杨森(1884—1977)——1928年至1937年任四川省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后来还在中华民国担任一些军事和党政职务。

杨松(化名:吴绍镒,化名:瓦西里耶夫、吴平、华西里)(1907—

1942)——1931年至1933年在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局工作,并负责编辑《太平洋工人》杂志。1933年至1934年在红色工会国际东方殖民地部工作。1934年至1935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驻满洲代表、中共吉东临时特委书记。1935年至1938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1938年至1943年在中国做党的工作和教学工作。

杨天生(音)——1934年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组织部部长。

杨永泰(1880—1936)——1935年至1936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0年至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1932年至1936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遇刺身亡。

杨友民——20世纪30年代为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司令部参谋。

杨之华(化名:杜宁)(1900—1973)——1933年至1934年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组织部秘书。1935年至1941年在苏联工作。1935年至1937年任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执行委员会秘书。后来在中国做党的工作。遭非法迫害,逝世后恢复名誉。瞿秋白之妻。

饶漱石(化名:阿四、梁朴)(1903—1975)——1932年至1933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1933年至1935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主席。1935年至1936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后来做党的一些工作。

叶楚伦(1887—1946)——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年起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31年至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1935年至1937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叶若夫, Н. И. (1895—1940)——1934年至1939年为联共

(布)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1937年至1939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至1938年任中央书记。1930年至1934年任中央干部部部长。1934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主席。1936年至1938年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1935年至1938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被镇压,未恢复名誉。

殷汝耕(1885—1947)——1932年至1933年为上海市政府参事。1933年至1935年任河北省一些地区行政督察专员。1935年10月投靠日本。1935年至1937年任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抗战胜利后被捕,1947年被处决。

尤尔吉克,С. Б. (1885—?)——1931年至1933年任红色工会国际国际联络部部长。

有吉明(1876—1937)——1932年至1935年任日本驻华公使。1935年至1936年任日本驻华大使。

于学忠(1890—1964)——1931年至193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团总司令。1932年至1935年任河北省政府主席。1933年任第51军军长、天津市市长。1935年至1937年任川陕甘边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甘肃省政府主席。后来还在中华民国担任一些军事职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一些政府职务。

于右任(1879—1964)——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至1949年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余飞(1902—?)——1928年至1932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8年至1930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红色工会国际代表。1930年8月至1931年1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组织部部长。被捕后于1932年秋投靠国民党。

俞秀松(化名:那利曼诺夫)(1899—1938)——1927年至1932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1933年至1935年任伯力《工人之路》报

副主编。1935年至1937年在新疆做党的工作。被盛世才逮捕，后在苏联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袁炳辉——1930年起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起为共青团中央委员。1930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1年至1932年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书记。1932年底被捕后投靠国民党。

袁世凯(1859—1916)——1905年起为北洋军阀首领。1912年至1916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

约翰逊, 纳尔逊, T. (1887—1954)——1929年至1935年任美国驻华公使, 1936年至1941年任美国驻华大使。

Z

泽利特尔曼, J. X. (1893—?)——1933年至1935年先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站和驻哈尔滨站工作。1935年9月至1936年3月在苏联外贸人民委员部工作。1936年8月至1938年10月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负责建设方面财务的主任会计。

曾山(1899—1972)——1931年至1937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至1934年任江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财政人民委员、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5年至1937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章乃器(1897—1977)——1932年至1934年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1934年至1935年旅居香港。1936年至1937年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之一。1936年11月至1937年7月被监禁。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政府职务。

章太炎(章炳麟)(1869—1936)——反满清革命运动参加者、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

张聪——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学习。被捕后

投靠国民党。

张鼎丞(1898—1981)——1932年至1937年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至1937年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37年至1939年任中共闽粤赣边区委员会书记。后来还担任一些党的职务。

张发奎(1896—1980)——1929年至1931年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4师师长。1931年至1935年引退。1936年至1937年任闽浙皖赣边区国民革命军总指挥。后来还担任中华民国的一些军事职务。

张国焘(化名:斯皮里多诺夫、张彪)(1897—1979)——1921年至1923年、1925年至1938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年至1938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5年至1938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至1937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1年至1933年任中共鄂豫皖边区苏区中央分局书记、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3年至1935年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至1936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1936年至1938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1937年至1938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38年脱离中共。

张培元(1894—1934)——1934年任国民革命军第8师师长、新疆边防督办。自杀身亡。

张绶山(曾秀夫)(1910—1987)——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顾问。后来从事军事和科研工作。

张太雷(1899—1927)——1925年至1927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南京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在广州起义中牺牲。

张闻天(化名:伊思美洛夫、洛甫、思美)(1900—1976)——1931年至1969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31年至1956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至1935年任中共中央书记。1935年至193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总书记。1931年至1933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34年至1937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1935年至1937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还担任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职务。

张学良(1901—2001)——1928年至1932年任东北边防司令。1930年至1931年任中华民国武装力量副总司令。1933年至1934年引退。1934年至1935年任湘鄂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1935年至1936年任西北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1936年至1975年被监禁。

张云逸(1892—1974)——1945年至1974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31年至1934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至1937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1932年至1933年任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1933年至1934年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4年1月任中共中央驻福州军事代表。1934年至1936年任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张作相(1881—1949)——1928年至1932年任吉林省政府主席、东北边防军副总司令。1933年至1935年任华北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6军团总指挥。后来担任一些行政职务。

赵博生(1897—1933)——1931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参谋长、代理总指挥。1931年12月起义转到中共方面。1931年至1933年先后任红5军团第14军、第13军军长,红5军团参谋长、副总指挥。在战斗中牺牲。

赵观涛——1932年至193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第6师师长。1933年至1937年任第8军军长。

赵立人(郑玉龙)——1934年3月至6月任中共江苏省临时委员会代理书记。被捕后投靠国民党。

赵尚志(1908—1942)——1932年任中共满洲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恢复党籍。1934年至1935年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1936年至1937年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被俘后牺牲。

赵世炎(1901—1927)——1927年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被国民党杀害。

赵延清(音)——1933年任察哈尔省民众抗日联军参谋部外联处处长。

赵毅敏(刘焜)(1904—2002)——1931年至1934年被监禁。1934年至1935年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1935年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政治委员。1935年至1937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后来从事党的工作。

郑学稼(1906—?)——1935年至1937年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后来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

钟荣胜(1884—1969)——苏兆征之妻。

周保中(1902—1964)——1956年至1964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2年初任中共满洲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1932年至1933年任救国军联合总司令部参谋长。1934年任绥宁抗日同盟军中共党委书记。1935年至1937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周达文(化名:丘古诺夫)(1903—1938)——1927年至1932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和工作。1932年至1938年任伯力《工人之路》报责任编辑。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周浑元——1932年至1934年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5师师长。

周昆(1902—?)——1934年至1935年任红8军团总指挥。1935年任红1军团副参谋长。1935年至1937年任工农红军军事

学校校长。

周恩来(化名:莫斯克文、苏克、陈光、少山)(1898—1976)——1927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年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28年至1931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1年至1943年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至1937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3年任中共苏区中央执行局书记。1932年至1937年任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后来担任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职务。

周向城(音)——1934年6月为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被捕后投靠国民党。

朱德(原名:朱玉阶)(1886—1976)——1930年至1934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4年起为中央委员。1934年至1935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30年至1937年任工农红军总司令。1931年至1937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事人民委员。后来担任军队和国家的一些领导职务。

朱镜我(朱德安,化名:朱镜吾)(1901—1941)——1930年至1932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共党团书记。1933年至1934年在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宣传部工作,1934年10月至1935年2月任宣传部部长。1935年至1937年被监禁。后来做党的工作和从事军政工作。在战斗中牺牲。

朱理治(1907—1978)——1931年至1934年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1934年至1935年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代理书记、副书记。1935年任中共陕北苏区中央局书记。1936年任红29军政治委员。1936年至1937年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后来担任党的一些职务。

朱立(音)(黄宜新〈音〉,化名:黄秉新)(1909—?)——1932年

至1934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1935年至1937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驻上海代表。

朱绍良(1891—1963)——1931年至1935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5年起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年至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2路军总指挥。1933年至1935年、1937年至1940年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后来还担任中华民国的一些军政职务。

朱务善(化名:奥希波夫)(1896—1971)——1925年至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至1930年在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后来在苏联从事科研工作。遭非法迫害。1937年至1954年被监禁和流放。后恢复名誉。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科研教学和编辑出版工作。

朱蕴山(1887—1981)——1931年至1933年任革命军抗日联盟组织部部长。1933年参与建立察哈尔省民众抗日同盟军。并参加福建省人民革命政府工作。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一些社会和政治职务。

庄东晓(化名:布勃诺娃)(1908—2000)——1928年至1930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1931年在鄂西苏区做党的工作。后在党的机关和红军部队开展的“肃反”运动中受到迫害。

兹拉特金,И. Я.(1898—1990)——1930年至1938年在苏联驻蒙古大使馆工作。1930年至1932年在中国工作。后来在日本工作。1941年被日本当局逮捕,后被杀害。

邹韬奋(1895—1944)——1933年为国民保障同盟积极分子。1933年7月至1935年8月侨居国外。1935年9月至1936年2月任《大众生活》周刊主编。周刊被查封后,于1936年2月编辑出版《永生》周刊和《生活日报》。1936年至1937年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之一。1936年11月至1937年7月被监禁。后来从事编辑、出版工作。

左权(化名:拉戈津)(1905—1942)——1931年至1932年任红26军团第15军军长兼政治委员。1932年至1933年在党的机关和红军的“肃反”运动中受迫害,被监禁。1933年至1935年任红1军团参谋长。1936年至1937年任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在战斗中牺牲。

佐尔格,里哈德(化名:拉姆扎)(1895—1944)——1929年起在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工作。1930年1月至1932年11月和1935年先后在中国、内蒙古、菲律宾、美国等地工作。后被日本人杀害。

本丛书第7、8、9、10卷勘误表

第7卷

页	行	误	正
前言 12	13—14	以前共产国际	以前由共产国际
前言 19	倒 8	编纂了	编纂了
45	倒 5	第 70、71、71 团	第 70、71、72 团
58	倒 10	给这两名团长传达	给这两名团长下达
73	8	成为以比武汉时期更发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成为比武汉时期更加高涨的
81	倒 8	嘲笑	嘲笑
85	9	“组织”、“左派”	组织“左派”
86	5	不发达的形式	不成熟的形式
131	14	一些同导来审定	一些同志来审定
284	13	在一起的？	在一起的，
293	11	许多错误， 健康的基调)	许多错误)、 健康的基调
339	倒 1	组织感化主式	组织感化方式

第 8 卷

页	行	误	正
5	倒 10	桎桔	桎桔
63	10	“夸部门”	“跨部门”
	16	搞狭武主义	搞馱武主义
88	倒 4	买办阶级,他对	买办阶级对
201	2	秦记(音)。公司	秦记(音)公司
223	4	1929 年 11 月 14 日	1929 年 11 月
254	倒 3	对着于	对着干

第 9 卷

页	行	误	正
217	4	不应限止	不应限制
246	9	句结	勾结
261、 500	5、倒 9； 倒 10	蛊惑	蛊惑
239	10	由安排选党员	由按照选党员
280	6	热中	热衷
283	倒 2	革命行动的冒动	革命行动的暴动
386	倒 4	7 月和 8 月	7 日和 8 日
452	倒 3	应该建议与…联系	应该建立与…联系
508	11	融恰	融洽
546	倒 5	捎募新兵	招募新兵
572	15—16	曾反动过	曾反对过

第 10 卷

页	行	误	正
12	2	决议的对中国	决议对中国
25	倒 1	蛊惑人心	蛊惑人心
34	7	1931	1930
39	7	英租界省有有轨电车	英租界有有轨电车
55	注⑤	见第 631 页注①	(本注取消)
101	7	马列宁主义	马列主义
177	倒 8	化分	分化
226	倒 1	Z 向[忠发]	向[忠发]
232	7	进斗争	进行斗争
282	5—6 注②④	“反布尔什维克联盟”② 见第 517 页注①	“反布尔什维克联盟” (本注取消)
393	倒 3	潘家寰	潘家宸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丛书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页数=430

SS号=12054674

出版日期=2007.9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原书定价=298.00（共五卷）

主题词=共产国际 关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 史料 中国
1931—1937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关系 新民主
主义革命 史料 中国 1931—1937

参考文献格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第
15卷. 北京市：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09.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王明给米夫的信（1935年7月19日）

季立三就阿拉木图的工作给米夫的报告（1935年8月3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向起草关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的决议的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摘录）（1935年8月1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第3号记录（摘录）（1935年9月2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机关结构的决议（摘录）（1935年10月2日）

潘汉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非常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10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非常会议第8（A）号记录（摘录）（1935年10月15日）

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35年10月29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吴玉章的信（1935年11月16日）

中国工农红军的呼吁书（1935年11月）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戈帕涅尔的便函（1935年12月20日）

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提出的1936年第一季度中国工作计划（1935年12月23日）

赖特就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中共培养干部问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书面报告（1935年12月25日）

库西宁书记处给叶若夫的信（1936年1月5日）
王明与邓文仪谈话记录（1936年1月17日）
季米特洛夫给伏罗希洛夫的信（1936年1月21日）
王明与邓文仪谈话速记记录（1936年1月22日）
王明同邓文仪谈话速记记录（1936年1月23日）
王明给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的信（摘录）（1936年1月23日）
陈丕时给米夫的信（1936年1月23日）
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36年1月29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关于干部问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书面报告（1936年2月2日）
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36年2月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为中共培养干部的决定（1936年2月11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关于为中共培养干部的紧迫任务给联共（布）中央的书面报告（1936年2月19日）
米夫关于中共干部问题的书面报告（1936年3月4日）
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信（1936年3月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的形势和中共的任务的指示文件草案（1936年3月5日）
盛世才给王明的信（1936年3月15日）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摘要）（1936年3月23日）
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的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的形势和中共的任务的指示文件草案的补充建议（1936年3月27日）
王明和康生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书面报告（1936年

4月1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第43(A)号记录(摘录)(1936年5月19日)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45(A)号记录(1936年5月20日)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为同中共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进行谈判提出的建议(1936年5月20日)

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36年5月2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共代表同陈铭枢谈判的指示(1936年6月1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的决定(1936年6月23日)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53()号记录(1936年6月23日)

陈铭枢给中共中央委员们的信(1936年7月1日)

潘汉年给王明的信(1936年7月1日)

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6年7月初)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1936年7月2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第60(A)号记录(摘录)(1936年7月23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不早于1936年7月25日)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61(A)号记录(摘录)(1936年7月26日)

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6年7月2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给中共中央的贺电草稿(1936年8月23日)

赖安关于艾萨克斯的书面报告（1936年9月7日）
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1936年9月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格伯特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1936年9月29日）
季米特洛夫给王明的电报（不晚于1936年11月20日）
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6年12月1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信（1936年12月23日）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106（ ）号记录（摘录）（1937年1月1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7年1月1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第107（ ）号记录（摘录）（1937年1月2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7年1月20日）
宋庆龄给王明的信（1937年1月2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7年1月28日）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109（A）号记录（摘录）（1937年1月2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7年2月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7年3月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7年3月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7年3月5日）

王明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7年3月1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7年3月2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7年3月28日）

乌里茨基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37年4月3日）

瓦尔加关于中国主要发展趋势的报告的基本论点（1937年4月20日）

上海党的工作者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37年5月14日）

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7年6月17日）

中共中央关于周恩来同蒋介石第二次谈判情况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报告（1937年6月17日）

王稼祥关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中共的任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提纲（1937年7月10日）

毛泽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1939年8月26日）

布劳恩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的关于福建事变的调查材料（1939年9月21日）

布劳恩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1939年9月22日）

人名索引

勘误表